

安徽历史系列专著

捻军调查与研究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马昌华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安徽历史系列专著

捻军调查与研究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马昌华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出版登记号:皖(01)号

责任编辑 秦 闯

封面设计 钱念孙

捻军调查与研究

马昌华 著

*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合肥市科委晓星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7.875 字数:19.75万

1992年3月第1版 199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02000

ISBN 7—212—00721—8/K·203 定价:4.20元



从涡河北岸远眺涡阳县城(雒河集)



蒙城与亳州分界之普济桥,桥旁是捻军雒河集会盟的山西会馆旧址



张乐行故居旧址



张宗禹故里张大庄之远景



张乐行家祖茔地



张琢(禹爵)及妻蔡氏墓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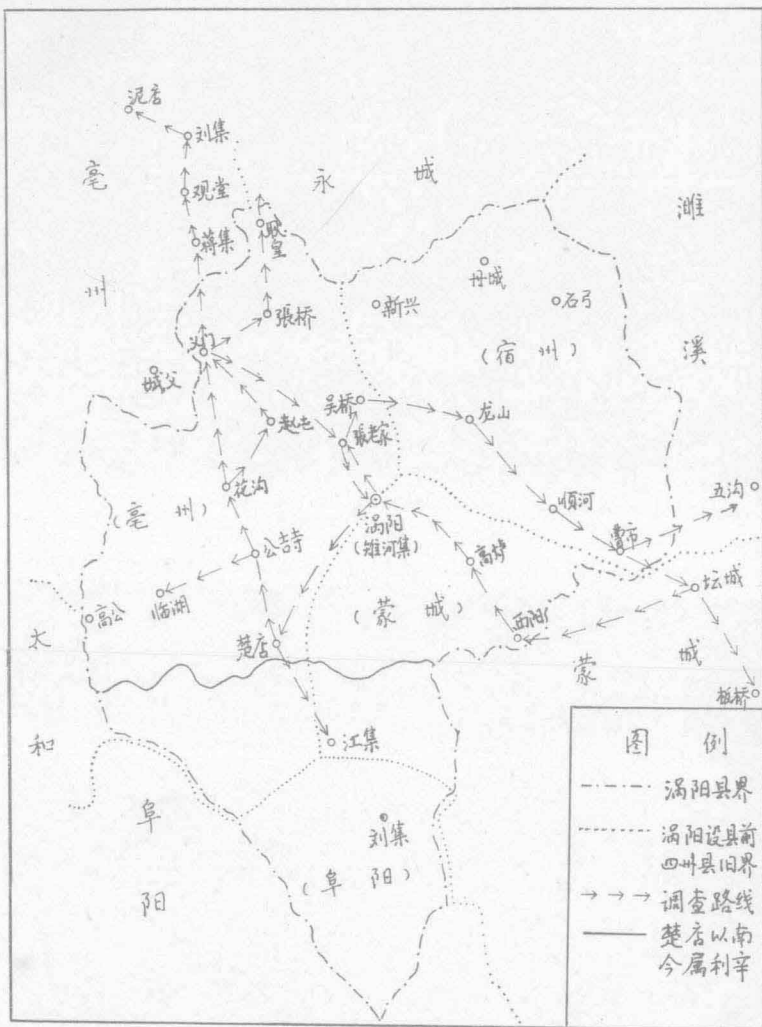


张乐行画像(牛春晓)



涡阳县捻军故事小组牛家昆于
1959 年访问张敏行之曾孙张羹才

—



《安徽历史系列专著》前言

安徽历史系列专著是系统介绍安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发展概要的地方史学术专著。它是根据1986年4月安徽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课题之一，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撰写的。

安徽位于华东腹地，地处黄淮海大平原南部，东接沿海省份，南与赣浙毗邻，巍峨的大别山蜿蜒西境，地当冲要。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用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创造出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财富，为发展伟大祖国的经济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数千年来，华夏神州所经历的种种风云变幻，都曾在江淮大地上引起强烈的激荡和反响；无数安徽志士仁人，能工巧匠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创造，则在伟大祖国的历史长河中，汇入一朵又一朵绚丽的浪花。安徽地方史是中华民族悠久文明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安徽襟江带淮，山河壮丽，地腴物丰，但在远古时代，这里洪水横流，一片汪洋。相传大禹统帅华夏、东夷各族民众劈山疏导，弭平水患，并“会诸侯于涂山”，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从此踏进了人类文明的大门。禹

也成了江淮儿女世代传颂的英雄。或与安徽是在治理水患之后步入文明有关，从此，“公共工程”——治水几乎成了安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面镜子，经济的发展与停滞，王朝的兴盛与衰落，社会的安定与动荡，政治的清明与腐败，都或隐或显地与治水相关联。春秋时，楚令尹孙叔敖督修芍陂，楚国末年才得以建都寿春，并获得数十年的安定。其后，东汉王景、三国刘馥、魏晋邓艾，或治塘陂，或兴屯田，江淮人民咸受其益。公元1127年，宋室南逃，决黄入淮，不仅最终丧失了对这块土地的统治，而且造成沿淮人民长达700余年的洪涝灾害，严重影响了安徽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安徽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社会历史的变迁与发展是在阶级斗争中曲折前进的，体现了阶级社会的共同规律。同时，不难看到，安徽在其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植根于自然经济土壤上的地方封建宗族势力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无论是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岗埠起伏的江淮丘陵，还是峰峦矗立的皖南和皖西山区，聚族而居的村落、圩寨星罗棋布，甚至一些城镇也划片分族而居。这一支支血缘家族，往往拥有武装。当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这类地方封建武装中的一部分，可能与破产农民、游民为主体的各种秘密会社如东汉太平道、元末白莲教、清代捻军等相结合，成为反抗和破坏封建统治的力量；而另一部分则投靠统治阶级，如清代的团练武装，成为镇压人民起义的帮凶。当民族矛盾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他们大都成为反抗外来民族侵占的重要力量，如秦晋淝水之战中主要由两淮健儿组成的北府军、南宋抗金前线的淮军等。当封建中央政权在各种社会危机的冲击下，削弱了对地方政权的控制的时候，这类封建地方武装有的也起着“保境安民”的作用，同时又在此旗号下进行着激烈的畛域斗争，与朝廷抗争并逐步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当旧王朝在人民起义的打击下濒临崩溃、改朝换代的时候，实力较强的封建地方武装，或从起义队伍中蜕化出来，或在镇压起义过程中，成为改朝换代的工

具，如东汉末年的魏曹集团、唐末的朱温集团、元末的朱元璋集团、近代的淮军及北洋军阀皖系集团等。

(三)数千年来，尤其是封建制确立以来，农业生产一直在安徽社会经济中起主导作用。尽管封建社会后期出现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起显著作用的徽商，但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依然是最基本的经济结构。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历经数千年的演变，以江、淮为界，逐步形成淮北、皖中和皖南三大块各具特色的经济区域，并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由北向南的倾斜。这三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一方面固然由于人口的迁移以及地理和气候的差异等自然原因，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历史变迁中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逐渐向长江流域南移的痕迹。

(四)进入近代，安徽经济毫无例外地纳入全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结构中。由于安徽地处华东腹地，靠近沿海，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侵略与冲击，但这种侵略与冲击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总是要比沿海地区略显迟缓。就全省而言，除沿江、沿淮少数城市以及沿淮烤烟种植区、皖南、皖西种茶区等少数地方，出现带有较强半殖民地色彩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外，其余广大地区仍是封建自然经济占着显著优势。这种格局，决定了安徽随着旧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的加深，逐步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供应地的命运，同时也造成了安徽近代工业发展缓慢、步履蹒跚的状况。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安徽并不落后，只是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百余年里，较之经济较发展省份，才渐呈落后之象。究其原因，从根本上讲，完全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在这里残酷压榨、竭泽而渔所酿成的。在近代中国一步一步地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中，安徽既受资本主义侵略之害，又受封建主义压榨之苦，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五)由于上述经济、政治、自然、地理诸因素的影响，在

安徽这块丰蕴灵秀的土地上，上自先秦下迄现代，人才辈出，涌现出了大批的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学者以及在历史上曾有重大影响、值得研究的历史人物如管仲、曹操、华佗、包拯、朱元璋、方以智、梅文鼎、戴震、方苞、姚鼐、吴敬梓、李鸿章、吴汝纶、孙家鼐、段祺瑞、陈独秀、周学熙、胡适、黄宾虹、陶行知、王明、冯玉祥、王稼祥、张治中、李克农……他们活跃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舞台上，对当时乃至现今的政治和文化等，都有一定的影响。与历史上安徽经济重心由北逐步向南转移相联系，安徽人才群的涌现也呈现出了同样的趋势。

(六)富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这是安徽人民在谱写自己的历史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鲜明特征。数千年来，尤其百余年来，安徽各族人民在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艰难曲折进程中，养成了刻苦耐劳、追求进步的坚强性格，他们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每次都以革命的手段来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

由陈胜、吴广发动的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大起义在蕲县（今宿县）大泽乡兴起，终于推翻了残暴的秦王朝。元末颍州刘福通、凤阳朱元璋先后领导义军推翻了元王朝的统治。又如东汉黄巾、隋末杜伏威、唐末黄巢、北宋方腊、明末李自成、张献忠，军锋所至，江淮健儿，踊跃响应。及至近代，更有太平军、捡军的金戈铁马，驰骋江淮，转战中原；辛亥义军，光复各地；

“二次革命”，誓师讨袁；安徽人民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真是前仆后继，可歌可泣。但从根本上讲，这些革命最终都留下了失败的记录。这表明，农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理论和共和国方案都不能救中国、救安徽。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在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安徽人民英勇奋斗的革命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得到升华，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

之一的陈独秀，早期活跃在安徽，培育了一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崛起于包括皖西在内的大别山区，创立了名闻中外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二师、四师、五师、七师驰骋在大江南北、淮河两岸，使日本侵略军闻风丧胆。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震撼了南京国民党反动统治。在尔后发动的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中，安徽人民积极参战，奋勇支前，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作出了重大贡献。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牺牲奋斗，安徽人民终于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几千年来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结束了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欺凌奴役的历史，人民成了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历史具有连续性。今天的安徽是前天和昨天安徽的继续和发展。在举国、全省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坚持不懈努力奋斗的今天，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开拓创新，编撰一套资料翔实、观点明晰、体例严谨的安徽历史系列专著，这是我省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大工程，也是服务当代、惠及后人的一项重要工作。这套专著是对安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乡土教材，它有助于广大读者重温我们伟大祖国这块土地上的悲惨史和光荣史、苦难史和斗争史，思昔抚今，从中吸取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祖国、热爱安徽的巨大力量，努力培养自己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也有助于广大读者进一步认识安徽省情，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指引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抓紧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抓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改变安徽面貌、振兴安徽、建设安徽

贡献力量。安徽历史系列专著的陆续问世，对繁荣社会主义的学术文化园地，是十分有益的；对那种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也是有力的反击。

安徽历史系列专著包括《安徽古代史》、《安徽近代史》、《安徽现代史》、《简明安徽通史》以及有关安徽历史上重大事件、人物等的专题研究著作，拟用五年时间陆续编撰并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前四部通史性的著作和若干专题研究著作。

为了完成编撰任务，由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安徽省人民政府、中共安徽省顾委以及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省出版总社、省文化厅、省档案局、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有关负责同志组成编委会，加强对这套系列专著的指导协调和质量把关；由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承担具体的组织和编写工作，并根据需要，聘请省内有关专家、学者承担部分撰写任务。

由于水平所限，加上时间仓促，疏漏与缺点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安徽历史系列专著编委会

1990年1月

目 录

《安徽历史系列专著》前言·····	(1)
捻军调查记·····	(1)
捻子的产生及其初期活动·····	(48)
再论“捻”与白莲教的关系·····	(73)
论捻军与太平天国之关系·····	(87)
捻军起义与淮北圩寨·····	(98)
捻军雒河集会盟时间考·····	(141)
捻军人物姓名小考·····	(149)
张乐行传略·····	(156)
张宗禹传略·····	(161)
戊戌涡阳刘朝栋等起义·····	(165)
捻军传说故事考实·····	(175)
捻军歌谣真伪辨·····	(196)
附录一 《中国人论捻军起义》导言·····	(213)
附录二 捻军歌谣·····	(224)
后记·····	(237)

擒军调查记

前 言

这篇擒军调查记，是根据20多年前的调查访问记录写成的。1958年秋天，安徽科学分院历史研究室组成一个擒军调查组，曾在皖北涡阳全县和蒙城、亳县、濉溪、河南永城的部分地区，进行为时两月的擒军史迹的实地调查。调查结束后，先将搜集到的擒军民歌整理注释；后又根据调查资料，参照文字资料，由张珊和我写了几篇文章，先后发表；而正在撰写的擒军调查报告，为当时编修省志的中心任务所中止。近偶从尘封的旧书堆中检出1958年擒军调查的原始记录，和一部分当时整理的调查资料残稿。这批调查资料，前几年屡有人问起，现把它整理出来，公诸同好。

动笔之前，为了帮助自己追忆当年的调查情景，又于1980年11月重访涡阳。承蒙县文化局的热情接待，并得以看到曹市《牛氏家谱》，所记牛斐然、牛师韩父子事，较《涡阳县志》为详。我又造访了张老家。张老家完全变了样子，残留在我记忆里的张老家，已不复存在。张乐行的故居，当年的乐行小学，经过一场浩劫，多已变成残垣断壁，仅剩土墙瓦顶的平房三间，现作大队办公室。凝视良久，低徊不置，怅然离去。回到涡阳，我又去寻找

山西会馆，几经询问，才在民房中间找到。山西会馆的命运远较张乐行故居为好，已经重新修复。二者同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县文化局的同志告诉我，上面拨给的文物经费有限，张乐行故居亟待修复，苦于经费不足。离开涡阳，我循着当年捻军由雉河集出征淮南的足迹，从涡阳乘火车到阜阳，转乘汽车至淮河边，由南照集渡淮至霍邱，经六安回合肥。于是动笔写这篇调查记。

我们1958年的捻军调查，是按捻军的五色旗区域，以集镇为点，象撒网一样，分赴周围村庄访问。涡阳农村，多聚族而居。捻军的五色旗，亦是按地区和宗族姓氏划分的：黄旗多为张姓，在张老家一带；红旗多为侯姓，在吴桥寺、侯集一带；黑旗地区在义门集以及与之接壤的河南永城境；蓝旗地区在涡阳以东，主要是顺河集一带的韩、刘二姓，和蒙城坛城的任姓；白旗在涡阳西南，主要是公吉寺、楚店、江集龚、孙、江三姓。两个月的时间，调查组先后到过涡阳、蒙城、亳县、濉溪和河南永城的大小集镇村庄300多个，被访问者达1000人次，搜集到大量有关捻军的口头资料和少量实物，多为捻军初起时在当地的一些遗事，而捻军后来出征在外地的战斗事迹较少。这些流传于民间的口头资料，虽嫌零星不系统，但多是由捻军成员直接传下来的，有的史料价值很高，颇为珍贵，可以弥补一些捻军本身资料的匮乏。通过实地调查，也解决了一些文字资料中长期纠缠不清的问题，如“捻”字原是地方方言，与铺、伙、股同一意思；“堂主”是“趟主”之误；捻的组织是利用宗法氏族和亲朋故旧的关系，而非利用宗教形式。

最后，对《捻军调查记》的内容，作几点必要说明：

一、这篇调查记仅是我所进行的调查，资料是按地区整理的，少数内容似是重复，因有的传说不限于一个地区。其实，内容亦不尽相同。

二、民间口碑，辗转流传，必然会出现“异文”，还有真伪并陈、精芜混杂的现象。整理这些口头资料时，做了些去伪存真、弃芜留精的抉择，但也只能尽量摒弃一些明显的无稽之谈。

三、口头资料里面有不少方言俚语，而当年当地称呼人都习惯在姓名中间加一个“老”字，表示尊敬，如张老乐（张乐行）；或称其绰号，如龚瞎子（龚得），以示亲昵。相沿成习，日久天长，有的人名字倒不为人所知，如韩老万。我当时的调查访问，多按其原话记录，现保持原貌，少作改动，以免失去民间口碑的语言特色，必要的注释，加在后面（ ）内。

四、为避免内容的冗长芜杂，和为行文的方便起见，调查访问时提供资料的老人名字，就不一一写出。附以访问过的人名单于后。

附记：这篇《擒军调查记》原发表在《安徽史学》复刊（1984年）第一期，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复印资料曾转载。今年我们开始“淮系集团”课题的研究，整理资料发现一摞手抄稿件，是10年前省图书馆归还社科所图书时，视为废纸，丢弃一边，被一同志掘拾起来的。其中有一本是我整理的擒军人物的调查资料，即题名亦为《擒军调查记》的手稿。它除了根据我个人的调查外，有的则完全是别人调查的资料，如蓝旗首领韩万峰，交由我整理，而且交代一个问题的调查经过。这部3万多字的稿子，在我的记忆中已没有一点印象了。在我写《擒军调查记》（1981年）时，早知它就尘封在身边，不但可省时省力，而且内容也可较为充实些。值《擒军调查与研究》的付梓，予充实以弥补之。同时改动个别文字，改正初刊手民之误。谨此说明。

8月7—11日 涡阳县城

1958年8月6日，我们擒军调查组一行5人，首途去涡阳，由合肥乘火车到蚌埠，住了一夜。翌日，又从蚌埠乘汽车，经怀

远，蒙城到达涡阳。

涡阳县城即原来的雒河集，在涡河南岸。清政府在把皖北的捻军起义镇压下去以后，为了加强对这个“三不管”地区的统治，于1865年析蒙、亳、宿、阜4州县之地，设置涡河县，县治即设在雒河集。

初到涡阳，人地生疏，首先是向县里了解情况和联系调查的事宜。县委宣传部予以大力支持，派县文教科的贾浩修同志协助调查组工作，负责与下面乡社的联系，同时在县城内进行调查。我访问的7位老人，其中有田振邦的侄儿田剑霞和侄女（刘天福的孙媳妇）刘田氏，得到了一些有关张乐行和田振邦兄弟的资料。

一、张乐行

张乐行起反那年是闰八月，反了12年，又是闰八月那年平的。

张乐行他们第一次聚会，在（涡）河北门里王三老玉（王玉山）家。那时北门里有一四方凉亭，起反时张老乐对三老玉说：这里只能接官，不能让我们兄弟干吗？三老玉说：那还用说。三老玉以后是蓝旗头。

张乐行称“盟主”，是我们所访问的老人所共知的。但对张乐行大旗上写的什么字？稍有不同的说法：“替天行道，杀富济贫”，“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大汉盟主张”。但都不知道张乐行有“大汉明命王”的称谓。

二、山西会馆

雒河集在明代就有山西帮商人，原有山西会馆。据山西帮商人的后人桑剑斗说，他曾看到过明代重修会馆的碑记。咸丰年间毁于兵燹，光绪二十四年重修。我们当时仅看到遗址。

捻军雒河集会议的地点，是否在山西会馆？我们所访问的老

人，说法不一。

三、田振邦兄弟

田振邦弟兄6人，振邦排行老三。老大田振起，老二田振景，老四田振存，老五的名字忘了，老六田振跃。老大、老二、老三、老五都干捻子。老五于起事后不久，大约咸丰五六年，战死在狼山。老二田振景大约在咸丰七八年战死在河南鹿邑。

田家原是涡阳城北十二里的城楼人。起事以前，住在宋牌坊一个地主的车屋里。家里很穷，老四振存和老六振跃跟随母亲讨过饭，田振存还在宋牌坊的地主家当过雇工。

田振起是红旗黄边旗头，他的领旗地区从武家河到赵屯，领彭渡口、洼张、宋牌坊三个庄，约有100匹马。

田振景是黑旗黄边旗头，他的领旗地区是赵屯到高炉，约有三千人。

田振邦是黄旗白边旗头，他的领旗地区从张老家到丁庄集，约十三四里，有1000多人。田振邦干捻子才十三四岁，头上还留个茶壶盖（儿童的一种发式），上马还要跳（踩）石滚子。

田振×是黄旗黑边旗头，他的旗领地区从张老家到八里庙，约有三四百人。

田振起同田振邦在僧王来“平反”时，投降清家。田振起降清后在马队里当哨官，后升为营官，以后因打仗残废回家来，在家住了10多年，病故。田振邦降清后先当营官，后升五营统领，接着因在东北佳木斯打白狼有功，升为四川提督。辛亥革命后，跑到北京住了一年多，于1914年8月9日病故。

四、刘天福

刘天福生于道光十四年三月五日寅时，死于光绪七年九月初四日。家里原来很穷，只有黄塘一块老陵地。刘天福十七八岁就

干捻子，是绿（蓝）旗，降清后做统领。

8月12—15日 张老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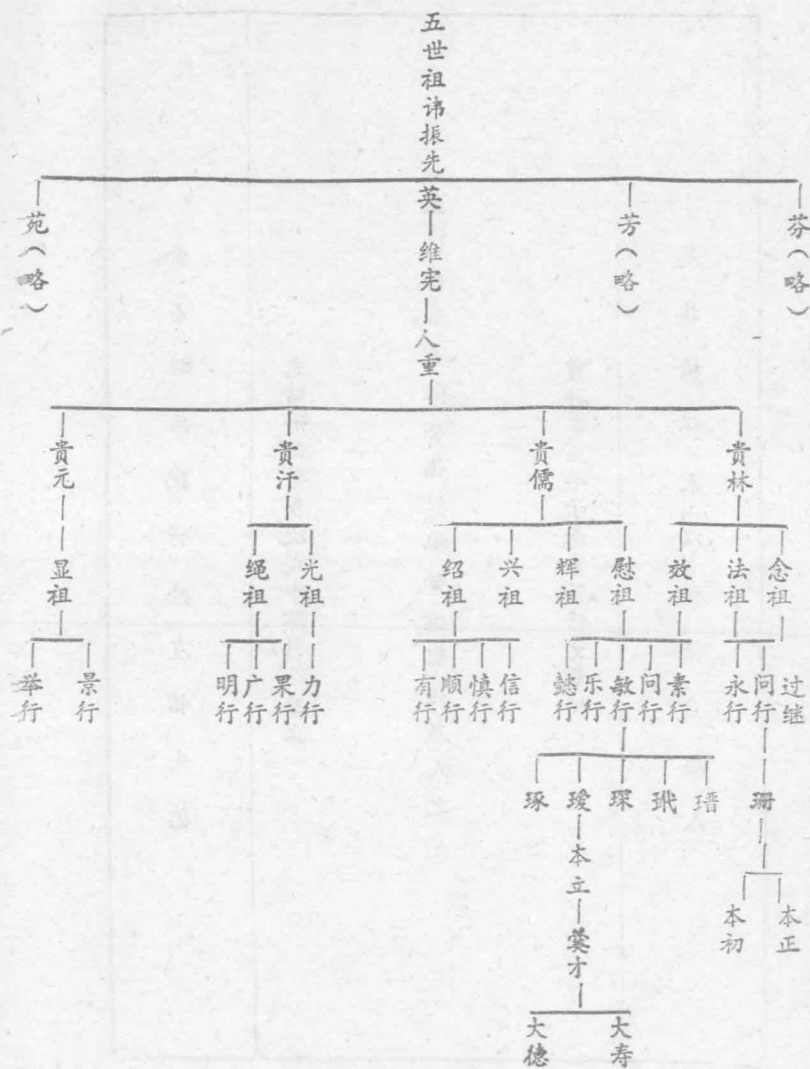
在涡阳城内调查后，我们于8月12日清晨，向张乐行的故里张老家进发。出涡阳北门，过涡河向西北，行进于田间的蜿蜒土路。12里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张老家是个大村庄，村内及附近村庄多为张姓，向称“十八门张”。在张老家的4天时间，我访问了张老家、贾楼、卢楼、张暗楼4个村庄的9位老人，并看了张家祖茔里的4块碑石：张乐行父慰祖母燕氏墓碑（1908年）；张敏行墓碑（1908年）；张琢（五孩）墓碑（1914）；张氏小宗图碑（1917年）。从而得知一些有关张乐行的家世和张氏家门参加捻军起义的情况。

张氏小宗图

序 文

吾张氏族谱，于光绪初年，幸先哲虑远忧深，由始祖墓侧之宗图令派衍支，分门第亲疏，皆一一叙明焉。奈时逢凶荒，恐代远年湮，一遇兵燹，派衍失传。于是，又叙吾小二门之宗图，敬勒诸碑，立于五世祖墓侧，俾春秋祭扫，得共仰观焉。噫！数百人之身，一人之身也。知念祖宗以念族人，庶几亲睦之情，油然而兴。乖争之气，肃然以敛。即幼子童孙，皆知敦忠厚而戒浇漓。创业守成，绵嗣诸于无疆矣。

张氏小宗图



张乐行父母墓碑

金石刻画犹将睦友铭先德

光緒卅四年岁次戊申肆月谷旦立

皇清故耆英张公讳慰祖暨德配燕孺人之墓

曾孙本立率子羹才孙修文奉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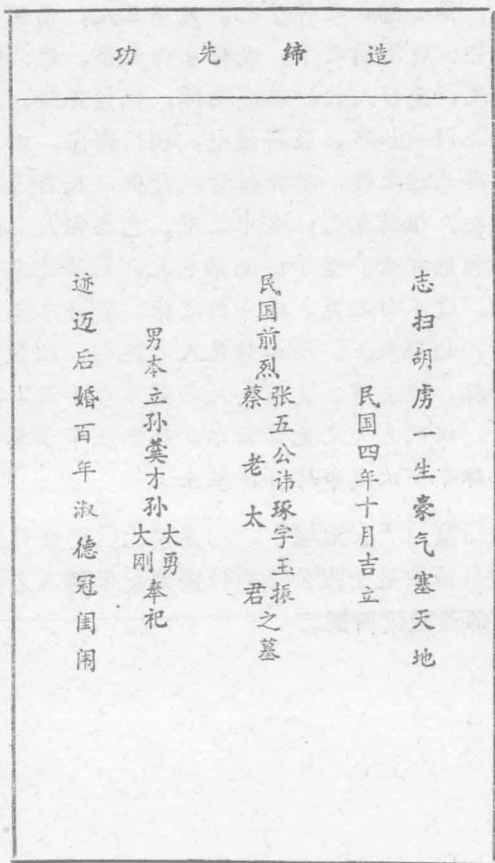
是非禎祥永以福祿启后人

张敏行墓碑文

昔敏翁者，张公慰祖之仲予也。兄弟三人，伯问翁，仲即公，季乐翁。皆少负不羁之才，咸得乡曲之誉。贵义轻财，赙穷恤匱；恭尔近礼，爱好人伦。道咸之际，饥馑荐臻，故四方就以求食。而公等见门庭如市，畏得譴怒，闭门谢客，以求苟免。而官司之尊，不察疏远之行，妄加诘责，故少以人自卫，甯身于远。夫祝聃之矢，惟冀免己；武中之甲，岂思害人。而小人媒孽其短，公等亦相继即世。嗟乎！兄弟不天，同罹忧患；妻子无辜，横被鲸鲵。遭不白之冤，延一线之脉。厥孙本立，零丁孤苦，辗转虎口，始得成立。而心悼先人之死别，欲聚亡魂于一兆。于是为棺梓，谨安厝。又惧先人之冤不白于天下，故金石刻画，略叙德行，以明先人之无罪云尔。孙本立率子英才孙修文奉祀。光绪叁拾肆年岁次戊申肆月谷旦立。

按：张敏行墓是“衣冠塚”，与妻侯氏合葬在其父母墓侧，墓碑正面刻“皇清故处士张公讳敏行暨德配侯孺人之墓”。碑文为张本立的蒙师董廷馆所撰。

张琢墓碑



按：张琢即幼沃王张禹爵，张敏行之第五子，小名五孩，据张氏后人说，与蔡氏是幼年订婚，送到张家。张琢十七八岁时成婚（一说根本未结婚），婚后18天跟擒军外出征战，后战死北方。

一、张 乐 行

张乐行，瘦高条，背微驼，脸上有几个细白麻子。家有三四顷地，在吴桥寺开过粮行、糟坊，摆过赌场。他交游甚广，招揽四方，疏财仗义，是个仁义光棍。手下有一批抢手，给人保运私盐，有次从山东回来，路过河南永城马收集，撵人家的绵羊。当地老牛会的头子王武举（王照琼）带人跟后追来，并说：“有种的就再来赶（羊）。”张乐行的人第二次又去撵羊，十八弟兄被捉住，关在永城监牢。张乐行同龚得去打永城，劫狱救出十八弟兄，杀了王武举全家，回来就祭旗起事了。张乐行妻马氏，妾杜金蝉，据说原是张家的使用丫头，人很聪明，又有头脑，能为张乐行出谋画策。

张乐行是在尹沟失败后，在酉阳集为叛徒李四一（李勤邦）出卖被擒的。就义在庙集周郢，先用铁钩从肛门拉出大肠，然后零割，死得很惨。

二、张 问 行

张问行，张乐行长兄，过继给堂伯父张念祖。早死，没有参加擒军起义。所遗一子张珊，却是黄旗首领之一，后来降清。

三、张 敏 行

张敏行，张乐行次兄，瘦高条，一只眼，外号“闯王”。病死在南乡，张家祖坟里有他的衣冠塚。

张敏行五个儿子：璠、玳、琛、璵、琢。老大张璠和老三张琛，随张乐行转战各地，于同治二年在涡河南张长郢战死；老二张玳，病死在家，老四张璵和老五张琢，后跟随张宗禹征战，张琢死在山东，张璵同张宗禹在徒孩河边不知所终。

张乐行就义后，张家男的征战在外，女的不是坐牢 就是在

逃。张敏行妻侯氏和张琛妻侯氏都被抓进亳州监牢杀害；张璠妻王氏和张琢妻蔡氏，逃跑在外，幸免于难。张琛妻侯氏在监牢里生一男孩。张璠妻兄王光宗同亳州团练首领段老谋（段谋南），交情深厚，段老谋设法从监牢把孩子抱出，谎称是女孩，由自己抚养。段家因此曾被抄家。孩子长到四五岁，才由张家两个寡妇领回，抚养成人，取名本立。本立子羹才，时（1958年）已70多岁。

四、张琢（五孩）

张琢，张敏行的第五子，所以小名叫五孩，跟随张宗禹带马队，打仗很厉害，当时人说，没有十二成的种，不敢跟他干。打仗时是一匹马两个人，一人骑在马上，一人抓住马尾巴，冲进阵去，一下就把官兵的阵式冲散。张琢是在山东经过一个梨园，他在马上欠身伸手摘梨时，被枪子打中卵子（睾丸）而死。

五、张崇先

张崇先，张老家人，与张乐行同族，是“旗杆底下”（指宗族支派）的。他有学问，在张乐行跟前做文差事。擒子失败后，回到张老家，被人告发，弄到宿州受重刑，两手的五指都并在一起，两脚的筋骨折断，成为瘸子。在宿州牢里蹲了一年多，死不承认在张乐行跟前当过“先生”，州官拿他无法，就把他放回家了。

六、张岳先

张岳先，小名叫岳，张老家人，也与张乐行同族。他善吹唢呐，给张宗禹的马队当号头。传说在同僧格林沁打仗时，张岳先一吹唢呐，僧格林沁的马队就“炸”了。后来他被僧格林沁的人俘获，僧王就要试试他的本领，命令部下摆开马队。张岳先爬到

屋顶上，一吹唢呐，僧王的马队就真的炸开拢不住了。僧王也没有杀他，还给他十两银子，把他放了。

七、张 德 才

张德才，小名羊，与张乐行不同族。据说他的上辈是张老家花了两顷地（实际上是一块荒地）从袁楼勾过来的。张德才的力气很大。他在张运蓝家当长工，有一次张运蓝叫张羊到家东老陵地里去把那棵槐树伐来，四把半粗的一棵槐树，张羊伐下后，就一个人扛来家了。张羊的枪法准，是撵绵羊的十八人首领。

8月16—19日 吴桥寺

8月16日清晨，我们离开张老家，北行八里到吴桥寺。吴桥是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集，有一家小饭店，也就是通常乡村大道旁的过路店子，但可为我们解决食宿的问题。

到了吴桥寺，即进入擒军的红旗地区。当地有“南张北侯”的说法，就是以吴桥为分界线，南面是“十八门张”的势力范围，北面是“九里十三侯”的势力范围。

我在吴桥先后访问了吴土楼、刘破桥、前董、后董、张小桥、张大庄等6个村庄的11位老人。其中吴土楼（在吴桥东三、四里）的84岁的侯怀德，对擒军的事迹知道的很多，我曾三顾其“茅庐”，听他讲了两天的擒军佚闻逸事。侯怀德的父亲侯大昌和叔父侯霞昌，当时都参加擒军。吴土楼是吴、侯两姓，姓吴的住庄东头，因是张振江的姑母家，所以是黄旗，旗头是吴双、吴贵；姓侯的住庄西头，是红旗，旗头先是侯红，后来战死，就由侯霞昌带队。擒军失败后，侯大昌、侯霞昌弟兄俩都回家不干了，侯大昌后来还当吴土楼的圩长。侯怀德所知道的擒军事迹，是直接从其父辈那里得来的“家传”，是比较珍贵和可信的。在

吴桥寺的调查，收获最为丰富，主要是侯怀德所提供的。

一、贩私盐和撵绵羊

当时江南（按：指安徽。当地老人们仍习惯称安徽为江南，因安徽建置前属江南省）吃淮盐，河南吃大盐（长芦盐），江南到河南去贩大盐。贩私盐用四五条牲口拉的太平车，一车可拉二三十包盐，每包百把斤。一年可去二三趟。咸丰年间，1吊钱到单县（山东）可买大盐30斤，到这里20斤盐可卖1吊钱。张老乐的人给人保运私盐，每趟每车给一包盐，一弄就同辑私的盐巡打仗。一次从北面贩私盐回来，路过永城，冒充官家赶人家的绵羊，羊也撵来了，后面人家追来，在马桥两下打起来，刘百雅掉到桥底下淹死。老乐第二次带人去给刘百雅报仇，杀死王武举一家30多口，就打那起事了。

张老乐手底下的枪手有张羊、张小妮子、朱兴德、朱敏德、朱大套、张尿、张言申、平头王（姓张，是洼张人）、刘百雅、高志安等。

马桥北张黄有“孝帽子会”（即地主团练，首领牛庚，称老牛会。因他们头扎白布，捻子称其为“孝帽子会”），专同大捻子打仗，弄得马桥北40里内无人烟。

二、张乐行杀侯永清、侯龙标父子

侯集的侯永清、侯龙标（侯莽）父子，也是混光棍的，家有顷把地。领一个戏班子，到那唱戏，只要戏一开台，听不听都要给钱。要是碰上阴雨天，戏不能唱，还得管他吃。当时有这样的歌谣：“侯永清的戏，不听不生气，麻秸枪、红纸旗，锣鼓一声响，跳出个拿鸡的。”“情愿耗套地，不听侯老永的戏，打火吃袋烟，越想越生气。”有一次侯永清的戏班子到太清宫准备唱戏，太清宫的和尚很害怕，又不敢不叫唱，便只好找张乐行。张乐行就去对戏班子的领班说，不准在太清宫唱戏。领班的跑去告

诉侯永清，侯永清怕张乐行，只好闷声憋气。后来侯永清的戏班子到家，去向侯殿清（家有很多地的日子主）要粮给戏班子吃，侯殿清去找张乐行帮忙。是张乐行带人去把侯永清、侯龙标父子杀掉。侯龙标要是不被张乐行杀死，还显不出侯士伟来呢！张乐行杀了侯龙标，侯家报了官。老乐手下有50枪手，州官办不了他，便要老乐的二哥张老敏办他。张老乐就到处跑，后来跑到北马桥，有个叫张立楞的劝老乐不要跑，同官兵干。在马桥同官兵打了一仗，打死了一个营官，又在王洼深打败了5营官兵，跑到庙集。陆大人见遍地都是人，吓的不敢出兵。在沙土集打了一仗，把陆大人打死，老乐便回来“装旗”（起义）了。张老敏见事情闹大了，也就跟着干了。

三、张乐行的投降问题

张老乐曾经去投郭大人，因为看到两个保人宋鸿占、刘鸿立被砍死在宿州大堂口，吓得跑回来不投了。

亳州两次派人来见张乐行，第一次张乐行见了，第二次张乐行骑马跑了。

周天爵派人来收抚张老乐，给5营统领，张老乐不干。

四、尹家沟之败

僧王带兵打尹家沟，张老乐同十八个“趟主”聚集在尹沟，人报王爷到了，老乐说：不咬屙，炮车不能过河。王爷到涡河边，命拆民房，扎草捆放到河中，炮车过了河。尹沟三面是水，只有西面有路。王爷从西面攻打，尹沟里面聚集的人多，包袱行李到处都是。王爷的炮打到里面起火。大捻子从东南面推倒圩墙冲出去，有很多人就回家剃头不干了。张老乐等十八“趟主”，除张老敏、张振江，都“塌驾”了。张老敏是躲在吴桥寺西头前董庄的红芋窖子里，僧王的兵过前董，见是个小庄子，没有去搜。

查。

五、捻军被困正阳关

大捻子被困正阳关，是因山水下来，人在关里出不来，正好胜保的兵赶到。老乐的人被困在关里，饿得吃“马缠”（马笼头）、刀鞘。吴士楼的吴常有当时就在关内，他出来后说：可给饿坏了，黄旗还好些，就蓝旗给饿得很。张老乐被困在正阳关，龚瞎子不好好打；张振江打败仗。最后还是孙老葵打败了胜保，解了正阳关的围。

六、捻军与太平天国的关系

张老乐派人去南京，他自己没有去见天王，要是依龚瞎子就去了。龚瞎子在六安安了民，想投洪秀全。孙老葵不愿投，对龚瞎子说：要投，先把你娘杀掉。

七、捻军的旗

捻子旗分五色，有四方旗、尖子旗、月亮旗（旗中有月亮）边子旗（镶边旗）。黄旗不镶边，分尖子黄旗，四方黄旗。张老乐是三尖黄旗，张振江是四方黄旗。姓张的都是黄旗。姓侯的都是红旗，侯士伟是红旗黑边，还有曹庙的曹廷翰是红旗白边，吴大寨的吴凤是红旗绿边。涡阳南到叶集都是白旗，有龚瞎子、孙老葵、江老台。龙山以东都是蓝旗，有魏坤、魏蓝、大白龙、小白龙。黑旗有牌坊集的燕二和西北湖心城的王贯三，“西北死了王贯三，捻子塌了半个天”。下张桥的杨兴泰是八卦旗。

红、黄旗人少，在一起才二十八张旗，五六百匹马，两家是一事，常一起出门。蓝、白旗人多，有几百张旗，民歌有“蓝白旗缠尻皮，打了败仗装装旗”。大捻子外出回来后，还是种地，等没有吃了，就对趟主说：没得吃了。趟主说：没有吃，“装旗”。

捻子外出打粮，近处叫“磨弯”，远处叫“打梢”。捻子起事后，就不剃头了，称清兵为妖兵。

八、张敏行、张琢父子

张敏行之参加擒军是被迫的。张老乐杀了侯龙标，侯家到亳州报了官。亳州官捉拿不到老乐，就要张老敏办他。老乐跑到马桥聚人，打死清兵营官，就到了庙集。陆大人（颍州知府陆希湜）见遍地都是人，不敢出兵。老乐便装旗起事。张老敏见事情闹大，自己也不得了，也就干了。

张老敏、张老乐都是“大稍禾”（大个条），但老乐没有老敏麻利（敏捷）。大捻子在正阳关，老乐、老敏同坐一条船。胜保的炮划子跟在后面追，快要靠近老乐的船尾，老敏一下子跳到炮划子上去，伸手掉转了炮头，那一炮才没打到老乐。

大捻子在尹沟失败后，张老敏是躲在吴桥寺西头的前董庄。后来就带着五孩（张琢）向南乡山里逃，在一个地方同一店家结为干亲家住下来。过了些时后，有次那位店家进城，看见悬赏捉拿张老敏的图影，回到家晚上同他的女人商量，准备去报营领赏。张老敏刁得很，他每晚都要到店家的窗下偷听。那天晚上，他偷听到店家两口子的谈话。第二天，张老敏便去打点酒买点菜，把店家请来，对他们说准备出趟门。酒后饭罢，张老敏就要店家送他父子俩。出了街，到了没人的地方，老敏向五孩使了个眼色，五孩就从后一刀把店家杀了。父子俩就又往南山里逃，挑货郎担生活。一天过大捻子，人家都跑，他父子不跑，老敏睡在屋里，五孩趴在窗子上向外望。等看到小阎王骑着马走过来，五孩就喊：辉哥！辉哥（张宗禹小名）！小阎王一看是五孩，就问：你咋到这来的？五孩说：俺爹还在屋里呢！小阎王就到屋里拜见张老敏，告诉他老乐“塌驾”和家属的死难消息，老敏就一病不起而死去。五孩就跟小阎王带马队，打仗勇敢，碰到清兵就没命地干。

九、侯士伟

侯士伟是侯老营人。他在亳州坐过班房。他奸了姓赵的妇女，姓赵的要告他。当时正好有一个人来向侯士伟讨债，他想：宁愿打人命官司，不愿打花官司，便对要帐的人说：跟我到侯楼去拿钱给你。在侯楼的洼子里把要帐的人杀了，而进了亳州的班房。

侯士伟对人厉害，心眼狠毒，“九里十三侯”多不愿跟他干。跟侯士伟干的都是“小户”，不敢同他争光棍。谁要是同他争光棍，非被他杀掉不可。

侯士伟同张老乐是姑表兄弟。他是毁在两个儿子手里。侯士伟的两个儿子侯山、侯旺，在乡里横行。侯山强奸了张士楼姓张的闺女（侯士伟的远房侄儿侯考妻），人家告诉侯家，侯士伟的女人说家里有两个骚羔子，不安分，谁还能骗骗（阉割）吗？这一下惹恼了姓张的，张老敏才把侯士伟杀了的。

侯士伟是被张老敏杀死在张寨。张寨是张振江的寨子。张振江同侯士伟的关系好，张老敏就叫张振江的手下人侯老二用张振江的名义，到侯老营把侯士伟诳到张寨。侯士伟到了张寨，一进屋见张振江正躺在床上吃大烟（鸦片烟），就问他啥事？张振江说没有找他。这时张老敏带着儿子和打手进了屋。张振江一看架式不对，说这是啥事？一找手下人都没有了，早被张老敏支使开了。老敏叫儿子把张振江架出去，动手把侯士伟杀死。

侯士伟死后，红旗的首领侯二老世，侯旺带马队。后来，侯旺是被侯菜园的人杀死在韩牌坊；侯山是被侯老营侯大绊杀死在二老世家。人家掀起侯山的皮袄，还说这皮袄不错嘛！就一刀戳进去了。

侯士伟带领红旗时光伐人家，等他一死，他的两个儿子也都被人杀了。

十、张宗禹

张宗禹是张大庄人，家有10多顷地。张乐行族侄。父亲张富新，外号“老阎王”，朝那一坐，小孩子都不敢假。对佃户雇工很刻薄，不许雇工上街赶集，怕耽误工夫。兄弟5人：同母弟2人，小名大广、小广（张宗道、张宗先），都干大捻子；同父异母弟2人，老四张宗信，外号大姑娘，未干捻子，现在张大庄就是他的后人。

张宗禹参加捻军的两种传说：

1. 在撵绵羊的时候，张宗禹就跟老乐混。他爹张维新要扎死他，他吓得不敢回家，就跟老乐干了。他爹恼得自杀了。

2. 有一年端午节前，老阎王叫张宗禹去黄店给黄先生（医生）送节礼，要他快去快回，不许在那里吃饭。可是黄先生硬是留下张宗禹吃饭。正好这天午后下雨，家里摊在场地上的麦子遭了雨淋。老阎王生气发怒，说：“我的话你都能不听，真反了。”就在家磨刀要杀张宗禹。正巧张宗禹的表弟在他家，知道了这件事，便跑到张大庄东边三孔桥等宗禹，叫他不要回家。张宗禹就跑到张老乐家，张老乐正在竖旗，见到宗禹说：我正好没有先生。张宗禹当时只有十九、二十岁，先在张老乐跟前当红笔师爷，案子犯在他手必死，所以人都说他象个小阎王。后来领旗带人下趟了。张老乐“塌驾”时，他正好带一支人到南山去了，就剩下了张宗禹这一支。五月十三，小阎王同五孩回来一趟，便复反了，以后就到外面去了，打到黄河北。最后张宗禹同张振江一道隐了。

张宗禹绰号“小阎王”的由来：

1. 捻军正阳关突围，张乐行看到张宗禹作战勇敢，说：真是阎王。

2. 捻军占据怀远期间，张乐行爱上一个外号“黑姐姬”的窑姐儿，便不大问事，渐同部下疏远。部下找他还不耐烦，甚至生气杀人。张宗禹一气之下，跑去把“黑姐姬”杀死。张乐行

知道也无可奈何，只是对他说：你是阎王爷。

3. 张宗禹是张乐行的红笔师爷，案子犯在他手里，就必死无疑，所以人都说他象个阎王样。

关于张宗禹“下落”的轶闻：

1. 张大庄的张西梦是跟张宗禹的先生。曹州一战后，他同王金完就下来回家。曾对人说：一天到徒骇河边，张宗禹见大势已去，就对他们说，你们各自逃命去吧！第二天早上，张宗禹就不见了。

2. 擒军失败后，张宗禹家的祖坟上，每年清明后都发现有纸灰。一天黄昏，吴桥寺集上来了一个和尚，投宿于一家粮行。夜晚与粮行的量斗者（俗称“斗把子”）同床而眠，和尚问量斗者：你还认识我吗？量斗者只觉面熟（原为张宗禹部下），但一时却想不起来。第二天破晓，和尚戴月而去。量斗者豁然醒悟过来，那不是“小阎王”吗？大家猜想他是回家来给祖上烧纸的。（涡阳的王大球在他写的《张宗禹传略》中也有此说，并且说那个粮行就为其曾祖父经营。）

十一、张 振 江

张振江是张大楼人。张大楼在张老家东十余里、张大庄北三四里。他家有顷把地，一开始就跟张老乐干。起义以后住张寨，与张敏行所住之袁小楼相距一箭之地。张寨就是经张振江之手打（筑）的寨。

张振江与红旗首领侯士伟的关系近乎，感情很好。张敏行用张振江的名义，把侯士伟诳到张寨杀死，张振江与张敏行的关系日渐疏远。张乐行死后，他一直是跟张宗禹干，末后一同隐的。张振江在大捻子塌驾后还回来过两次：第一次是回来扒银子的，那时他女人住袁小楼；第二次回来，又到袁小楼，一叫门，那知他的家搬走了。打那以后，就没有回来过了。

泰一
是

十二、杨 兴 泰

杨兴泰是永城苏平楼人。兄弟5人：杨兴文、杨兴礼、杨兴泰、杨兴福，老五早死，名不详。他和张老乐是表兄弟；同刘狗是儿女亲家。起事后他住下张桥（吴桥寺北25里），打的是八卦旗，黑旗上画八卦。他打八卦旗，是为了多招几个人，同白莲教没关系。下张桥在大捻子以前是有白莲教，等大捻子一起来，就没有了。下张桥杨汉亭也说，杨兴泰的旗是黑旗上画八卦，不是白莲教。僧王带兵围下张桥，要不是韩老万在下张桥，杨兴泰就投僧王了。韩老万在胡庄被僧王围困3个月，寨被攻破后，跑到下张桥。张老乐、张老敏知道了杨兴泰想投僧王，便把杨兴泰找到张寨，问他可是要投僧王？杨兴泰说：我要是想投僧王，叫僧王的炮打死我。杨兴泰回到下张桥，僧王的炮打在屋顶上，杨兴泰被打死了。一说炮弹落在院子里，没炸，杨兴泰用烟袋杆子去敲，炸死的。韩老万从圩里冲出，也被打死。

8月20—22日 龙山

从吴桥寺向东，约行30里抵龙山，集镇座落山腰。“龙山是三山口，紧靠运粮河”，清朝在这里设龙山营，驻扎军队。这里是捻军红旗一个首领胡椒大王王万全的“领旗地区”。

我在龙山访问了焦楼、三里门、丁王庄、大王庄和姜庄的8位老人，他们都说胡椒大王的名字叫王万全，是红旗（《涡阳县志》说胡椒大王叫王万一，是黑旗）。姜庄93岁的姜清雅说：黑旗在龙山西北25里地与河南交界的报条寺（音）、刘奶奶庙一带，大老渊、二老渊、苏老天、王贯三、五沟集李开哥，都是黑旗。龙山流传着胡椒大王围焦楼及其被杀的传说。

一、名字和旗色

胡椒大王是龙山南大王庄人。据其后人王德才、王德和说，他名叫王万全，是红旗蓝边旗头；因他矮小又黑象胡椒，而成为绰号。姜庄93岁的姜清雅也说他是个红旗头。可是，《涡阳县志》的擒军旗表中胡椒大王的名字却作王万一，而且是黑旗。按：后人记忆自己“上人”的名字，讹误可能较少；从地区看，王万全是在红旗的领旗地区，大王庄距红旗首领侯士伟的侯老营很近，而且它东边的焦楼也是红旗。

二、围焦楼

焦楼在龙山东南数里。我们当时（1958年）看到的焦楼，深濠高墙，可见当年它是那一带的一个大而富有的圩寨。焦楼是红旗，旗头是焦德辉。后来翻了官，随左宗棠打过回军，得了军功，在河北保定府马队当哨官。焦家与张敏行沾点亲，张敏行的内弟媳妇的娘家在焦楼。所以在乱的时候，张敏行的妻子住在焦楼。

焦楼焦法贤：大王庄胡椒大王与焦德辉、焦成友不和。10月15日，焦楼都去赶龙山会，胡椒大王见焦楼人少，就带人围了焦楼。焦楼是两道海子的圩，全靠妇女守圩。当时焦德辉在龙山，张敏行的妻子也在龙山，便一同去向张老乐求救。老乐不愿来，焦德辉就要跪下了。老乐没办法，就来了焦楼，未进庄，只在庄外转了一圈，去向胡椒大王说事，准备把焦楼化为两截，两下各住一半。焦楼的人不愿意。老乐说：这不过是退兵之法，胡椒大王兵退后，你们不让，我能咋的？后来兵退后，焦楼不让，可人不敢出庄。

姜庄姜清雅：当时有个刘老扎子围龙山，焦楼的人去龙山瞧瞧，去了18个人。刚走出焦楼，在王园被胡椒大王带人围住。焦

楼的人逃回寨内，没有人受伤。姓王的头还被砍伤，就把焦楼围住。在这之前，胡椒大王就曾杀过焦楼东头的焦二先生，两下里便结下了仇。

张老家张羹才：胡椒大王向焦楼借粮，焦楼不给而被围。姓焦的找张敏行的女人写信，到张老家找张乐行。老乐先叫把大黄旗扛去，跟着自己也去了。他找了胡椒大王后，叫焦楼送三车秫秸，胡椒大王给三吊钱算完事。事隔多年，焦法贤的父亲焦德龙还对先父张本立说，他家承姓张的情，不是姓张的他们就完了。

三、被 杀

王万全是被郝凤清手下人王朝堂、严荣祥所杀。

郝凤清是龙山西北不远的郝庄人。家有三五十亩地，起首在街上赌个博安个宝。他是黑旗小旗头，出门也带千把人。

胡椒大王之死，是因他混孤落了单。他有次赶龙山集，在一处原是做生意的空房子（一说茶馆）歇脚，到后面套房里吃大烟。王朝堂、严荣祥两人同阵去杀胡椒大王。王朝堂先进去，直奔后屋。胡椒大王见事不妙，就想翻越后院墙逃走，可他人矮，一跳未翻过去。王朝堂赶到跟前，就手一刀把他杀死后，严荣祥这才赶到。

这一捻军内部的自相残杀事件，发生在1856年。据焦楼77岁的焦法贤说，是在他父亲焦德龙9岁的时候。焦德龙是属猴的，应是道光二十八年（1848）戊申出生，按民间过去习惯说虚岁，焦德龙9岁是咸丰六年。

8月23—24日 顺河集

龙山东南行20多里，到顺河集。顺河集在涡阳县东40里，是捻军蓝旗地区。韩老万、刘永敬、刘天福等著名捻军首领，都是

这里人。捻军发生刘永敬、刘天台叔侄被杀的“六安事件”以后，内部产生分裂，蓝旗后来降清者不少。瑕亦可掩瑜，后人又可能为亲者讳，关于他们的传说并不很多。韩老万住家的村庄，是调查组的其他人去访问的。韩老万的后人将珍藏的韩老万使用过的齐头镢赠给我们。齐头镢原是一种农具，捻军用做武器。我们带到合肥，转送给安徽省博物馆，列为一级藏品，后又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征调去。我在顺河集仅访问了大潘、小潘和韩古庄的7位老人。

百年以前，大潘叫西潘寨，小潘叫东潘寨。当时有“五里三潘，行事过天”的说法。东潘寨是七分官三分私的官寨，寨内有一门大炮“十里近”，还是韩老万送来的。圩长是潘贵堂，管十多个庄。捻子起反时，东潘寨没有破过，外面的人跑到这里避难的很多。韩老万都把家眷送到这里。韩老万是韩桥人，家有两犍牛、两顷多地，是有日子过的。苗沛霖来打过，给一炮打回去了。苗沛霖对潘贵堂说：你要有种，你去寿州。潘贵堂真的去了。苗沛霖说潘贵堂有种，留他过了一个月零三天。捻子失败后，英翰（安徽巡抚）说潘贵堂通捻，把他弄到颍州杀了。

韩老万

韩老万是顺河集西南十里大韩庄人。大韩庄在涡阳县建置前属蒙城县。其父辈弟兄很多，有地二三十顷，分家时，老万的父亲分得十顷八顷的。弟兄四个，老万居长，人称大老万。还有二老万名清峰，三老万名碧峰，四老万名秀峰。据说四老万抱给其姑母做儿子，家住小涧集，故有四老万姓丁之说。老万兄弟分家时，每人分得一顷80亩地。

韩老万的个条很大，念过书，通晓医术，但不行医，起义前常给人看病。

一、名字和绰号

我们所调查访问的老人，对韩老万的名字众说纷纭。大韩庄老万的玄孙韩东华、小韩庄韩江峰、顺河集王惠林，都说韩老万的名叫韩万峰。但大韩庄老万另一玄孙韩东冒却说名叫韩高峰。另还有“韩万呼”之说。按：当地韩姓的字辈是：从、玉、峰、克、士、修、东、树；当时对人尊敬的称谓，习惯在姓与名间加一“老”字；再从其三个弟弟的名字，也证实了他是“峰”字辈。从而可以肯定韩老万名叫万峰。

韩老万的绰号，资料记载中作“狼子”或“浪子”。经过调查才弄清楚。原来他是鼻子有毛病，堵塞不通，说话鼻音重，语音嗡嗡，吐字不清，即俗称“龉鼻子”，故而有“韩龉子”之绰号。资料中作“狼子”或“浪子”，不仅是歪曲了原意，而且是谐音讹字，诋毁污蔑。

二、起 事

捻子起事前水灾连年，庄稼欠收，摊一场麦还打不出几升。甚至连百亩地之家的韩老万，把种粮都吃光了，家无隔宿之粮，起先还能向亲戚去借粮，后来连亲戚家的粮也吃光了，就开始向富家大户“磨弯”。据说这样并非韩老万所愿，而是别人把他架起来的。

刘永敬说：韩老万家有一二顷地，不愿意起反，旁人把大旗插在他家门口。别人去抢他姐姐家，也就说是他抢的。逼着他反，不干不行。

韩江峰说：别人去抢人家，就说是韩老万抢的。报了官，官家来逮他，看他家正关着门在院子里杀牛，也没有什么刀枪兵器，不象是抢人家的样子，就没逮他。但处处抢人的事情，都借他的名义，他也就只好干起来了。

传说张乐行在起事后，就曾派人与韩老万联系。另据韩士玉、韩江峰、王惠林等老人说，韩老万还曾受过太平天国的封（为平北侯或扫北王）。我们在调查中听到捻军首领被太平天国封为扫北王者，不知凡几，不足为凭。另据传说，韩老万虽是蓝旗总旗头，但姓韩的没有姓刘的户大人多，而实际上的蓝旗领导者是刘饿狼（刘永敬）。1857年12月，刘饿狼在六安被杀后，韩鼐子才起势的。

三、韩老万之死

弄清韩老万死于何处的问题，却经过一番周折。我们到大韩庄调查，起初所访问的老人，包括韩老万的后人，都说他是死在六安。但后来有一个叫韩士钢的老人，却说韩老万不是死在六安，而是死在家里，坟墓就在青阳沟东边的孔庄后面。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和注意，转而重访韩老万的玄孙韩东晓。开始他还坚持前说，可当我们对韩士钢的话一说出来，韩东晓的母亲梁氏就说：不用再瞒了，老万是在大潘打仗受伤死的，抬回家来安葬的，坟就在青阳沟那边。随后韩东晓陪我们去看了韩老万的坟墓，与韩士钢所说丝毫不爽。韩氏后人之所以要隐瞒韩老万的死葬地，对外秘而不宣，可能是受清朝对捻军残酷镇压的旧观念影响，还视韩老万当年的起义为造反、大逆不道而有恐惧心理。

8月25—31日 曹市集

顺河集又东南行，约行10余里，到曹市集，东与蒙城县境毗连。曹市的团练“牛家军”，专与捻军为敌，牛裴然、牛师韩父子充当清廷鹰犬，专事分化瓦解，招抚捻军中的叛徒，如杨瑞英、李勤邦等。这里也是捻军张慎德、张慎聪兄弟的领旗地区。我在曹市集、郝岭、张疯寨访问的6位老人，多不知道张慎德、

张慎聪的名字，而只知其外号大雷、二雷、三闪。据《涡阳县志》说，头号雷是张慎德，三闪是张慎聪，是黄旗。而传说他们是兄弟3个，起根发苗是在井张庄，领的是蓝旗（按这个地区应属蓝旗范围）。当时他们把曹市集的砖石运到大侯庄，修筑圩寨，名为张德府。当地流传有“大雷二雷都不怕，就怕三闪说句话”的民谣。后来他们都翻了官，但未封官，在郝岭置了地。

9月1—3日 坛城（蒙城县）

曹市集东南行，走不多远，即进蒙城县境。约行10余里，到达坛城（南距蒙城40里），位于坛城山下。集镇不大，倒还有个城门，说明它过去是个小城。这里是捻军后期著名首领任柱（任化邦）的家乡。我在坛城访问了岗子邓、汪家庄的4位老人。

任柱是坛城南五里之小任庄人。柱是小名，大名任化邦，还是南毛子（指太平天国）给起的，封鲁王。他家里很穷，小时候在大任庄给人家放猪。猪正在家吃食，他只要鞭子一炸，猪就跑出来了。

任柱的个条不大，很粗壮。他十八九岁就干捻子，混不转的时候，常向他的一个姓邓的亲戚去要。有的说那是他姑母家，有的说那是他姐姐家。后来人越混越多。

任柱竖旗的地方在坛城。坛城当年有内外两圩：外圩方圆八里，坛城山置于其中；内圩方圆四里。打清江时留任士奎、任云清、张建勋毋占鳌守坛城。张建勋、毋占鳌同苗沛霖勾结，放下吊桥，苗沛霖攻下坛城。那时天正下雨，人跑不掉，吓得直投井，井都填满了。圩里的妇女全被虏去。坛城一带就流传着“张建勋、毋占熬，二八佳人搭吊桥”的民谣。任柱从清江回来，便把任士奎杀掉。任云清吓得骑了匹花马向东逃走，李营（坛城东里许）的人把他救走。后来他投了清，做了镇台。

任柱是与张宗禹（一说张琢）不和才分兵的。他后来死在盩县（鞏榆），是站在一个坟上瞭望，被人用枪打死的。

9月4—5日 蒙涡道上

9月4日结束在蒙城境内坛城、板桥集、阎集的调查，动身回涡阳。半天时间要趲行70里路，必须轻装。不能再象以往那样，每次转移地方，请人肩挑被褥，我们自己肩背行囊赶路了。于是雇了辆独轮车，将被褥行囊全部装在车上。午后，从坛城轻装就道。约行20余里，途经西阳集，是张乐行为叛徒李四一（李勤邦）出卖被俘的地方。我们急于赶路，未敢停步，匆匆一瞥而过。又行20里，过高炉集。捻军中又一出卖张乐行的叛徒杨二（杨瑞英），就是高炉人。时已夕阳西下，我们已赶行40多里，感到腹饥口渴，停下“打尖”。当我们步出高炉街头时，已是暮色苍茫了，路程还有25里，日夜兼程赶行，到达涡阳县城，已经夜深人静。

5日，小憩一天。到涡阳一月，调查的任务完成一半。剩下的调查内容和行程，是涡阳西南、西北的捻军白旗和黑旗地区了。

9月6—13日 江集

9月6日，我们又首途去江集。乘汽车到楚店，是这次调查中唯一的一次“安车代步”。涡阳到楚店35里，车行半个多小时即到。楚店是个大集镇，有一条很长的街，这里曾是捻军著名首领孙葵心“竖旗”的地方。我们采取由远及近的办法，先南去江寨集调查江台凌，再折回楚店调查孙葵心，然后由楚店西去公吉寺。这样每转移一个地方，行程大致相等。

江集涡阳设县前是蒙城辖地，1964年划归新设之利辛县，在楚

店南面25里。周围村落集中，我一个星期访问了12个村庄的15位老人。资料中大都将江台凌的姓名弄错，《豫军纪略》作姜太林；《剿平捻匪方略》和《安徽通志》作姜台林。以《涡阳县志》作江台凌为是。江集地区除了流传有江台凌和孙葵心的遗闻佚事外，还有擒军与练总地保、官寨、老牛会关系的传说。

一、江 台 凌

1. 竖旗起事

江台凌是江集北15里之江老家人。家有两顷多地，原是有日子过的。弟兄5个，老台最小，人称五老头。据说他二哥还得功名，是个文生秀才。

他20多岁的时候，因受人家欺侮，气愤而起。纪伦寨纪守奎说：江老台给人圆事，挨人砍了一刀，老台气得很，说大捻头还是钱买的吗？回家后就竖旗起事了。至于是给谁圆事，说法又有分歧。纪伦寨纪守邦说是给纪老虎圆事，那句话说错了，纪老虎拿刀砍老台没砍到，老台一恼就竖旗起事。但江老家江聚堂说：崔小集的崔骡子是个光棍，在集上为人圆事，老台在旁说几句话不投他的意，他就向老台劈头一刀，可没砍到。老台回家气得很，人劝他竖旗，他就干起来了。我们又到崔前庄去访问崔骡子的后人，据崔儒海说：崔骡子名叫崔学端，在江老台起事前就干起来了。一天，崔骡子骑着马，碰到老台在割草。他说：入你娘，你还想发财吗？顺手砍老台一刀没砍到，吓得老台往家跑，到家向爹娘哭罢就竖旗了。从而肯定江台凌之竖旗起事，是因与崔学端不合，且受欺侮造成的。

2. 旗色和纪律

调查江台凌的事迹，先从江老家开始。第一个访问的是江聚堂，提到江台凌的旗色， he说是红旗白边子。江家平说是大红旗。其余的老人对这个问题说不清。带着疑问我们到附近村庄调

查。江西庄江华兰也说是大红旗，这可使我们迷惑了，怎么回事呢？这里明明是白旗地区。在李老庄才听到李世清说：江老台打的是白旗红边子旗。但从其说话语气，还不甚肯定。直至在江老园遇到87岁的江佐让，明确说江老台是红边白旗，我们才豁然领悟，江家平、江华兰等所说的大红旗，可能是指边色而言。

对江台凌捻军的纪律，有这样一些传说：

江老台的人出外，不许杀人放火、馱人家妇女。回来家后，就各归各家。等一些穷人没有吃时，就找老台，再聚人出去。

（江老家江聚堂）

老台的人纪律很严，听说在颍州府时，把跟随的妇女，另外安置一处，不许手下人乱往那跑。（李老庄李世清）

江老台的人到那里，不准讹吃骗喝。老台知道谁讹吃骗喝，就把他杀了。乱拉庄稼人去做什么事情，老台也是不许的。大捻子回来家后，还是公买公卖。做生意的人，该做啥生意，还做啥生意。当时卖牛肉包子的，一斗麦的本钱，卖完可买一石麦。

（三里庄江浩言）

江老台的人都是穷兵，十冬腊月连棉袄都穿不上。（李小桥李秀君）

文字资料中亦有捻军“禁止谣掠”、“逢人即不杀”之类的记载。

3. 所到之处

江台凌捻军到过的淮南和豫鄂边，传说中多有反映，笼统地称之为南乡、南大山、西山套。如：人常说江老台带着些人吃挨饭，到过南大山、西山套、南乡，过一阵就回来了；江老台在山套打过败仗。据江浩言说：江老台到过老河口，那边有淤泥河。老台的人都出漆痱子（即生漆疮），得干疤疯（即被山石划破而得破伤风），死了很多人。回来的人，三亭只有两亭。同时还流传下来一些民谣，

听说过武关，两眼泪不干，
 抛掉好坐马，扛点青竹竿。
 跟着江老台，苍谷揣满怀，
 才说烧着吃，官兵又撵来。
 哈巴狗子洋眼炮，打得老台钻山套。
 江老台站得高望得远，看看多妖①可来撵。

传说江台凌还到清水沟打过苗沛霖团练。清水沟给苗蛮子闹得没办法，来请江老台去打蛮子。苗蛮子的人比老台的人多。苗蛮子那边有个叫刘兰馨的向老台说，那个要能打过我，苗营的人尽你用绳子拴。结果把刘兰馨打败了。

4. 江台凌之死

关于江台凌之死，有这样一些传说：

江老台同张老乐都毁在僧王手里。割肉下油锅，先割老台一刀，老台哼了一声，老乐把眼一翻，不叫哼。（刘学道）

江老台同张老乐一样，是抽肠死的。（江浩言）

江老台是在家被官兵逮去五牛分尸死的。

老僧王虽利害，但不敢同江老台打。僧王平反时住花沟，哄骗老台投降，把他处死。据老的说，当时老台并不想去，别人说不要紧，结果送了命。（栾凤三）

这最后一种说法，倒是与《亳州志》的“姜台凌乞降，亦极刑处死”之说相吻合。

5. 江台凌部下

传说跟江老台干的人，能够道出姓名者有：

江是雨，江老家人，是老台的打手、先锋官。

江兆，江老家一带人，但不知是哪庄的。民谣有：“江老台

① 多妖系指多隆河，满洲正白旗人，官至荆州将军。又作鲍妖或鲍超

打得好，离了江兆也是个屁”；“江老台离了江兆爬不起来”。以前唱二弦戏的，把江老台画成大红脸，江兆是个武生。

江泰，江老家西边的江西庄人。家有七八十亩地，跟江老台混，是应捻样子。后来投了官，给官兵送粮，被苗蛮子的人杀死在蒙城县白圩子。

纪老虎，纪伦寨西二里之庙西庄人。家里没有地，穷得两口子穿一条裤子。是个小旗头，在江老台手下。纪伦寨纪守邦说：纪老虎在平反后被官家逮去，但他是有嘴有牙的（即能说会道）官家也不能拿他怎么着，就把他放回来家。后老死在家。纪木匠庄纪殿臣说：捻子失败后，有7个状子告纪老虎，都未告倒他。

江大喜，江东庄人。余不详。

二、纪 伦 寨

江老家附近的纪伦寨、张长营寨是官寨。纪伦寨是我们在捻军调查中所看到的最大最好的圩寨。它修筑于咸丰年间，以筑寨人的名字为寨名。

纪伦原先在清营混个亮白顶子。家有两顷地。无寨的时候，东边打西边躲，西边打就东边跑。纪伦说：咱打（筑）寨吧！就自己画了个图，装了6门炮。等寨打好后，纪伦说：寨也打好了，别给苗沛霖送粮了。苗沛霖来打纪伦寨，给三炮轰跑了。

纪伦寨东南10里是江老家，西边2里是庙西庄，夹在江台凌同纪老虎之间。但是他们都不打纪伦寨。因为老台与纪伦有亲友关系；纪老虎同纪伦是本家爷们。纪伦寨在大反时没有破过，外面的都跑到这里来避难。

三、捻 军 与 团 练

捻子到外面去“打捎”，有日子过的人也跟着去了。江集练庄村（东到郑庄、西南到刘集、北到崔小集，方圆约三十里）

的两个地保江南永和郑鹏江，也都下“趟”了。大反时有六七年没有完钱粮。当时江集的练总是江福志，管周围6个寨。捻子一外出，练总地保该乍办还乍办。捻子一回来家，就捻子说的算了。捻子回家来的时候不长，顶多十天半月又出去了。捻子回到家，就是吃、喝、赌。做生意的人，该做啥生意，还做啥生意。也有些外地人跟到这边来，但那一趟不毁他几十个。捻子一出门，西边（指张村铺、临湖铺、干沟西）老牛会就来了，又烧又杀。

9月14—17日 楚店

楚店原属亳州，是涡阳西南一个大集镇，东西一条街长二、三里。它是孙葵心起义竖旗的地方，与东南12里的江老家、西北25里的公吉寺，恰好在一条线上。孙葵心同江台凌的关系很好，过从甚密。在江集调查江台凌，就听到不少有关孙葵心的传说，尤可引人注意的是，孙葵心屡欲降清，迟疑不决。与《剿平捻匪方略》所说“孙葵心蓄意投诚已久，但自念负罪甚众，往往迟疑中止”，不谋而合。但江集的老年人都知孙葵心竖旗在楚店，而弄不清他是那里人，并且还都说孙葵心是大红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于14日转移到楚店调查。我访问了孙大庄、小王庄和路庄的5位80岁以上老人，弄清楚孙葵心是楚店西南15里的孙集孙腰庄人，江集一带老人所说的大红旗，原来是指“边”而言，因为这里是白旗地区，旗色的区分在镶边。楚店的老人多明确地说孙葵心是白旗红边或红边旗。

一、起事竖旗

孙葵心是孙集孙腰庄人，家有一二十亩地。起事是因向孙集富户“磨弯”。据孙小寨孙少臣说：孙老葵在起事前，有次向

孙集他的本家“磨弯”，孙集那边也答应给了。那知到时候带人来逮他，老葵就向西南李营跑，翻几道濠没能跑掉，给逮到孙集。往亳州送时，走到孙集西边的叶桥，给龚瞎子带人劫去。龚瞎子就问老葵有没有种？要是有种，就把孙集的人杀尽。老葵觉得都是本家，就说那不能以，我也是没办法才向人家“磨弯”。但是李庄92岁的李景华却说，孙集把老葵逮住往亳州送，中途邓尿劫下，叫老葵在孙集集上骂三圈，从那就起事了。孙少臣还说孙老葵起事，是靠涡阳西南老葵桥的孙大营、孙二营的人把他抬起来的。那两个庄上的人都会武把式。

竖旗在楚店，也有种种说法。先是听到刘营92岁的刘学道说：孙老葵乍起是在楚店。楚店集王家是他姥娘家。老葵的舅舅王斌也是旗头，在张老乐手下。深入一调查，始知刘学道的说法并不完全可靠。孙大庄孙秉钧说：楚店集西头王家是孙老葵姥娘家。王斌是楚店东南七八里的王老庄人，不是孙老葵舅舅。王斌比老葵早，在大反时已死。在旗头中没听说有个王斌。我们在楚店集上问不到孙葵心王姓姥娘家的后人，转向东南方向去调查。据路庄路焕文说：王老庄王斌、王四是贼头，脸上漆的有字，时间还在早，与反叛（指捻子）不一事。王老庄无老年人，在附近的王后湖庄，一位88岁的老人王汉章说：大刀王斌，方刀王四，小先生李代，都是大反前人。

孙葵心的旗色同江台凌一样，也是白旗红边。调查时的情况亦如一辙。孙之故里的孙腰庄及周围村庄的老人，不是说大红旗，就是说红旗。后至孙大庄才听到孙秉钧说是白旗，还说孙大庄孙盛师跟孙老葵干，是白旗红边。小王庄孙学才说是红边子旗，追问他啥旗红边子？回答白旗红边子。路庄路焕文就明确说是白旗红边。

楚店集的圩寨，还是孙葵心挑（筑）的。当时寨内生意照做，孙老葵的人从外面回来，生意还好些。老葵一辈子就热（爱）

戏，他还带一个戏班子。从外面回来后，整天唱戏。

楚店西边十四五里的展沟，就是老牛会。老牛会同大捻子打出仇来了。大捻子一出门，老牛会就到这边来抢杀，人就往楚店寨里跑。大捻子一回来，就到那边去杀抢。

二、柳沟战役

传说孙葵心捻军到过六安州、南乡、西山套、鹿邑。内容较为具体的是柳沟之战：蓝旗在柳沟打输了，来搬孙老葵。100多里地，一夜就赶到了。官兵不知啥大人带的大炮队，等孙老葵的人都赶到跟前了，还咕咚咕咚的哩！孙老葵的人顶着门板过去，把官兵打败。官兵啥大人从没打过败仗，可在那次败在孙老葵手下，打那以后不敢同孙老葵打仗。

柳沟集在今阜南县境。柳沟战役是在1857年3月26日至4月29日，历时月余。捻军因“食将尽”而退出柳沟。流传下来的有一首民歌，就可看出捻军的严重缺粮情况：

孙老葵性子急，一心想上柳沟集。

上先吃的飞萝面，末后啃的水牛皮。

三、关于孙葵心欲降的传说

调查孙葵心的事迹，先在孙小寨访问的第一个老人是孙少臣。他说孙老葵病死在家，接着又说他第二次到南山去，已经穿黄马褂了。引起我们注意。但老人对这个问题大都说不清楚，只有孙腰庄附近刘营的92岁刘学道、孙大庄孙秉钧，说得较为具体，而且将孙葵心对投降犹豫不决、举棋不定的心理活动都描绘出来。

张老乐叫孙葵心到南乡去，老葵不愿去。老葵看到官兵人多，想投程大人。程大人也答应老葵投后还是原套打，原来带多少人还带多少人。约定在去南乡回来后就投。在临去南乡时还赌

咒说，再去南乡，就死在南乡。那知犯了咒，病死在南乡。

孙老葵私下里想投官，在商量的投官的事后，走到街上碰到一个算卦的，老葵就问了一卦。算卦的问了老葵问啥事后就说：你投也罢，不投也罢，由你自己决定。老葵一想，投了又怕官杀，也就没敢投。

在清朝统兵大员和地方大吏奏折中，屡次提到招降孙葵心之事，也说“孙葵心蓄意投诚已久，但自念负罪甚重，往往迟疑中止”。

孙葵心是死在敌人加紧对他招降的时候，1861年2月在合肥小蜀山被庐江团练击倒坐轿，“伤重而死”。传说都说是病死的，但对死地的说法不同：

先在南乡生病，抬回家来后死的（李景华）

病死在外面，运回家来的（孙秉钧）

病死在困龙山卧龙岗。（孙连亭、路焕文）

传说之所谓病，实即是伤；龙山卧龙岗实为小蜀山大龙岗之传说。

四、孙葵心的部下

孙盛师，楚店北之孙大庄人。家有10来亩地。是个白旗红边小旗头，领10来杆旗，带百十人。孙大庄东边3里的赵寨赵通龙是日子主，家有六七顷地。赵寨有个赵推，要杀通龙。赵通龙找孙盛师去说情。赵通龙为感孙盛师的情，把儿子赵剑基认孙盛师为干爹，两下结为干亲家。捻子失败后，孙盛师回来家，赵通龙已死，赵剑基送给他一顷多地。孙盛师活到七八十岁病死。

孙二老怀，楚店西小王庄人，孙盛师族叔，人都叫他二老头子，是个“小户”，跟孙老葵到过柳沟集、西山套。捻子失败后回来家，种一杆枪（庄）的地，又过了几年才死的。

王怀信，居处不详，是个小趟主。孙老葵死后，由别人带

队，他与之不合，被杀。

孙老炳，孙集附近隋寨人，是个小旗主，很早就打仗打死了。

孙老威，孙集附近孙大寨人，是个小旗主。

孙四瞎，孙集人，死在鹿邑。

9月17—19日 公吉寺

由楚店西北行25里，至公吉寺（又作宫吉寺，原名公一寺），集镇不大。我先后访问了公吉寺老街、大张庄、大孙庄、霍桥、龚方庄和张菜园11位老人。从他们所提供的口碑，略知龚得初起的情况。

一、龚得其人

龚得家住磨盘松。“得”是小名，当地群众多叫他龚得、瞎得、龚瞎子，而都不知龚德树这个名字。龚姓说龚得是“道”字辈，大号叫龚道才或龚道德。他是个蝙蝠子眼，晚黑能看见，白日不沾，所以人叫他瞎子。公吉寺张行泰、张朝宾说：龚瞎子小时候不成手，干个偷鸡摸狗事，被人撵得不能归家。他命大，人家捉他几回，都没捉到他。末后他发了威。当时南京是老毛子的（指太平天国）。龚瞎子先同张老乐一起，后随老毛子，还做南京的六安州副将。他后来死在生死关（松子关），有人说他的坟还在南京。

龚瞎子是白旗总趟主。他的红笔师爷是龚道云，一直跟随龚得，龚瞎死后才回来家。后来李委员下乡验寨，龚道云吓得上吊死了。

二、杀张得、张可

张得、张可（一说张龙、张虎）是张菜园一带人，兄弟俩是

赌棍，为地方上一霸。据张菜园张文善、马庄马修心说：龚瞎子不在家，张得、张可“撩”了他娘。龚得回到家，他娘向他哭诉。瞎子是个孝子，对他娘很孝顺，便安慰他娘说：以后给你老人家报仇。他娘说：等你给我报仇，我骨头都上黄锈了。瞎得说：你别看小官没有马骑，可阴沟里也能翻船。后来龚瞎子便托人说事，认张得、张可做干老子。有次张得、张可在孔寨赌钱（一说赴宴），龚瞎子带人去把他俩杀了。另据龚方庄龚连勤说，到孔寨杀张尿、张可，共去7人：龚道才（龚得）、龚小寡、马全、瞎眼狼（姓龚）、龚世全、李天洞、神棍张谈。

三、打高公庙

高公庙在公吉寺西20余里，原属亳州，与太和交界。清军驻守高公庙的是杨锡山，群众送给他个“羊杂碎”的绰号。龚方庄龚连云、龚云田说：龚瞎子的事闹大了，高公庙的杨官，南捉北拿，杀了很多。等龚瞎子从（涡）河北张老家回来，到邓老庄邓老欢家里，听他说杨官捉拿他。瞎子便带了邓老欢、吴老坡（吴营人）、丁向（三交塘人）、樊某（樊营人）、四大天王（都姓张）等18人，去打高公庙。瞎子用计去摸营，白天自己装扮成个卖茶的，到官兵营去卖茶，一边卖还一边吆喝着：你们可都要招呼着（注意点），龚瞎子会摸营。趁人不在意，把茶往炮眼倒。夜晚带人去偷营，官兵的炮都打不响。瞎子用计偷了高公庙的营，得了武器和500人，才开始起事的。

另据龚方庄龚连勤说，龚瞎子到高公庙去摸杨官的营，共去18个人：邓老欢、龚道才、丁向（三交塘人）、盛俭（盛竹园人龚得舅舅的儿子）、吴老坡（吴营人）、朱茂、朱匡（堂兄弟俩）、马长毛、王黑、牛穗子、何老宰（河溜人）、侯旺（白市集附近人）、龚豁子、祁盖（祁庄人，外号“三个半葫芦”——七盖子）、龚旺（龚前园人）、龚明、龚耀弟兄俩（后圩人）

阚小炳（阚老家）。

后来就流传下来这样一首民谣：

高公庙两头亭，当中坐个杨驴熊。

绅士两厢劝不走，单等瞎得来摸营。

9月20—27日 义门集

我们由公吉寺去义门集，约行20余里，途经花沟集。我们停下“打尖”小憩。午后，我们分作两路：一路北去赵旗屯调查，然后再到义门；一路向西北直奔义门。义门集又名庙集、南频涡阳，北与河南永城县境接壤，水旱码头，交通方便，商业繁盛，是涡阳县第一大集镇，居民中回族不少。这里曾是捻军黑旗刘玉渊、刘学渊兄弟的活动地区。我在义门集涡河南的邓小街、邓楼、张寨、大刘庄、刘园、邓牌坊等村庄，访问了13位70岁以上老人。邓小街87岁的高元勋提供的刘狗弟兄的家事，是极为难得的资料。高元勋的父亲高心田12岁就给刘狗牵马，知道一些刘狗的家庭情况。另外还弄清了两个问题：（1）我们访问的老人都说刘尿是兄，称刘狗为“二狗子”，纠正了资料记载中的兄弟颠倒的错误。（2）刘狗不是八卦旗，而是黑旗白边子旗，老人多形象地说“老鹅膀子旗”，与白莲教无关。

一、籍贯来历

刘玉渊、刘学渊兄弟在义门地区，是以小名行世，刘狗、刘尿人所共知，大名却鲜为人知，而只知绰号大老冤、二老冤。而且起初访问的很多人，都找不清他们是那个地方人。义门集的邓家玉说是家住河南四桥口；祝起龙说是（涡）河南哪庄人；锁开珍又说是河南刘园人。但访问刘园的老人，都说刘狗、刘尿与刘园不一家，不是刘园人。直至后来在邓小街找到一位87岁的老人，

名叫高元勋，才弄清他们的来历。

刘狗的原籍是山东滕县，道光十年（1830年）左右出生，在他8岁的时候父亲死在监牢里。道光二十六年，滕县是个大歉年，刘狗的母亲带着4个孩子逃荒，到了义门集，在涡河南四桥口的河岸上挖个洞栖身。穷得弟兄合穿裤子。刘狗18岁时，在一个邓氏地主家当了半年长工，秋后就给辞了。刘狗的力气大，吃得多，地主都不愿雇他，便在农忙时给人打短工，农闲时贩个青菜瓜果。后来涡河码头上的马腿头马老五看刘狗的力气大，便要他当马腿子（码头搬运工人）。义门集当时有六成行（粮行）、官盐店。马腿子就给六成行、官盐店搬运粮食和盐。刘狗的力气大，人又憨厚耿直，得到众人的拥戴，成为头领。后来马老五想加抽马腿的头钱，又怕刘狗反对，先送两吊钱去给他，刘狗没有收，马老五怀恨在心。有一次刘狗他们去扛官盐，马老五唆使盐官敲他们竹杠，诬赖刘狗他们偷了两包盐。这件事激起了公愤，打死了盐官，事情闹大了。那时张乐行已经在雒河集起事，众人便推刘狗为首，装旗起事了。

刘狗起义的时间，是在1853年。据高元勋说，他父亲高心田是属虎的，比他大31岁，12岁时给刘狗牵马。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是阴历壬寅年，民间过去都习惯说虚岁，高心田12岁那年，应是1853年。

二、兄弟竖旗

刘狗大名学渊，膂力过人，能扛起成车的柴禾，在兄弟4人中名气最大。文字资料的记载，多以其为兄，如《剿平捻匪方略》和《河南军情探报》。亦有以其为弟者，如《山东军兴记略》。在义门集调查，听到的传说，也都是刘狗是兄，刘尿即玉渊为弟，可能是说起来口顺习惯使然，并未发现是个问题。可是在涡河南，刘尿竖旗的圩寨，张寨的张新俭、张新会和刘园的刘金

和，却都说刘狗是老二，称其为“二狗子”，引起了我们注意，似觉可信。

他们的绰号原应为“老冤”，是称呼憨厚挨欺的冤大头或受气包，谐音其名，成为大老渊、二老渊。还有两弟，人都不知其名，只知绰号为三疯子、四老马子（资料记载中有刘四麻）。

起义以后，义门集的四角八楼，都是刘狗弟兄几个的势力范围。刘狗住邓楼。邓楼原来就有楼有寨，他又重修。邓楼有钱的人多，刘狗见姓邓的就杀，邓家大户都逃到亳州去了。刘尿住张寨。张寨原叫张小庄，是在刘狗弟兄铺搭开以后才打（筑）的寨，扒了很多庙。老三住十里庙。老四住许圩子。

二、作 风

义门地区群众对刘狗弟兄的性情暴躁、随便杀人和乱搞女人的作风，多有微辞，并有种种传说：

刘狗、刘尿性子暴，张口就骂，抬手就打。他俩到庙集，只要一进茶馆，原来象鸭子窝的茶馆，马快变得鸦雀无声，人就一个一个地溜走了。那时赶义门集，不敢过午，怕碰到刘狗。他心毒，是武的，见人看他，或向他笑笑，就起疑心。有一次刘狗路过邓竹园，一个妇女在地里摘绿豆，抬起头来望他。刘狗说：你望我干啥？就叫手下人把她杀了。

刘狗、刘尿弟兄俩在邓楼、张寨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刘狗弟兄四个驮人家六七十闺女媳妇；刘尿有十八房家眷，上集时一人骑一匹马。

三、刘狗、刘尿之死

僧王来平反，住周大营周振远的祖父周乐家。周乐家当时好日子。有四五顷地，僧王平反只杀了些头子，小户剃了头就算了。刘狗是在庙集东南15里小刘庙的红芋窖里逮到的，刘尿也

是在东南的余楼给逮到的，都是在赵旗屯附近。死在大周营家后五叉路口，是挖眼睛、穿黑锁、抽肠死的。张老乐也死在那里。另据义门集祝起龙说：平刘狗、刘尿者是刘先文，绰号刘猴子，湖北孝感人；邓楼邓新和说是绑在庙集桥桩上用刀割死的，赶集的人走到那都要用刀割，不割官不愿意。按刘先文实有其人，同治四年（1865）为副将，驻义门。但《安徽通志》和《亳州志》都说俘获刘狗者是翼长舒通额。

9月28日—10月1日 亳县境内

义门集的调查结束，涡阳的调查即基本结束，整个捻军调查，亦已接近尾声。9月28日，调查组分为两路：一路由义门向东北，经耿皇寺到河南永城的下张桥，调查杨兴泰；一路由义门向北进入亳东境，循着1863年僧格林沁由河南到皖北“剿捻”的路线，在蒋集、观音堂、泥台店调查。惜未去亳北的雷寨、芦庙，调查大花旗雷彦和小花旗李廷彦的事迹。我在观音堂乡政府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与会老人对捻军甚为茫然，只能说出“僧王打蒋集子，观音堂是前队，刘集（观音堂北二十里）是后队”；而在蒋集周围的张土楼、阎楼、余楼和陈庄，访问的6位老人，都知道僧格林沁打蒋集打了40多天，他们称之为“僧王打炮”；张土楼、陈庄有两个捻军首领。

一、张朝阶

张朝阶，蒋集西南张土楼人。当地人都叫他张老丹，而不知其名。据他的70岁嗣孙张世龄说：祖上是书香门第，富贵之家，还曾出过拔贡。家有祖上丢的三顷地。兄弟3人，是阶字辈，他是老二，忘记叫啥阶。起事后竖旗是在韩楼（张土楼东三四里），是黑旗红边旗头，带有百十杆旗。韩楼的寨还是他打

(筑)的,两道濠沟,一道围墙。僧王来打韩楼,大炮就架在韩桥(韩楼北一二里),打有月把没打开。后来还是苗蛮子把他诓去,圩子才破。到苗那里,苗还设酒席款待,在席上把他杀掉。尸首是由金某装棺用骡子驮回来的。他死时才二三十岁,没有儿子。老大反前死去,有一个儿子。老三跟他混,是在涡阳西南边打败仗凫水淹死的,有两个儿子,从小过继一个给他,叫张起云,就是先父。

按张朝阶可能是以字行,以过去名与字有关系的习惯,取“平步丹阶”之义,应为“丹平”,所当时人尊称他张老丹。僧格林沁在奏折中称张朝阶作张平,恐系脱漏丹字之误。

二、陈万福

陈万福,蒋集西北三里陈庄人。家有10来亩地,是个仁义光棍。起义后竖旗在蒋集。是黑旗。僧格林沁部清军进攻蒋集,当地人习惯称为僧王打炮,打了40多天,末了还是哄开的。宋楼宋景禄说他老太太(曾祖)那时9岁,活到88岁才死,到现在(1958)97年了。据陈庄陈西明说:蒋集寨破后,陈万福给带至庙集,劝不降他,僧王才把他杀掉。听说亳州还有很多人去保他,可是来不及了。陈万福有两个儿子,小名一个叫买、一个叫雷,都跟人跑在外面。乱平才回来,那时我七八岁了。地也收回给人种,自己只种菜园。后都老死在家。

按:僧格林沁的奏折也说陈万福是被“诱出正法”。

结 束

10月2日,两路调查人马“殊途同归”义门。翌日,动身回涡阳,又临时动议,顺路重访张老家,调查土地情况。6日,三进涡阳。8日,循着原路回合肥。历时两月的调查结束。

擒军调查中被访问的人名单

(1958年)

姓 名	年龄	住 址	备 注
王玉山	71	涡阳县城东关	
王之骥		涡阳县城东关	
苗怀仁	72	顺河街	
田剑霞	55	城 内	田振邦侄
谈瑞朝		城 内	
刘田氏	60	县医院	田振邦侄女 刘天福孙媳
王继明	88	老 城	
张冀才	70	涡阳县张老家	张敏行重孙
张安民	50	涡阳县张老家	张冀才子
魏学存	85	贾 楼	
卢金荣	81	卢 楼	
张怀才	75	张老家	
张宝玉	76	张老家	
张宗先		张老家	
张振芳	80	张暗楼	
张师存	85	张暗楼	
侯怀德	84	吴桥寺吴土楼	
刘常有	87	刘破桥	
董福然	76	后 董	
董福胜	64	后 董	
董文清	79	吴桥寺前董	
张美山	74	吴桥寺前董	
张维洞	68	张大楼	
张维蓝	62	张大楼	
张西中	72	张大庄	
张德奎	66	张大庄	
张德标	75	张大庄	

续 表

姓 名	年龄	住 址	备 注
王玉杰		龙山集	
焦德贤	77	焦 楼	
门玉韶	68	三里门	
王宝善	88	丁王庄	
王德才	75	大王庄	
王德和	72	大王庄	
姜清雅	93	姜 庄	
陈福胜	60		
潘学武	80	顺河集小潘	
潘进胜		顺河集小潘	
潘新泰	74	顺河集小潘	
潘克永	79	大 潘	
韩西宗	76	韩古庙	
韩西中		韩 庙	
韩学成	76	韩 桥	
高从海	77	曹市集	
牛再勋	84	曹市集	
郝文彬	59	郝 岭	
郝子沅	79	郝 岭	
张××		井 张	
张凤藻	71	张疯寨	
张凤德	73	张疯寨	
刘云山	74	刘瓦房	
刘茂林	81	前周庄	
许克勤	78	许 楼	
侯广林	79	大 侯	
牛怀庆	68	一里牛	
牛廷标		一里牛	
邓云弟	88	蒙城县坛城岗子邓	

续 表

姓 名	年 龄	住 址	备 注
汪学武	60	汪 庄	江老家人
江聚堂	77	涡阳县江集江老家	
江家平	79	涡阳县江集江老家	
江有成	76	王单桥	
董大山	70	魏老麦场庄	
李秀君		江集李小桥	
江华兰	82	江西庄	
纪守奎	69	纪伦寨	
纪守邦	71	纪伦寨	
纪殿臣	83	纪木匠庄	
李世清	71	李老庄	
江浩言	85	三里庄	
孙少臣	70	孙小寨	
孙连亭	80	烟 园	
刘学道	92	刘 郢	
李景华	92	李 庄	
孙秉钧	75	楚店孙大庄	
孙振先	82	楚店孙大庄	
孙玉喜	87	楚店孙大庄	
孙学才	89	小王庄	
路焕文	88	路 庄	
王汉章	88	王后湖庄	
张行泰	73	公吉寺老街	
张登泰	83	大张庄	
张朝宾	83	大张庄	
李广才	67	公吉寺老街	
龚连科	74	公吉寺老街	
龚云发	71	公吉寺老街	
孙尚钧	79	公吉寺大孙庄	

续 表

姓 名	年 龄	住 址	备 注
孙怀福	74	霍桥庄	
龚连云		龚方庄	
龚连勤		龚方庄	
龚云田	74	龚方庄	
张文善	71	张菜园	
马修心	75	马 庄	
祝其龙	72	义门集顺河街	
锁开珍	76	义门集顺河街	
邓家玉	76	义门集顺河街	
高元勋	87	邓小街	
邓世成	74	邓 楼	
曲世东	80	邓 楼	
邓际云		大刘庄	
张新俭	74	张 寨	
张新会	78	张 寨	
刘金和	82	刘 园	
胡金其	66	周桥王楼	
邓新和		邓 楼	
邓宝相		邓 楼	
张世林	70	亳县蒋集张士楼	
阎广三	67	阎 楼	
阎克亮	77	阎 楼	
宋老人	72	宋 楼	
陈西明	70	陈 庄	
焦步奎	80	亳县观音堂	
蒋献财	81	亳县观音堂	
王清运	70	亳县王染坊	

捻子的产生及其初期活动

19世纪中叶，全国各地各族人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起义风起云涌。清王朝就象条腐朽了的破船，飘摇在农民起义的暴风雨中，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在数十起的农民起义之中，尤以长江以南的太平天国运动和淮河以北的捻军起义，规模最为浩大。本文是在对捻军的实地调查后写成，对“捻”的产生时间及“捻”字解释、捻军与白莲教的关系、捻军起义前的活动，提出粗浅的看法。

一、捻的产生时间与捻的解释

捻，产生于何时？对研究捻军者来说，也是一个要弄清楚的问题。据王闿运说：“捻之为寇，盖始于山东。游民相聚，有拜福，有拜捻，盖始于康熙时。”^①这是关于捻的产生时间最早的一种说法。除王闿运的《湘军志》以外，我们现在尚未见到别的记载，可以佐证。因之，我们还不能轻信王闿运的“始于康熙时”的说法，只能姑作一说而已。应该说明，王闿运把捻的产生地点，说成是山东，是不确切或不全面的。确切而全面的说法，

^① 王闿运：《湘军志·平捻篇》，见《捻军》资料第1册第1页。

应是《剿平捻匪方略》序言里所说的“河南之归、陈、南、汝、光，江苏之徐淮，山东之兖、曹，所在有之。而安徽之风、颍、泗为甚，凤、颍所辖蒙、亳、寿为尤”。此外另据王定安所说：“山东之兖、曹，河南之南、汝、光、归，江苏之徐淮，直隶之大名，安徽之庐、凤、颍、寿，承平时在在有之。”^①这种说法也较可靠。其实，在捻的组织内，也并无所谓“拜捻”仪式。

根据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资料，大致可以肯定，捻产生在嘉庆年间，是没有问题的了。嘉庆十九年（1814年），陶澍在他的“红胡匪徒日炽，敬陈缉捕事宜”奏折里，已经提到了“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②的捻的组织形式，但还没有明确地提出“捻子”的名称。到嘉庆二十年（1816年），在清仁宗圣训卷101里就明确地提到“捻子手”的名称和捻的初期活动特征：“本年三月间，光、息交界五福桥地方，捻子手百余人，手执长枪，前往互斗，并挟有一丈余长之抬枪。经过市场，人皆分道让路，不敢声言，仇杀多人，亦不报官。”之后，在清帝的“上谕”及其奴才们的“奏折”里就出现“捻匪”的污蔑字样了。

如果把顺刀会、拽刀会、红胡子也认作是捻的话，那么，捻的产生时间还可以提早到乾隆二十年。据《清高宗圣训》卷254记载：

徐州肖县地方，有顺刀会名色，每逢庙会集场，压宝打架，酗酒诱赌……永城有此会名……今徐州与永城接壤，又有此会名，明系豫省窜入。

关于顺刀会的入会形式，据《清高宗圣训》记载：“但有

① 王定安：《湘军记》卷16，《平捻篇》。

② 《清仁宗圣训》卷101，第17页。

顺刀一把，便许入伙，呼朋引类，十百成群。”我们把顺刀会的活动与初期捻军的活动对照来看，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捻军的初期活动内容，也确实有群聚集镇、喝酒、赌博、争光棍（打架往往由争光棍而起）等情况。我们在捻军的调查中，一些有关捻军或捻军首领的传说中，都掺杂着聚众而饮、赌博、争光棍的事情^①。能不能就因为捻军的初期活动与顺刀会的活动情况相似，从而认为顺刀会就是捻了呢？显然不能。因为顺刀会与捻军同样是反抗封建压迫的群众组织，他们的活动有很多相似或是酷似的地方，这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

捻子，是捻军和捻军地区的广大群众对自己的组织的称呼。从今天皖北的群众还称它为“大捻子”或“捻子”^②来看，可以想见，当时捻军和捻军地区的群众对它也是这样称呼的。在蒋子潇的“捻子”诗中有“其名曰捻子”^③之句，另在《豫军纪略》中也有“自号为捻，不相统一”之^④说，这都说明了捻是捻军的自称。

关于捻的解释，资料中是众说纷纭的。但是由于一些地主阶级文人的妄加臆断，或对捻军的极尽污蔑，结果，便歪曲和蒙蔽了捻的真实意义，把一个原来简单的问题，弄得复杂深奥了。

① 传说捻军起义以前，张乐行手下的人，曾用他的名义在吴桥寺摆过赌，张乐行又曾争光棍而杀死侯龙标；张敏行有个义子专替他推着车子到处赶集赌钱；余如侯士伟、江台凌、孙寡心等在传说中也莫不有赌博的事情。

② 我们去秋在涡阳调查捻军，所访问的老人，几乎都是这样称呼捻军的。

③ 蒋湘南：《蒋子潇先生的遗集·捻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1册，第325页。

④ 《豫军纪略》卷6，《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2册，第289页。

资料中关于捻的解释，归纳起来，基本上是两种说法①：

一种说法是“捻纸燃脂，毁室劫财”。持这种说法的是《涡阳县志》：“江淮间聚众打降谚呼曰捻；又盗捻 纸然脂毁室劫财，即名曰捻。”与《涡阳县志》的说法相同的是王闳运在他的《湘军志》里所说的“其党明火劫人，捻纸燃脂，因谓之捻”。

另一种说法是“一股为之一捻”。陶澍在他的《条陈缉捕豫皖等省红胡匪徒折子》里说：

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②。

与陶澍这种说法相同的有黄钧宰的《金壶七墨》、《山东军兴纪略》和方玉澜的《星烈日记汇要》等三种说法。

黄钧宰在《金壶七墨》中说：

惟安徽之庐、凤、颍、亳，河南之南汝、光、陈，响有白莲遗党，劫掠最横，以朱染须，号曰红胡匪，每一股谓之一捻。③

《山东军兴纪略》记载说：

……或数百人为一捻，数千人为一捻，故当时号曰捻匪。④

方玉澜在《星烈日记汇要》中也说：

每大会，则聚集首领，或数十，因曰，此一捻也，彼一捻也，如以指捻物使之聚而不散也。捻子之称，盖由此

① 王定安的“乡民行帷逐疫，裹纸然膏为龙戏，谓之捻”的说法，是把玩龙灯的所谓一灯为之一捻，牵强附会地拉来解释捻军的捻，实际上是解释不了捻的。故此处未把王定安的说法列为一说。

② 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24。

③ 黄钧宰：《金壶七墨》卷4，第4页。

④ 《山东军兴纪略》卷2上，《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4册，第28页。

起。^①

两相比较，“一股谓之一捻”的说法多于“捻纸燃脂，毁室劫财”之说。当然，我们不能从多与少上去判断正确与不正确，对与不对。但是，它至少可以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一個条件。穷究其源的办法，还是从资料的本身去考察。

首先，让我们来看《涡阳县志》。《涡阳县志》是当地人写当地事，应为人所信，这是不用说的。但要知道《涡阳县志》是在捻军起义失败五六十年以后，即1924年才修的。因此，《涡阳县志》中有关捻军的资料，几乎全得自采访。虽然当时还有些捻军成员健在，但是，记忆与传闻就难免没有错误的地方。并且修《涡阳县志》的黄佩兰等人，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写的，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捻的解释上。他们规避捻的真实解释不谈，却把捻解释成“捻纸然脂，毁室劫财，即名曰捻。还说什么“江淮间聚众打降，谚呼曰捻。”据我们所知，江淮之间无此谚语很显然，《涡阳县志》在这里还想借谚语的力量哗众取宠，但结果倒是谎言惑众了。

其次，我们看看王闳运的说法的可信程度。要是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来，王闳运在写《湘军志》时他自己对捻的真实含义也是弄不清的，既说是“徐淮之间，因以一聚为一捻”，接着又说“或曰，其党明火劫人，捻纸然脂，因谓之捻”。最后，弄得王闳运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莫知其本所由也。”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就有理由怀疑“捻纸然脂，毁室劫财”不是捻的原来的本义。我们既有了这种怀疑，便可进一步来考察一下“一股谓之一捻”的说法的可信程度。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陶澍的话的可信程度。陶澍是最早注意捻子的一个人。他是嘉庆时江南御史，在嘉庆十九年的奏折中就

① 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1册，第300页。

提到了“每一股谓之一捻子”。陶澍的奏折是经过实际调查写成的，这是勿用怀疑的，所以说陶澍话还是较为可信的。

其次，《山东军兴纪略》虽是一部“官书”，但它对捻军活动的记载还是比较翔实的。这可能是由于捻军出征山东的次数频繁，捻军与山东接触的机会较多，山东方面对捻军的情况较为熟悉的原因，因此，《山东军兴纪略》所记捻军事绩便较为翔实可靠。

其他如黄钧宰的《金壶七墨》、方玉澜的《星烈日记汇要》均属当时人记当时事，材料的来源非是亲眼所睹，即是当时的传闻，其可信程度在某些方面往往超过“官书”。

根据上面从资料的本身分析的结果，应该说“一股谓之一捻”才是捻的原义或正确解释。这一点我们在捻军的实地调查中也得到了证明。“捻”，为皖亳交界一带地方的方言，与股、伙、铺同义。皖北涡、蒙、亳一带，对一股子、一伙儿的习惯说法是一捻子或一铺子。现在尤以说铺为普遍。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人、几千人在一起，均称为“一铺”，“常说这一铺子”、“那一铺子”。此处之“铺”应读为动词“铺路”、“铺张”之“铺”。《涡阳县志》说初期捻军有所谓“十八铺”者，就是18股捻军也。

二、捻军与白莲教的关系

有人认为“捻党是白莲教的变种，和白莲教有密切的历史渊源”^①。

这种看法，可能还是很普遍的。持这种看法的人，不外乎是

①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第7页，1951年三联版。

根据这么几点：

1. 捻军首领称“趟主”，而有些资料如柳堂的《蒙难追笔》、《山东军兴纪略》和《豫军纪略》却把“趟主”误作“堂主”，易使人误解捻军是个宗教的组织，从而使人联想到捻军与白莲教有关。一字之差，关系至大。

如：《蒙难追笔》说：

贼首曰堂主，有大小之分。大堂主树一大旗，各自为色，其所领之小旗，多则百余，少亦数十，色与之同。领小旗之头目，人曰小堂主。①

《山东军兴纪略》说：

……子弟父兄相率为盗，私立名号，曰堂主，曰先锋，或数百人为一捻，数千人为一捻，故当时号曰匪。②

《豫军纪略》说：

……其教（按指河南商邱金楼寨白莲教）中徒众有为皖捻堂主者。③

柳堂本人于1858年（咸丰8年）曾在姚得光捻军（涡阳贾家圩子）中生活过两个月，他对捻军的情况也是比较熟悉的，所记捻军事，也较为翔实。但他也有个别错误的地方，如把“趟主”误作“堂主”就是一个例子。这个错误的产生，可能是由于语言的隔阂造成的。柳堂是河南人，对涡阳的语音，他不尽全能听

① 柳堂：《蒙难追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1册，第350页。

②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4册，第28页。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2册，第189页。

懂,“趟”与“堂”的音又相近。且“堂主”这个名称较之“趟主”更为柳堂所熟悉。可以设想,柳堂便会很自然地认为是堂主了,他绝没想到也不会想到捻军对其首领会有“趟主”这么个特殊的称呼。《山东军兴纪略》和《豫军纪略》与柳堂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可能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可能是以讹传讹,错误相沿的结果。

“趟主”究作何解,或“趟主”的由来是怎样的呢?根据调查材料,有这样两种说法:

(1)“趟主”先是指“盐趟主”。皖北在捻军起义以前,贩私盐的活动很普遍,有专给人保送私盐者(传说张乐行就曾给人保送过私盐)。每趟出外贩盐,谓其首领为“趟主”。

(2)捻军起义以后,每到外面“打捎”^①一次,称为一趟,称其首领为“趟主”,谓一趟之主也。

实际上,这两种对“趟主”的解释是一种解释。起初,“趟主”这个称谓,是由贩私盐而来,实际所指的是“盐趟主”。后来,事情发展了,捻军的出外“打捎”代替了贩私盐活动,但与贩私盐一样,还要一趟两趟地出去。因之,“趟主”这个名称还得保存下来。不过改变了内容形式而已。

2.把“红胡子”与“捻子”混淆起来,以为“红胡子”就是“捻子”。若再根据陶澍在《条陈缉捕豫皖等省红胡匪徒折子》里所说“查红胡子原系白莲教漏网之人,间出偷窃,身带小刀为防身工具,人以其凶猛,故取戏剧中好勇斗狠而挂红胡者名之”^②和黄钧宰在《金壶七墨》中所指“惟安徽之庐、凤、颍、亳,

^① 捻军出外打粮,远者曰“打捎”,近者曰“磨弯”。

^② 陶澍:《条陈缉捕豫皖等省红胡匪徒折子》,《陶文毅公全集》卷24。

河南之南、汝、光陈，响有白莲教匪，劫掠最横，以朱染须，号曰捻匪”之说法，^①那么，“捻党”就是“白莲教的变种，和白莲教有密切的历史渊源”了^②。

其实，把红胡子认作是“捻子”，也是错误的。据我们所知，“红胡子”乃是皖北和豫南某些地方对土匪强盗的称谓，就如同安徽有些地方称土匪强盗为“大马子”或“老锤”一样。从而可以肯定“红胡子”这个名称，乃是封建地主阶级对起来反抗封建压迫的人民的笼而统之的污蔑称谓。蒋子潇在他的《捻子》诗中有“其名曰捻子，红胡乃诅咒”两句，其下注云：“良民谓之曰红胡子”，就是最好的例证。红胡子既是封建统治阶级对起义人民的笼统的污蔑称呼，那么，陶澍和黄钧宰以及别的资料中所说的红胡子，还不能断定就是“捻子”，因为也有可能指的是顺刀会、“盐枭”等。所以，我们不能说“捻子”就是白莲教的变种。

3. 淮北是白莲教的老根据地。

远在元代，淮北就曾有白莲教的活动，如1351年（至正11年）刘福通在颍州起义，1355年（至正15年）韩林儿在亳州登基，建元龙凤。以至清代，白莲教都不断起义。捻子正是产生在白莲教曾经活跃过的地方，人们便会很自然地以为捻军与白莲教有密切的关系，有深远的历史渊源。甚至以为捻军也有宗教仪式，是个宗教组织。有人企图把捻军与白莲教的关系说得如何密切，不顾事实地说什么“捻军起义以后，曾借用白莲教的旗帜，借用他们的称号、方法和斗争经验”，^③“（捻军）曾经从白莲教借用了抵抗民族侵略的教义和经验”，甚至连捻军的战斗口号和服装都是借用白莲教

① 黄钧宰：《金壶七墨》卷4，第14页。

②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刊》，1959年三联版，第7页。

③ 江地：《论捻党》。

的①。照这样说来，捻军的起义，实质上是白莲教在嘉庆年间的两次起义后的又一次起义。实际上，捻军既未曾借用白莲教旗帜、称号、方法和斗争经验，也未曾借用白莲教的教义，更未曾借白莲教的战斗口号和服装。大家都知道，捻军的旗是五色旗和五色镶边旗，怎么能说是借用白莲教的旗呢？从张乐行的称号——大汉明命王，论证与白莲教有关，这还不无根据。问题是张乐行是不是真的称“大汉明命王”，或者是有别的称号。除《豫军纪略》外，我们还没有见到别的记载，说张乐行称大汉明命王。我们在皖北调查捻军时，皖北的老人均知张乐行称过“大汉盟主”或“盟主”，而不知有“大汉明命王”之称。因此，张乐行的“大汉明命王”这个称号，是值得怀疑的；捻军既非是个宗教组织，又何以要从白莲教那儿借用教义呢？说到捻军的战斗口号，那更不是向白莲教借用的了（真不知道白莲教有什么战斗口号外借）。据我们从调查中所得的材料，捻军起义后，大旗上书“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大汉盟主张”或“替天行道，大汉盟主张”。这显然是受了水浒传的影响，效法梁山泊英雄的行为，与白莲教是无关的。

嘉庆年间，白莲教曾发动过两次起义。第一次起义是1796年至1805年（乾隆末年至嘉庆九年）的白莲教川楚陕大起义。这次起义历时10年之久。起义最后虽是失败，但也把清王朝拖得精疲力尽，使得清王朝的统治力量急转直下。经过10余年，又爆发了第二次起义，即1814年（嘉庆十九年）的天理教（白莲教的一支）起义。起义虽被很快地镇压下去，但它是清王朝统治力量的试金石。它以太监作内应，几百个天理教徒能攻进皇宫，这就足以说明清王朝的腐朽程度了。白莲教两次起义失败后，清廷对之严加

① 江地：《论捻党》。

注意，白莲教不得不改换名目，以八卦教、虎尾鞭、义和拳等名义出现，进行活动。

嘉庆初年白莲教的川陕大起义失败后，有一些教徒逃亡至豫皖之交一带，潜伏下来，伺机而动。其中一部分教徒仍秘密地继续进行布道传教的宗教活动。1822年（道光二年）河南新蔡朱凤阁与安徽阜阳邢名章起义^①便是明例。但另外，也有个别的或一部分白莲教教徒可能以个人的身分加入到“捻”中间去，变成捻的成员，给捻增添了新的力量。但这不能说是“捻党这一组织形式，也就成为劫后余生的白莲教徒的最好活动形式”^②。

捻军起义以前，皖北有没有白莲教的活动呢？回答这个问题是肯定的。但是从资料中找不到具体答案，因此还是应该借助于调查材料。传说义门集（又名庙集，原属亳州，今属涡阳），在捻军起义以前曾有白莲教的活动，捻军起义以后，白莲教却消声匿迹了^③。事情可能是这样的：捻军起义以后，势力大于白莲教，白莲教便依附于捻军，参加到捻军中去。这种情况的发生，往往还要诉诸武力。传说中的捻军与白莲教关系不但并不怎样密切，而且两者之间时常发生磨擦，相殴互斗的事情倒是有的。例如皖北一带流行着有“驴踢的，龟爬的，娘娘被他杀得怕怕的”和“牛不走，车不转，娘娘急得一身汗”二首民歌。在前一首民歌中的“他”字，传说是指龚得，这当然不一定可靠，但指的是一个捻军首领是无疑的，“娘娘”是指白莲教所供奉的娘娘。这两首民歌就是描述白莲教被捻军打败时的情景。所以说捻军与白莲教的关系并不是很融洽和泰然共处、相安无争的。

① 据《清史·列传·孙玉庭传》。

② 江地：《初期捻军史论丛》，1959年三联版，第8页。

③ 据涡阳吴桥寺吴士楼85岁的侯怀德说。

下面我们举出大家一向认为与白莲教关系密切，或他们本人可能就是白莲教徒的两个捻军首领，来看看他们是不是白莲教徒。这两个捻军首领是刘狗（即刘学渊，绰号二老渊）和杨兴泰。他们两个的领旗地区①都在白莲教曾经活动的地方——涡阳义门集。如果以涡河为界：则刘在涡河之南，杨在涡河之北。

刘狗原是山东滕县人。1846年（道光26年），滕县岁歉，便与其兄刘尿即刘玉渊（绰号大老渊）逃荒到义门集②。后在涡河上当码头工人。起义以后，义门集南边的张寨、邓楼，就作为他与哥哥刘尿的圩寨③。据《豫军纪略》说，刘狗是八卦旗，并曾于1861年（咸丰十一年）支援过河南商邱金楼寨的白莲教起义。《豫军纪略》记载：“（金楼）寨首部永清，其先习白莲教已三世矣……永清不悛，乘中原多故，其教中徒众为皖捻堂主（应为趟主）者，志益侈。……八卦旗捻首刘狗至金楼谒永清，执礼甚恭，薪木无毁伤……会刘狗以马步贼二万来援……”④刘狗捻军出征河南、山东的次数频繁，支援过金楼寨的白莲教起义是可能的，但《豫军纪略》却把刘狗的旗弄错了。我们在义门集调查时，老人们众口一词地说刘狗是黑旗或是形象地说黑老鸱（乌鸦）膀子旗，与白莲教无甚密切关系，更不用说刘狗是白莲教徒了。

① 捻军中语，即势力范围。

② 据涡阳义门集88岁老人高元勋说，道光二十六年滕县遭灾荒。根据我们从调查中得到的检验，老人们碰到年代这个问题，总是弄不清的。在我们尚未找到其他的资料，予以印证以前，只好存疑。但也需说明一下，高元勋的父亲高飞田12岁时，曾给刘狗牵马。高元勋所知道的刘狗的事迹，都是直接听他父亲讲的。因之，高元勋所讲的光绪二十六年，是有它一定的可信程度的。

③ 据涡阳义门集张寨75岁张新俭、79岁张新会所说。

④ 《豫军纪略》卷2，《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捻军》第2册，第189页。

杨兴泰是涡河北的下张桥人。他“是八卦旗，黑旗画八卦。杨兴泰不是白莲教”^①。“杨兴泰打八卦旗，不过是为了多招几个人，与白莲教没有关系”^②。有可能杨兴泰的八卦旗是受白莲教的影响，但是受影响者不一定是白莲教徒。另外，八卦并不能作为白莲教的唯一的标志，不能看到八卦就认为是与白莲教有关系。因为民间的传统看法：一直都把八卦看作是驱妖避邪的吉物，往往悬之床头、门上。杨兴泰的八卦旗也有可能是受了民间传统习俗的影响，不一定是非与白莲教有关系便不能打八卦旗的。

从另一个方面即捻军的组织形式看，捻军也是与白莲教无甚密切关系的。把捻军这支抗清的农民力量组织起来的不是宗教的力量，捻军并不是宗教组织。捻军的组织形式是宗族间的自然结合。关于捻军的组织形式另有专文阐述，这里不再重述。但为了论证捻军的组织是宗族的结合，不妨举出几个捻军主要首领作为例子：

1. 张乐行，黄旗旗主，捻军名义上的总领袖。他的家在涡阳（雉河集）西北12里之张老家。张老家附近的几十个村庄多为张姓，号称“十八门张”。捻军中较为知名者如张宗禹、张振江、张敏行、张琢均为张乐行同族。

2. 侯士伟，红旗旗主，北距张老家20里之侯老郢人。姓侯的村庄有十几个，分布于侯集附近，号称“九里十三侯”。红旗的成员主要是姓侯的。

3. 龚得，白旗旗主，涡阳公吉寺磨盘松人。姓龚的号称“九里十三龚”，说明姓龚的人也不少。

① 据涡阳县义门集下张桥78岁的杨汉亭说。

② 据涡阳县吴桥寺吴土楼85的侯怀德说。

4. 顺河集^①“一门刘”，如刘永敬（饿狼）、刘天台（小白龙）、刘天福、刘天祥、刘天岳、刘天讲等，都是蓝旗。

余如江台凌、孙葵心、苏天福等也莫不是族大人多的“大户”^②。

一般地说，在捻军中，姓张的都是黄旗；姓侯的是红旗；顺河集的姓刘的都是蓝旗。捻军宗族结合的最突出的一个例子是：涡阳西北20里有个吴桥寺（张老家与侯老郢之间，当时有南张北侯之称，就是以吴桥寺为界），在它的东面有个村庄叫吴土楼，庄内住户是吴侯两姓。因为是两姓，几十户的一个小村庄，就有两个小旗头，而且旗色各异。姓侯的因与红旗总旗头是一家，便是红旗；姓吴的与黄旗张振江是亲戚^③，便是黄旗。

捻军的旗头与旗头之间，也多是沾亲带故的，如张乐行与侯士伟、苏天福、杨兴泰，刘狗与杨兴泰，都有亲戚关系。地主阶级却把捻军的宗族结合的组织特点污蔑为“子弟父兄相率为盗”^④。我们认为要是用“子弟兵”来称呼捻军，倒是很恰当的。

宗族的结合，使得捻军内部形成一个个的家族集团，大大小小的旗，便是它的形式或标志。这就在捻军中形成了牢固的宗族观念和地域观念。在捻军成员的脑子里，只知道自己的集团和维护本集团的利益，而并无整体这个概念。因而，每一个集团或旗把本身利益看得很重，对外往往采取排斥的态度。所以在捻军

① 顺河集今属涡阳县，在涡阳县城（原雒河集）东45里。

② 这是皖北老人的习惯说法。此处之大户，非指富家大户，是指族大人多言。

③ 传说张振江的姑母嫁给吴土楼姓吴的。

④ 《山东军兴纪略》卷2。

的内部，相互的殴打和残杀的事情，不是很罕见的。这就是捻军为什么始终没能走到统一的道路上去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这也可以想见，捻军是不会也不可能接受白莲教的那一套组织和仪式的。

关于捻军不是个宗教组织的问题，这在《清仁宗圣训》和《清宣宗实录》里早就说得很清楚：

该匪徒等（按指红胡子、捻子手等）……非如邪匪之勾结伙党，聚而倡乱者可比。①

查颍州强悍成风，为捻党逃捕渊藪，向有捻匪私泉，虽非习教传徒，声势最易联络。②

虽然这两个封建统治的头子把组织人民起义的白莲教、八卦教视为“邪教”，横加污蔑，但却使我们知道了捻非宗教组织这一事实。

三、捻子起义前后的活动

安徽淮北是当时政治、经济都很落后的地区，土瘠人穷，加之灾荒连年，广大的农民群众一直在饥饿线上挣扎。若不愿坐而待毙，那么就只有挺而走险的路一条。“方捻寇之初起也，不过饥穷乌合之徒”③，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薛福成当然是不会说捻军好的话，但他也不得不承认捻子的起义是为饥寒所迫这个事实。

① 《清仁宗圣训》卷 101。

② 《清宣宗实录》卷 41。

③ 薛福成：《庸庵内外编·治捻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 1 册，第 357 页。

这样，广大的饥饿农民便成为捻军的重要成员。这也是捻军得以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捻军起义前后主要是积聚自身力量和获取生活资料两个方面。

1. 贩私盐的活动

清沿明制，把全国划分成11个盐区，规定在某一地区只能销售某种盐，以垄断食盐的价格。“皖北阜、亳、蒙三县旧销淮引，宿州旧销东引”。①与皖北接壤的河南陈州、归德是长芦盐区。涡阳建置，是由宿、阜、蒙、亳等县各划出一部分。因此，在涡阳这个地区里，当时是两淮盐区与长芦盐区交错的地区。按规定两淮盐区的人民只能购买淮盐，芦盐就被认作是私盐，甚至“一邑之中，此乡彼乡而亦指为越私”②。而官盐与私盐的差价又很大，据陶澍说：“安省之颍、亳，豫省之汝，光一带例食淮盐，现在每斤值钱四五文不等，长芦私盐每斤不及半价”③。而且“芦盐味鲜，淮盐味苦”④。传说也有“卫盐（芦盐）粒大味咸，淮盐（淮盐）味淡”之说。“味苦”的官盐比“味鲜”的私盐价格高过一倍，并且“官盐店卖盐还兑（掺）土，分量不够去找它，不仅不给添，反而给你去掉一铲子，说：“够了，拿去吧！”⑤谁又愿意多花钱去买“味苦”和受闲气的官盐呢？“是以居民利食私盐”⑥，所以就“民情趋便了”。⑦

① 《涡阳县志·盐法》。

② 同上。

③ 陶澍：《条陈缉捕豫皖等省红胡子匪徒折子》，《陶文毅公全集》卷24。

④ 《亳州市志·盐法》。

⑤ 据涡阳县侯老鄂侯全敬所述。

⑥ 同④。

⑦ 《亳州市志·食货志》。

这样，安徽河南的贩私盐活动，当然是很活跃的了。

关于贩私盐活动的情况，资料中有这样的记载：

安省之颍、亳，豫省之汝、光一带，例食淮盐，现在每斤值钱四五十文不等，长芦私盐，每斤不及半价，是以居民利食私盐。其间私贩盐泉，实繁有徒，而红胡则又为之护送，每车私盐索钱二百文，每日私盐不啻百辆。①

河南陈州，归德例食芦东引盐地方，与汝宁、光州例食两淮引盐各属，壤地相接，盐价多寡悬殊，数日往还，即获倍利。该处匪徒，罔知法纪，聚众兴贩，由归德之鹿邑、陈州之项城等县置买，或以驴驮，或以车运，每起数十人至二三百人不等，明目张胆，挺刀各持，昼夜南行，毫无顾忌，所过州县，又有本地土棍，每一头目率领皆伙匪多人，各分地界，沿途守候私盐经过，……戗刀手，捻匪、红胡匪子皆由此出。②

我们在捻军调查中也得到些这方面的资料，说明在捻军起义以前皖北贩私盐的活动很普遍，为了要与“盐巡”作斗争，贩私盐者便需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的走私活动。因而，当时除了贩私盐者以外，另外还有专为人保送私贩者，这就是捻子的初期活动内容之一。传说当时张乐行手下有18枪手（此外还有50枪手，100枪手之说），专给人保送私盐。可见当时的贩私盐活动是大规模的公开走私活动。传说这种大规模的贩运私盐，一年也不过一两次，时间多在春冬农闲季节，每趟出去之先，由保送私盐者

① 《清宣宗圣训》卷12，第5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1372，第16页，见南开大学历史系编《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第830页。

订下出去的日期。届时，四乡八寨的农民、商贩和部分中小地主，带着一些原始的运输工具如太平车、牲畜之类，风涌而至，然后就出发到山东的单县去贩运芦盐。据说在咸丰年间，一吊钱到单县可买芦盐30斤。贩到皖北，20斤就可卖一吊钱。每车（太平车）每趟给保送私盐者盐一包①。

把资料与传说对照起来看，就可以看出，两下所说的情况是差不多的。稍有不同者，即贩私盐的地方，《清高宗实录》说是河南汝宁、光州淮盐地区到鹿邑、项城去贩芦盐。传说是皖北诸县到山东单县去贩芦盐。其实这并不矛盾，芦盐既被看作私盐，贩私盐当然要到芦盐地区去贩，而鹿邑、项城、单县均为芦盐区。可以想见，路程的远近与贩私盐的规模大小有关系，据传说亳州、蒙城也有到宿州去贩芦盐的，只不过是规模较小而已。据推测，贩私盐者有两种：一种是专以贩私盐为生，是大规模的；另一种是偶尔参与贩私盐的活动，是小规模的短途私运。

大量贩私盐的结果，是在乾隆时候已经有“两淮地方，私盐出没，官引不能畅”的情况。至嘉庆时。其情况之严重是可以想见了。清统治者对之便要设法制止，唯一的办法就是查禁。据传说当时设有“缉私营”，专以缉查私盐为事。据《涡阳县志》说，当时的情况是“盐巡充斥，而防务隳，险诈之徒，专伺往来城郭，携有升合者而指为贩私，巡勇肆其淫威，致酿重案，数十年间，指不胜数”②。与“盐巡”作斗争的这个任务，就落在专为人保送私盐的“捻子”身上。因而可以这样说，与盐巡的斗争

① 据涡阳吴桥寺吴士谔85岁的侯怀德说：太平车一趟可拉盐20—30包（二三千斤），给保送私盐的盐一包。

② 《涡阳县志·盐法》。

就是当时捻军反清的主要任务。

如上所述,当时皖北的广大人民,因食盐的问题,所受清政府的盘剥与闲气是罄竹难书的。就是《涡阳县志》也认为清政府的食盐垄断政策是造成捻军起义的一个原因,“彼张乐行、牛师修之已事,岂非为士诚、国珍(谋)而未成者哉”。

2. 所谓“争光棍”活动

皖北在捻军起义以前,“争光棍”的活动甚盛。从表面上看“争光棍”是属于一种打码头争地盘的人们之间的私斗和厮杀的性质,但从其客观效果看,便不能否认它在当时是起了扩大和统一反清势力的作用”。所以,我们有理由把“争光棍”活动看作是积聚或扩大反清力量的手段。

原来,皖北的赌风甚厉,赌场多设在集镇上。据方玉澜说:

贼之强悍而富者自为首领,纠众横行,于集市聚赌,排列刀矛枪统,名为镇棚,众称为棹主。各集市皆然。①

当时皖北的情况也确如方玉澜所说,摆赌的人(即赌头,也即方玉澜所说的棹主)非交游广阔的人(这样的人即所谓光棍)不得为之,但不一定是“强悍而富者”。传说张乐行在吴桥寺摆过赌,当然张乐行自己不会去摆赌,不过是别人借他的名义而已。

传说中捻军的大部分首领都被称作仁义光棍或五狼光棍②。仁义光棍在当时是个得之不易的称号,因为它要有行侠尚义的行为和能为人解难排纷的能力,以及“见难必拯救”③的心肠。光

① 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1册,第309页。

② 在皖北老人的说法中,仁义光棍与五狼光棍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对作风正派、行侠尚义、能为人解难的人的称呼。如张乐行大家都称他为仁义光棍,反之则称为五狼光棍。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1册,第325页,《蒋子涵先生遗集·捻子诗》。

棍也就是《蒋子潇先生遗集》里所说的“响老”。“响老者，人有不平事辄为之平，久之，赴愬者众，赞口洋溢轰远近，如风鼓雷鸣，则成响捻子也。”①

“光棍”（也即响老）是混出来的，但也是争出来的。因当时“混光棍”的人多，善恶并存，势必会有争。传说涡阳侯集的侯永清、侯龙标（有的资料说他是捻军首领）父子俩，也是混光棍的，但在地方上仗势跋扈，为人所恶。他有一个戏班子，到哪唱戏，只要戏一开台，听不听都要给钱；若是碰到阴雨，戏不唱，还得管他们吃。当时有“侯永清的戏，不听不生气，藤稽枪，红纸旗。铜鼓一声响，蹦出来个‘拿鸡’的”，“情愿耙套地，不听侯老永的戏，打火吃袋烟，越想越生气。”之歌谣，就是群众对侯永清的戏班子的评价。据说有一次侯永清的戏班子又到太清宫准备唱戏，太清宫和尚很害怕，但又不敢不叫唱。怎么办呢？便只好去找张乐行。张乐行便对戏班子的领班说，不准在太清宫②唱戏。领班跑去告知侯永清，侯永清慑于张乐行的势力，只好闷声憋气地走了。后来，双方又因另外的事情而发生械斗，结果，张乐行把侯永清、侯龙标父子杀掉。

3. 撵绵羊的活动

《涡阳县志》记载：

咸丰元、二年间，饥馑荐臻，龚得等横行劫掠，乐行族子杨曾率党十八人赴永城掠羊百余只，吏捕之狱。时乐行贩私盐黄河北，归率龚得等万余人围永城，劫杨等十八人出狱。众依乐行自固，乐行声势始大。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1册，《蒋子潇先生遗集·读读书游集传》。

② 涡阳县境内有东西两太清宫。此指西太清宫，在县城西北五六里。

根据调查, 18人^①撵绵羊是以张德才为首, 第一次撵绵羊是从北方保运私盐回来, 路过永城, 见有羊散牧田野, 趁便赶之, 真是“顺手牵羊”也。永城的地主便借端寻衅, 对张德才等人说: “要是胆量, 再到永城来撵羊。”张德才等人当然也不甘示弱, 因而又有第二次的撵绵羊。第二次去永城撵羊, 在把羊往回赶时, 永城的一个武举带人追赶, 追至一个桥上, 双方发生激战。激战的结果, 永城方面的4个教师爷被打死3个; 捻军方面的刘雅伯掉到桥下溺死。捻军为了给刘伯雅报仇, 又到永城去把武举一家30多口杀光, 事情越弄越大, 就从那起事了。

捻军与永城一武举的厮杀, 可能就是与河南团练会的斗争, 因为传说“永城那边的人用白布裹头”, 就是老牛会的明显标志。皖北蒙亳地区的群众曾把河南老牛会称为“孝帽子会”, 就是因为老牛会用白布裹头之故。

这里, 还要指出《涡阳县志》所说“乐行族子杨”的错误。按张德才的小名叫“羊”, 其父是从北方逃荒过来的“外来户”, 先是在袁小楼(距张老家五六里)给袁姓地主看家护院当保镖, 后来是张老家用一块荒地把他勾过来, 落户张老家的。张德才力气大, 成为张乐行手下的著名人物。但他与当地的张姓不同宗, 也就不能是张乐行的“族子”。

4. 捻军初起时的活动——“打梢”

晚住周口南……取乾麦置磨上, 研作大鼓片, 用水团饼烈火烧之, 出火即散, 亦不熟, 众为争食, 其为饥寒所迫可

① 关于撵绵羊的18人, 我们在调查时, 从老人的回忆中能够得知姓名的有: 张德才(小名羊)、杨春、司马荣(绰号司马蹄)、张德全、张德元、高瞎子、张双老头、张德明、张好、刘亭、张义雅、刘百雅。

知，想在家即亦此无之。①

这是曾经被捻军姚德光部俘虏过的河南省扶沟人柳堂对捻军饥寒情况最真实的记述，这也是一幅最好的捻军饥寒图的素描。麸片做的不熟的饼，尚争而食之，其饥饿的程度可以想见了。这便决定了，捻军在起义以后，它的主要活动，便是为获取生活资料，“方捻寇之初起也，不过饥穷乌合之徒”。这也是捻军在战略上“过城寨不攻，遇大军则走”②的不攻“坚”的原因所在。既然，其目的是为获取生活资料，当然便不愿意付出巨大的代价去与敌人作攻坚的正面战斗。所以说捻军在初起义的一段时间里的“攻掠”是无远大的战略目的的，每攻一地，数日不下，便撤离而去。

捻军在起义以后，每次出征，多往河南、山东，名之谓“打捎”。既归，“货财车挽担负，牲畜逐群而驱”③。捻军对“打捎”弄回的“货财”，是怎样处理的呢？就是说捻军是采取什么样的分配原则？据方玉澜说，是“半入捻首，半入捻众”。实际上，这种分配方法是与情理不合的，捻军的首领有什么权利独得一半呢？若是捻军首领所分得的一半是做为公有而储备起来，那倒还合乎情理，可是捻军中并无储备公粮的制度。所以说“半入捻首，半入捻众”的分配方法，是值得怀疑的。

我们从捻军的实地调查中，证实了柳堂所说的“马双步单”的分配方法是对的。柳堂在《蒙难追笔》中写道：“所抢之物，

① 柳堂：《蒙难追笔》，《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捻军》第1册，第349页。

② 薛福成：《庸庵内外编·治捻冠》，《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捻军》第1册，第357页。

③ 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捻军》第1册，311页。

除供给大小堂主（应为趟主——作者）外，马双步单，按“份分”^①。“马双”是指有马的人即马队分两份，这就是说，在分配中马也算一份。但是还有一点，柳堂却没有说，即鳏寡孤独的人，虽无子弟参加捻军外出“打捎”，但也照样可以分得一些。这是捻军的“有饭大家吃”和“有福同享”的农民平均主义思想的最好说明。“货财”分配以后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据柳堂说：“且所抢之物，值百卖一。时乡间正富，一小堂主所得仅钱变二十余千，即坐食亦难持久，况逢集便至饮酒驰马，争相夸耀，不二十日荡废尽矣。废尽再抢，然不曰‘抢’，曰‘出’”。^②据方玉澜说：“恣意大啖”，“迨至食尽，又出抢掠”。^③应该说明，柳堂、方玉澜都是地主阶级的文人，对捻军是要极尽污蔑的能事的。但也要承认，他们所说的，有些地方，也是事实。我们在捻军调查中，也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大捻子从外边回来后，就吃、喝、赌”^④，“等到吃完喝光的时候，就向趟主说：‘没有吃了。’趟主说：‘没有吃，装旗！’”^⑤“装旗”就是准备出外“打捎”的意思，这和柳堂所说“出门先数日，各堂（趟）主聚一议事，曰‘装旗’”相似。

这种情况，在捻军中继续或存在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综观上述，19世纪初叶（清嘉庆年间），安徽、河南、山东、江苏的一些地区，产生了捻这支农民的反清力量。而捻的起

① 柳堂：《蒙难追笔》，《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第1册，第351—52页。

② 柳堂：《蒙难追笔》。

③ 方玉澜：《星烈日记汇要·贼情二十》，《捻军》资料第1册，第313页。

④ 据涡阳县汇集南三里庄86岁的老人江谔言所述。

⑤ 据涡阳县吴土楼85岁的老人侯怀德所述。

义，首先爆发在皖北现今的涡阳地区。皖北与河南、山东、江苏接壤，而涡阳这个地区（未建置以前）在当时的皖北，又是蒙城、宿县、亳州、太和、阜阳等州县交错的地方。在这个地区，清朝的统治力量较为薄弱^①；但清朝官吏和封建地主对农民的压榨却更为深重^②。加之，又连年遭受水虫灾荒，人民所受的痛苦也较诸其他地区为深。因之，涡阳地区是当时政治、经济都很落后的地方。这使得捻军起义有可能首先突破这薄弱的一环。

如果说灾荒与饥寒是捻军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太平军的北伐是捻军大规模起义的直接原因，或者说太平军的北伐对捻军的大规模起义起了促进作用。而捻军起义以后，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把获取生活资料作为自己的主要活动，在政治上并没有一个远大的革命目标和明确的革命纲领。农民的落后性和受水浒传里“梁山泊英雄”的影响，使得捻军效法和借用水浒传里“梁山泊英雄”的“替天行道，杀富济贫”的行为和口号。捻军的组织是建立在宗族结合的基础上，在捻军中便形成了宗族观念和地缘关系，使得捻军对外抱着排斥的态度和偏见。这就是捻军在未和太平军联合之前，长期未能走到统一与团结的道路上去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捻军的产生和发展的整个历史来看，可以说它基本上还是没能越出中国历史上的原始的农民起义范畴。但是，

① 皖北的老人多称涡阳地区捻军起义时是个三不管的地方。当时，在这个地区里发生事情，宿、蒙、亳、颍等州县便互相推诿、卸责。这给捻军的活动以便利条件。

② 黄钧宰《金壶七墨》说：“皖北州县，差役每遇词讼，纳钱请清票，而数倍取偿于百姓，历任官皆以为肥，由是差横行，甲于他省。”另据《刀口余生》（赵雨生）的《被掳纪略》说：“至于捻匪起手，多系州县所逼。”见《近代史料增刊·太平天国资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14页。

我们不能也不应忘记捻军这支反清力量，所给予清统治者的严重的打击，和它在反清运动中的功绩。

再论“捻”与白莲教的关系

——兼评李东山同志的《试论“捻”和白莲教的关系》

50年代，我曾参加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捻军调查组，到皖北的涡阳、蒙城、亳县一带，作了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调查。回来以后，写了篇《捻军的产生及其初期的活动》（以下简称“前文”），谈到“捻军”与白莲教的关系，对江地同志在《论捻党》一文中说“捻党是白莲教的变种，和白莲教有密切的历史渊源”，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现又看到《江淮论坛》1980年第6期发表的李东山同志《试论“捻”和白莲教的关系》（以下简称“李文”），他认为“两种看法都有些偏激”。细检我的那篇小文，觉得这个问题还需作进一步的探讨，同时对“李文”亦有不同意见，不揣冒昧写出来，谓之“再论”。

一、关于“捻”的产生和正名问题

“捻”产生于19世纪之初。“捻子”之名最早见于记载的，是1814年（清嘉庆十九年）陶澍^①在《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匪徒折子》里提到的“每一股谓之一捻子”。这说明在此之前，

① 陶澍，湖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进士。先授翰林院编修，后充四川乡试副考官。十九年改任江南道监察御史。道光间，历任安徽、江苏巡抚、两江总督。

“捻”在豫、皖一带已活动了一段时间，形成了一股势力，从而引起清统治者的注意。关于“捻”的产生，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嘉庆时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以后，“撤勇归籍”，这批被裁撤的乡勇，在外面过惯了吃粮当兵的抢掠、博饮的生活，养成了一种游手好闲的惰性，“归籍”以后，变成“不屑生业，唯事博饮”的游民，“日则市场恣横，夜则乡村行窃”。此说见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

另一种说法是嘉庆时白莲教起义失败后，豫、皖一带成为幸存下来的白莲教徒的“逃遁渊藪”。此说见陶澍《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匪徒折子》。据郑元善《宦豫纪事》说：“捻匪，即俗称红胡子也”。

“红胡子”，强盗之谓也，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对各种反清组织的诬称，不专指“捻”而言。陶澍的“奏折”，距白莲教起义失败的时间不久，他把红胡子和白莲教联系，说明对这个问题敏感，对白莲教特别注意。再者，嘉庆时白莲教起义失败后幸存下来的教徒，跑到异乡别土，可以想象，若无亲朋故旧的关系，在当时是难以扎根立脚的，非如被裁撤的乡勇回到家乡故土可比。所以，我认为第一种说法，较为切合实际。这批“撤勇归籍”的人，回到家乡，浪迹于乡村集市，“唯事博饮”，当地的一些不事生产的失业游民，“又从附和之”。于是，在嘉庆年间就形成一股力量，他们从事贩运、保送私盐的活动，“或以驴驮，或以车运，每起数十人至二三百人不等，明目张胆，挺刃各持，昼夜南行，毫无顾忌。……聚时兴贩，散即肆劫掠。曳刀手、捻匪、红胡子，皆由此出”^①。他们除贩运或保送私盐以外，便多聚集乡间集镇，狂饮滥赌。1808年8月（嘉庆十三年七

^① 《清宣宗圣训》卷82。

月），给事中周廷森在《严惩聚众匪徒奏折》里说：“其滋事之先，由赌博而起。遇会场市集，公然搭设长棚，押宝聚赌。”为此，1815年颍州府专门出过禁赌“条示”，说明问题的严重程度。当时的集市，是四乡八寨各股力量汇聚、交锋的地方，免不掉产生磨擦，或者为占地盘，争雄长，而动干戈，就是所谓“争光棍”。“光棍”即蒋湘南所说的“响老”、“响捻子”，“无业者投之，亡命者投之，贩盐、掘塚、博掩者投之”^①。《河南军情探报》说张乐行：“家本小康，向来结交赌博，疏财光棍。”

“捻”是一种自然结合的群体。“人之入捻，非迫胁之，自乐入也。”^②进出自由，不拘形式，合则留，不合即去，象《湖北通志》说的“捻者，捏也。亡赖招呼成队，若手之搏物，仓卒捏成，撒手立散”，倒是有点符合初期“捻”的情况。大大小小“捻”的自由结合体，不相统率，内部是靠宗法氏族和亲朋故旧的关系维系着的。

关于“捻”的解释，尽管资料中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实际是两种说法：一种说法，“一股谓之一捻子”。陶澍《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匪徒折子》和黄钧宰《金壶七墨》都持这种说法。余如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和马杏逸《捻匪述略》、查揆《论安徽吏治》，亦应属于这种说法。

另一种说法，捻纸燃脂或捻香聚众。王闿运《湘军志》、王定安《湘军记》、王腾甲《捻匪志实》和《涡阳县志》，都属这种说法。

这样，我们就可见出：第一种说法的时间较早，多是当时人记当时事，耳闻目睹，是第一手材料。第二种说法较迟，夹杂了

① 蒋湘南：《蒋子潇先生遗集·读汉书游侠传》。

② 方玉润：《星烈日记汇要》。

牵强附会和恣意歪曲，从而掩盖了“捻”的原意，尤其是1924年黄佩兰主修的《涡阳县志》，把“捻”解释成“捻纸燃脂，毁室劫财，即名曰捻”，给后来的研究增添了麻烦。虽然大多数史学研究者在对“捻”的解释上是倾向于第一种说法的，但总不能很肯定。这个问题，经过我们1958年的实地调查，便迎刃而解了。原来，“捻”为皖北的方言，涡、蒙、亳一带对一股子、一伙儿的习惯说法是“一捻子”或“一铺子”。从而肯定了“一股谓之一捻子”的说法。有人还曾提出“捻”是自称还是他称的问题。从“捻”的原意看，可以理解为是自称，尹耕云《豫军纪略》也说是“自号为捻”。当然，这个问题还应辩证地看，既是自称，又是他称，这是无关宏旨的问题。

“李文”首先提出“澄清对‘捻’的正名”问题。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捻军正名”的历史。最早提出“捻军”这一称谓的是罗尔纲先生在1938年出版的《捻军的运动战》一书。从那以后，捻军之名通行，没有人提出疑问。不料17年后（1955年），罗先生自己倒提出异议，他在《太平天国新军的运动战》“三版序言”中说：“我在这部小书（原名《捻军的运动战》）中，对那在天京失陷后，由太平天国名将赖文光改编蒙、涡地方起义队伍而成的太平天国新军称为捻军，因此这部小书就叫做《捻军的运动战》，这是犯了十分严重的客观主义的错误，失却了人民的立场。”因为“他们自己并没有自称为捻军”。到1960年，他又写了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捻军正名——一个有关立场问题的名称的商榷》（《安徽历史学报》1960年，创刊号）。他认为“应不称为捻军，而应在（捻军的）不同阶段中，对它提出不同的称

谓”^①。接着,《学术月刊》1961年第九期发表了王成庆同志的《捻军正名质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王文认为:“称谓的正确与否,是不是就反映了立场,反映了客观主义,这是需要作具体分析……决不在于‘捻军’、‘大汉’之类的称谓。立场的问题是在研究分析历史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对阶级矛盾的根本态度”。我认为根本的问题还是罗先生所提到的“书法”问题,奉太平天国正朔的问题。与其说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不如说是站在太平天国的立场。我们知道,在封建史学中,名号、称谓问题,是马虎不得的。最近,“李文”又提出“澄清对捻的正名”问题,说“两家之争,首先都涉及对捻的正名,特别是将初期捻组织集团称为捻党问题。笔者认为,这一称呼很重要,是个源流,如不给捻较为正确的正名,对捻的研究就会误入歧途,得不出正确的结论”。这里的所谓“两家之争”,应是指我和江地同志在捻军与白莲教关系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看法,但我们并未“涉及捻正名”问题,我只是在“前文”顺便提了一下“捻党”这一称谓是否恰当的问题。我认为资料中的所谓“捻党”,是含有贬义的,“其义不过是成群结党的意思而已,如果我们今天还沿用‘捻党’这一称谓,是没有什么必要的了,且易使人产生误解”(即与今之“党”混淆)。“李文”也不同意“捻党”这一称谓,与我原来的看法大致相同。但他认为“正名应该称初期捻组织集团或称初期捻自由组织”;“1855年在雒河集(今涡阳县)十八铺结成义军之后,称为捻义军”。实在不敢苟同,理由是:

① 1855年秋雒河集会议前分成三个时期,称“捻”或“捻党”。1855年秋至1856年起义统一,建大汉,称大汉起义军。1857至1863年加入太平天国和1863年冬至1868年,称太平天国张乐行部或龚得树部和太平天国梁王张宗禹或鲁王任化邦部。

(一)“捻”这一民间结社，是自由结合的组织集团性质，在行文中使用是可以的，要是把“组织集团”作为捻的称谓，似无必要，也多此一举，正如“会”、“党”是一种组织集团，我们如果再称之为“会组织集团”，“党组织集团”就会感到不伦不类一样。

(二)“捻”的大规模普遍起义，是在1853年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太平军进入安徽的革命大好形势推动下形成的，不过比较分散，不相统一。1856年初的雒河集会盟，标志着捻军从分散走向统一。但1853是“捻”的起义时间，也是划分“捻子”和捻军的分期时间。捻军者，“捻”起义军之谓也，正如称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队伍为“军”，内含起义军之意一样，诸如绿林军、赤眉军、瓦岗军、黄巾军、红巾军等，不须“改捻军为捻义军”，何必标新立异，画蛇添足呢？

(三)名字、称谓，只不过是符号，只要没有原则的错误，能为人所接受、通用就行。也不要把问题说得过于严重。因为“正名”毕竟只是捻军研究中的一个小问题，并不至于会使对“捻”的研究“误入歧途”。

二、“捻”和白莲教有历史渊源吗？

“捻”和白莲教的关系，应是指这两个组织之间有无历史渊源（内在联系）和它们的相处关系（外部关系）而言。为要解决历史渊源的问题，必须对这两个组织进行一番逐本探源。上面已扼要地叙述了“捻”的产生及其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下面再考查一下白莲教的历史。

白莲教开创于南宋，源出于东晋慧远的白莲社，属于佛教的净土宗。净土宗分弥陀、弥勒两派。净土宗于魏晋南北朝时在民间很盛行，隋唐时衰落，南宋初又复兴起来，产生以高僧为中心

的一些念佛修行的异端宗门，著名的有白莲、白云两宗。二者的区别是前者有妻子。唐宋时的弥勒教，元末以后便与白莲教混合到一起，不再单独存在。

关于白莲教的产生，只能从南宋宗鉴的《释门正统》卷4《斥伪篇》和志磐的《佛祖统纪》卷47、54得知，是在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由吴郡延祥寺和尚茅子元创立的念经忏悔修行的道俗团体，被佛教正宗视为异端。它主张念经忏悔，不杀生，禁荤酒。白莲教创立后，发展很快，“愚夫愚妇传相逛惑，聚落田里，皆乐其妄”（志磐《佛祖统记》卷47）。引起了南宋统治当局的注意，把它看得与“吃菜事魔”（摩尼教）的妖教徒一样的危险，遭到取缔和镇压，茅子元问了妖妄惑众的罪，流放到江州（江西九江）。宗鉴《释门正统》卷4说：“后有小茅闾黎复收余党，但其见解不及子元。又白衣展转传授，不无讹谬，唯谨护生一戒耳。”

到了元代，先后曾三次下令：“禁白莲社，毁其祠宇，以其人还民籍。”（《武宗本纪》）但在仁宗时（1312—1320年），白莲教却一度成为合法的宗教，仁宗曾降旨保护建宁路（福建省西北大部分）的白莲教。到了英宗，再下令“禁白莲佛事”。

白莲教在宋、元以前，流行于长江以南地区（江、浙、闽、赣），元末以后，它的活动区域才向北发展，以皖、豫、鲁、冀、鄂等省为盛。我在“前文”里说“皖北是白莲教的根据地——白莲教的家乡”，是不确的。元时的白莲教，是熔儒、释、道于一炉的大杂烩，佛家的法，道家的行，儒家的礼，他们有妻子住寺庵，拜神象（不是原来的佛象），男女混杂，夜聚明散，已经不是茅子元初创时的白莲教了①。

①（日）重松俊章：《初期白莲教会》，《食货半月刊》1935年1月1卷1期。

明代左道之兴，大约以万历前后为最盛，宗支繁衍，名目众多。清黄育梗《破邪详辩》所收白莲教各种经卷目录70种。而所谓“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几乎是各种经卷的口头禅，虽然是打着弥勒、弥陀的旗帜，而所表现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甚为模糊，只是一些凭空杜撰以及敷衍推演的故事，并无系统。这种左道旁门之能兴起，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系。世乱年荒，免不了有生死无常之感，因而有希求乐土之想，宗教便应运而兴。

清代的白莲教，更是宗支繁衍，教派林立，没有统一的领导。程啸同志把它划分为三种类型，是符合白莲教实际情况的。

第一类，具有比较明确的反抗观念，用弥勒降生、救灾解劫、“清朝以（已）尽”、“日月复来”等政治化的宗教语言，鼓励群众起来反抗封建压迫，王伦的清水教、林清和李文成的八卦教属于这一类型。

第二类是宗教性的互助团体，徒众“约誓遇事帮助”，“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得到了贫苦群众的拥护。

第三类是纯粹的迷信团体，教首“聚众敛钱”，徒众望“免灾祈福”。

这三类组织构成一个纷繁复杂的秘密宗教系统，它们之间又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

宋、元、明、清四朝代都把白莲教视为异端邪教，律有明文禁止。但是他们的叛逆性格十分顽强，元末以及明、清两代掀起多次起义。特别是清代，白莲教有几次大的起义，如乾隆时的王伦起义，嘉庆时的川楚大起义和林清、李文成的天理教起义，遭到清政府的残酷镇压。白莲教为了生存下去，变换名称，分化支派，在山东、直隶、河南一带仍继续存在，而且成为颇有势力的

① 程啸：《乾嘉朝义和拳浅探》，《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

宗教结社。但当时皖北的白莲教的活动势力，较鲁、豫为弱。

综观上面对“捻”和白莲教所作的粗略考查，可以看出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组织。“捻”是自由结合的民间群体团伙，不“习教传徒”，“非如邪匪之勾结伙党”^①。清代嘉庆、道光两朝颁布的治捻律例，只指为“劫”，都没有涉及传习“邪教”。白莲教是秘密宗教结社，是靠“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弥勒出世”、“日月复来”、“反清复明”和“免灾祈福”的政治、迷信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反抗封建统治压迫的。它们之间看不出“历史渊源”来。1958年，我们在捻军调查中，只在义门一地，传说曾有白莲教的活动。《涡阳县志》也说咸丰三年十一月“教匪张捷三倡乱于义门集”。除此之外，文字资料和口碑传说，几乎都未提到涡、蒙的白莲教活动，引起我对江地同志的“捻党是白莲教的变种，和白莲教有密切的历史渊源”说法的怀疑，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而且，我们在调查中搜集到的两首民歌，却是描述白莲教被捻军打败时的情景^②，说明这两个组织之间的相处关系，并不是亲密无间的。这也是不足为怪的事情。因为在捻军内部，相互毆斗和互相残杀的事，也并不罕见。传说张乐行杀了侯龙标，红旗捻军才显得出侯士伟来，可是后来侯士伟又被张乐行的二哥张敏行所杀。现在，“李文”又提出“捻和白莲教有一定的历史渊源”的问题。但使人感到奇怪的是，江地同志所说的“变种”和“历史渊源”，本是一致的东西，而“李文”既说“捻不是白莲教的变种”，又说“捻和白莲教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① 《清仁宗圣训》卷101。

② “驴踢的，龟爬的，娘娘被他杀得怕怕得。”“牛不走，车不转，娘娘急得一身汗。”

按：传说“他”是指龚得；“娘娘”是指白莲教。

“李文”为论证“捻”和白莲教“组织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还照搬了江地同志《论捻党》一文中的例证和观点。但他并未予以说明。

1. 根据《清史·列传》卷43《孙玉庭传》和《清宣宗实录》卷41的两条材料，认定1822年（道光二年）捻和白莲教“曾经共同组织过一次起义”。原文是：

河南新蔡教匪朱风阁（即朱麻子）与安徽阜阳教匪邢名章，自新蔡起事，突入安徽颍州境。

豫有教匪朱麻子等，由新蔡窜入阜阳滋事，若非颍属匪徒勾结，该犯等何敢轻入其乡。查颍州强悍成风，为匪徒遁逃渊藪，向有捻匪、私枭，虽非习教传徒，声势最易联络。风闻艾亭集在阜阳西南，距城一百六十里，捻匪最多，即朱麻子等犯窜匿之所。

以上这两段材料，清楚地告诉我们，是河南新蔡和安徽阜阳白莲教“共同举行的一次起义”，看不出是“捻”“曾经和白莲教共同组织过一次起义”。江地同志在引用这段材料时，未曾细阅《清宣宗实录》里的“御史程霭采奏折”的原文，“李文”也跟着照抄。原文中的“若非”、“何敢”和“风闻”等，明明都是一些不肯定的揣测之词，最多只能说是白莲教朱风阁、邢名章起事，进入颍州境，拟与捻“勾结”，和朱麻子等“窜匿”于阜阳县艾亭集捻的活动地区，怎么能说成是捻和白莲教“共同举行过一次起义”呢？

2. 根据《豫军纪略》一条材料，说刘狗是“八卦旗捻首”，曾支援过河南商邱金楼的白莲教，从而肯定刘狗是白莲教徒，并且不惜篡改原文，改“八卦旗捻首”为“八卦教首”。为了看清和说明问题，我把《豫军纪略》卷2“教匪”关于金楼白莲教以及与刘狗的关系这段原文全录出来：

金楼寨在归德府商邱县，寨首部永清，其先习白莲教已

三世矣，为离卦大宗。海内承平，守令仅以邪教诛首恶，永清之祖、父皆伏法，而子孙幸邀宽典。永清不悛，乘中原多故，其教中徒众，有为皖捻堂主（按：应为“趟主”）者，志益侈。适堡寨之议兴，金楼寨筑城浚池，倡于众曰：“大劫将至，欲免者入吾寨。”八卦旗捻首刘狗至金楼谒永清，执礼甚恭，薪木无毁伤。愚夫愚妇益信其为乐土，归之者如市。咸丰十一年，钦天监言：八月初一日，日月合璧，五星联珠。永清诳其众，谓祥由己，谋以其僭伪号，约皖捻王明、李永年入其寨。复由吴廷瑞、尤本立、黑巴等为之翼辅，将裘马牧而进围归德，事泄，遂反。……会刘狗以马步贼二万来援。

从《豫军纪略》的这段资料的文意看，只是这样几个问题：1.金楼郜永清的白莲教是家传，“其先习白莲教已三世矣”。2.教徒中有参加捻军、并为首领者，但并非指的刘狗，最多是指的王明、李永年。因此，郜永清“谋以其僭伪号，约皖捻王明、李永年入其寨”，而无刘狗。3.刘狗捻军到金楼“薪木无毁伤”是对捻军在别处的有“毁伤”而言，从而可以反证，刘狗如是白莲教，与金楼白莲教本是一家，不会有“毁伤”的问题，何须特书“薪木无毁伤”呢？不过，刘狗确是支持了金楼的白莲教，使得群众“益信”郜永清所宣传的金楼寨是可免遭劫难的“乐土”。金楼的白莲教到1861年才起义，遭到清军的围攻，刘狗又曾去支援解围。这些只能说是刘狗与白莲教的关系不错，但并不能肯定其就是白莲教徒或白莲教首。

刘狗是在他16岁的时候（1864年，）偕其母兄（刘尿即刘玉

渊)和两个弟弟从原籍山东滕县逃荒到亳州义门集(又名庙集,今属涡阳县)落户的,在当地无亲朋故旧的关系,是捻军首领中唯一的“单门小户”^①。且与张乐行的关系并不好,于是便同金楼的白莲教和豫捻陈大喜,以及与张乐行有嫌隙的白旗孙葵心、蓝旗刘天福等的关系不错,往来活动于豫、鲁间。据《山东军兴纪略》卷二说:“(咸丰八年十月)大喜、二老渊与乐刑(行)失和,分股合孙葵心捻,自出焚掠商、鹿间。”

“李文”说“白莲教的领袖刘玉渊(即刘狗)公开率领其徒众参加捻军组织”,不知是根据什么资料?又说“八卦教首刘玉渊入捻旗上保留八卦图案倒是有史可考”。还不就是篡改《豫军纪略》“八卦旗捻首”为“八卦教首”那一条伪证?可是《豫军纪略》又多处说刘狗是黑旗或蓝旗。余如《剿平捻匪方略》和《山东军兴纪略》也都说刘狗是黑旗或蓝旗。我们在义门集调查时,老人们说刘狗是黑旗或是形象地说是“老鹅(乌鸦)膀子旗”(可能是黑旗白边,因乌鸦的翅膀尖是白色。)。而且,八卦并不是白莲教的唯一标志,不能把八卦与白莲教等同起来。因为,我国民间把八卦视作驱妖避邪的圣物,往往悬之床头、门上,藉保家宅平安。

另外,“李文”还从所谓“地域关系”和“情感的渊源”来论证“捻和白莲教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1. “李文”说:“地域关系给这两大革命组织的成员和这两大组织的领袖们,必然要带来同乡同土的乡谊关系,尽管这些都是历史的,但按淮北人的土话说,五百年前都在一个锅里勺扯子了。”“这样,捻和白莲教从历史渊源看,他们的成员相互之间

① 据涡阳县义门集邓小街高元勋(1958年86岁)所述。高元勋的父亲高心田12岁时曾给刘狗牵马当差。

早就是非亲即故，非朋即友了。”“可是这个无形的情感却给这两个革命组织搭上一道无形的历史桥梁，由这一桥梁就导致捻和白莲教情感的（或者说是政治思想的）和组织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

这都是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怎么能这样研究历史呢？如果有人问一下，捻和白莲教的活动区域里，还有乡勇、团练、联庄会和老牛会，它们同捻和白莲教也有“同乡同土的乡谊关系”，也是“五百年前都在一个锅里扯勾子了”，那就也有“历史渊源关系”了？

2.“李文”又“从情感的渊源关系考查。这里有一个例证：陶澍在1814年（嘉庆十九年）在给皇帝的一个奏折里，曾提到过白莲教遗党王妮子、李东山、马大振等人；再据野史《清代十三朝演义》和笔者到张乐行的故乡调查，都提到这3个人，而且指明这3个人之中的马大振是张乐行的干爹……如果这一说能成立的话，‘捻’领袖张乐行的起义，不能不含有为亲友报仇的因素。”

李文举这一例证，大概是想说明“捻”和白莲教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张乐行是“白莲教遗党”马大振的干儿子，“子报父仇”嘛！可这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我们在张老家调查时，是曾听张乐行的侄孙张羹才、张安民父子说过此事，但我们知道那是张安民得之野史，不足为信。1814年（嘉庆十九年）陶澍《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匪徒折子》里关于马大振的一段原文是：

匪徒前此有党，而今则有目也。查匪徒零星藏匿，彼此声息不通，犹易缉捕。近则公然具有头目，群相护从，听其指挥。其在安徽者，则李东山、马大振二人最为出名剧匪，现在藏匿阜阳县境内，每人手下均有千人。

从陶澍的《奏折》看，马大振不是“白莲教遗党”，且在阜

阳县境内，那时的张乐行才4岁^①，怎么能与马大振的沾连上呢？

最后，说两句并非题外的话，作为结束语。我们不能把历史当作一团泥巴，捏来揉去，随意篡改和恣意美化、拔高农民起义。学术研究要有科学的态度、踏实的作风和严谨的方法，引用别人的观点和转引的资料，要加以说明。

^① 据《张乐行自述》，1863年张被俘时53岁。

论捻军与太平天国之关系

19世纪中叶，全国各族人民反抗清朝统治的武装斗争如火如荼。捻军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同始共终，唇齿相依，二者的关系较之与其他农民起义军的关系更为密切。本文拟从双方之能合作是客观形势的促使，捻军为合作付出了代价，前期捻军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后期捻军与太平军余部的关系等四个方面论述捻军与太平天国的关系。

捻军是“捻子”起义军之谓也。“捻子”这一民间结社性质的组织，先于拜上帝会而产生，最早见之于官方记载，是嘉庆十九年（1814）^①，正是洪秀全出生的时候。咸丰初，当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举行起义时，皖、豫之交也有捻子的零星起事。太平天国北伐军途经皖、豫，推动捻军的普遍起义，但都各自为战，不相统率。1856年初^②，在使捻军形式上由分散走向统

① 陶澍《条陈缉皖豫红胡匪徒折子》：“每一股谓之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

② 参阅拙文《捻军雒河集会盟时间考》。

一的雒河集会盟后，捻军主动四处出击，声势极一时之盛。但当清军调集兵力，从徐州、归德向南分进合击，大军压境，捻军却难力敌，根据地中心的雒河集屡陷于敌。张乐行等捻军主力的南下，占领豫皖边重镇霍邱三河尖，就是拟向太平军地区靠拢，意欲与之合作的迹象。

太平天国经过天京内讧，元气大伤，石达开的出走，又从安徽带走一部分兵力。当时太平军的安徽战场形势是：“庐州失守，清军在三河、舒城、六安、巢县、无为处连营，困逼桐城。”^①李秀成“仅有残军六七千人，守桐保皖”，支撑着局面，处于捉襟见肘、穷于应敌的境地。于是他也就想到要联合捻军，通过“与张、龚有交”的李昭寿居间联系，“特通文报与张来投，张接得文件，当即复文，已肯来投”^②。这正如黄恩彤在《捻匪刍议》中所说：

当长发之初起也，……是时尚未有捻匪为之助也。即捻匪初起，亦自张旗鼓，不屑附于长发也。既而北犯之贼，全军受戮，无一生还。上下游各要地，亦经我军次第克复。贼见势之日蹙也，于是以全力守安庆，而时时分出股匪，以与我争江外之地，兼挠我江北之军，意谓不如此，不足延金陵旦夕命也。是时捻匪屡经受创，势渐披靡，不得不假长发之声势，以图再振。而长发亦因党与渐离，乐收捻匪以为用。于是分者始合，狼狈苍黄。急则相倚，势使然也。^③

1857年3月1日，张、龚等率领捻军再次攻占三河尖，陈玉成、李秀成也率部攻克舒城、六安，继续北上，拟与捻军会合，“那知张行先发龚得树、苏老天半路相迎”^④，在霍邱南两军会

① 《李秀成自述》。

② 同上。

③ 黄恩彤：《知止堂集·续集》卷5。

④ 同①。

师。张乐行等捻军在淮南5年，与太平军共同对敌作战，进行过的战役有：1857年颍上、正阳关、固始战役，1858年的六安、三河战役，1859年的定远战役，1860年的保卫安庆的桐城挂车河之战，1861年的湖北罗田松子关战役，1862年的围攻颍州。这都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天国的战争，同时也提高了捻军自身的战斗力，令敌人刮目相看：“数年之前，贼（指捻军）不知沟垒可恃，专以野战为强。自咸丰七年以后，皆知深沟高垒，以守为战……又自伙党曾与粤逆合股，习为谲诈，其狡狴似粤逆而强悍过之。盖百战之余，未可轻视也。”^①

所以，敌人也最害怕捻军南下与天平军合作，如当时帮办安徽和春军务的徐宗干说：“现在不患南贼（太平军）之北来，而患北贼（捻军）之南应。”^②胡林翼在给左宗棠的信中也不无忧虑地说：“乱民起于粤，势不终于粤。吾所忧者淮、徐、豫耳，自古南人悍终逊于北人。”^③而且敌人也随时防止太平军、捻军的联合，如曾任帮办团练大臣的袁甲三说：“查皖北一军，本以遏粤匪之北窥，防捻之勾结……甲三视事之初，适当粤捻勾结一气，防剿均无把握。”^④

捻军在同太平天国合作的问题上，内部的想法并不一致，意

① 袁甲三：《袁端敏公集·上科尔沁亲王僧》。

② 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答宗棠京兆书》。

③ 胡林翼：《胡文忠公遗集》卷4。

④ 同①。

见是有分歧。主要首领张乐行、龚得^①、苏天福、韩老万^②等，都是主张合作者，而且身体力行。尤其是龚得，态度最为坚决，行动积极，是对合作起了关键作用的人物，而且张乐行对他是言听计从。黑旗的另一主要首领王冠三，也是合作派，惜在捻军第一次攻占三河尖后的撤退途中，战死在亳州小洪河。但是为数不少的捻军次要首领缺乏政治远见，安于“固守土圩”，处于“出则为捻，居则为民”的状态，不愿离开家乡，寄人篱下，远去与太平天国合作。或阴持两端，其代表人物是孙葵心和刘永敬。

孙葵心是红边白旗首领，起义于楚店集，南与江集（今属利辛县）江老家的江台凌，西同公吉寺磨盘松的龚得，相距不远，都是白旗，关系也不错。但他反对联合太平天国，民间传说有“龚瞎子在六安安了民，想投洪秀全，孙老葵不愿投”的说法。后来他在实际行动上，与张乐行、龚得若即若离，而阴怀异志，“其与张、龚二逆不合，亦应属实”^③。胜保屡次派人招降，并已达成默契，拟从淮南返回淮北后，即行叛变。途经合肥小蜀山，偶与团练遭遇，坐轿被打翻而殒命，方未成为事实。

刘永敬绰号饿狼，宿州顺河集（今属涡阳）人，是蓝旗捻军中势力最大的刘姓一族的首领，倚仗人多势众，骄横不羁，屡欲率众返回淮北家乡。在六安被张、龚所杀。

余如白旗的江台凌、王怀义，黑旗的刘玉渊、刘学渊兄弟，黄旗的张敏行、张振江，红旗的侯士伟等首领，有的曾随张乐行进军淮南，后又返回淮北，有的一直留在家乡“固守土圩”。

捻军五旗中的蓝旗人多势强，地跨宿、蒙两州县，总旗首韩

① 龚得，即龚德树。据调查得知，龚得是小名，谱名是“道”字辈，大名应为龚道树或龚道德。

② 韩老万，即韩奇峰，但按其谱名是“峰”字辈，应为万峰。佚名《江、河南发匪纪略》作万军，音近字异。

③ 袁甲三：《袁瑞敏公全集·致胜克斋钦使》。

老万是主张合作的，其弟秀峰是捻军常驻太平军的代表。但以刘永敬为首的刘姓一族，则反对合作，他们之随张、龚等到淮南，是勉强行事，并非本愿，遇到困难，遭受挫折，问题就暴露出来。如正阳关被困突围后，他们由于屡战不利，人员伤亡严重，就要“解散归农”，回归雒河家乡。最后还是由张乐行侧室杜金蝉的劝说，“众感动，议遂寝”^①，而且蓝、白旗之间又有嫌隙，在到六安之前，曾经发生“同室操戈”的自相残杀：“22日傍晚至二更后，闻得贼营枪炮之声不绝，窃谓官军逼近，该逆自相惊扰。今据称是白旗党匪因抢蓝旗食物，并前在方集屡败不救之嫌，自相残杀。复经张乐刑（行）为之排解而止。”^②所以在他们到了六安后一个多月后，就又故态复萌，恣意妄为，不仅影响动摇军心，且将太平军逼得“弃城而去”。张、龚便采取极端措施，杀死刘永敬、刘天台叔侄，其众由刘天福、刘天祥领回淮北。

当时有关六安事件的官方奏报，有胜保和袁甲三的奏折：

捻匪困守六安，势已穷蹙，贼众猜忌，人心已离，其蓝旗捻刘永敬即刘饿狼，欲带所管贼众回窜雒河，为张、龚二逆所杀。

汪赓才《河南军情探报》：

昨（1859年1月26日）探六安贼匪由开顺河西窜商城边境，此股系蓝旗刘饿狼之捻，因刘饿狼被龚逆所杀，蓝旗捻众均与张、龚两逆不和，遂欲窜回雒河集老巢。

另据《涡阳县志》、近人王大球《张乐行传略》及民间传说歌谣，都说刘永敬是被定计害死，即是所谓“诱杀”，没有大动干戈，也未牵连很多人。

① 民国《涡阳县志》。

② 《黄彭年日记中有关捻军资料》，《山西师院学报》1959年第3期。

但是，六安事件导致了捻军内部的分裂，使其原本松散的组织离析，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捻党之分崩离析，实始于此”^①。不仅是蓝旗捻众的“悄悄离去”，而且后来蓝旗捻军首领之纷纷叛变投敌，张乐行之被蓝旗捻首李家英、杨瑞英出卖受擒，后期捻军蓝旗任柱与黄旗张宗禹、张琢之不和而分军，都同这一事件有点关系。所以说张乐行等捻军同太平天国的合作，是付出沉重代价的。

三

欲论前期捻军张乐行等与太平天国的关系，必须先要了解一下捻军的特点。捻子是一种民间结社性质的组织集团，主要是以宗法氏族为基础，自愿结合，进出自由，没有纪律约束，是个松散的组织。且有很强的地域性，各自独立，不相统率。其大大小小的首领（称趟主），是靠其在家族中的地位，在亲朋中的声望。《湖北通志》形象的描述“捻子”组织：“亡赖招呼成群，若手之搏物，仓卒捏成撒手立散。”虽是带有贬意，倒是符合情况。即使是在起义以后，也未能完全改变这种状态。雒河集会盟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也还是个松散的联盟。张乐行虽为盟主，除了其自领之黄旗，他指挥调动不了别的旗捻军。太平天国焉能指挥调遣？所以张乐行等捻军同太平天国的合作，当然会是“听封而不听调用”。

捻军首领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见诸文字记载的，张乐行先后有征北主将、鼎天福、成天义和沃王，龚得是征北正总提和盖天义，苏天福是应天侯，张宗禹是石天燕，韩碧峰是石天燕，韩秀峰是鼎天燕，张隆是钟天福。民间传说洪秀全赠给张乐行一副

^① 《涡阳县志·兵事》

对联：“桢命养飞龙，试自思南国之屏藩，谁称杰士；中原争逐鹿，果能掌北门之锁钥，方算英雄。”^①仔细推敲一下，就知是当地文人对盟主张乐行的恭维，不象是洪秀全的口气，自称“南国”，如此看重张乐行。

太平天国授予捻军首领的封号，都不知道确切时间，我们现在都是把封号在资料中出现的时间，当作受封的时间，如张乐行的“征北主将”见之于《李秀成致张洛行书》（1860年），“沃王”是见之于《陈玉成致张洛行书》（1862）。显然不够准确。若是从客观的历史过程和事件分析、推断，捻军首领接受太平天国封号的时间，前后可能有三次：

第一次是1857年开始合作，从霍邱会师到占领六安期间；

第二次是在1859年，因这一年李秀成、陈玉成均以三河大捷之功先后封王，而捻军也为三河战役出过力，理应受封；

第三次是在1861年，当时太平军保卫安庆的兵力紧张，捻军积极支援，这年二三月，孙葵心、龚得相继战死，太平天国方面对活着的或战死了的捻军首领，总要有所表示，民歌中说龚得“死后官上又封官”。

不能说张乐行等接受封号就是加入了太平天国，捻军就变成太平军。因为捻军是既不受太平天国的调遣，又未按太平军制改编，还是打着自己的旗帜，保持其独立性，同太平军是友军关系。但是，治太平天国史者却多将捻军归属于太平天国。或说是太平天国改编蒙、亳地方部队，而以王先谦《东华录》中的一条记载张乐行打着鼎天福的旗帜为证，说是捻军打的是太平天国旗号。地方部队是对中央军而言的。那么不禁要问，太平天国已经取代清王朝建立中央政权了吗？太平军是中央军吗？而且还使人

① 王大球：《张乐行传略》。1958年捻军调查时也曾听到当地故老传说。

怀疑的是，张乐行1861年已被封为沃王，为何不打王号的旗帜而打着鼎天福的旗号呢？如果说接受封号就是加入了太平天国，那就要反问一下，苗沛霖也曾接受太平天国的奏王（一说扫北王）封号，怎又不把苗练归入太平军呢？这种说法或论点，说穿了就是过去史家“奉正朔”的正统观念在作祟。

另一个问题，捻军同太平天国合作有利还是有害？过去也曾有过争论。这也还是站在太平天国立场上立论。有害论者的根据，就是《李秀成自述》所说“招得张乐行之害……此等之人听封不听调用也。”不听调用怎么就成为害？或说捻军的纪律不好，影响败坏了太平军的名声。那《李秀成自述》也说到太平军刘官芳、古隆贤、赖文鸿、杨辅清部的纪律败坏，“百姓死者此等之人”。实际上无论是太平军还是捻军，纪律的好坏，都是因人而异，没有绝对的好，也不是绝对的坏。资料中也不乏有捻军纪律好的记载，如捻军攻破夏邑城后，彭煊记其家属：“逃至西城隅冯姓败屋中，四面贼矛棚屋内，伤姜女使耳。忽一贼谕止之，众不听。其贼怒，反戈斥以勿杀，因大声曰：……汝等勿恐，吾旗在后，来者不敢犯也。”^①“贼首亦或禁止淫掠。”^②“逢人即不杀，褫其衣而叱逃之。”^③“捻自咸丰辛酉以还，岁必数至，飘忽无常，未为巨患，渐生玩寇心。”^④

同时还要知道，《李秀成自述》是在9天内以每天7000字的所速度，奋笔疾书而成，哪有时间认真思考问题，只能是意之至，随笔书之。且是其一己之见，不免会有失实或误见。所以，不能仅以《李秀成自述》为根据，得出捻军有害太平天国的结

① 《夏邑县志·纪亭纪变序》

② 徐宗干：《浙东信文编·丙辰日记》。

③ 《阜宁新县志·壬戌纪难》。

④ 《临淄县志·捻匪偶记》。

论。正如不能仅据《干王洪仁玕自传》，就把太平军进取湖北、解救安庆计划失败的责任，推在李秀成身上。或是根据《遵王赖文光自传》，就认为陈玉成等“畏曾国藩如神明，视楚军为翻虎”；并得出“败国亡家，生死皆出”于李秀成的“妄攻上海”。

事实是张乐行等捻军在淮南5年，配合支援太平军进行过很多战役，这种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捻军的这一历史功绩，事实俱在，如当时身居上海的王韬在日记中引江宁管小异语云：

“狂寇之兴，首尾九年，窃踞金陵，已越六载。今官军攻围得手，渐附城垣，毒焰稍熅，势将瓦解。奈捻匪张乐行结连滋扰，上游复通，贼粮得以援济，而恢复又无时矣。”^①在述及李秀成部太平军攻克苏州时又说：“闻其中捻匪居十之八，长毛之势焰稍衰。”^②这些当时人的议论或看法，不免有夸大其词之处，但多少总是可以反映点实际情况的。

然而，两军的合作不尽如人意，相互间不免有芥蒂或嫌隙。1859年（咸丰九年）凤阳被清军围困，情势危急，捻军派韩秀峰到芜湖，向李秀成请援兵。李秀成“因京围在急，而力难兼顾”，未能派兵。到第二年天京解围，始派吴定彩、吴如孝往援，“重修旧好”。可是凤阳已经失守。后来张乐行在《自述》中说：“我因他们待人不好，就折回老家居住。”而李秀成在《自述》中却说：“招得张乐行之害。”这种互相埋怨的情绪，总是事出有因，但不完全符合事实。

四

1863年（同治二年），捻军丧失淮北家乡的根据地，张乐行等

① 《王韬日记》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五日，中华书局1987年版。

② 《王韬日记》咸丰十年四月十六日，中华书局版1987年版。

牺牲。先期入豫的捻军黄、蓝旗部众，由张宗禹、任化邦率领，活动于豫、鄂间。1864年，陈德才等统率西北太平军东下，由陕经豫入鄂，谋救天京，在鄂东受阻。两军便配合作战，忽分忽合。11月5日的霍山黑石渡一战，西北太平军损失殆尽，仅剩赖文光一支数千人，因与任化邦等捻军在湖北活动，得以保存下来。时捻军尚有数万之众，国破家亡的共同命运，将这两支抗清队伍维系一起，合军抗敌图存。大家“誓同生死，万苦不辞”，共请赖文光“领带”。这固然是由于其资历学识和作战经验，为众所诚服。但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捻军黄、蓝旗有嫌隙，需要第三者的缓冲斡旋。所以赖文光说他是“不得已勉强从事”。

捻军黄、蓝旗的矛盾，是“六安事件”的阴云不散。捻军原就有地域的门户之见。五旗中只有蓝旗不在亳州，跨地宿蒙二州县相连。刘永敬在六安被张、龚诱杀，黄、蓝旗结怨，刘天福带领蓝旗捻众回淮北。据《涡阳县志·诸刘孙丁罗传》说，任化邦还是刘天福义子，关系非同一般。另《涡阳县志·兵事》还说“五孩与任怀邦不协，遂分道入豫。”五孩为张敏行第五子，名琢，即张禹爵。在刘永敬的家乡宿州顺河集（今属涡阳），也有任柱与五孩不和而分军的传说。

这支以捻军为主体的联军，太平军只占十之一。所以，清方的官私论述，多是说太平军余部加入或变为捻军。

尹耕云《豫军记略》：

残贼仅数千，伪遵王赖文光挈之入皖捻任柱、陈（程）二老渊（坎）股，与张总愚（宗禹）合窜。

周世澄《淮军平捻记》：

六月，曾国荃克金陵，余贼势亦衰耗，汶光遂变而为捻。

贼之东窜（捻）也，其股以任柱为主，而赖汶洸、牛洛洪亦在其中。

钱恩荣《军情》：

查邱远才系粤逆余党，与文光同入捻伙。

柯悟迟《漏网喁鱼集》：

长毛逃窜，投入其（捻军）伙者不少。

同时，联军的编制，亦如捻军既往，打五色旗，称首领为旗主或趟主。如《淮军平捻记》述与东捻作战：

任逆在头队迎拒，赖逆带花旗步队在中；

逆酋牛遂子、何成等忽率白旗步贼犯我左路……伪遵王赖文光、伪正宗任三戾等亦率蓝旗分数支犯我右路。

又如赵烈文《能静居日记》述及联军中的称谓：

其偏裨号旗主，所辖视其所胁之多寡，无定额；再上逆为堂（趟）主，所辖视旗主之多寡，亦无定额；再上则则首，皆僭王号。

余一鳌《见闻录》：

贼称捻匪为北队兄弟，捻匪称贼头为唐（趟）主。余称南队兄弟。百姓称捻匪为红毛，称贼为长毛。

从而可知，后期捻军并未采用太平天国兵制，怎么又能说是“成为一支崭新的太平天国后期新军”呢？“国”已不存，“军”将焉附？名者，实之宾也。名字称谓只不过是一种符号、形式，倒不是很重要，但却不能之以己好恶，感情行事，主观地去改变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

捻军起义与淮北圩寨

圩寨之在淮北平原上雨后春笋般的兴起，是在捻军起义以后。捻子并非是从圩寨发展起来的^①，更不是土豪地主利用其寨主圩长的地位，组织私人武装，趁清朝统治的松弛发动的叛乱^②。本文仅就捻军起义的根据地、安徽淮北的圩寨兴起、捻军与团练竞相修筑圩寨的时间、规模和类型等几方面论述这一问题。

寨堡在历史上多是中原民间避战乱的处所，或为农民反抗官府据点。它被封建统治者用来对付农民起义，始自清代嘉庆年间爆发的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嘉庆二年（1797）十月，副都统衙署广州将军明亮提出掘濠筑堡以坚壁清野的建议，而被“传旨申飭”。至四年（1781）六月，仁宗皇帝的态度转而支

①（日）清水穗《论捻军叛乱》指出捻子是从圩寨发展起来的。转引自（日）井木毅寿著、马汝珩译：《捻军起义与圩寨》，载《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② 傅衣凌：《关天捻乱的新解释》，载协和大学《福建文化》二卷二期，1944年6月；《明清时代阶级关系的新探索》，载《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二者对捻军起义都持这种观点。

持，认为“此亦保护地方之良策……飭令所属地方，晓谕居民，相度地形，仿照办理，令乡勇等保护，坚壁清野”^①。从而使团练与圩寨联袂，用来对付农民起义。

当太平天国、捻军起义的风暴席卷大江南北和淮北平原时，清朝统治者又使用起团练与圩寨的伎俩。咸丰三年（1853）初，清廷将两道“上谕”和明亮、德楞泰的《筑堡御寇疏》、龚景瀚的《坚壁清野议》以及章程条款，颁发各省，遵照执行，并任命周天爵、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

周天爵，字敬修。山东东阿人。嘉庆进士。道光初为怀远知县、宿州知州。“起家县令，洊至湖广总督。”^②因其性残酷，滥刑嗜杀，宦海几度沉浮。道光末署广西巡抚，值太平军起，专办军务。1852年，调安徽筹防务，赴淮北招抚捻众。翌年，太平军攻克安庆，皖抚蒋文庆毙命。清廷以安徽巡抚授周天爵，以年老力辞不就，遂专办安徽团练，驻宿州（后病死于阜阳王市集）。

吕贤基，字羲音，号鹤田。安徽旌德人。道光进士，由编修迁御史、给事中、鸿胪寺卿。咸丰初，擢工部右侍郎兼刑部左侍郎。1853年3月，奉命回籍督办团练，与帮办团练大臣周天爵会同皖抚福济办理军务。吕贤基复奏调兵科给事中袁甲三、翰林院编修李鸿章^③等帮同办理团练事务。

①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46，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② 方浚师：《蕉轩随录》，刻本。

③ 据淮军将领刘秉璋之子刘体仁（智）的《异辞录》：“李文忠（鸿章谥号）为编修时，以文字自喜，恒为文节（贤基谥号）草疏言事。”当太平攻克安庆，“文忠感念桑梓之祸，过文节丛愚上章，文节即令其代制而允具名焉。”清廷遂即命吕贤基回籍办团练。吕气急败坏地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

这两位专办安徽团练的钦差，是“未辖一兵，未携一钱”的光杆司令，所能做的首先是遵奉“谕旨”，“通飭”全省各地举办团练，修筑圩寨，所谓行坚壁清野之法。所颁发的团练章程，也是“奉旨”遵照宿迁县仿嘉庆川楚豫三省团练章程的条款册式，又续定条款13则及推广条款3则（附后）。

团练有官团、民团之分。嘉庆间称官团为乡勇，由招募而成，供给粮饷，随清军作战；民团称团勇，是由地方组织青壮年自出资斧，守御堡寨。界限泾渭分明。嘉庆六年（1801）六月，署四川总督勒保奏称：

惟是团勇一项，与乡勇有别。如随营打仗，防守卡隘，官给盐菜口粮，听候调拨者，谓之乡勇。百姓等自己出资，修筑堡寨，择其中年青精壮各备器械，里民自行捐给口粮，以为守御者，谓之团勇。①

可是咸丰间的团练，不但官团与民团职司的界限不清，而且称谓也因地而异，很不一致，虽然“团练章程”统称其众为乡勇，首领称练长、练总。

官团称乡勇、乡练，是由地方招募，即所谓“养勇”，供给粮饷，调遣打仗；或是由民团变为官团，即先是由地方绅董土豪组织，后经官府发给官团旗，受调遣离境打仗，补贴粮饷。如合肥团练，东乡始为官团；西乡初是民团，结寨自保，不光是对太平军，也防范清军的骚扰，1858年始随清军作战，听官方调遣，同治初成为创建淮军的基础。

民团称其众为团勇、练勇、寨勇、练丁，是当地绅董地主捐输或按田亩摊派钱粮，组织族众、佃户，“筑寨自固”。受州县地方官领导，在境内联防防御，互壮声势。间亦出境作战，如太和团练，“自县南和阳驿连屯百三十里，练勇三万人，悉听指

① 《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69，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挥，五战亳、阜”^①。“咸丰十一年，巡抚贾臻驻颍州，颁官团十二旗于太和，以为颍军后路。”^②然而，时人在论及民团时也有强调防守，反对征调出战者。如河南太康李浚在1859年前后写的《团练》一文中说：

故今之乡团，可团自为防，而不可调防；可团自练丁，而不可抽丁；可团自为战，而不可律以随兵出战。前之假调团以养勇，是示以可畏之迹，而使不敢团也。今之按寨团以抽丁，是示以可疑之迹，而使不敢团也。^③

团练在蒙、亳捻军地区习称“老牛会”，肇始于河南率先建立的永城团练头子牛庚。老牛会的人都用白布包头，以示戴孝，与捻军有杀亲之仇。所以，捻军地区群众又谑称为“孝帽子会”。河南的团练是为防御捻军，但对举办团练的形式（民团或官团），在实行的过程中似曾出现龃龉，这从李浚的《上毛都堂书》可窥见端倪：

夫乡团非他，皆南亩之农夫也。赴调则麦委禽享，终岁之养无资；不赴则刑驱势迫，首事之受辱难堪。于是，雇无赖以塞责，每名有四百钱一日者，有五六百钱一日者，未至戍所，已半逃亡。当事愤乡团之不可用也，遂变而为养勇之说，严檄各州县养勇千二百名、千五百名不等，每名日给三百、二百钱又不等。^④

但是，李浚对州县募勇办官团，很不以为然。于是，他再向河南团练大臣毛昶熙上书为尧：

今于数十日之间，立致二万余勇，声势似极赫耀矣！然试思及于敲骨吸髓之后，室罄囊空，措饷无计，

① 民国《太和县志·人物》卷8。

② 民国《太和县志·兵事》卷6。

③ 李浚：《李又哲先生文钞》抄本，存安徽省博物馆。

④ 李浚：《李又哲先生文钞》抄本，存安徽省博物馆。

此二万余之勇，能相安于戍所叹待毙乎？我又抚之不能，遣之不能，其势固必溃矣。溃而失事祸犹浅也；溃而为贼，祸尚可言耶？故为今之计，莫若速罢养勇，以弭未形之变；实行团练，以收逸获之效也。①

团练中还有所谓“官捻子”的说法，“今之练勇，即为平日之捻匪，而昔之捻匪，不尽为今之练也。近有名官捻子，仗势欺凌，勒索民间财物”②；或“藉团练之名，擅作威福，甚至草菅人命，抢夺民财，焚掠村庄，无异土匪”③。

安徽淮北的团练，敢于主动出击，屡与捻军为敌者，有宿州、蒙城、太和、凤台等州县。

宿州团练以西乡曹市集（今属涡阳）的“牛家军”为著，“其族散处于秦旺、板桥、唐山三处。豫抚李鹤年叙牛氏，世称其师皆父子，旅尽兄弟，捐家抒国，厥功甚伟。而首倡义旗，勘定梓里者，实自捷三封翁始。捷三名斐然，宿州岁贡生……清咸丰，粤匪窜皖北，张乐行等乘隙而起。斐然练乡团，命子师韩从戎”④。牛氏一族参加捻军者甚少。团练“牛家军”却与捻军是死敌，后来一大批蓝旗捻军首领叛变降清，多是牛斐然“设法招抚的。张乐行也是被牛师韩带领团练到蒙城西阳集（今属涡阳）擒获的。

蒙城团练的练总是李南华，时与捻军战。但在凤台苗沛霖团练兴起后，蒙城在其势力范围内，李南华一度隶属于苗练。后苗沛霖叛清，围攻蒙城，“南华以数百饥疲之众，力拒十数万方张之乱，共历二十余日之久”⑤。

① 李浚：再上毛都堂书，《李又哲先生文钞》抄本，存《安徽省博物馆》。

② 《查琛致瑞兰坡书》，《捻军》第5册第159页。

③ 《清史列传·福济传》卷55。

④ 同治《涡阳县志·牛斐然父子传》。

⑤ 《蒙城县志·李南华传》。

太和东、北与蒙、亳接壤，筑寨办团练较他早。咸丰三年五月十九日（1853年6月25日），亳捻龚得入太和境活动，史、刘八姓族众与之战，是为团练之始。九月，几处团练合攻捻军于安丰集，“龚得匿酒池下得免”^①，是为团练出击之始。“十一月，阜阳、亳州、沈邱、鹿邑、项城等，皆与太和联团以严防御。”^②至八年（1858）二月，太和已筑成圩寨百余所，掘沟辟线路。此后，捻军自豫归经太和，屡被团练“打二梢”，沟路纵横，截获輜重。捻军中有“不怕官兵与苗怪，只怕九里十八寨”之说。

凤台团练的头子苗沛霖，原是个失意诸生、贫穷塾师。咸丰初地方刚办团练，他就去投奔寿州知州金光箸，“欲投营充练总。光箸忽之，不许。沛霖快快返”^③。咸丰六年（1856），捻军到凤台武家集，“沛家被劫，因筑寨为堵御计，屡与贼战皆胜。乃置五旗练长练丁”^④，“连圩数十，拥众数千，沛霖之名震两淮”^⑤。翌年，胜保以副都统衔帮办河南军务，进攻淮北捻军，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胜保以苗练攻捻之功，“力为保举”，授四川川北道，督办淮北团练。后胜保调京，苗以己功大小官而不满，遂“决计反”。十年（1860），围困皖抚翁同书于寿州，并联络捻军，通款太平天国，受封号，“乃令军中蓄发”。遂与捻军、太平军合攻颍州，围困皖抚贾臻于城中3月。同治元年（1862），胜保复督师淮北，苗沛霖“复下令薙发反正”。他反复无常，朝秦暮楚，最后死于乱军中碎尸万段。

① 民国《太和县志·兵事》卷6。

② 同上。

③ 方浅师：《退一步斋文集》，刻本。

④ 张瑞璋：《两淮戡乱记》，刻本。

⑤ 光绪《凤台县志·兵事》。

清朝统治者在“通饬”各省举办团练的同时，还“谕民结寨”，行坚壁清野之法，以攻防两手对付农民起义。这样，各级地方官员都有“劝谕”、督促民间修筑圩寨之责，在吴棠①的诗文集中就收录有这类文字。

首先是亳州的绅董地主“筑寨自固”。咸丰初由亳州候选训导李承谟、文生韩璇、武举尹长发等倡导团练，动员60余绅民，在亳东“筑三十一寨；周匝百里，势甚壮”②。惜不知其寨名。同治间建置后即修的《涡阳县志》，所列的201所圩寨表，大都已不称圩寨，而名为圩寨者仅32所。

太和县东、北与亳州接壤，咸丰二年（1852），就开始在西40里修筑一所圩寨，名叫李寨（一名乐天寨）。三年，筑寨12座，绝大部分是在县东、北部。其中三塔集寨面积900丈，也是后来全县200余所圩寨中最大者；增生刘存诚一人独修4寨，都在县西北边，靠近亳州、河南境。但全面展开修筑圩寨，是在五年（1855），即捻军频频出境活动之时，至八年二月成筑百余所。这4年间是太和修筑圩寨的鼎盛时期。以之观淮北其他州县圩寨之开始修筑，情形大致相似。仅据方志记载，举以为例：

1856年——

颍上县监生李彭年，“咸丰六年捻匪窜扰，筑土圩为守御

① 吴棠，今安徽嘉山县三界（原属盱眙）人。举人出身，大挑知县。咸丰间在籍办团练，以军功官至总督。其《望三益斋诗文集》收录的《劝谕徐属各圩坚壁清野示》、《劝谕徐属各圩挑沟陷贼马示》及《上各大府请通行坚壁清野》，都是他任徐淮道时（1860年）写的。

② 光绪《亳州志》。

计”^①。

凤台县，文生苗沛霖，藉捻军攻武家集，“因筑寨为堵御计”^②。

蒙城县，先是苗沛霖始议于刘家集筑圩助守，未果。遂分五色旗立圩于宋家庄、王家瓦房、南界沟、顺河集、骆驼铺、柳林营、三义集等处。第二年（1857）春，邹兆元筑营于双涧集，败来攻之捻，遂于双涧立圩。夏，练总李南华自洛河还，邑候密谕筑圩防守^③。

185 年

五河县，“知县狄融莅任，谕四乡认真团练，晓以大义，人皆感愤，四乡各练总相继筑围（圩）御贼”^④。

泗州，两河口练总文生张树人赴州，“稟请筑圩五河之桥店，齐集西南各堡练勇，沿沱河险守之”^⑤。此后泗洲始出现圩寨。

再观邻近蒙、亳捻区的江苏、河南的州县，在咸丰七年前，只有零星的或全无圩寨。八年（1858）以后，圩寨便迅猛地兴起。即以今属安徽的萧县（原属江苏）为例，咸丰六年前仅是就地改筑原有的山寨，只可临时应急以避捻军锋镝，不能守卫村庄以坚壁清野。遂又筑寨平原。至十年（1860）成寨98所^⑥。

修圩筑寨，挖沟浚濠，垒土（或砖）围墙，要耗资财占土地。地方官吏的“劝谕”督促，下面绅董奉行故事，难免畏葸不前，这就要靠当地绅董富豪的解囊捐输，或有声望的耆旧宿儒的策划奔走，始得以蔽其事。所以，在同治以后修的皖北洲县志

① 《颍上县志·人物》卷9

② 光绪《凤台县志·兵事》卷7。

③ 民国《蒙城县志·兵事》。

④ 光绪《五河县志·兵事》卷7。

⑤ 光绪《泗虹合志·兵事》。

⑥ 光绪《续萧县志·团练》卷9。

中，出资捐地筑寨者，充斥于人物志的“义行”门类。尤以太和为多，举两个代表性人物为例——

徐广缙，咸丰二年署湖广总督，以武昌失守（太平军）概职。归豫随胜保办理军务，引疾归太和。时捻、苗煽乱，首倡筑寨，集团练互卫。

刘存诚，增生。咸丰壬子（1852）捻起，首创团练，谓非壁垒清野不可，首筑许、范二寨以为倡。既众工，富者有吝色，立发仓廩以助。“戊午（1858）二月，寨成百余所，建议掘沟辟线路，异日歼匪尽赖乎此，且可贻后世水利。嗣会团杨家寨，竟以沟路报捷。众益信，踊跃为之……豫省修治寨沟，皆由存诚劝而始为也。”①

余如亳、宿、颍、凤、泗、五州县，各举其一，以窥全豹。

亳州许凤聚，咸丰初倡团练，尽售其田修圩寨，一方安堵②。

宿州丁长庚，相乡（今淮北市）人。咸丰兵燹，士民转徙于萧、徐之间。长庚遣其第三子武生训庄冒险归，捐地10余亩，浚濠立栅，筑为一圩③。

颍上吴起亮，龚家集人。素有勇力，集西筑土圩自卫，远近避难者多往依之④。

凤台苏洪韬，武进士，授甘肃会宁守备，官至湖北护理靖远协副将，以疾归。遇捻乱，筑圩保乡里⑤。

泗州许立位，青阳镇（今江苏泗洪县治）东鄙人。咸丰辛酉（1861），西匪（按指捻）东窜。青阳镇议筑圩，屡不就……以

① 民国《太和县志·人物》卷9。

② 光绪《亳州志·人物》卷13。

③ 光绪《宿州志·人物》卷20。

④ 光绪《颍上县志·人物》卷9。

⑤ 光绪《凤台县志·人物》卷12。

與迎之至，则集夫役筑濠堦，阅月而圩竣。督练守御，乡里赖以保全①。

五河赵之屏，国学生，西乡练董。值捻氛四起，筑圩缮守，弗吝貲财②。

民圩官寨的兴起情况，已如上述。同时，捻军圩寨也蓬勃发展起来。州县地方志对此少有记述，但从清朝地方大吏和统兵大员的奏折，可窥见其崖略。捻军之修筑圩寨，始见于豫抚英桂于咸丰五年十月十八日（1855年11月27日）的奏折：

又据余炳涛禀称，捻首张落刑（乐行）等亳州解围后，退踞雒河集一带，筑造土城，为负隅计③。

咸丰六年五月十八日（1856年6月20日）又奏：

逆匪叠被痛剿，知大兵必乘锐进攻，先于白龙王庙集内设濠立栅，并力负隅④。

这里所说的“筑造土城”、“设濠立栅”，就是圩寨。不过是刚开始，还比较简陋，是为临时修筑的防御工事。随着1856年雒河集连续失守，便在冲要之地的大村庄，挖濠筑垒，筑造坚固的圩寨。至1858年已是到处筑寨，捻圩林立。

容照于咸丰七年二月初七日（1857年3月2日）奏称：

（捻）各于蒙、亳、怀、宿交界，择村堡较大地方，挖濠筑垒，以为巢穴⑤。

伊兴额、史荣椿于咸丰八年五月初九日（1858年6月19日）奏称：

现在自宿州浍河以南至临淮以北，遍地皆贼，到处筑

① 光绪《泗虹台志》。

② 光绪《五河县志·人物》卷12。

③ 《剿平捻匪方略》卷9。

④ 《剿平捻匪方略》卷17。

⑤ 《剿平捻匪方略》卷24。

圩①。

此时捻军以圩寨为据点，出攻退守，进退裕如。清军的进攻，徒然劳师糜饷，经旬累月，不能攻破一寨。袁甲三在给僧格林沁的信中道及捻军：“自咸丰七年以后，皆知深沟高垒，以守为战，而攻剿愈觉费手。”②他在咸丰十年十一月十六日（1860年12月27日）上奏的《通筹兜剿匪折》中又写道：

从前之贼，专以野战为能。近则筑圩屯踞，贼垒林立。

官军以全力围攻，累月经旬，未能破其一寨。且此破彼筑，亦属徒烦兵力。③

僧格林沁在咸丰十年十一月十三日（1860年12月24日）就曾上奏，陈述进攻蒙、亳捻军根据地的困难，与袁甲三的论调相同。他在奏折中写道：

捻匪巢穴，官兵难以进攻，该逆并将巢穴四面一二百外村庄焚烧无存，井亦填塞。官兵裹粮带水，何能与之持久？

一经撤退，该逆紧蹑其后，往往因此失利。此各路官兵仅能堵御、不能进攻之情形也。④

这段文字说明清军难以向蒙、亳地区进攻，应是捻军圩寨起了保卫根据地的作用。但说捻军“将巢穴四面一二百里外村庄焚烧无存”，既非事实，亦悖情理。蒙、亳地区东西长200余里，南北宽百里。捻军地区主要是今之涡阳县境，广袤不过百里，其间亦非全是捻军圩寨，还有民圩民寨（或称官寨）。同时并存，座落交错，相距十几里。即如柳堂在《蒙难追笔》中所述淝河东的情况：

自过淝河至贾家园子，蒿莱遍野，狐兔成群，不见人

① 《剿平捻匪方略》卷44。

② 袁甲三：《上科尔沁亲王僧》，《袁端敏公集·函牍》卷1。

③ 《袁端敏公集·奏议》卷13。

④ 《剿平捻匪方略》卷88。

迹。行数十里，见一土阜，即村落也。①

这里说的数十里，实即20余里。西淝河是亳州与太和县的分界河，东距今涡阳县城（雉河集）60余里。贾家围（圩）子在涡阳县西南40里。淝河又是捻军与太和团练的分界线。捻军时经太和入豫境，团练常到河东烧杀，造成近河东地区荒无人烟的凄凉景象。

三

寨的原义为栅栏。依山名寨，以山之峻削险阻为固；倚水曰圩，以水之淳蓄潴洄为固。圩，原是南方低洼地周围防水的堤，或作围，意为防守。在村庄周围挖濠掘沟，垒土（砖）围墙，称为圩或寨，因地制宜。在濒近洪泽湖的低洼水网地区的泗州、五河都称圩，其他州县圩、寨互称，亦可能是有无围墙之别。

咸丰以前，淮北颍泗地区的古寨很少，凤台县有连珠寨，为五代时营垒遗迹，一在城东北紫金山西麓，周围里许，高4尺，广七八尺；一在紫金山东南2里，周围里许，高4尺，广丈余②。太和县西45里的“张家寨，为明末所修筑。弘光帝由汴南下经太和，曾驻蹕其寨，赐张元梯牙笏，书‘求宁圃’匾额”③。另在太和县西北45里，还有个道光二年修筑的万安寨。

咸丰间圩寨的修筑，有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从简单的浚濠立栅到挖沟浚濠，垒土筑墙，发展到两道濠沟（当地俗称双海濠）、土砖两道围墙的圩寨。传说捻军黑旗首领刘玉渊、刘学渊，黄旗首领张慎德、张慎聪，在起义以后，都扒庙拆砖去修筑。

① 柳堂：《笔谏堂全集》第7种，《捻军》（一），第351页。

② 光绪《凤台县志·古迹》

③ 民国《太和县志·杂志》卷2。

圩寨。圩寨的面积，一般200丈至500丈不等，容纳千人至四五千人；大者千丈左右，能容纳万人以上，阜阳的吴家寨甚至能容纳两万人；小者百丈左右，只能容纳数百人。

圩寨的规模形式，只能从一麟半爪的零星记载及捻军调查获得的口碑资料中，窥见一斑。

河南扶沟人柳堂，少年时（1858年）曾在姚德光部捻军中生活过80余日，在他后来写的《蒙难追笔》中，记述了在捻军中的生活见闻，其中描述了捻军圩寨贾家围（圩）子：

一小村落，围以土墙，南开一门，吊桥以木板为之，仅通行入；贾姓居大半，故呼曰贾家围子①。

这是个不大的捻军圩寨，既有吊桥，村庄必有濠沟环绕。这里所谓“一小村落”，其实并不很小。淮北平原的村庄普遍较大，多聚族而居，百户以上的村庄原本不稀罕。况且贾家圩子是“合数十村为一村”。1958年捻军调查，我就到过一些还保留着圩寨痕迹的村庄，多已不叫圩或寨的名称，周围面积多在两里，寨墙不复存在，濠沟犹在，只是面貌改，淤塞水浅，吊桥变成桥或路，还多用篱笆以阻挡鸡猪出庄。

江集②江老家西北10里的纪伦寨，是我们那次捻军调查见到的最大最好的圩寨。它修筑于咸丰年间，以修寨人的名字为寨名。传说：“纪伦原先在清营混个亮白顶子，家有两顷多地。无寨时东面打西边躲，西边打就东跑。纪伦说：咱打（筑）寨吧！就自己画了个图，装了六门炮。等寨打好后，纪伦说：寨也打好了，别给苗沛霖送粮了。苗沛霖来打纪伦寨，给三炮轰跑了。”③

淮北圩寨以一道濠沟的土围墙为多，俗称土圩子。也有初修

① 柳堂：《笔述全集》第7种，《捻军》（一），第349—355页。

② 江集原属蒙城，1865年划归涡阳县，1964年又属新设置的利辛县。

③ 参阅《捻军调查记》。

土圩，后改为砖寨的，如太和县西北35里的税子铺寨，面积（长宽）353丈，咸丰七年（1857）修为土墙，十一年改为砖墙。砖寨多为集镇聚资或巨绅富豪所修筑的官寨，甚至还有双濠沟和土砖两道围墙的大圩寨，内有街市，颇类城垣，容人逾万。

1934年建置的临泉县治沈邱集（原属阜阳县），“原建砖寨一座，颇类城垣。寨之四周，筑有砖砌炮楼十一座，甚为巩固。东、西、南、北、东南五门，面积约七百亩，市容整齐，街道宽阔”^①。

铜陵曹蓝田在他的《己未会试纪行》中，有一段描述阜阳吴家寨形式规模的记载：

是晚抵阜阳境吴家寨宿。初，余在颍上^②，闻吴家寨最坚，欲一览其寨而不得。至是过回溜集，遥望其寨，若平地有山突起，两峰对峙云霄间，一大一小，中微断，……二寨相倚焉。吴君瑤阶名琪树，率其子出寨相迎。瑤阶前署石台县教谕。初进小寨，居人列市甚盛。由小寨转进大寨，过濠沟二，濠深广各数丈，水深及濠半，清可照人。大寨内外二重，外土寨，稍有阜，中放枪眼，内寨砖石砌成，高可五六丈，广丈余，周围可数里。寨上女墙坚厚异常，望楼高敞可眺望，半腰留枪眼，甚巨。寨中居民约二万余人，人各有腰牌，出入无稍混。大小长短戈矛，森罗环列，不计其数。铅药足，粮草丰。余笑谓吴君曰：“此东南第一寨也。”吴君曰：“粤贼初陷金陵，周侍郎（即周天爵）督吾乡团练，即谕民结寨，并绘图以示人。皆忽而莫从也。此寨鸠工最早，历岁增修，吾家始出钱万贯，后则居人计亩输租，故幸保至今……初大寨县四门，因署郡守某诬以谋反，索去钱三千

① 民国《临泉县志略》（不分卷）。

② 曹蓝田于咸丰五年（1855）任颍上县教谕。

贯，后遂杜其北门。”^①

民圩民寨，蒙、亳当地群众称之为官寨，以区别于捻军圩寨。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圩寨，在蒙、亳地区座落交错，同时并存，关系微妙得很。有些民寨是看风使舵，脚踩两只船，“圩长持两端而畏捻”^②。他们的态度是随形势风向的变化而转变，用当地故老的话说，就是官的私的都来。传说：“江集的练总是江福志，管周围六个寨。捻子一外出，练总地保地该乍办还乍办。捻子一回来家，就捻子说的算了。”^③甚至还有捻军首领外出将家属送到附近民寨的事情。

涡阳县东顺河集（原属宿州）附近的大、小潘两个村庄。

“百年以前，大潘叫西潘寨，小潘叫东潘寨。当时有‘五里三潘，行事过天’的说法。东潘寨是七分官三分私的官寨，寨内有一门大炮‘十里近’，还是韩老万送来的。圩长是潘贵堂，管十多庄。捻子起反时，东潘寨没有破过，外面的人跑到这里来避难的很多，韩老万都把家眷送到这里。”^④

这种民圩捻圩之间的微妙关系，也就是清朝统兵大员在奏折中所说的“名为团练，实为贼匪”^⑤，“浚南、淮北附捻民圩甚众”^⑥。

捻军内部是靠宗法氏族的血缘关系和地缘的纽带维系，其与外部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呢？韩老万与潘贵堂的私交，就是地缘关系的很好例子。

① 曹蓝田《璞山存稿》卷9刻本。

② 光绪《亳州志》。

③ 参阅《捻军调查记》。

④ 同上。

⑤ 咸丰九年六月二十四日傅振邦奏，《剿平捻匪方略》卷61。

⑥ 咸丰九年八月十九日胜保奏，《剿平捻匪方略》卷65。

四

综观上述，捻军起义以后，淮北的团练与圩寨联袂出现。州县地方官倚赖团练支撑，维持地方政权的存在。团练成为地方武装力量，不免会有绅董或土豪利用其练总、圩长的身份，倚据圩寨，形成地方势力。“其强有力者辄敛费抽丁，或设局献事。甚且挟嫌互攻，寻仇抗官。”^①或者是拥兵自重，待价而沽，窥测方向，以求一逞。苗沛霖就是这类典型。如《涡阳县志·兵事》说：“捻匪倡乱，前抚臣仿坚壁清野，使民筑圩自卫，既而加砖堞，坚如城郭。各立圩主，抗钱粮，擅生杀，甚至寻仇劫掠，如苗沛霖等酿成巨祸。”

这种特定环境的历史现象，使国内外有的学者认为：“捻子是从圩寨发展起来的”，“圩寨道光末既已存在，而与地方政府对峙”^②；领导“捻乱”是地主或土豪，以其圩长寨主的身份，“利用氏族制残余，与血缘或地缘相结合”，形成地方割据势力，乘机叛乱，而非农民造反^③。其主要根据是孙衣言《安徽候補直隶州知州褚君墓志铭》：

自道光之季，吏习于恬熙。皖豫间盗大起，豪猾大姓筑寨自固，谓之圩。圩大者千余家。间则出剽劫，或拒伤官兵。稍益，迫胁旁小圩役属之，小者十数圩，大者至连圩百十，号曰捻匪。州县不能制，则相率诣匿，或糜以团练。^④首先，在分析、理解这段文字的原意之前，先要知道孙衣言在

① 民国《涡阳县志·人物》卷13。

② (日)清水稔：《论捻军叛乱》，转引自(日)井木赖寿著、马汝珩译《捻军起义与圩寨》，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③ 傅衣凌：《明清时代阶级关系的新探索》，《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

④ 孙衣言：《逊学斋续文钞》卷4，见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安徽为官的时间经历。孙衣言是浙江瑞安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选庶吉士。咸丰初授编修，十年(1860)，外放安庆知府。时安庆为太平军占领，皖抚翁同书改任其为护理按察使，以疾归。翌年，湘军攻下安庆，两江总督曾国藩以书招之，授凤颖六泗道。旋丁忧回籍。他在安徽正是苗沛霖团练猖獗之时，印象必然深刻。所以，后来(1880年)他在给1858年任过来安知县的褚惟培写的墓志铭中，提到捻起圩寨兴，以其亲历熟悉的咸丰末年事，追溯至“道光之季”，然而却把捻子与“豪猾大姓”混为一体，且时间概念模糊。如果注意到文中“稍益”的用词，也许不致于误解为道光末年之事。“益”的本字为“溢”，有逐渐、增加、进一步诸意。“稍益”在这里就可理解为“时间的推进”。若是原文断句不同，意思也就完全两样：

间则出剽劫，或拒伤官兵，稍益迫胁旁小圩役属之。

间则出剽劫，或拒伤官兵。稍益，迫胁旁小圩役属之。

然而，认为“捻子是从圩寨发展起来的”，“捻乱”是地主或土豪领导的叛乱，而非农民造反，对孙衣言《褚君墓志铭》中这段文字的断句，都以前者，作为依据。

其次，道光末年修筑的圩寨，也是寥若晨星。至于说连圩十数以至百十，“州县不能制，则相率讳匿，或糜以团练”。显然是咸丰间事，而且是八年(1858)以后，正是苗沛霖团练声势显赫之时。但苗沛霖亦非捻军，只是捻军的短时间同路人。

试看圩寨的修筑时间：

太和县从1822—1922年整整100年间，共修筑圩寨273座，绝大部分为咸同间产物，尤以咸丰年间为最多(159)，其次为同治年间(41)，光绪以后微不足道。圩寨多以姓氏称名，必然会有很多寨名重复，如刘寨就有17个。故又另有吉祥之意的别名。但还是不免重名，如黄岗寺堡有二刘寨，别名保全寨、协和寨，

而中聂湖堡也有二刘寨，其一别名亦为协和寨。太和圩寨（见附表）的修筑年代统计于下：

时间	圩寨数	时间	圩寨数
道光二年	1	十一年	2
咸丰二年	1	咸丰年间	31
三年	12	小计	160
四年	9	同治年间	41
五年	17	光绪年间	4
六年	26	宣统年间	4
七年	17	民国年间	8
八年	23	时间不祥	56
九年	13	小 计	113
十年	8	总 计	273

从而可知，咸丰五年（1855）至八年修筑的圩寨，与捻军的频繁活动有直接关系。另从咸丰间作幕太和的杨积中所作《申复已未筑寨文》^①得到证实：

伏查蒙、亳捻匪，于前年（1855）七月鸱张之后……再四思维，惟有坚壁清野，使民间各自保守。而小民难与图始，虽经取再四劝谕，终属畏难苟安。迨自上年（1856）正

① 杨积中：《续御寇略》卷上《申复已未筑寨文》，咸丰七年四月，见聂崇岐编《捻军资料别集》。

月以来，叠被逆匪滋扰，渐有悔心。复经职苦口开导……迄今总计各堡共修大小圩寨五十余个。

萧县修筑圩寨亦始自咸丰五年，先是改造原有的山寨，但不足以保卫村庄，起不到坚壁清野的作用。自八年（1855）始，复改在平原筑寨，至十年共修筑圩寨98今，间距三五里至十里不等，互相呼应。“虽亦不免伤亡，较邻境害差减焉”^①。

另据苏、豫两省的州县志记载，修筑圩寨也都是在咸丰六年以后。应该说是捻军起义使圩寨在淮北出现，捻军势盛促进圩寨兴起，而不能说捻子是从圩寨发展起来的。

再观捻军主要首领的出身家境，只有少数几人是过日子过的。家有土地200亩，在当时也只是不愁衣食之家，像张乐行、韩老万（峰）和江台陵。或是有个小功名，如王冠三是武庠生。但还都不是“豪猾大姓”。其余多是贫寒“小户”，景况各不相同，龚得贫无立锥之地，任柱幼为猪倌，刘学渊兄弟在涡河上做“马腿子”（码头搬运工），侯士伟被逼债上门而杀人。景况稍好一点的，苏天福家开粉坊，孙葵心做过衙役。

捻军起义既然不是圩寨兴起发展的结果，所以就不能说是“围绕村庄修建土墙的做法，为捻军叛乱提供了物质基础”^②。也不能将圩寨看作是捻军的组织单位^③。实际上也不是。这先要了解捻子的组织，是个松散群体，围绕一个人（混光棍）的活动而凝聚团结起来，起始就无村域界限。举行起义以后，捻军的组

① 光绪《续萧县志》。

② 蒋湘泽：《捻军叛乱》（西雅图，1954年），第32—44页，转引自（美）孔飞力著、谢思伟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第三章，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

③ （日）井木赖寿著、马汝珩译《捻军起义与圩寨》：“圩寨既是捻军的组织单位，又是出击的据点。”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

织是靠宗法氏族的血缘关系或地缘这根纽带维系。捻军的旗色就是区域性的，组织内部是以人际关系为主，而不是以村庄为单位。所谓圩寨，不过就是挖道沟围堵墙的村庄。举一个实例，就可知圩寨不是捻军的组织单位。

涡阳县的吴桥寺是当年捻军黄、红旗的分界线，当地有“南张北侯”的说法。集东三四里的吴士楼有吴、侯两姓。吴姓住村东头，因张振江（姑母家姓吴）的关系，就是黄旗，旗头是吴双、吴贵；姓侯的在庄西头，当然是红旗，旗头先是侯红（战死），后是侯霞昌。很显然，捻军的组织单位不是圩寨，而是由人组成的“旗”，圩寨只是其所在处。圩寨作为地方行政的基层组织，那是捻军失败以后的事了。

（附《团练章程》、《太和县圩寨表》于后。）

团练章程^①

钦差工部侍郎加三级左堂吕奏奉谕旨，通飭山东、河南、江南（苏）、安徽四省连疆地方官，遵照宿迁县仿川、楚、豫三省团练章程，一体举行。今将条款、册式开列如左。

原定条款二十一则 道光二十三年

一、每年汇造烟户册，晓谕居民，申明保甲。今复遵例举行团练之方，或一大村，或众小村，各立练长正副二人，谓之小团。合众小团，又立练总正副二人，谓之大团。所立练总、练长，务择其明白质实、众所仰望者，由官给札飭办。

一、地保循图守界，犬牙相错，既行团练，不必拘定图分。故有里居毘连，可合数团为一团者，亦有村落辽隔，可分一团为两团者。该地保们各按图随团办事，庶使首尾相应，互为救援。

一、乡勇须择年力精壮，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者，无论绅民，有无田产，均列名充当。该勇每十人立一长，或不及十人亦立一长，谓之十长。十长则统于练长，层层约束，一遵保甲十家牌头之例。派完之后，归于练总，按各小团分别造册，某练长名下管领乡勇若干，开列姓名、年齿，呈官过硃，以便亲查。倘有违抗，不愿入团者，指名禀究。

一、大团制大旗一面，上书某图乡勇。一遇有事之时，此旗

① 安徽省博物馆藏清抄本，系咸丰间休宁施村人胡旭斋手录当时文告、探报、禀帖及自述等内容的一册杂钞。参阅《安徽史学》1985年第2期。

随练总左右，以为众人耳目。小团各制小旗一面，上书某村乡勇，随练长调度。该勇各系号带一根，上书某村乡勇某人，以便分团立队，不致混乱。

一、团内制造军火器械，修卡挖壕，一应费用，着练总练长协同地保，劝花户共为捐襄。无论商民，均须秉公办理，不得徇私勒索，不许任意抗违。所有捐制枪炮若干，刀矛若干，均归练总练长造具清册存官，临时禀请酌给，以昭慎重。其余农具棍棒耙叉，亦足捍卫，可不必载入。

一、各团遇有寻常贼盗，均以鸣锣为号，有事之村，昼则举旗，夜则悬灯，以为标帜。附近村邻一面率勇救护，一面飞报别村，由近及远，四路兜擒。其别团闻警者，虽不在赴救之例，亦须戒严预备。若遇大伙流寇，又以放炮为号，无炮则以防夜鸟銃代之，不独本团互相救应，即别团亦必闻声赴援，以防冲突。违者从重治罪。

一、巡更会哨，以传签为号，常变不同，缓急亦异。无事之时，则各村传递更签，本团自为起止。除去昼日，自黄昏某时刻起，传递一签，沿村巡查，接连每一时发一签，至天明止，一夜巡遍一团。误者议罚充公。若有大寇将近临境，则各团按昼夜十二时辰，制签十二支，各团互为传递，一时一签，昼夜轮流。一团遇警，即随签飞报别团。误者惟该团练总练长是问，加重治罪。

一、各团调度，须用信号旗签，均由官制，发给练总收存，以便遇事传集某团，该团即率团勇依限飞驰，照信签指定处所集齐，听候派遣。敢有玩误者，加重治罪。

一、大伙流贼倘在一二百里，每团须选健足探报四五十名，轮流走探，以备预防。贼人若将临境，即率乡勇赴卡堵御。凡有三人之家，以一人居守，二人赴卡，其有借故躲延，禀官治罪。

一、各团遇警，须看明山河市镇，择其易守之地，筑卡挖

濠，安设枪炮。并将各小村牛犊辘重，并归一处，以便协力保护，毋得观望自误。

一、各团每月合操一次，须择要隘处所，齐集会哨，施放枪炮，演试武艺，以壮声势，使贼匪闻风远遁。其有技艺过人者，并令教习乡勇，议费酬劳。

一、凡土著之民，欲为盗者，必勾引外盗，与之同事；而外盗亦必假土著为之巢穴，务须严加盘查。如有携眷搬徙者，须问明来历，方准入团。若贼将临境，本团居民不得率行他徙，摇惑人心，违者罚产充公。

贼来先以放火呼噪惊人耳目，该团即当整兵以待，不可畏避。至夜间伏路巡更，尤为紧要，必须轮流派拨，以均劳逸。如有推诿偷安者，查实重惩。

一、各团拿获盗匪，交地保拨勇解官究治。其有贼匪聚众恃强，敢与格斗，被乡勇杀伤者，例置勿论。

一、各团须与县署声息相通，方能随事缓急，酌量办理。每大团择一明白晓事之人，常住本城，凡有应行事件，随时禀明核夺，以免地保书差，藉端滋扰。

一、遇警报即于练勇内分段，另选若干名，设局给发口粮，同营兵护城，仍与各团互相呼应救援。

一、市镇人烟稠密，宵小易潜踪，其居民团练，一如城治乡村。至买卖商价，虽无可抽，亦须输费资，视生意之大小，酌出钱之多寡。一归练总练长掌收，或添募勇壮，或制造器械，随时斟酌。所有寺庙庵堂，多停流棍；乐户娼家，最易藏奸。须一体搜查。而行户客店，尤须各立稽查号簿，每日登记宿客姓名来历，报送汛官、练总查问。亦有外处匪徒，假作乞丐难民入境，藉以窥伺，均须加意查诘。凡有踪迹可疑者，即行盘拿。倘或玩忽不记，偶疏稽察，一经发觉，从重治罪。

一、地方官每月除在城朔望举行乡约外，仍须轻骑简从，巡

行村落。或因公下乡，校阅各团乡勇，队伍果否整齐，技艺果否娴熟，分别赏罚，以示劝惩。

一、乡勇有能拿获贼匪者，报官先为奖赏。其有积匪要犯，亦或啸聚成群，无论大团小团，有能首先擒获者，既为国家剿贼，即为里党除奸，应由练总等禀官核实具请，分别保奏，以励士气，而安民心。

一、各团绅富，或有急公好义，情愿捐输，以助团练之资者，自二百两以上应行详请咨部议叙。

续定条款十三则

一、向年各团捐输，每地一亩捐钱三五文，耕牛一只捐钱一二百不等。至于骡马等物，有捐与否？今特酌中地亩，以五文为率，牛只以百文为率。骡马等物，仍循其旧，无须更改。

一、城市商贾自典商起，每典捐制钱二十千文，下至油坊、漕坊、钱铺、杂货、布店、行户，以次而降至百文止。所捐之项，储公备用。

一、各团拿获盗贼解官，问系巨盗，赏勇制钱十千文。至拿窃贼及偷农具田禾者，均由练总等公同酌赏，以示鼓励。

一、各团遇警，由练总发信签号旗，知会练长齐勇，签上书明限某时到齐。误期罚练长出钱二十千文充公。

一、耕牛被窃，每只应提公项制钱六千文，归牛户添补买价，以重农务。该团仍报官追缉，得赃给领后，仍将所偿之钱归公。其有湖中牧放、棚内开疆走失者，均由看守不严，不在此例。

一、倚仗同族邀约多人，诡捏分产借货等情，强取牲口钱物者，该团纠勇擒捕，送官究惩。

一、行旅骤遇劫夺，附近村民，急应救护，所获之匪，送官究办。至于践踏青苗、偷窃田禾等事，亦与窃贼一例，送官办

理。

一、捉获小窃，不得擅行毒殴。如有伙盗强抢格斗，被乡勇杀伤者，例实勿论。乡勇被贼杀伤，重则给养伤钱二十千文，轻则至五千而止，均由公项支发。

一、擒获盗贼，由练总交地保，拨勇解官，酌给公项盘费。

一、遇有火变，附近村庄急应扑救，如有迟延与托故不到者，罚该练长输钱五千，以充公用。

一、团中军火器械，原为御盗而设，无事不许私行佩带。违者，练长等协同地保拿获送官。倘练长等有徇隐情，该练总明官罚惩。

一、旗用印记，签用铁烙，遵川、楚、豫成例，由官治造给领，以昭画一。所有练总旗七尺长，号旗三尺，练长旗五尺。乡勇号带宽一寸二分，长五尺。更签用竹制成，宽一寸，长一尺八寸。信签宽一寸二分，长一尺五寸。分给大小各团，一体遵行。

一、传递更签，须议赏罚。每一大团所有各小团，互相传签，以便稽查。倘遇贼拿获，该勇除照例受赏外，加赏制钱一千文，以示鼓励。倘传签有误，将该勇重责二十棍，即罚该练长制钱一千文，以充公用。

推广条款

咸丰三年

一、经费宜裕也。各捐输钱项，自道光癸卯年，商民止捐一次，以备团练之需，至今已历十载，所存并无余款。今据各练总公议，照旧复捐，以供团练经费。城镇自典商捐钱二十千，各铺面以次捐五百文。乡村按户捐钱，计地与牛，每亩五文，每牛百文，汇齐存公备用。惟本年水患未除，被灾之区，民力恐有不给，本县自行捐廉，以资接济。凡遇出城捕盗，所带役勇并签调团丁，每名按日发给饭钱百文。如该公项足用，练总自备并殷实绅商急公加捐者，各听其便。其有捐至二百两以上者，详请议

叙，以示鼓励。

一、号令宣明也。凡各团遇警，仍遵旧章，一面传签知会邻团，预备救援；一面飞速稟报本县，亲率役勇，即日起行。先发信签，按团分调，四面围拿。酌半留守，以防窜扰。该练总到会拿处所，即将信签缴还。违误者照例议罚。至本县所带役勇，一体量功给赏。倘该役有退缩不前，首先逃走者，当时斥革，即将该勇量功顶充，以示惩戒。本县信赏必罚，决不食言。

一、赏恤宜重也。凡遇大伙捻、幅匪犯境，拒捕，无论本县亲临，及该团自与匪接仗，除格杀勿论外，该勇有能生擒一名者，赏钱三十千；杀毙一名，赏钱二十千。如有所获之匪，曾经悬示赏格，仍照格加赏。其有被匪拒杀者，恤其家属钱一百千；受伤重者，给养伤费二十千，次则十千，又次五千。均照营例验明伤痕，如式体恤。如该勇不在奉调之数，情愿奋勇帮拿，有能擒贼杀贼者，一体给赏，均各稟官备案。

以上三条，均由各团练总公议，照旧变通，以期尽善，允宜施行。惟宿邑地当孔道，水陆交冲，今昔情形不同，城乡缓急亦异，更当因地方制宜，便民为要。本县现准城乡练总公议，于团练旧章权宜变通捐钱，练勇更易遵行。所有本城内外街道，绅士商民，各列姓名店号，造册捐输，每日每户捐钱百十文，按十日一收，存储公所，以资緝捕。经费另立章程，出示晓谕。城外镇市，该练总等又于本团各自相度机宜，议有抽丁校练，折费补充各条款，统准造册存汇，以备稽查。其守望约团练章程，刊刻全本，另行给发。

镇城图 大团正副练总 总管各团事件清册 每册二本一存 官一存练总

旗 遵川楚豫团练旗式书大团乡勇字样 壹杆
号旗 遵川楚豫团练旗五方五色 伍杆
信签 每签书十二时辰字祥 十二枝
更签 每签书二三四五更字祥 伍枝

小团正副练长 管领乡勇花名清册一本

管领客民花名清册一本

捐办器械清册一本

劝造捐输清册一本

庄集村 小团正副练长 劝造捐输清册 每册二本一存 官一存练总

地	顷	亩	捐钱	千	百	十文
牛	只		捐钱	千	百	十文
典			捐钱	千	百	文
号			捐钱	千	百	文
铺			捐钱	千	百	文
店			捐钱	千	百	文
行			捐钱	千	百	文
坊			捐钱	千	百	文
馆			捐钱	千	百	文

庄集村 小团正副练总 管领客民花名清册 每册二本一存 官一存练总

年 岁 身 面 须 省 府 县 人 现 住 村

庄集村 小团正副练长 管领乡勇花名清册 每册二本一存 官一存练总

正副头目年 岁

庄集村 小团正副练长 捐办器械清册 每册二本一存 官一存练总

旗	遵川楚豫团练旗式书小团勇字样	一杆
号带	书小团乡勇姓名字样	根
更锣		一面
信炮		位
更枪		杆
长矛		杆
腰刀		把
铙钹		杆

其他农具概不入载

咸丰叁年 月 日

太和县圩寨表^①

寨名	别称	面积广袤	修筑时间	修筑人	距城方里	归属堡名
周寨	东守望寨	130丈	咸丰五年	周春苞	东北5里	望高壕堡
王寨	西守望寨	140丈	七年	王占鳌	东北5里	望高壕堡
张寨	遗安寨	160丈	五年	张鸿钧	县东10里	郭城陂堡
后尚寨	大同寨	200丈	五年	尚凌云	县东10里	郭城陂堡
李寨	乐成寨	120丈	同治二年	李汉昭	县东10里	郭城陂堡
西化寨	顺寨	179丈	光绪廿四年	陈鸣勋 重修	东南8里	望成铺堡
王小寨	保和寨	171丈	同治三年	李尚忠	东南8里	望成铺堡
陈桥寨	东顺化寨	230丈	同治三年	陈鸿泰	东南8里	望成铺堡
陶寨			同治三年	陈霞光	东南8里	望成铺堡
旧集寨	县寨	430丈	咸丰五年	朱念清 6人	县北8里	旧县集堡
朱寨	同心寨	200余丈	咸丰间	朱元肃 4人	西南1里	和阳驿堡
复祥寨		155余丈	咸丰十年	王履安	东南13里	双庙铺堡
胡寨	同心寨	290余丈	八年	胡日琢	县东35里	黄岗寺堡
诚心寨		180余丈	同治五年	姜俊华	县东35里	黄岗寺堡

① 民国《太和县志·舆地》。

续表

萧 寨	义聚寨	72丈	咸丰十年	萧省三	县东35五里	黄岗寺堡
刘 寨	保全寨	118丈	同治元年	刘梅 3人	县东35五里	黄岗寺堡
后姜寨	同德寨	120丈	二年	姜殿邦	县东35五里	黄岗寺堡
刘 寨	协和寨	78丈	三年	韩景玉	县东五35里	黄岗寺堡
宋 寨	公谊寨	62丈	二年	王凤昌	县东35五里	黄岗寺堡
人和寨		180丈	咸丰六年	李凤翔	县东30里	天宫寺堡
万安寨		220丈	七年	李绍铎	县东30里	天宫寺堡
里仁寨		160丈	同治元年	李殿选	县东30里	天宫寺堡
鼎峙寨		120丈	咸丰十年	李灿斗	县东30里	天宫寺堡
协同寨		210丈	六年	李居易	县东30里	天宫寺堡
刘 寨	协和寨	98丈	同治五年	刘步堂	县东40里	府君庙堡
太平寨		83丈	二年	卢绍年	县东40里	府君庙堡
完全寨		96丈	三年		县东40里	府君庙堡
三塔寨		900丈	咸丰三年	孙仰参	东北35里	三塔集堡
解 寨				解学纯	30里	东良善堡
刘 寨	务农寨	160丈	同治元年	刘特选 3人	30里	东良善堡
贾 寨	万和寨			贾志成	30里	东良善堡
张 寨		340丈	咸丰七年	张冠儒 3人	30里	东良善堡

续表

孙 寨	保和寨	200丈	咸丰八年	孙仰参 2人	东北50里	史家林堡
利和寨	睦邻寨	140丈	十年	李思明	东北50里	史家林堡
薛 寨	咸安寨	140丈	九年	薛文思	东北50里	史家林堡
东藩寨		120丈	光绪二十四年	邹嘉宾 2人	东北50里	史家林堡
玄墙集寨	万寿寨	700丈	咸丰八年	吴戒四	40里	玄墙集堡
张 寨	同心寨	130丈	咸丰间	张猷彩 2人	45里	鱼鳞沟堡
名店利寨	仁义寨	208丈	咸丰间	韩正蒙	45里	鱼鳞沟堡
寿岳山寨		350丈	咸丰七年	岳应梅 6人	45里	鱼鳞沟堡
寿东寨		240丈	十年	岳振清 3人	45里	鱼鳞沟堡
刘 寨	福寿寨	270丈	九年	刘继宽 2人	45里	鱼鳞沟堡
栾 寨	忠义寨	410丈	八年	栾秉巽	50里	上大涧堡
赵 寨	宝善寨	210丈	七年		50里	上大涧堡
郭 寨	同安寨	240丈	同治六年	陈凤治 2人	50里	上大涧堡
吴家寨					县东50里	竹园湖堡
王家寨					县东50里	竹园湖堡
刘 寨	永康寨	155丈	咸丰九年	刘大统	东北50里	郭村庙堡
宋 寨	永寿寨	95丈	同治元年	宋明伦	东北50里	郭村庙堡
许 寨	双合寨	120丈	咸丰十一年	许学昌	东北50里	郭村庙堡

续表

崔寨	永安寨	168丈	咸丰十年	崔景合	东北50里	郭村庙堡
安丰寨		400丈		刘应珍 3人	60里	安丰集堡
刘寨		130丈			60里	安丰集堡
田寨					县南5里	五道沟堡
徐寨	绥定寨	400丈	咸丰六年	徐广缙	西南8里	下白洋湖堡
王寨	永康寨	345丈	五年	王莲溪	西南8里	下白洋湖堡
王寨	和合寨	300丈	咸丰间	王有涵	县西15里	中白洋湖堡
永和寨		290丈	民国2年	邢翰卯 5人	县西15里	中白洋湖堡
徐寨		130丈			县西15里	中白洋湖堡
朱亮寨		140丈			县西15里	中白洋湖堡
砖桥寨		237.4	同治初		西南12里	砖桥集堡
杨寨	公和寨	720丈	咸丰五年	杨大馨 2人	县西30里	上白洋湖堡
杨庄后寨	魏寨	240丈	咸丰五年	杨大贤 2人	县西30里	上白洋湖堡
园寨	人和寨	280丈	民国元年	杨钊2人	县西30里	上白洋湖堡
杨老寨		210丈	咸丰初	杨从贵	县西30里	上白洋湖堡
李同寨	东保定寨	320丈	七年	李仰魁	县西30里	上白洋湖堡
小李寨	顺天寨	147丈	同治元年		西南30里	许家窝堡
大李寨	西保定寨	300丈	咸丰八年		西南30里	许家窝堡

续表

保安邢小寨		285丈	民国元年	邢秉敬	西南30里	许家窝堡
协和邢寨		320丈	民国元年	邢金耀	西南30里	许家窝堡
汪庄王寨	永康寨	180丈	宣统三年		西南30里	许家窝堡
陈寨	和平寨	280丈	咸丰三年		西南30里	许家窝堡
小张寨	义和寨	140丈	同治三年		西南30里	许家窝堡
赵楼寨		110丈	同治间		西南30里	许家窝堡
郭寨	顺兴寨	185丈	同治初	郭创修	县西25里	柳河岸堡
刘寨	长留寨	172丈	咸丰九年	刘绍孔 2人	县西25里	柳河岸堡
众志寨		240丈	八年		西南40里	卢家岗堡
共和寨		240丈	宣统二年		西南40里	除此六寨
康定寨		200丈	咸丰六年		西南40里	尚有大朱寨、大、
平安寨		220丈	八年		西南40里	小邢寨
万安寨		160丈	九年		西南40里	二、杨寨
永和寨		200丈	民国元年		西南40里	二，余俱未详。
张寨	万福寨		咸丰九年	张鸿道 3人	西北25里	十里沟堡，另有姚寨、人俱未详。
税铺子寨		353丈	咸丰七年	张鹏梧 3人	西北35里	十一年土易砖寨民修

续表

邹 寨	福康寨	350丈	咸丰七年	邹凤亭 2人	西北35里	税子铺堡
徐 寨	保聚寨	200丈	同治元年	徐汝弼	西北35里	税子铺堡
徐 寨	仁和寨	430丈	咸丰六年	徐广绥 2人	西北52里	西八里铺 堡
萧 寨	万福寨				西北52里	西八里铺 堡
界首寨			咸丰五年	饶元章 12人	西北60里	界首集堡
前段寨			民国3年		西北45里	上聂湖堡
万安寨		240丈	道光二年		西北45里	上聂湖堡
萧 寨	万福寨	360丈	咸丰三年	萧从文	西北60里	大桥堡
刘 寨	西致和寨	160丈	六年	刘广明	西北60里	除此八寨 还有方楼 寨，余未 详。
靳 寨	万和寨	300丈	同治五年	靳宪章	西北60里	
吕 寨	万全寨	300丈	民国11年	吕冠卿 4人	西北60里	
金 寨	合和寨	300丈	咸丰六年	郭俨然	西北60里	
李 寨	同心寨	300丈	八年	李 时	西北60里	
郭 寨	仁义寨	600丈	咸丰间	郭敬修	西北60里	
李楼寨		260丈	宣统三年	李思乐	西北60里	
王 寨	瑞昌寨	204丈			西北20里	独龙沟堡
咸熙寨		280丈			北西20里	
乔王寨	天合寨	237丈			西北20里	

续表

忠王寨		200丈			西北20里	独龙沟堡
李寨	乐天寨		咸丰二年	李恭俭	县西40里	中聂湖堡
刘寨	协和寨		三年	刘万江	县西40里	中聂湖堡
张寨	致祥寨		四年	张振祥	县西40里	中聂湖堡
孙寨	安乐寨		四年	孙冠云	县西40里	中聂湖堡
刘寨	致和寨		五年	刘南春	县西40里	中聂湖堡
王寨	细阳寨		四年	王怀仁	县西40里	中聂湖堡
陶家寨			六年	陶举仁	县西40里	中聂湖堡
张桥寨			咸丰间		西北45里	北黑虎庙堡
段寨			咸丰间		西北45里	北黑虎庙堡
杨寨			咸丰间		西北45里	北黑虎庙堡
桑寨	西公和寨	240丈	咸丰四年		西北65里	黄门堡
张寨	南公和寨	240丈	八年		西北65里	黄门堡
范口渡寨		210丈	六年		西北65里	黄门堡
范寨	万全寨	600丈	五年		西北55里	胡家集堡
滕寨	敬事寨	176丈	六年		西北55里	胡家集堡
许寨	钦天寨	340丈	六年		西北55里	胡家集堡
前李寨	公心寨	156丈	六年	汪占元	东北75里	壕台寺南堡 此三寨，北堡

续表

后李寨	人和寨	186丈	咸丰七年	郭远峰	东北75里	有刘、武、范、陈四寨，余未详。
宋寨		160丈	八年	宋连元	"	
人和寨		260丈	四年	刘春甲 3人	西北70里	龙王庙堡
王寨	义和寨	210丈	六年	李宗周 2人	西北70里	龙王庙堡
奉天寨		200丈	六年	刘琛2人	西北70里	龙王庙堡
光武寨		580丈	三年	刘存诚	西北70里	光武庙堡
赵寨		300丈			西北70里	光武庙堡
卢寨		180丈	咸丰七年	卢凤三 2人	西北70里	光武庙堡
黄寨		230丈			西北70里	光武庙堡
苗桥寨		220丈	咸丰九年	郭殿敬	西北70里	光武庙堡
大郭坑寨		280丈	三年	郭锡珍 2人	西北70里	光武庙堡
任寨	顺天寨	200丈	三年	刘存诚	西北60里	新阳城堡
姜楼寨	三和寨	190丈	三年	刘存城	西北60里	新阳城堡
孙寨	同心寨	300丈	三年		西北60里	新阳城堡
于寨	致和寨	230丈			西北60里	新阳城堡
刘寨		180丈	咸丰三年	刘存城	西北60里	新阳城堡
全和寨		142丈	八年	王光灿 4人	西北70里	蒋良店堡
重兴寨		98丈	八年	温兴4人	西北70里	蒋良店堡

续表

祁集寨					西北70里	蒋良店堡
吴寨	西万和寨	230丈	咸丰七年	吴越2人	西北70里	芦村店堡
郭寨	万和寨	190丈	咸丰七年	郭春林2人	西北70里	芦村店堡
张寨		240丈	咸丰七年	张兆远2人	西北70里	芦村店堡
庞寨		220丈	八年	庞云飞2人	西北70里	芦村店堡
孔寨	九如寨	240丈	九年		西北13里	坏滩溜口堡
杨寨	福善寨	180丈	同治二年		西北13里	坏滩溜口堡
王寨	万全寨	240丈	同治二年		西北13里	坏滩溜口堡
高寨	万顺寨	314丈	咸丰九年	高士曾	县西20里	下聂湖堡
马寨	利和寨	276丈	十年	马占元	县西20里	下聂湖堡
刘寨	南中心寨	458丈	八年	刘体贵	县西20里	下聂湖堡
陈寨	同升寨	286丈	八年	陈德馨2人	县西20里	下聂湖堡
张寨	万福寨	240丈	八年	史俭德4人	县西20里	下聂湖堡
三义寨		223丈	宣统三年		县西20里	下聂湖堡
张寨	重熙寨		咸丰间		县北30里	双浮图堡
栾寨	纯禧寨		咸丰间		县北30里	双浮图堡
高寨	安仁寨		咸丰间		县北30里	双浮图堡
王寨	尚和寨		咸丰间		县北30里	双浮图堡

续表

保和寨			咸丰间		县北30里	双浮图堡
西双合寨			咸丰间		县北30里	双浮图堡
成聚寨		150丈	同治二年		县北18里	十八里铺堡
协力寨		260丈	咸丰十一年		县北18里	十八里铺堡
天佑寨		170丈	同治元年		县北18里	十八里铺堡
刘家寨	同聚寨	280丈	咸丰七年	张万铨 2人	东北25里	史家桥堡
邱寨	义同寨		同治四年		东北25里	史家桥堡
丁井寨	福履寨	140丈	咸丰六年	高献光 2人	东北25里	史家桥堡
韩堡寨	保合寨	220丈	同治四年	张万铨 3人	东北25里	史家桥堡
孙寨			咸丰间		东北30里	彭固堆堡
梁小寨			咸丰间		东北30里	彭固堆堡
栾寨			咸丰间		东北30里	彭固堆堡
张桥寨	天保寨	266丈	咸丰间	张俊禄	西北45里	南黑虎庙堡
刘寨	后中和寨	280丈	三年	刘步迟	西北45里	南黑虎庙堡
杨寨	举安寨	220丈	咸丰间	杨化纯	西北45里	南黑虎庙堡
张楼寨	双合寨	230丈	五年		东北50里	大庙村堡
李寨	协和寨	196丈	同治间	李心纯 2人	县北45里	港沟集堡
常寨	义成寨	260丈	同治间	常克修	县北45里	港沟集堡

续表

傅寨	东顺天寨	210丈	同治间	傅柏谦 2人	县北45里	港沟集堡
纪寨	西顺天寨	220丈	咸丰间	纪廷栋	县北45里	港沟集堡
刘寨	人和寨	320丈	咸丰间	刘浩然	县北45里	港沟集堡
颜寨	义兴寨	117丈	光绪三年	颜超群 2人	县北45里	港沟集堡
萧寨		240丈	咸丰间		东北30里	张桂桥堡
鲍楼寨		500丈	咸丰间		30里	张桂桥堡
刘家浅寨	人和寨	300丈	八年	刘明珠 3人	40	十里庙堡
集安寨			同治二年	吴汉升	东北30里	中良善堡
盘石寨			三年	王殿拔	东北30里	中良善堡
东义合寨	义寨		咸丰间		县东30里	西良善堡
西义合寨	义寨		咸丰间		县东30里	西良善堡
王寨					东北25里	陈家桥堡
胡寨					东北25里	陈家桥堡
张寨					东北25里	陈家桥堡
孙寨					东北25里	陈家桥堡
卞园寨					东北25里	陈家桥堡
徐寨					东北25里	陈家桥堡
尹寨	天保寨	220丈	咸丰五年	尹宗贤	县西60里	曹顺冈堡

续表

替 寨	万和寨	320丈	咸丰五年	替上田	县西60里	曹顺冈堡
范 寨	时和寨	200丈	咸丰五年	范思法	县西60里	曹顺冈堡
惠迪寨					西北80里	枣林庄堡
西程寨					西北80里	枣林庄堡
刘 寨					西北80里	枣林庄堡
赵 寨					西北80里	枣林庄堡
合顺寨		700丈	咸丰间		西北80里	李兴集堡
刘 寨					西北80里	李兴集堡
南谢寨	天保寨				西北85里	二郎庙堡
黄楼寨	天增寨				西北85里	二郎庙堡
谢楼寨	天佑寨				西北85里	二郎庙堡
斤 沟 寨 店	久安寨	300丈	咸丰六年		东北60里	斤沟店堡
仁义寨		270丈	咸丰六年		东北60里	斤沟店堡
义合寨		260丈	咸丰六年		东北60里	斤沟店堡
中和寨		320丈	咸丰六年		东北60里	斤沟店堡
里仁寨		280丈	咸丰十年		东北60里	斤沟店堡
保和寨		360丈	咸丰六年		东北60里	斤沟店堡
关营寨	保安寨	320丈	咸丰间	关宪章	县北60里	板桥集堡

续表

关楼寨	保障寨	220丈	咸丰三年	关如璧	县北60里	板桥集堡
王寨	南万和寨	180丈	四年	王兴让	县北60里	板桥集堡
陈寨	忠恕寨	200丈	六年	陈耀宗	县北60里	板桥集堡
胡寨	东壁寨		四年	陶凤亭 2人	东北15里	墳台集堡
栾楼寨			同治间	栾秉义	东北15里	墳台集堡
陶楼寨	信义寨	200丈	咸丰七年	陶庆先	东北80里	小砖桥堡
陶楼寨	和合寨	80丈	八年	陶理任	东北80里	小砖桥堡
邹寨	永安寨	100丈	民国三年	邹时秀 2人	东里80里	小砖桥堡
三和寨			咸丰八年	韩士义	东北80里	小砖桥堡
傅大寨		260丈	九年	傅九畴	西北百里	慈圣集堡
傅小寨		200丈	八年	傅大宾	西北百里	慈圣集堡
林楼寨		150丈	十年		西北百里	慈圣集堡
任楼寨					西北百里	慈圣集堡
云寨	安全寨		咸丰九年		西北90里	清泥浅堡
高寨	安集寨		同治元年		西北90里	清泥浅堡
三义寨		210丈	咸丰八年	吴福远	西北90里	司町店堡
天仪寨		210丈	六年	吴福远	西北90里	司町店堡
张寨		214丈	七年		西北90里	司町店堡

续表

李 寨	仁义寨				县北50里	茅冈集堡
王 老寨 人 寨			咸丰六年		西北80里	王老人集堡
陈 寨	治安寨		咸丰六年		西北80里	王老人集堡
三和寨		400丈	同治三年	周殿选	县北75里	洪山庙堡
中和西寨 周 寨		220丈	元年	刘兆瑞 3人	县北75里	洪山庙堡
唐营寨	富春寨	270丈	二年	唐敬汉 3人	县北75里	洪山庙堡
刘 寨	万和寨	240丈	咸丰五年	刘振清 3人	县北75里	洪山庙堡
阎洼寨	生全寨	250丈	六年	阎景运 3人	县北75里	洪山庙堡
张 寨	公议寨	240丈	九年	张希典 2人	县北75里	洪山庙堡
刘 寨	信义寨		八年	刘维新	县北80里	蒲沟集堡
宋 寨	人和寨		五年	宋祥 3人	县北80里	蒲沟集堡
徐 寨	忠心寨	250丈	光绪廿四年	邹壮华 3人	县北80里	蒲沟集堡
肥 河寨 口 寨		480丈	咸丰七年	鄧 昭	县北90里	肥河口堡
马 寨	保合寨	240丈	八年	马乐年 3人	县北90里	肥河口堡
樊 寨	桃园寨	220丈	九年	鄧壮国	县北90里	肥河口堡
桑 寨	义和寨	200丈	同治四年	桑汉云 2人	县北90里	肥河口堡
前育后育	位寨 位寨	240丈	咸丰四年		东北45里	于家堡南牌
		144丈	咸丰四年		东北45里	于家堡南牌

续表

张 寨					东北45里	于家堡北牌
田楼寨					东北45里	于家堡北牌
张册寨 店寨			咸丰间		县北60里	张册店堡
桑 寨	刘楼寨				县北60里	张册店堡
协和寨					县北60里	张册店堡
双庙寨 集寨			咸丰间	王新民	县北70里	双庙集堡
忠信寨				郭秉忠	县北70里	双庙集堡
保全寨				魏凤山	县北70里	双庙集堡
李 寨					县北70里	双庙集堡
中公寨 和寨		210丈	咸丰六年		县北60里	卧龙岗堡
公正寨		200丈	五年		县北60里	
阎家寨			咸丰间		县北75里	桑家店堡

捻军雒河集会盟时间考

清朝嘉庆年间的白莲教起义失败以后，北方农村又出现了一种名为“捻”的民间结社组织。经过道光一朝的发展，到了咸丰初年，就爆发了起义，差不多是与南方的太平天国革命同时。

“捻”的组织主要是依靠宗法氏族的纽带来维系的，各自为股，不相统率。所以在它起义的初期，易被敌人所使用的剿抚两手各个击破，一大批首领不是战死就是投降，成为倏忽即逝的昙花一现人物。但是经过几年斗争实践的筛选，却也涌现和确立一些捻军的领袖人物，并使他们认识到由分散走向联合的必要，所以就有捻军历史上著名的雒河集会盟。

关于捻军雒河集会盟的时间问题，见诸资料记载的，有咸丰五年秋和六年正月两种不同的说法，前者为《豫军纪略》、《亳州志》、《永城县志》，后者是《安徽通志》、《涡阳县志》、《蒙城县志》。

《豫军纪略》卷6：“咸丰三年，粤逆滋扰归德以来，豫、皖之界土匪蜂起，其时各自为股，仅抢劫未敢攻城。去秋张乐行、苏添福、龚德、王贯三、侯实为等分五色旗，僭称王号，伪刊玺文，设立军师、司马、先锋名目。”这是河南归德府地主绅董襄世铨等45人于咸丰六年二月赴京的“呈诉”。“去秋”就是指咸丰五年秋。

《涡阳县志》：“六年正月，蒙城岁贡郑景华、李士钰谋于捻众。尊乐行为盟主。乐行乘肩輿至雒河集，祭告天地，宣布信条，旗分五色。”

《豫军记略》的作者尹耕云是参与过剿捻、直接同捻军打过仗的人，是当事人的记载，被人视作信史是很自然的事。而记载“会盟”在咸丰六年正月的几种资料，过去所看到的是撰修时间较晚的光绪、民国地方志。所以史家都认定捻军雒河集会盟是在1855年秋，且已成定论。但是，随着新资料出现，对历史上已成定论的问题，也还应重新来认识。引起我对这一问题重新思考的，先是因看到同治九年《涡阳县志》^①，始知民国《涡阳县志》的内容肇源于此，亦还属于是当时人的记事。再就是去年底应邀参加新修《涡阳县志》评稿会议，又看到一位无名氏的题为《江、河南发匪志记》^②（抄件），作者是河南夏邑县桑固店人，以其亲身见闻记述了捻军五色旗和推张乐行为盟主的情况，记载如下：

（咸丰五年）自九月后，捻匪遂滋蔓于南方，自界沟集南北，以亳州、蒙城、永城等而起，遂成捻匪之渊藪。于是黑旗头有苏天福、王贯三；白旗头有龚得，浑名曰龚瞎子；蓝旗头有韩万军（峰），浑名曰韩新子；红旗头有李约；黄旗头有张洛行。各领数千捻匪，聚有数万之众。……而北方之人，至此多改面易心，暗领王贯三、苏天福印号。至明年正月，树旗聚众，各旗下有小旗头，或领二三十人或领四五十

① 安徽省图书馆存有现抄本，稿本藏天津市图书馆。

② 1963年，夏邑县文物普查，在桑固乡前杨庄发现，缺封面和第一页。但据保存者杨进修（1897年生，秀才）说，他当年在王村教书，从该村的染坊得到时完整无缺，封面题《江、河南发匪志记》。县文化馆油印30份，将原稿上交省里。《中学学刊》1984年第4、5期发来时，题为《捻军见闻录》。

人，或领七八十人。

捻匪自去年腊月半归故巢后，聚党益众，共推张乐行为盟主。门首大书“无敌大将军”五字，用黄旗黄伞遮盖而行。于是有割据一方、雄长江河之意。故于本年元旦后不数日即围亳州、永城，然皆不能克。

这是迄今所见到的有关捻军雒河集会盟的较为详细的资料，它记述了“会盟”前后的具体经过：咸丰五年九月以后，南方的亳州、蒙城、永城等州县的捻军势力壮大起来，五旗的领袖人物已从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并确定了其领导地位，标志着捻军会盟的条件趋于成熟；黑旗捻军的势力也随之壮大，“北方之人”多向苏天福、王贯三领旗；“去年（五年）腊月半归故巢后”，才共推张乐行为盟主，各旗捻军复“树旗聚众”，发展壮大捻军的队伍。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捻军推张乐行为盟主，是在咸丰五年腊月半以后的事。

此外，不妨再考察一下捻军五旗主要首领之间的关系和捻军在1855年的活动，这样可能有助于确定其雒河集会盟的时间。

捻军五旗中的黄、红、白和部分黑旗在亳州境，蓝旗在蒙城、宿州，黑旗主要在河南省永城、夏邑县。

黄旗张乐行是雒河集（今涡阳县城）西北12里张老家人。家本小康，“自来耕种为生，也曾包送过私盐”^①，“开过粮行、糟坊，摆过赌场。他交游甚广，招揽四方，仗义疏财”^②，“素著仁义”，“人皆忧乐行”^③。“因犯罪拒捕，聚众乏食，始行抢劫”^④但他在起义后的“三年中，倏降倏叛”^⑤。直至1854年

① 《张乐行自述》。

② 《捻军调查记》。

③ 曹蓝田：《璞山存稿》，刻本。

④ 《涡阳县志》。

⑤ 同①。

9月，袁甲三还要他捉拿苏天福“表明心迹”，但又密遣兵弁以诱擒之，始坚定其反清的决心。

红旗侯士伟是雒河集北35里吴桥寺侯老郢人。他同张乐行是表兄弟，张敏行的妻子侯氏娘家又在侯老郢。侯士伟的红旗首领地位，还是靠张乐行的力量确定的，侯集“侯龙标要是不被张乐行杀死，还显不出侯士伟来呢”^①！但是后来侯士伟又死在张敏行手里。捻军五旗以红旗的势力最弱，多是同黄旗一道行动。

白旗龚得是雒河集西南25里公吉寺（又名公鸡寺、宫吉寺）磨盘松人。出身寒微，家境贫苦，母子俩相依为命。他的眼睛白天惧光，夜晚看物清楚，俗谓“蝙蝠眼”，所以绰号瞎子，机智多谋，是捻军的智囊。他同苏天福是张乐行的左右臂，关系最为密切。

黑旗苏天福是河南永城平家楼人，初起时在亳州境内活动，曾随太平天国北伐援军占领永城。河南团练捉拿他，常追到亳州境内烧杀。苏天福一直是得到张乐行的支持，他们的关系深厚。黑旗王贯三是河南夏邑县三官集王楼人。“字王春，乃夏（邑）武庠生也”^②。他同宋希元是儿女亲家，俱起手于太平天国北伐军经过皖豫之时。至1855年秋天，始同张、龚捻军有联系，“或送财物于南，或勾群匪而北”^③。

蓝旗韩老万是雒河集东45里顺河集韩桥人。他是鬻鼻子，绰号韩鬻子。“家有两犍牛，两顷多地，是有日子过的。”据说他是被迫参加捻军起义的。捻军五旗以蓝旗人多势强，“黑旗的马，白旗的枪，蓝旗全仗人硬棒”（捻军民歌）。蓝旗的领旗地区是蒙城、宿州，捻军初起的“十八铺”中的李殿元、胡元众等

① 《捻军调查记》

② 佚名《江、河南发匪志记》。

③ 同上。

原就同张乐行有老关系。

其次再看看捻军在1855年的活动：

3月，龚得捻军进至夏邑县营盘集，始与黑旗王贯三、宋希元捻军接触。

4月，宿州知州郭士亨向进入亳州境剿捻的河南候补道张维翰建议收抚张乐行。“乐行不用命”，乘夜逃走。张乐行的祖坟被掘。

5月，“左都御史袁甲三罢，奉召回京，捻匪乘间复起”^①。“初，落刑起甚微，公（李晓峰）从端敏战降之，役部下。端敏中去，乃复肆，卒为剧寇”^②。

7月，张乐行“聚蒙、亳、阜、永四境土棍龚瞎子、韩狼子、侯士伟、苏添福等，分五色旗，大起犯蒙”^③。

8月，张、龚捻军败颍州知府陆希湜、参将朱连泰于义门集，“团练董事遭祸尤惨”^④。

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张、龚、苏捻军占领夏邑会亭，攻破商丘马牧集。“捻匪（八月）十七日入会亭。北方捻首王贯三令其族弟王士杰先到桑固集安排菜饭。……或送财物于南，成勾群匪而北。……气势数倍于前，则皖豫之贼既聚，燎原之势已成”^⑤。

11月初至年底，张乐行龚得捻军复克蒙城，围攻亳州、永城、归德等城，战无虚日。

综观上面对捻军五旗首领和他们在1855年活动的粗略考察可知，这一年秋天，战无虚日，捻军似无会盟的间隙时间。张乐行本人

① 光绪《宿州志》。

② 方浚颐：《二知轩文存·徐刚毅公传》卷27。

③ 民国《蒙城县志》。

④ 民国《涡阳县志》。

⑤ 佚名《江、河南发匪志记》。

从1855年5月以后抗清态度才坚决，势力才壮大起来；亳州境内捻军黄、红、白之旗首领的关系，本来就是很密切的，他们（主要是张乐行）跨地三州县，虽有过去“十八铺”的渊源，同蒙城的李殿元、胡元众有老关系，但同宿州境内（主要是顺河集地区，今属涡阳县）蓝旗韩氏兄弟和刘性叔侄的关系，还需要一番联络的过程。到这一年的七月，蓝旗首领韩老万才同张乐行等亳捻一起攻打蒙城，有了联合的军事行动。黑旗捻军永城的苏天福，初起时多是在亳州境内活动，一直是得到张乐行等亳捻的支持，关系至为密切。但是黑旗捻军另一股重要力量，夏邑县的王贯三同亳捻的关系，1855初始有接触，到了秋天双方才配合行动，真正合作。至此，地跨两省五州县的捻军五旗已经形成，并且都已确立了各自的首领，客观的形势和主观的愿望，逐渐促使他们趋向联合。这时（1855年秋），以蒙城岁贡郑景华、李士铎等一批谋士见捻军“燎原之势已成”，“转思拥渠魁为奇货，竟仗策以从，借箸为乐行筹大计”。^①于是他们出谋画策，四处游说，八方联络，奔走于不同地区之间。这中间总是必然要经过一段联络策画的过程，等到时机成熟。这么重要的会盟大事情，是需要隆重从事，选定一个“黄道吉日”的。那么，中国传统的“普天同庆”的旧历新年，还有层“一元复始”之意，倒是个恰当的时间，也是顺情合理的。所以，光绪《安徽通志》、民国和同治《涡阳县志》都说捻军推张乐行为盟主是在咸丰六年正月；佚名《江、河南发匪志记》说是“自去年腊月半归巢后”，也可理解为第二年正月；汪士铎《乙丙日记》记述其甥吴栗生在咸丰六年正月二十九日从河南开封府署写的信说：“捻匪伪号大汉。”应是吴栗生在听到这一消息后不久，当作一个重要新闻写信告诉汪士铎的，那也就是在正月。

^① 《涡阳县志·兵事》。

关于张乐行的称号，见诸资料记载的有五：盟主①、大汉盟主②、大汉③、大汉明命王④和大汉永王⑤。

盟主由“众兄弟誓同生死共推”⑥，是雒河集会盟的主题，这种形式承袭了我国历史上“歃血为盟”的传统，倒也很切合捻军的实际情况。捻军的组织特点，是各自成军，保持独立，不相统率。雒河集会盟并没有能改变捻军的这一弱点，只不过组成一个松散联盟，各旗捻军还是保持其独立性，盟主是指挥调动不了的。各旗捻军的联合统一行动，只是配合和支援的平等关系，而没有领导和服从的关系。但是，捻军毕竟是由分散走向联合，结束过去一盘散沙似的各自为战的状态。

盟主冠以“大汉”，应当看作是针对于满洲贵族的异族统治，是一种民族意识的表现，而不能认作建立大汉国。观之捻军会盟时的实际状态和领导人物的思想境界，尚缺乏远谋大略，还不具备建国的条件。虽然后来张乐行在怀远发的《檄文》中也有“开创疆宇，以图王霸之业”的话，不过是为鼓动“安坐土圩”的淮北捻军救援怀远而说的“套话”罢了。至于汪士铎《乙丙日记》中述吴栗生给其写信说“捻匪伪号大汉”，为什么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大汉盟主”，因经道途传播而造成断章取义之误呢？就是张乐行自己在《檄文》、《晓谕》里，有时称大汉盟主，有时也只称盟主。如果说捻军建立大汉国，那么大汉盟主的称号就有不伦不类和矛盾之嫌，国中又怎么会有盟主呢？所以，还是将大汉理解为民族意识的表现，较为妥贴和切合实际。

① 光绪《安徽通志》、《亳州志》、《涡阳县志》和佚名《江、河南发匪志记》。

② 《张乐行檄文》、《大汉盟主张彦天安程告示》和《大汉盟主张给那万军的晓谕》。

③ 汪士铎：《乙丙日记》。

④ 尹耕云：《豫军纪略》。

⑤ 《张乐行自述》。

⑥ 同⑤。

张乐行称王的问题，除了《豫军纪略》和《张乐行自述》，再未见到其他资料提到过，是很值得怀疑的。若是真象《豫军纪略》说的“张乐行伪号大汉明命王”，那么，后来张乐行在其《檄文》、《告示》、《晓谕》和《自述》里，为什么都不提呢？而在《自述》中却又突然冒出一个“自称大汉永王”来，这不能不使人想到《豫军纪略》的记载和《张乐行自述》录供的记录可能有误，或是掺杂了某种目的，而使人产生怀疑。捻军的调查资料也表明，张乐行的称号是盟主或大汉盟主，大旗上写着：“替天行道，杀富济贫，大汉盟主张。”这个问题作为一个疑问提出来，尚有待今后去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捻军人物姓名小考

汉字多同音异义字，易使人名出现音同字异的差错。历史上名见经传的人物尚且不免，如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字愚荃，被误作玉泉，王茂荫字子怀，误为子槐；那么，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匪寇的农民起义人物，就更可想见了。不但是名无定字，且有连姓氏都给弄错的。由于流传下来的作为史料的官私记述，大都出自封建文人墨客之手，或仅根据语音，或为“讨口上便宜”，故意将农民起义人物的姓名，改为草头水土旁的谐音字，诅咒其被水淹土埋头上长草，以发泄仇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只有近代的太平天国运动，遗留下来大量的自身资料，使得其人物姓名不出舛错。而捻军人物的姓名，虽可以同治九年修的《涡阳县志》，作为考定的依据，因其去捻军失败的时间不远，是当时人记家乡事。但其中也不免有错误之处。

根据我所接触的资料和实地调查，发现不少捻军人物的姓名是弄错了。发微钩沉，辨析其错，纠正其误，以还原貌。为叙述的方便起见，还是以捻军旗色分述之。

黄 旗

张乐行，捻军的盟主，自领黄旗。他的名字，无论是其后人

口述，还是张氏小宗谱及其他文字记载，大都是作“乐行”。应该说是毫无问题的。清朝的诏谕、奏章或方志中作“落刑”，是诅咒的污词。但有的官私著述，如方志、张瑞墀《两淮戡乱记》、佚名《江、河南发匪志记》（稿本）却作“洛行”。或是在同一本书中，乐行、洛行互作。显见“洛行”是含有诅咒之贬意。但是，使人不甚理解的是，太平天国的军事领导人李秀成、陈玉成，他们给张乐行写信，也作“洛行”。这就曾使一些太平天国史家视作金科玉律，以此为据，将张乐行改作张洛行。记得我第一次接触捻军的历史，知道的就是张洛行。那是在50年代初，听罗尔纲先生讲授太平天国史（当时称“专门化”课）。如今在一些著作或词书中，提到张乐行，还要加上“一作张洛行”。其实真是没有这个必要。

张乐行有一个14岁的儿子，与其同时在蒙城西阳集（今属涡阳）被捕，牺牲在义门集周营。传说是为张乐行侧室杜氏所生的庶出。关于他的名字，资料记载中出现张闹、张喜两种说法。孰是？以愚之见，都对也。其实就是一个“尿”字，由于南北方的读音不同而造成的错误。尿，北方人读niao，谐音作闹；南方人读suī（虽），谐音作喜。从而也可得知，《张乐行自述》即“供词”的记录者是为江浙一带人，所以作“张喜”。

完全相同的例子还有：后期捻军蓝旗首领牛宏升的儿子，名牛遂（或牛遂子），又作牛耀，同为“尿”字的南北方读音差异的原因；捻军黑旗首领刘玉渊即大老渊，小名也叫“尿”，所以《亳州志》又作刘虽。过去淮北人小名叫“尿”的不甚少见。

杜金蝉，张乐行的侧室。一直跟随张乐行南征北战，同时牺牲。据张氏后人说：她小名大金，原是张家的使唤丫头。因其嗓子响亮似蝉鸣，而后取大名为金蝉。所以，《涡阳县志》作杜进，是其小名的谐音；《蒙城县志》就作杜金蝉。

张琢，张乐行二哥敏行之第五子，小名五孩。《蒙城县志》

“马王崑传”误作武亥。1863年（同治二年），清军僧格林沁部攻陷雒河集，张敏行、张琢父子南逃幸免于难。据张氏后人说，张敏行病死南乡，张老家的墓是衣冠塚。张琢就跟随族兄张宗禹，带领马队，成为后期捻军的一员骁将。1865年，捻军在与太平军余部联合成军后，几个主要首领都称王，张琢袭其叔张乐行的王号，称幼沃王。张禹爵这个名字有承袭爵位之意。1866年捻军之分军为东西捻，《涡阳县志》和民间传闻都说是由于张琢与任柱之不协。1868年6月，张琢在山东宁阳境经过一梨园，从马背探身摘梨，被流弹击中睾丸，伤重而死，谎称出天花。这是其后人所说。

张振江，黄旗捻军较著名首领，但很多资料都把他的名字作张佃江或张殿江。从调查获得的口碑资料，证实《涡阳县志》作张振江是对的。他是张大楼人，起义后住在张寨，邻近红旗地区，同侯士伟的关系很好。张敏行父子之杀侯士伟，就是假借张振江的名义把他诓到张寨杀死的。1868年，西捻军在山东茌平县南镇最后一战，随张宗禹突围到徒骇河边的18骑中，就有张振江。传说是一起“隐”了。

张德才，小名羊（《涡阳县志》作张扬）。传说张乐行手下的18枪手之一，“撵羊”和永城劫狱都由他引起。但《涡阳县志》说他是张乐行族子有误。其实，张德才与张乐行同姓不同宗。他是随父从北边逃荒过来的，先是帮工在袁姓大地主家，看家护院。父子俩武功好，“张老家用（送给）两块地勾引过来的”。

红 旗

侯士伟，捻军红旗首领。资料记载中又作世伟、士维、四维、实为等。而从调查知其为“士”字辈，可以肯定《涡阳县

志》和王大球的《捻军旗表》作士伟为对。红旗捻军的区域不广，主要为侯姓，势力较弱。但紧靠黄旗地区，侯、张两姓非亲即故，关系较密，两旗的行动常在一起。传说侯士伟的红旗首领地位，还是靠张乐行的力量，消灭了侯集的侯龙标，才确立起来的。可是，后来（1858年）侯士伟因两个儿子的行为不轨，开罪张敏行妻侯氏娘家，而被张敏行父子所杀。

白 旗

捻军白旗地区是在原亳州东南的公吉寺、楚店及蒙城的江集，三个著名首领龚得、孙葵心、江台凌成犄角之势。

龚得，公吉寺磨盘松人。公吉寺又作宫吉寺、工记寺，原名公鸡寺。周围村庄多龚姓。龚得是其小名。关于他的大名即学名（俗称谱名），从调查中得知他是“道”字辈，名叫龚道才或龚道德。但传说龚得带领18人打高公庙，其中有个龚道才。若按过去穷苦人家孩子起学名“连根倒”的省事办法，即小名连姓或在小名前后加上“字”辈，那就应是龚道得，或改用同音字为龚道德。可是李秀成在《自述》中却称作龚得树，又有可能是龚道树之误，因道与德字的音义相近易混；或太平天国方面忌讳道德给他另起的名字。而在颍州府属各州县方志和传记中，均是以“龚得”出现，说明他的学名鲜为人知，即以小名行世。

孙葵心，传说是孙集人，起义后之能以楚店集为据点，是因为他的舅父（一说“大刀王斌”）家在楚店，起义较早。是靠舅父的势力起家。但在有的资料记载中，将他的名字说作孙魁新，或污蔑作孙溃心。

江台凌，江集江老家人。江集涡阳阳县建置前属蒙城县辖境，1964年又从涡阳县析归新设置的利辛县。他在五兄弟中最幼，当地人称五老头。江集周围一带多江姓，顾名思义，江老家

是江姓的老家。可是，有的资料记载，却将江台凌的姓名全弄错，作姜太林。就连《亳州志》也说作姜台凌，弄错了姓。还是《涡阳县志》作江台凌为是也。

蓝 旗

捻军蓝旗地区分布在原宿州和蒙城县境内。1865年，宿州的曹市集和顺河集、蒙城的高炉集和西阳集等原蓝旗地区，划归新设置的涡阳县。而后期捻军的主要蓝旗首领任柱家乡坛城，仍属蒙城辖境。

韩老万，蓝旗捻军总首领。顺河集附近的大韩庄人。绰号韩贛子，是其鼻塞语音不清，即俗谓“贛鼻子”。资料记载中讹为“韩狼子”、“韩浪子”。传说韩老万家是有两犍牛、两顷多地的日子主，初末参加捻子。大韩庄及周围村庄欲推举韩老万为首领，为能促使他出来，大家就将吃剩的牛骨头往他家门口丢，要他“背盗名”。又把起义的大旗竖在他家门口。所以，韩老万参加捻军起义，是被群众“逼上梁山”的。关于韩老万的名字，资料记载作“韩奇峰”，恐是有误。从调查得知韩老万的字辈为“峰”，他的后人也不能确知其名，只记得叫韩万峰。但他的三个兄弟为清峰（二老万）、碧峰（三老万）、秀峰（四老万）。如果按照当地当时对人表示尊敬，呢称老某，是在姓与名间加“老”字，那韩老万的名字应为韩万峰。前几年见到一本根据油印本转抄的《江、河南发匪志记》，是河南省夏邑县桑固店一位当时人写的专记捻军活动的稿本。其中提到捻军五色旗首领，蓝旗为韩万军，同韩万峰的字音很接近。从而可以肯定韩老万的名字不是韩奇峰，应为韩万峰。

任化邦，小名柱子。蒙城县坛城集大任庄人。幼失怙恃，跟叔父任乾生活，给庄上各户人家放群猪。后随任乾起事，是个无

名之辈的小旗主。1859年任乾战死，代领其众，始以任柱之名昭著。后期捻军与太平军余部合军，称鲁王，始以任化邦之名著称于世，统率东捻军转战豫、鲁、苏，使敌胆寒。李鸿章视其为项羽。当地有“化邦”这个名字是太平天国给起的传说。

牛宏升，曹市集牛王铺人。初为蓝旗捻军的一般首领，名不甚著。资料记载中又作牛洛洪。其实，这应是群众对牛宏升的尊称牛老宏，被敌人谐音污蔑为“烙红”或“烙洪”，而讹作洛洪的。1865年，与太平军余部合，称荆王，牛宏升之名始著。1867年于山东战死，由其子牛尿（资料中作牛遂或牛耀）统领其众。

李蕴泰，蒙城人。初为蓝旗捻军一个不大不小的首领，其名见诸资料，先多以李允之名，绰号大肚子。在调查中故老也只知道大肚子。而李蕴泰之名却鲜为人知。1965年在他称魏王后，李蕴泰的名字昭行于世。

龚得、张琢、任柱、李允等人的名字，初见诸资料记载，均为单名。后来，即在与太平军合作后，又都是以复名行世。无疑是受太平天国（人无单名）的习俗影响。另外也是表明捻军改弦更张的象征或标志。

黑 旗

黑旗捻军区域最广，跨地豫皖两省。主要是河南永城、夏邑两县和安徽亳州义门集（今属涡阳）。

王冠三，又作贯三，夏邑人。应以佚名《江、河南发匪志记》（稿本）作“冠三”为准确，因作者就是夏邑桑固店人。他与永城苏天福（作添福为误）同为黑旗总首领。捻军五旗中只有黑旗是两个“总司令”。王冠三，单字春，是武痒生。他与夏邑另一黑旗首领宋喜元（作希元为误）是儿女亲家。1856年从霍邱三河

尖撤退途中，在阜阳落马掉小洪河淹死，并非如有的资料所云，战死三河尖或被“擒斩”。民歌有“西北死了王冠三，捻子塌了半个天”。

刘学渊，小名狗。原籍山东滕县。道光二十六年（1836），随母逃荒到亳州义门集，涡河桥洞为栖身之所。他打过短工，当过“马腿子”（码头工人）。兄弟4人，刘学渊身强体壮有力气，在起义前后名气最大。所以在资料记载中也多误以其为兄，而将兄刘玉渊（小名尿）误作弟。就是在调查中访问的老人，也都是刘狗、刘尿连说，虽都不知他们的学名，但多明确地称刘学渊的小名为“二狗子”。可以纠正史料记载之误。关于刘玉渊刘学渊兄弟俩的绰号，原是大老冤、二老冤，意为憨厚老实好欺的冤大头或受气包。资料记载中作“老冤”是对的。不过，多谐音其名作“老渊”，即变为尊称了。他们还有两个弟弟，名字不祥，只知其绰号为三疯子、四麻子（《亳州志》作刘四麻）。

另就是刘学渊弟兄的旗色问题。有人认为是八卦旗，以此作为他们是白莲教的根据。其实是错了。我们在调查时，听到的多为“老鸱”（乌鸦）膀子旗，或简言之为膀子旗。起初我们也给弄懵了。听的多了，再仔细一琢磨，原来黑色乌鸦的翅膀尖是白色的，不就是黑旗白边吗？捻军八卦旗就在义门集东北不远的下张桥，首领是杨兴泰。

正是由于刘玉渊、刘学渊兄弟是外来户，与当地无沾亲带故的瓜葛，所以在起义后以凶狠著称。同时也不大同捻军其他旗合作，独来独往，甚至与张乐行的关系不融洽，倒是同河南商邱马收集金楼寨白莲教的关系密切，曾经支援过那里的白莲教起义。

张乐行传略

张乐行（1811—1863），昵称老乐，涡阳县张老家人。家庭小康。父名懋祖，母燕氏。兄弟3人，乐行为季。长兄问行，自幼过继给伯父念祖承嗣，早死。仲兄敏行，捻军中称为“闯王”。起义前父母即已谢世，兄弟分家产，张乐行分得田产70余亩，并在吴桥集上经营糟坊、粮行，“也曾包运过私盐”。

张乐行瘦高个子，背微驼，脸上有几个细白麻子。幼年曾进过私塾就读，粗通文墨。年长喜交游，广结友，“贵义轻财，赍穷恤匮”。道咸之际，灾荒频仍，四方就其门以求食者众，“乡邻颇感其德”。张乐行身边聚集的人益众，在地方上抑强助弱，扶危济困，喜打抱不平事，时人称“仁义光棍”。

咸丰二年（1852），张乐行手下的张德才等人，从北边包运私盐归来，途经河南永城境，因撵散牧于田野的羊群，同永城“老牛会”发生械斗，被捕系永城狱。张乐行遂邀约龚得，聚众劫狱，救出张德才等，“众依乐行自固”，声势愈大。

咸丰三年初（1853），太平军进入安徽，淮河两岸农民“揭竿而起”，淮北蒙、亳、凤、永等地捻军号称“十八铺”（股）。清廷派前漕督周天爵办理安徽团练，到淮北招抚起义首领。张乐行曾受其招抚，随其攻打过定远北炉桥的陆退龄起义军。“寻以餉项无着，遣散归籍”。张乐行“闭门谢客”，暗中却与在亳境

活动的永城捻首苏天福联系密切。次年九月，清朝负责剿捻的兵科给事中袁甲三，一方面要张乐行“拿获苏天福表明心迹”，另一方面却又密派兵弁诱擒之，迫使乐行再次聚众起事，始坚定其抗清的决心，同苏天福、龚得等联合行动。

咸丰五年（1855），张乐行率捻军东向蒙城，北出皖、豫边，转战亳州、永城、夏邑、商邱境内，攻城略寨，“进退绰如，纵横跌宕，所向无前”。时又与夏邑王贯三、宋喜元黑旗捻军取得联系，捻军的五旗首领已经确立。此时以蒙城岁贡郑景华、李士钰为首的一批谋士，“竟仗第以从，借箸为乐行筹大计”，为捻军的联合出谋画策，奔走联络。

次年正月（一说五年秋），地跨两省五州县的捻军各旗汇聚雒河集，在山西会馆以“歃血为盟”的方式，祭告天地，“众兄弟誓同生死”，共推张乐行为盟主。确立捻军的五旗军制，张乐行自领黄旗，白旗龚得，蓝旗韩万峰，黑旗苏天福和王贯三，红旗侯士伟。张乐行以盟主的名义，发布告示和行军条例，严明纪律，申述官逼民反，为除奸诛暴而起义。张乐行的门首大书“无敌大将军”五字，用黄旗黄伞遮盖而行。于是有割据一方，雄长江河之意。

雒河集会盟后，张乐行率众出征河南。清军乘虚而入，于咸丰六年五月十七日（1856年6月19日）攻陷雒河集。张乐行回救不及，率军南下怀远，沿淮西上。六月十五日（7月16日），占皖豫重镇霍邱三河尖。时太平天国在“内讧”后，石达开出走带去一部分精兵，减弱了太平军在安徽战场的兵力。李秀成欲借助捻军的力量，通过其部下同张乐行有旧交的李昭寿，居间联络。张乐行亦愿合作。咸丰七年（1857）二月初九（8月4日），两军在霍邱城外会师。捻军同太平军的合作，“听封而不听调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张乐行曾先后接受过太平天国的征北主将、鼎天福、成天义和沃王等封号。

霍邱会师后，两军遂即攻下霍邱、正阳关，交由捻军驻守。在豫、皖两省清军的进攻下，捻军先后放弃三河尖、霍邱，集结于正阳关，被困百余天。时李秀成驻六安，派李昭寿救援。八月十八日（10月5日），张乐行率众突围与援军会合，撤退六安。时蓝旗捻众“以累战不利，且囊橐充裕，谋解散归农”。由于张乐行侧室杜金蝉的劝说，“众感动，议遂寝”。

捻军到达六安后，蓝旗旗主刘永敬（绰号饿狼）故态复萌，还是屡欲带领其族众回归淮北家乡，不听指挥和纪律约束，使得捻军内部在与太平军合作问题上矛盾激化。年底，张乐行与龚得将刘永敬、刘天台（绰号小白龙）叔侄“诱杀”。史称“刘饿狼事件”。蓝旗捻众由刘天福、刘天祥带领回淮北，造成捻军的分裂。

咸丰八年四月十三日（1858年5月25日），张乐行率众撤离六安，由淠河乘船北上至正阳关，顺淮东下，占领怀远。半月之后，连下临淮及凤阳府县两城，遂又分军克五河，从而切断清军的淮河水路，打通捻军的淮南北通道，使捻军与太平军的地区得以衔接。

这年秋天，李昭寿在滁洲叛变投降清军，动摇了捻军中的意志不坚定者，张龙、李允、任乾、韩秀峰、孙葵心等人，频向清军暗送秋波，出现一股洽降的逆流；还有部分捻首，“乃各思苟安之计，回家固守土圩”。张乐行屡次派人到临淮、凤阳，制止张龙的投敌行为，使其有所畏惮，不敢遽发。另派人到芜湖向李秀成求援。李“因京围在急，而力难兼顾”，未能派兵前来。张乐行为摆脱危境，便向太平军地区靠拢，派龚得由怀远南下，于次年六月十七日（7月16日），与太平军庐州守将吴如孝联合攻克定远，扭转了这股投敌逆流。捻军后还曾配合太平军的三河大战，西出合肥、舒城一线，阻止西来援救的清军，为陈玉成，李秀成全歼李续宾湘军出力。

当清军水陆两路攻怀远时，捻军“堵御不暇”，情势危急，张乐行以盟主的名义，向“固守土圩”的淮北家乡捻军发出“檄文”求援，“行文再再”，前来应援者寥寥。十月十四日（11月8日），怀远失守。两月后，临淮、凤阳也相继落入敌手。咸丰十年（1860），捻军在淮南的根据地仅剩定远一隅之地，曾东出袭占来安，西上配合太平军保卫安庆之战。十一年二月，张乐行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龚得，随陈玉成西进湖北，战死罗田松子关。九月，太平军失守安庆，陈玉成退居庐州，太平天国的安徽江北战场形势急转直下，岌岌可危。时淮河流域的凤台、寿州、颍上，有苗沛霖团练的抗清活动。张乐行遂萌归志，于年底假道苗练地区渡淮，到达颍上。陈玉成也派马融和率领一支太平军北上。他们与苗沛霖团练联合攻颍州（阜阳），将署安徽巡抚贾臻围困在城内数月，久攻不下。

同治元年（1862）二月，清廷复派胜保“再视师淮北”，苗沛霖复降。时马融和又随扶王陈得才进军陕西。张乐行遂回雒河家乡。四月，陈玉成从庐州突围北上，在寿州为苗沛霖所赚被擒，送往颍州胜保军营。张乐行曾率捻军驰往颍上县江口集，中途搭救，未果。

是年秋，清廷派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统军攻捻，由豫入皖。亳东的捻军圩寨相继失守，清军一路向雒河集进攻。年底，张乐行率捻军退往宿州，欲北上山东受阻，复退守雒河集和尹家沟。翌年二月朔（3月19日），尹沟、雒河集失守，张乐行率残部向西南走，在张村铺为清军所创，仅剩数骑相随，折而东走。在蒙城县西阳集（今属涡阳县），为叛徒李家英出卖。二月初六日（3月24日），张乐行及其子张喜（一作闹，实应为尿）、义子王宛儿，被宿州知州英翰率团练擒获，缚送亳州义门集（今属涡阳）僧格林沁军营。十八日（4月5日），张乐行父子英勇就义于义门集西北之周家营。妻马氏、侧室杜金蝉，亦同时牺牲。

前期捻军的活动结束后。由张宗禹、任柱领导的后期捻军，又在中国北方大地上驰骋了5年。

参 考 资 料

- (1) 同治九年《涡阳县志》。
- (2) 《剿平捻匪方略》。
- (3) 张瑞堦：《两淮戡乱记》。
- (4) 佚名《江、河南发匪志记》。
- (5) 《张乐行自述》。
- (6) 罗尔纲、江地、王大球等：《张乐行传》。
- (7) 捻军调查资料。

张宗禹传略

张宗禹（？—1868），小名辉。涡阳县城（雒河集）北20里张大庄人。张乐行族侄。生于清道光年间，家道殷实，有地10余顷。父张富新，性情暴躁，人多惧怕。兄弟5人，宗禹居长。其同母弟宗道、宗先均参加捻军战死。张宗禹自幼读书，弱冠将应科举童子试，偶因琐事，父怒欲严惩，遂往投族叔张乐行，父子从此绝情。时张乐行已在张老家聚众起事，先司文墨，后统军作战。

咸丰八年（1858）五月，淮南捻军占领怀远、临淮、凤阳后，张宗禹曾受张乐行派遣，统军东下五河，治军严厉，杀不听其命令者，因得“小阎王”之绰号。

十年正月，张宗禹等统率淮北捻军3万，奔袭苏北重镇清江浦（今清江市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毙淮海道关葆晋等，攻占清江浦，显露出其有勇善谋、“强忍敢战”的军事才能，从而在捻军中崭露头角。太平天国封其为“石天燕”。后称“梁王”。

同治二年（1863），当僧格林沁部清军攻陷亳东捻圩，向雒河集进逼之际，张宗禹率一部捻军西走，联合河南汝宁（今汝南）陈大喜捻军，向豫西活动，为捻军留下火种。张乐行牺牲，僧格林沁清军撤离后，张宗禹率部返雒河集，捕杀出卖张乐行的李家英、杨瑞英等叛徒。旋复入河南境，同陈大喜、任柱等活动于

豫、鄂边。

次年春，太平天国天京形势危急，陈得才等率西北太平军东下回救，受阻于鄂东不得进。张宗禹即与之合，攻麻城不下，遂东走入皖。10月，在霍山城西20里的黑石渡一战，西北太平军大部投降，陈得才自杀，仅邱远才脱逃，北走六安麻埠，与张宗禹捻军汇合。后又同留在湖北的赖文光和任柱等汇合。时捻军已易步为骑，以其快速之优势，运用流动战术，驰骋疲敌。

同治四年（1865年），捻军由鄂经豫入鲁，一路疾驰而东，再折而西趋，驰骋数千里。四月二十四日（5月18日），在曹州府（今菏泽市）西之高楼寨，利用依阜面水的地形设伏。以弱兵诱敌，集中优势兵力，将尾追的僧格林沁清军围而聚歼之。击毙蒙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内阁学士全顺和总兵何建鳌等。清军的11000马队几乎全部投降，增强了捻军的骑兵力量，是为捻军历史上的一次最大的胜仗。

曹州大捷后，张宗禹即率众南下，回到雒河集家乡，围攻涡阳县城。后为刘铭传等淮军所迫，遂入河南。

五年（1866）九月，捻军在许州（今许昌）分军（另说杞县或中牟）。张宗禹率领族弟张琢（五孩）及怀王邱远才，统军入陕，是为西捻军。十一月进抵西安，在城东灞桥十字坡，歼灭陕西巡抚刘蓉部湘军，击毙提督萧德扬和记名提督杨得胜。活动于渭水流域，几次围攻西安不下，于次年二月过渭北，会合回民起义军。后由于左宗棠楚军的进逼，乃于十月向陕北进军，由蒲城经郃州、甘泉北趋急进，连克安塞、延川、绥德等州县城。把以谋略自负的左宗棠拖得智绌计穷，“忧愤欲死”。

张宗禹在绥德休整时，接到东捻军告急文书，遂即南下宜川。十一月初五日（12月7日），由龙王辿及壶口踏冰过黄河，东入山西境。时张宗禹号于众曰：“戊辰（同治七年）正月初五日破京城，御太极殿受贺。”乃出河南，直趋河北，进军北京，

以“围魏救赵”之策，谋救东捻军。

七年（1868）正月入河北境，从鸡泽、平乡挺进定州，逼易州，军锋直达京郊芦沟桥。清廷震骇，急任命三路钦差大臣，调兵遣将。各路勤王清军云集京郊，分头堵御。

张宗禹在进入河北境后，东捻军已经覆败。他集诸将会议说：“遵王既军败升天，赶救不及。现在应急回陕西，与回军相依，以免被妖围困，再蹈遵王覆辙。”于是率军南走，从河南卫辉、新乡西向获嘉、修武，拟仍经由山西回陕西。但清军在这一阻山面河的狭隘地区，扼险堵御。捻军不得过，乃折而东趋，与敌追逐周旋。三月，自内黄渡卫河，进抵山东东昌府（今聊城）；又由李海务渡运河，进入直、鲁边区。四月，从天津南走山东高唐州。这时捻军局蹙在减河南、运河东、黄河北、大海西的地区，为敌人的河防长墙工事所困，重蹈了东捻军的覆辙。时届伏汛季节，河水陡涨，又值阴雨连旬，平地雨水泛滥，捻军马队行动不能施展其快速的特长。六月，捻军被围困在山东境内黄河、运河和徒骇河之间，无法冲突出去。二十八日（8月16日），在平县南镇一战，全军覆没。张宗禹仅率18骑突围，落荒而走。夜宿一村庄场屋，人困马乏。及睡起，不见张宗禹踪迹，徒骇河边遗有衣履，莫知其所终。

关于张宗禹的下落，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败后逃至仓县之孔家庄，变更姓名，舌耕为生，后20余年病死。

二、潜走新疆，投陕西回民起义首领白彦虎，相与北走俄罗斯，不知所终。

三、遁入空门为僧，还曾回故里，在吴桥集上一家粮行借宿，“踏月而去，莫知所往”。

参 考 资 料:

- (1) 同治、民国《涡阳县志》。
- (2) 张瑞舞:《两淮戡乱记》。
- (3) 《剿平捻匪方略》。
- (4) 王之春:《漱生随笔》。
- (5) 张树侯:《淮南耆旧小传》。
- (6) 罗尔纲、王大球等:《张宗禹传》。
- (7) 捻军调查资料。

戊戌涡阳刘朝栋等起义

清朝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在腐朽枯寂王朝的死水潭中激起波澜，也在知识阶层的先进分子心头笼罩上一层亡国灭种的阴云。他们忧国忧民，欲“师夷之长技”，向西方学习，变法图强。1889年，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光绪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如昙花一现，迅即失败，国势更加衰颓。与此同时，由于连年灾荒，社会动荡不安，各地民变不断发生。在安徽北部捻军曾经起义的地方，又爆发了刘朝栋等领导的涡阳起义。当地人称为刘疙瘩起义。

一、起 因

从1886至1888年，安徽长江以北地区连续3年遭受严重的旱涝灾害。据当时在皖北做官的冯廷韶给其父及弟的家信透露，1898年的“皖北灾况，更甚于往年”，“如此奇灾，即七八十岁人，亦谓从来未有”。荒歉连年，粮价奇昂，民不聊生。“涡河两岸，十室九饥”^②，“十人之中，几无一人能度残冬”^③。对

① 冯廷韶是浙江德慈人，于光绪二十三至二十八年（1897—1902），历署宿州知州和凤台、颍上知县，并在凤阳府办理过赈务。

② 袁大化：《光绪戊戌平定涡匪纪事本末》。

③ 《冯廷韶家书》，《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5期。

如此严重的自然灾害，“地方官毫无抚恤，追呼银粮，枷打锁押，日甚一日”^①。黎明百姓生计无着，于是“弱者转于沟壑”，流徙四方，“扶老携幼，纷纷南下”^②。而疾病瘟疫又伴随饥饿纷至沓来，如当时的凤阳城内“疫病盛行，凤城日毙数人，沿街逃荒难民倒卧者，触目皆是”。强壮者不甘坐以待毙，挺而走险，“流而为盗”。“抢劫之案，无日无之”，“抢米之案，已成见惯司空”。1898年4月（光绪二十四年三月），饥民携抢三河镇军米，将巢湖水师长龙炮艇折毁。安徽巡抚邓华熙严办了三名首犯，并将庐州知府和合肥知县撤职奏参，“以为从此可以稍挽颓风。詎料不及半月，各地又复纷抢米粮，视法如弁髦”。淮河、洪泽湖里也“极不平静”，五河、怀远、正阳关“则有洋票船被劫”，凤阳府署书启刘某在洪泽湖内“被抢一空”。甚至在凤阳府城内，每天都有抢钱抢慢的事发生。“怀远平峨山刀匪，颇有蠢动之意”。

当时皖北“人人有思乱之心”，只要有人登高一呼，“顷刻即可有事”。整个社会就像一堆干柴，只要有一点火星，就能燃起一场大火。

二、经 过

刘朝栋原是涡阳县丹城集西北刘洪庄人，颈后长一肉瘤，绰号刘疙瘩。身体魁伟，力气过人。他在青町集帮过工，也贩过私盐。经常往来于涡阳、亳州、宿州和永城之间，交游甚广，结识曹市集的牛汝秀、魏得成和酃家集的邵大发等人。

① 袁大化：《光绪戊戌平定涡匪纪事本来》。

② 《冯廷弼家书》，以下引文末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此书。

牛汝秀^①是涡阳县曹市集人，在集上开茶馆为业。曹市集在涡阳建县前属宿州，是当年捻军蓝旗的重要活动地区，也是团练“牛家军”的老巢。牛汝秀与后期捻军著名首领牛宏升、团练头子牛师韩是同族本家，和刘朝栋交谊甚笃。

魏得成是曹市集大魏庄人，其父魏坤是捻军的著名蓝旗首领。

光绪二十四年夏，刘朝栋因“劫案”被各处捉拿日亟，遂于十一月十八日在涡阳县东北之柴村庙，与牛汝秀、魏得成等商量，谋举大事，得到他们的赞同，“反志益坚”。十一月二十六日（1899年元月7日），曹市集“逢集”，刘朝栋等百余人随着赶集的人群“潜布于市”。等到中午集上人正多的时候，“世修（汝秀）突出红旗一面，号于众曰：岁饥无食，吾辈且饿死，刘某起义，何不从之？市人哄然，应声如雷，遂蜂拥而抢盐栈，以次遍及于各肆店。比出街衢，从其后者已六七百人矣”^②。涡阳起义就这样首先由刘朝栋、牛汝秀在曹市集揭开了序幕。

曹市集“揭竿而起”的当天晚上，刘朝栋等人至大魏庄魏得成家聚议。众推刘朝栋为长，制黄布旗，上书“大汉盟主刘”。牛汝秀、魏得成、余盛五等“则共领红旗一队”。关于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考虑到将与清军作战，急需武装自己，于是把有武器的地区定为主动出击的目标。

第二天（8日），刘朝栋等率众再至曹市集，缴获了已故清总兵牛师韩家的刀矛枪炮弹药，并向附近圩寨的富户索枪要马。

9日，起义军北上攻龙山营。龙山在涡阳县城东北25里，原

① 牛汝秀即牛世修，又作牛世秀、牛师秀，此据曹市《牛氏宗谱》和邓华熙《剿办涡阳事件节略》。

② 《涡匪纪实》，赵尔巽全宗第十一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李鹏年《涡阳刘疙瘩、牛世修起义》，见《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

为清军汛地,设有龙山营。该营游击寿右营都司何师程与右军守备秦德荣,先期前往寿州给寿春镇总兵郭宝昌祝寿去了。“署左军守备李鸿标知有匪起,继往寿春请兵”^①。龙山营寨由千总吴有谋、圩长张得馨指挥勇兵团丁防守。起义军攻击两个时辰不下,夜改用火攻,积柴草烧营寨东、南两门,守军不支溃败,遂于日攻克龙山,杀伤敌人甚众。俘虏了重伤的千总吴有谋,击毙外委吴玉阶、队目郜廷杰、李燕隆及圩长张得馨。龙山营的枪械弹药,尽为起义军所得,声势壮大,起义队伍已逾2000人,马亦有百余骑。

起义军攻克龙山以后,接着往攻涡阳县城。知县欧阳霁和绅董王开朗、马骥才等率乡勇练丁固守。亳州威靖营统领张云松、龙山营游击何师程驰援,协同防守。起义军未能攻下县城,遂撤围向北,退踞石弓山、丹城集。随后又分向北、西进军。

北路一支进入河南永城县境,欲往山东与大刀会合,至马村桥,受到归德镇豫军的堵截,乃折而向南渡涡河。

西路于12日进攻义门集。义门集又名庙集,在涡河北岸,商业繁盛,是涡阳县大镇,地当皖豫水陆之冲要。清朝在这里设有巡检司,“极称坚固”。巡检宋超、把总孙传曾率清军与刘思文、刘长太等民团据守。相持半日不下,义军撤回丹城。第三天(14日)复大举进攻,守镇兵丁慑于义军的声威,不战自溃。“寨内伤亡无多”,宋超、孙传曾突围出逃,遂克义门。缴获的物资,“往来搬运,彻昼夜未能尽”。起义军的声势进一步地壮大。

这时涡阳各地纷纷竖旗,聚众起事。涡北马景芳、刘化远、周德怀起于石弓山,孙凌志起于义门集,燕怀军起于燕牌坊集;涡南邵大发起于酆家集,葛怀玉起于西阳集。“旬日之间,啸聚二万余众,大致分南北两股,其势汹汹,焚杀奔驰,几遍涡阳全

^① 邓华熙《剿办涡阳事件节略》,载《安徽史学》1986年第5期。

境”①。“几将为发捻之续矣”②。

三、失 败

涡阳起义的消息，首先是由署宿州知州瞿世琬电告安徽巡抚邓华熙，于曹市集首义5天后递到省城安庆。可是起义军仅几天时间就连克龙山、石弓山、丹城、义门等村镇数十处，使得“皖北各州县以及毗连之江苏徐州、河南归德等，处处震惊，纷纷告急”③。清朝最高统治者也极为紧张，几天之内连发十数道电旨和上谕，命苏、豫、皖及鲁、直等省督抚飞速调兵遣将，合力进剿。皖军寿春镇郭宝昌自南而北，豫军归德镇武朝聘自北而南，苏军徐州镇刘青熙由东向西，三路向涡阳分进合击。

刘朝栋等北路涡阳起义军在攻克义门集后，屡欲东进，都遭到宿州署知州瞿世琬、游击谭新益、陈怀德和在籍总兵王心忠率领的兵勇练丁阻挡。18日又在龙山、张老家两地连被清军所败。刘朝栋等走青町集，与石弓山刘化远、周德怀、马景芳等约定19日晚合攻宿州临涣镇（今属濉溪县）。徐州镇总兵刘青熙恰于“日晡到临”。署山东巡抚袁大化“假归”（故里涡阳青町大袁庄），亦于是日至临涣。他向刘青熙建议：“剿以速为妙，若稍迟滞，则饥民争投掠食，日添千百人，蔓延浸广，势更难图。”④第二天（20日），刘朝栋等率先攻，为清军所败，退至道竹桥。石弓山刘化远等亦赶到，展开激战，“势甚凶勇，枪炮齐发”。清军步队伏夹河东岸丛塚间，“用枪平码向高轰发，击毙

① 邓华熙：《剿办涡阳事件节略》。

② 《涡匪纪实》，赵尔巽全宗第十一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李鹏年《涡阳刘疙瘩、牛世修起义》，见《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

③ 刘坤一、邓华熙、裕长奏折，光绪二十五年正月三十日，转引自李鹏《涡阳刘疙瘩牛世修起义》，见《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

④ 袁大化：《光绪戊戌平定涡匪纪事本末》。

数人，贼众溃散”①。刘化远等退回石弓山，被清军追击攻陷。刘朝栋等西南走青町，尚有5000余众。21日再战又败，几被全歼。

“向之反侧寨垒，各出杀贼自赎，终宵不止，众散殆尽”②。22日，刘朝栋单骑潜回青町，藏匿于圩长刘长太家而被其诱擒，在送往涡阳途中，为龙山游击何师程“飞马要诸城外”，转送至西阳集郭宝昌处。刘朝栋“引颈就刃，略无怯容”③。

南路以邵大发为首，于1899年元月16日在酈家集起义，自称仁义王。当北路刘朝栋等向东进攻临涣时，涡北牌坊集的燕怀军北进，受阻于归德镇武朝聘部豫军而退回，南渡涡河，与邵大发合作。他们欲向凤台、阜阳进发，经花沟、彪狸铺（标里）、孙村店、临湖铺至张村铺。同时涡南各地，纷纷起义响应，孙仲一、赵金郎、冯东鲁起于楚店集，葛怀玉等起于西阳集，李韶、赵紧宗起于李门集，王俊之起于临湖铺，邓怀修起于彪狸铺，袁好文起于阎集。

19日，当邵大发到达陈家圩时，圩长陈庆之佯为欢迎，暗设伏兵。起义军疏于戒备，被杀数百人，邵大发本人负伤，仍指挥拼杀，血洗陈家圩。遂于是晚退向酈家集，途中遭周家圩团练的抵抗，又聚而歼之。

20日，南路起义军分兵四出：冯东鲁由张村铺西出王家桥入阜阳境，至三塔集，破王家寨；燕怀军西出张村铺，破周家寨，由四大王庙攻阜阳；孙仲一由李家桥入阜阳境，破关家寨；邵大发由李门集合葛大玉、葛大祥、刘怀勤等往淝南，22日破冯家寨。

阜阳知县黄家杰率各乡团练，会同清军守备徐振清堵击。起义军战死数百名，北撤急渡淝河，又被涡阳团练击杀200余人。22

① 袁大化：《光绪戊戌平定捻匪纪事本末》。

② 同上。

③ 同上。

日，又在顺河集为团练所败，退入涡阳境高公庙一带。23日，在路家圩杨家寨又连败，“存者十不二三”。

邵大发率众进攻蔡湖东西两圩寨失利，在清军卓胜营高得胜部的追击下，伤亡散尽。同时大发的伤势加剧，遂带领十数人潜避在邵小庄养伤，为族人告发被擒，解送郭宝昌军营杀害。

历时17天的涡阳起义终告失败。起义的其余首领：南路的燕怀军亦是清军擒获杀害的；葛怀玉潜回家携妻扮作难民外逃，经蒙城西郢村为人识破，被捕遇害。北路的孙凌志、李银、周元会等先后战死；牛汝秀延至3月24日在蒙城骆驼铺被捕，解蒙城杀害；余盛五、刘元善等外逃，下落不明。

四、影 响

刘朝栋等领导的涡阳起义，影响并不仅限于涡阳境，淮北颍属各州县也都纷纷响应。

亳州的沙土集、龙德寺等地有程二老闪、王耀青、袁石真、秦冠贤；城父寨有蒋青云、程学礼；杨家集有刘有义；古城集有王今容；立德寺有傅金汤；辛桥集有罗亨潮；泥台店有罗风林。

“亳东南面百余里中，几无一片净土”^①。亳州的起义军一度进入涡境，闻刘朝栋失败折回，于24日夜袭孙家大营，伤亡严重。次日在李家集又为团练所败，起义队伍溃散。首领除程二老闪幸逃，其余均先后被捕杀害。

蒙城有鹿家圩的鹿小贵“与匪暗通，聚众谋趋附”^②。19日（阴历腊八），寿春镇总兵郭宝昌军次蒙城北小涧集探知，亲督营勇两哨入圩查究，鹿小贵被缚送出，谕令附近各圩寨“反正办团”。王家寨的刘成“抗违不散”，复被郭宝昌派队擒获杀

^① 《涡匪纪实》，赵尔巽全宗第十一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转引李鹏年，《涡阳刘疙瘩、牛世修起义》，见《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

^② 邓华熙：《剿涡阳事件节略》。

害。

宿州的五铺、三铺（今均属濉溪县）、丁家圩等地均有聚众“勾结思逞”之人，但尚在酝酿就被宿州勇役捕打解散。吕家楼吕安（一作吕德元）在小濉城东聚众二三百人，将欲起事。24日（腊月十三日）分防濉溪口之署凤颍同知程璧、分汛把总李修勤率团勇擒获吕安、吕庐等15人，余众逃散。“宋町集有从前捻首李德让之子李岂云”，于18日（腊月初七），“宰牛二头、马一匹，聚众约数百人，竖旗起事，推廩生李彦和为首。年家楼有地保之子年小老四，闻亦聚众起事”^①。

五、失败的原因和启示

光绪戊戌的涡阳起义，与40多年前的捻军起义有相似之处，都是由于连年的严重灾荒，首先在涡阳“揭竿而起”，发展迅猛，影响波及颍属亳、蒙、宿各州县。但是，刘朝栋等没有捻军的有利客观条件，即太平天国已在南京建立政权，占领长江中下游和淮南广大地区，牵制了清王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使得捻军在起义后得以从容活动，发展壮大。刘朝栋等的起义孤立无援，而且面对的已是有现代通讯工具和洋枪洋炮的敌人，已非捻军对付的使用刀矛原始武器的清军可比。

敌我双方力量的悬殊，是这次起义失败的主要因素。刘朝栋、牛汝秀在曹市集首义后，皖抚邓华熙接到署宿州知州瞿世琬的“首发电禀”，“即电致凤阳道李光久、寿春镇郭宝昌，派兵驰往，相机剿办”。清廷得到涡阳起义的奏报，对捻军起义的余悸犹在，不敢掉以轻心，急忙连下十数道诏谕，调集苏、豫、皖3省的正规部队，合力进剿，并组织地方团练，在人数武器和作战能力方面，都占有明显优势。反观起义队伍虽发展很快，几天

^① 《冯迁韶家书》。

聚众数万，但“十九皆负耒耜之饿夫”，“饥民冀得升合粟，携响应”^①。如刘朝栋等率众进攻临涣集，败于道竹桥，被清军“杀千余人，其实皆饥民也。饥民狙于龙山之役，闻贼攻临涣，携筐筥蜂拥至，遇道竹桥溃匪，争问将掠某处？犹不知其败也。至是被杀破腹者，所食草具宛然。闻者哀之”^②。“败贼散匿村中，搜出斩首，多褴褛不堪，目不忍视”^③。大量的饥民涌进起义队伍，虽然一时可以增长声势，但既未经战阵训练，又无严密组织，战斗力很差，一经战败，就像决了堤的水一泻不可收拾。所以历史上很多农民起义容易一哄而起，一哄而散。

起义领导之间的争权夺利，自相残杀，造成内部的不团结，削弱了起义军自身的力量，使得起义很快失败。在起义几天以后，刘朝栋和魏得成为争当盟主，发生了内讧。魏得成以自己是捻军蓝旗首领魏坤之子，家有捻军旗帜，应为盟主，便对刘朝栋当盟主不满，不受其约束。刘对魏亦“心颇忌之”。他们之间的嫌隙，为敌人挑唆利用。“三十日北走丹城，圩长王品刚有智略，闻刘、魏交恶，设盛筵中庭，请盟主升座。魏昂首踞上位，品刚率家人罗拜欢呼去。刘忿恨，几不终席。旋请魏议事，手刃魏兄弟三人，自称大汉盟主^④”。这一内讧事件引起其他起义军首领的不满。如丹城附近牌坊集的燕怀军即率众南渡涡河，与酃家集的邵大发合作，是为南路起义军；使得涡阳地区的起义未能形成一股统一力量，而是各自为战，力量分散，为敌人各个击破，导致起义很快失败。

农民小生产者的权利欲和狭隘性，在涡阳起义领导层表现为浓厚的封建意识和严重的报复性，缺乏斗争谋略和远大目标，只顾

① 民国《涡阳县志》。

② 同上。

③ 袁大化：《光绪戊戌平定涡匪纪事本末》。

④ 同①。

眼前。不考虑后果，正如俗语说的“半夜起来做皇帝，快活一时是一时”。刘朝栋在攻破义门集后，将缴获的曹市集已故总兵牛师韩的黄马褂、龙山营游击何师程的皮袍、义门巡检宋超的肩舆，“皆服而用之”，排刀护马，前呼后拥，“俨然王者”。南路邵大发为陈圩团练所赚而受伤，遂聚歼该圩老幼，已属过分；在回鄆家集的途中，又血洗周圩，不分老幼，大施报复。陈、周二圩“死者二千余人，焚烧房屋数千间”，使得“乡民纷纷迁避，数十里中几墟矣”^①。至是，使得一些原来态度暧昧，“心存观望”，“多持两端者”，或隐与起义通的圩寨，“乃大惶，惧其及已，于是互相盟约，以死抵抗”^②，从而壮大了敌人的力量，孤立了自己，加速了失败。结果起义的首领都是被地方团练所擒获，而被清军杀害的。

涡阳起义同时也暴露出清军的腐败情况，“兵无训练，步散马矣，营官多不知兵，徒有利器，不善用之”^③，竟有队官对阵不知发枪者。当起义队伍攻龙山时，“驻亳（州）韩金明带了马队一哨来援（涡阳），因误携枪弹，不战而退”^④。调赴涡阳镇压起义的寿春镇皖军，亦是踌躇不前，“（郭）宝昌始由寿州行抵蒙城之小涧集，惮贼众，不敢进，仅派哨探而已”^⑤；“乃至拔队到蒙，踞贼巢尚七十八里，不敢前进一步，任其煽惑裹胁，愈附愈多”^⑥。所以，与其说涡阳起义失败于清军，不如说是失败于地方团练。清军如此腐败无战斗力，已预示着清王朝的灭亡为期不远了。

① 《涡匪纪实》，赵尔巽全宗第十一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同上。

③ 袁大化：《光绪戊戌平定涡匪纪事本末》。

④ 民国《涡阳县志》。

⑤ 同④。

⑥ 《冯廷福家书》。

捻军传说故事考实

一、前 言

100多年前，爆发于安徽北部的捻军起义，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写下了反清斗争的光辉一页。今年正是她的110周年。我们曾为研究捻军历史，在1958年秋天，到皖北的涡阳、蒙城、亳县3县进行了两个多月的实地调查，搜集到很多捻军的口碑，给捻军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可靠的资料。在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听到许许多多动人的捻军传说故事。我当时也曾想，要是能将如此大量的捻军传说搜集整理出来，定可使我们民间文学的花坛里添开一朵鲜艳的奇葩。现在，可以得到满足了。自谭继安、李东山、母连甫和缪文渭等4同志搜集整理的5篇捻军传说故事，在1959年9月号《民间文学》上问世后，到现在，陆续发表的捻军传说故事将近百篇。而且安徽人民出版社（1960年）和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还出版过捻军传说故事的专集。可见文艺界对捻军传说故事的欢迎和重视。对一个曾对捻军历史作过实地调查的人来说，看到发表的捻军传说故事，总对它有一种亲切之感或一种特别的感情。

从发表的捻军传说故事来看，其搜集、整理工作是分地区（主要是涡、蒙、亳3县）进行的。涡阳是谭继安、牛家琨同志，蒙城是县文联（李东山等），亳县是县文联，进行搜集整理。

工作的。而以当年捻军起义的主要地区涡阳的任务较重。论质量，亦以涡阳为最，蒙城次之，亳县又次之。

评论捻军传说故事的质量高低，主要应该以对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尊重或忠实程度来衡量的。象《闹粮》、《老乐拒捕》、《二老溯》、《龚得卖药》和《正阳关突围》等，就是较好的几篇。其特点是保存了语言朴实生动、形象鲜明和内容风趣等民间创作的特点。但是《撵绵羊》、《长直沟之战》、《陈公豹》、《芦老照送粮》、《李大汉智打盐官》、《瞧病》、《西瓜炮》、《巧战僧妖》和《杀牛庾》等篇，一看就知道不是完全根据口述者的记录整理而成的，情节的虚构，语言的贫乏，再加上大量的形容词，使之失去民间故事的朴实、生动、风趣的特色。

初发表的捻军传说故事，整理的态度比较谨严，也比较忠实于民间的口头创作，因而质量较高，杂志竞相刊载。这说明文艺界和读者对它的重视和喜爱。可是后来有的人便粗制滥造，于是乎东拉西扯、生拼硬凑、张冠李戴等现象都出现了。象《李大汉智打盐官》，就很类似《水浒传》里的“智取生辰纲”。总不于是巧合吧？诸如此类的现象，却不能不是个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作为一个曾对捻军历史作过实地调查者，看到这种现象，不能也不应该缄默不言。于是，便在工作之暇，耐着性子（有很多篇，确实叫人难以卒读）将发表的捻军传说故事统看一遍，边看边记，遂写成了这篇札记似的《捻军传说故事考实》。

二、考 实

所谓考实，即考《捻军传说故事》的传说之实。发表的捻军传说故事很多，时间也不允许我去逐篇的考订。现只能就我所熟悉的选择十几篇，这十几篇在我看来，质量还是比较好的。根据我当时亲听老人们讲述的传说，再参考些资料，把它核实一下。

1.《闹粮》

在张乐行的故里张老家附近，普遍流传这一传说。《闹粮》的情节有虚构的地方，但还是篇较好的捻军传说故事。结尾的民歌：“树叶青、树叶黄，老乐啥晚能回乡，老乐回家望一望，团练牛会一扫光”。不应该是这时候唱起来的，而是在捻军出征淮南时，河南地主武装老牛会乘机到安徽的捻军根据地烧杀抢掠，捻军的家属为怀念出征的捻军而唱起来的。

2.《老乐拒捕》

在张老家确有“林老头在地主袁克俊地里拾红芋，张老乐抱不平，打了袁克俊”的传说。这篇《老乐拒捕》基本上是根据老人的口述整理的。但其中也有与传说出入的地方，即林老头“被打得鼻口出血昏倒地上”，“忽然从人空里走出一个大个子，这人就是张乐行”。其实，林老头挨地主袁克俊打时，张乐行当时并不在场，而是在林老头被打后回到张老家，别人给他出主意，对他说：“去找张三爷①给你出气。”“老乐要是不去呢？”“你这样对他说：‘你到南地里拾红芋，袁克俊不让拾，还打了你，打你的时候你说你是张三爷庄上的。袁克俊说什么张三爷李四爷的，说张三爷多打几下，给你张三爷捎去。’”张乐行原是爱替穷人打抱不平的，再经这“激将法”一“激”，就带了人去把袁克俊狠打了一顿。这篇《老乐拒捕》要是能添进这一段“激将法”，我看会添色不少。

3.《撵绵羊》

18人撵绵羊②的传说，流传的地区较广，最普遍和可靠的说

① 张乐行兄弟三个，长兄张问行，二哥张敏行。乐行行三，晚辈尊称三爷。

② 根据调查，“撵羊”的18人，我们能知道名字的是张德才、杨春、司马永、张德全、张德元、张德明、高瞎子、张双老头、张好、刘亨、张义雅、刘百雅、张荣易等13人。

法，是与贩私盐联系在一起的。《涡阳县志》亦有关于18人撵羊的记载。据传说，撵绵羊共有两次：第一次“撵羊”是张德才等到山东贩盐回来，路过河南永城，见有羊散牧田野，年青人喜欢闹玩，便顺便赶之，所谓“顺手牵羊”。永城那边的人来追，两下口角便动起武来，当然不是张德才他们的对手，就对张德才他们说：“有种，你们下次再来撵。”张德才等一帮年青人又怎甘示弱呢？因而便有第二次“撵羊”。第二次去永城撵羊，与永城的王举人带领的人在一桥上展开激战，结果永城王举人所带的四个教师爷被打死三个，捻军方面刘伯雅掉到桥下溺死。捻子为给刘伯雅报仇，又到永城去把王举人一家杀光。事情闹大，就起事了。

这篇《撵绵羊》，我怀疑它有很大一部分的故事内容是杜撰的，情节是虚构的。引起我的怀疑的是：（1）我听了很多关于撵羊的传说，可都没有提到龙山。从地理上看，河南永城马收集的王举人竟能跑到当时安徽宿州境内的龙山打猎（龙山有何猎可打），这确是件使人不能相信的事情。（2）“撵羊”是以张德才、杨春为首，张乐行并没有参加，可是在《撵绵羊》中却把张乐行也拉出来了。（3）“双老头”姓张，是张老家人，也是“撵羊”18人之一。龙山距张老家25里，他怎会在龙山。而且“双老头”是现在他的晚辈对他的称呼，当时他也是个年轻小伙子，《撵绵羊》中却称他为“双老头大爷”，还带领“年轻人”去找张乐行，不知怎么扯起来的。

4.《火烧袁楼》

在张老家，也只有在张老家，才能听到“火烧袁楼”的传说。传说原很简单：张乐行向袁楼大地主借粮，袁楼慑于捻军的势大，运用缓兵之计，答应3天送到，于是向亳州请调官兵。张乐行派人到公吉寺、大韩庄请来龚得和韩老万，攻打袁楼，火烧袁楼。这里我们可很明显看出《火烧袁楼》的虚构比例很大。并

且还有一处事实的错误，即袁楼“挂过双千顷牌”。在张老家一带确有袁楼挂过双千顷牌，“从雒河集到亳州，脚不踩人家一寸土，口不喝人家井里一滴水”的传说。当我们在调查时初听到这样的说法，也曾认为这是很好的土地集中的典型材料，因而便当作重点，深入调查。最后弄清楚了，“挂过双千顷牌”的事原来是在明代，而在咸丰初年即起义的时候，袁楼最大的地主占有的土地，也不过数顷而已。

5.《杀侯莽》

张乐行杀侯莽的传说，在张老家、吴桥寺一带均有流传。侯莽即侯龙标。《杀侯莽》中说侯莽即侯永清，是错误的，其实侯永清是侯莽的父亲。侯莽住侯集，家有顷把地，也是个“混光棍”的，带领个戏班子，戏班子一到家，就向侯殿清（他家地很多）要粮给戏班子吃。戏班子到那唱戏，只要戏一开台，听不听都要给钱，若是碰到天阴下雨，戏不能唱，地方还得管吃。有一次，侯莽的戏班子到张老家附近的太清宫唱戏，正好碰到阴雨，这一来太清宫的和尚可慌了，于是去找张乐行。张乐行到太清宫对戏班子的“领班”说：“不准在这唱戏。”戏班子的“领班”便跑去告诉侯莽，侯莽一听是张乐行不叫唱，便不敢唱了。双方便生了嫌隙。后不知因为什么，张乐行趁侯莽防范松懈，带人到侯集把侯永清、侯莽父子杀掉。据说“要是侯莽不被张乐行杀死，又那能显出侯士伟来呢？”

据老人说，侯永清、侯莽父子俩，在地方上仗势欺人，不得人缘。但也都说张乐行杀侯莽是由于“争光棍”。在捻军资料《豫军纪略》中侯龙标亦被列在初期捻军首领之内。看来张乐行杀侯莽的性质问题，还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最后要特别指出《杀侯莽》里一处张冠李戴的地方。我想这

篇捻军传说故事的整理者谭继安同志在安排情节时大伤过脑筋，就是张乐行与侯莽的冲突焦点何在呢？于是乎就把“米老头卖媳妇”的传说应用上，把侯莽变成人贩子。这样一来，冲突的焦点就有了，故事也就好收场了。其实，“米老头卖媳妇”的故事，与侯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米老头卖媳妇”的传说确实是有的，我在调查时也听到过，内容与此完全相同，但只是说明咸丰初年淮北的灾荒严重，到处卖儿卖女，人价极贱，人贩子到处活动的情况，与侯莽是毫不相干的。

6.《正阳关突围》

“大捻子被困正阳关”或“老乐被困正阳关”的传说，在今之涡阳县流传颇广。这篇《正阳关突围》，基本上是根据传说整理的。当然，其间也免不了有添油加醋的地方。但它在发表的捻军传说故事中还算是比较尊重口头创作的。传说的捻军正阳关被困的时间和过程，与史实亦大致符合。

1857年6月（咸丰七年五月），捻军进入正阳关，“留韩狼子守关”，张乐行、龚得等赴霍邱联合李昭寿、薛小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当时正是“大雨时行，河流涨发”之时，“距关十里悉巨浸”。清军又跟踪而至，捻军逐被围在正阳关内。8月下旬，张乐行、龚得、薛小等赴援正阳关，行至中途，清军乘机攻陷霍邱，龚得便去六安，张乐行遂进守正阳关。9月12日，“东北风暴作，大雨如注，六安山中蛟起，淮河两河骤涨”，张乐行亦被困在关内，“食将尽，割驴马杂野菜食之^①”。9月18日，李昭寿自六安率增援部队至，捻军遂突围去六安。

当然《正阳关突围》的传说也有不尽符合史实的地方。（1）《正阳关突围》把龚得也放在关内，就与事实相左。可是我倒听到过这样的传说：“老乐被困正阳关，龚瞎子不好好地打。那

^① 引文均见《豫军纪略》。

时龚瞎子已在六安安了民。后来还是孙老葵（即孙葵心）带人打败了胜保，解了正阳的围。”^①这个传说就说明龚得甚至整个白旗都不在关内，因为孙葵心也是白旗。（2）捻军被困正阳关时，派人到六安向太平军请援，不是向英王陈玉成，而是向忠王李秀成。因为当时太平军在六安的将领正是李秀成。至于资料中所说赴援正阳关者为李昭寿，与传说中的太平军倒并不矛盾。因为李昭寿投顺太平天国后，即为李秀成的部下。所以说，这篇《正阳关突围》的捻军传说故事是有它一定的史料价值的。

7.《龚得起手》

龚得的学名龚道才^②，“得”是小名，是涡阳西南公吉寺磨盘松（村名）人。公吉寺一带，姓龚的是大族，号称“九里十三龚”。

这篇《龚得起手》，创作成分较多，不能算是根据老人的口述整理的。这一传说的本身，就有一些不可靠的地方，如龚得到龙山入捻。传说确有这样说法，但它的可靠性是值得考虑的。因为捻军起义时，各旗首领都是在当地聚众起义的。即使是有这样的事情，龚得也不会跑到离家60多里地的龙山（龙山当时是黑旗郝风清、王万全的领旗地区），而不到离家较近（30多里）的张老家张乐行那里去，这也是使人难以理解的事。

8.《杀张胜张可》

涡阳公吉寺一带，龚、张二姓是大族，因而龚张两姓械斗私杀的事情是层出不穷的。从这篇《杀张胜张可》中可看得出来。传说张胜、张可是赌棍。关于龚得杀张胜张可的传说很多，“异文”也很多。就拿张胜、张可来说，就有“张龙、张虎”，“张

① 据吴桥集吴士楼侯怀德说。

② 据公吉寺龚姓老人说。

德、张可”、“张尿、张可”等几种说法。但异文也都有共同之处，即张胜、张可“撩”了龚得的娘，龚得是个孝子，为替他娘报受辱之仇，还认了张胜、张可为干老子。有一次，张胜、张可在孔寨赌钱，龚得便带领龚小寡、瞎眼狼（姓龚）、龚世全、马全、李天洞、神棍张谈等共7人，到孔寨把张胜、张可杀掉。

但是，象《杀张胜张可》这样的传说，我倒没听到过，我怀疑它可能又是一篇创作。既然这篇《杀张胜张可》是根据马修心的口述整理的，那么，我也把我1958年访问马修心的记录抄在下面：

……龚瞎子的娘挨张德、张可骂了一顿。龚瞎子回来家，他娘就向他哭诉。瞎子便向他娘说：“娘，别哭，我给你老人家报仇。”他娘说：“等你给我报仇，我骨头都上黄锈了。”瞎子说：“你别看小官没有马骑，可阴沟里也能翻船。”后来，瞎子便托人说事，认张德、张可为干老子。有一次，张德、张可在孔寨赌钱，龚瞎子就带人到孔寨去杀了张德、张可。

马修心是公吉寺附近的马庄人，75岁（1958年）。记得我去访问他的时候，是在村子外面找到他的，于是我们就坐在田边的路上谈起来。

9.《打高公》

在捻军首领中，龚得是以足智多谋著称，民间关于龚得的偷营摸寨的传说特别多，传说最多的就是龚瞎子打高公庙。传说：龚瞎子的事情闹大了，高公庙的杨官（即杨锡山，绰号杨杂碎，群众喊他杨驴熊）便派人南捉北拿，杀了很多。当时龚瞎子不在家。等到龚瞎子从河北（指涡河北）张老乐那里回来，到邓老庄他干爹邓老欢那里，邓老欢便把高公庙杨驴熊捉拿他的事告诉他，龚瞎子便带领18人去打高公庙杨官。龚瞎子先在白天装扮成

个卖茶的到高公庙的清兵驻地卖茶，一边卖茶，一边还招呼着：“你们可都注意啦，龚瞎子会摸营。”趁清兵不注意的时候，就将茶往炮眼里浇。到了夜间，龚瞎子就与邓老欢、吴老坡、丁向、盛伦、朱茂、朱匡、马长毛、王黑、牛穗子、何老宰、侯旺、龚豁子、祁盖（绰号三个半葫芦——七盖子）、龚旺、龚耀、阚小炳等18人，去摸了高公庙杨官的营。清兵的炮都打不响。因而当时便流行了这样的歌谣：高公庙两头亭，当中坐个杨驴熊，绅士两厢劝不走，单等瞎爹来摸营。

将上面的传说与这篇捻军传说故事《打高公》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打高公》的虚构和夸张的地方。而且从《打高公》中的一些语汇来看，也不给人以真实感，如：“乡亲们回去吧，我一定打开高公庙，活捉杨驴熊，替老少爷们报仇。”“龚得要打高公庙，活捉杨驴熊替百姓报仇。”等等。这样的话，竟能出自100多年前的古人之口，怎能叫人相信呢？

10.《浍河桥摸营》

1856年7月（咸丰六年六月），清廷派顽固派的崇安到安徽“剿捻”。崇安由河南进入安徽。由亳州向东，一路逢人就杀，连欢迎他的地主豪绅，都被他杀掉。不但人民恨之切骨，就连地主士绅对他也有“难言”。崇安追捻军张乐行等至临涣集的浍河桥，捻军来个回马枪，大败崇安。因而捻军浍河桥大败崇安的英勇战斗事迹，便流传下来。记得我们在涡阳张老家、曹市集调查时，曾听过这类传说，但都三言两语，过于简略。

这篇《浍河桥摸营》不是完全根据口述整理的：

（1）有些地方，在很大程度上它是由文字资料转变而来，只要把《浍河桥摸营》与《涡阳县志》的文字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痕迹来。

《浍河桥摸营》：

咸丰五年的春天，各路捻子在蒙城贡生郑景华、李士钰的串连下，齐聚雒河集，公推张老乐为大汉盟主，龚得为军师，杀猪宰羊，祭告天地，宣布信条。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五色正旗以外，又分五五二十五色边军旗。另外还有大花旗、小花旗、八卦旗等等。

《涡阳县志》：

（咸丰）六年正月，蒙城岁贡郑景华、李士钰谋于捻众，尊乐行为盟主。乐行乘肩舆至雒河集。祭告天地，宣布信条。旗分五色，以正镶递推递广，又有八卦、水花等名目……

（2）语言也不符合口述者的口吻。如“弟兄们！今天是我们杀崇安，替穷爷们报仇的时候”，龚得看看大家的劲头鼓起来了”，等等，倒很象是现在部队里的政治指导员在作战以前所作的动员报告。这样的话，出自龚得之口，就使人觉得不真实。

（3）“曾国藩献计”一段，显系虚构，且不用说它。奇怪的是怎么会把曾国藩也弄出来，看了不禁哑然失笑。因为那时曾国藩正在长江以南与太平军作战，怎么会在北京向咸丰皇帝献计呢？

根据以上三点，我有理由说《浍河桥摸营》不是完全根据老人的口述整理的。

11.《打清江》

清江浦原属江苏淮阴县，在今清江市北，是清朝河道总督的驻地和漕运的中心，为当时苏北重镇。其繁华富庶可以想见。1860年2月，捻军张宗禹等部神速地攻下清江，据《涡阳县志》说：“各载宝而归，雒河商人有转鬻以致富者。”至今涡阳特别是张老家一带的老人，还都如数家珍的乐道捻军打清江的故事。这篇《打清

江》基本上是根据张安民的口述整理而成。我也曾亲听张安民讲述过。不过，从史料价值（指传说）上着眼，我当时对张安民讲述的捻军传说，是持怀疑态度的，因为：（1）他是张乐行的近门后人，调查捻军事迹的人，一定都会去访问他，久之，他从访问者方面便听到很多捻军的事迹。（2）他的文化程度不算低，时常看县志和一些现代著作，获得历史知识。（3）年龄不大，只50多岁，所述捻军传说为间接又间接。因此之故，他所述说的捻军事迹，往往是把口头的传说与文字的记载混杂一起，使人莫辨。

按照我们从调查中得来的经验，老人们碰到年代和反动家伙的名字，是不大记得清楚的（事实上也很难记清楚）。这篇《打清江》里所提到的“两个大官”联英和庚长，却是实有其人。联英在1860年做过3个多月（2~5月）的代理漕运总督。庚长自1856年2月9日至1860年6月24日做（南）河道总督，驻清江浦。捻军打清江时，驻清江的河道总督，正是庚长。就这一点，我怀疑他（指张安民）不是得自传说。

作为一篇民间故事，我认为《打清江》在发表的捻军传说故事中间还是比较好的。

12.《杜金蝉》、《金豆子》

关于杜金蝉的传说，我们只在张老家听张乐行的近门张本治、张羹才和张安民讲述过。据他们说，杜金蝉原是张乐行的丫头，后来收了房。在周天爵向张乐行劝降时，她曾劝过张乐行不要降清。另据《涡阳县志》说捻军正阳关突围后去六安，在捻军成员中产生“归农”之议，杜金蝉便对众人说：“‘主人（按，指张乐行）初无意做白头贼，诸堂主（按，应作趟主）强推以为盟主，骑虎而又欲下之，可乎？今日之事勿庸多言！’众感动，议遂寝”。从这我们可以知道杜金蝉确是一位头脑清楚的很有才能的妇女，对张乐行确起了“内助”的作用。

《杜金蝉》是把传说加水溶解，使其膨胀，加上夸张的手法，创作成的。就连另一篇关于杜金蝉的捻军传说故事《金豆子》，我对之亦有怀疑，因我没听到过传说，不便妄下断语。但结尾的几句小唱：“杜金蝉真管谈，五色豆子五色线，又记兵又记将，又捆清兵拎着玩。”我怀疑是现在人编的，至少它在张老家决不流传。我们调查捻军在张老家待的时间最长，可从没听过这样的小唱。

13.《胡椒大王》

“胡椒大王”是涡阳县龙山南四五里的大王庄人，他的名字据《涡阳县志》说，叫王万一，黑旗首领。可是他的后人大王庄的王德才、王德和却都说他叫王万全。我想还是他的后人的说法，较为可靠。王万全，人很矮小，象个辣椒，别人便送他“胡椒大王”这个绰号。另外，大王庄还有个黑大个王万×，绰号“火头大王”。

在龙山一带，关于“胡椒大王”的事迹，传说最多的是“胡椒大王围焦楼”和“胡椒大王在龙山被杀”。这篇《胡椒大王》的口述者焦法贤，就住在焦楼，我也曾访问过。他对我讲述的就是“围焦楼”和“被杀”，但关于“打虎入捻”、“火烧龙山”，倒未听其提及只字。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从焦法贤的嘴里能把《胡椒大王》说得如此之好，确实难得。因为，无论是从他（指焦法贤）的思想或是从当年焦家与“胡椒大王”的关系来看，都是不能使人相信的事情。而且，发表的《胡椒大王》与传说中的胡椒大王判若两人，似乎是过分的美化了。

龙山在淮北平原上确算是座山，要是放在淮南，不过是一个土墩而已，即使是在100多年前，龙山也决不会有虎。没有虎，怎么会有“胡椒大王打虎入捻”的故事呢？这确使人生疑。

苗沛霖是安徽凤台人，是一个以团练起家的地方武装势力头

子，太平天国、捻军、清政府三方面他都投靠过，也就在军事投机中扩大了他的势力。苗沛霖在1857年以前，也即在他投清以前，未曾到过涡阳。即便是在1857年以后到今之涡阳攻打捻军，也没有到龙山。那么，苗沛霖“火烧龙山”的事，是为讹传无疑。

14.《张五孩》

张五孩即张琢，是张乐行的二哥张敏行的第五个儿子，故叫五孩。在捻军中是一员骁勇善战的猛将，民间关于他的英勇作战的传说颇多。这篇《张五孩》是忠实于传说的，但我对之还有生疑的地方。张五孩是捻军的一员勇将，但不是个单独带兵、独挡一面的将领。捻军初起他在张乐行、张敏行左右，后期他又跟随其族兄张宗禹南征北战。不但“张乐行带着几十万捻子去打正阳关，家中就留张五孩带有百十个捻童看家，守住雉河集”这件事不可信，而且内容的本身也有矛盾。既然是张五孩“守住雉河集”，怎么接着又说：“这天五孩带着捻(童)正在义门集西头操练。”请问义门集(又名庙集)在雉河集西北45里，且义门集是黑旗刘狗、刘尿和八卦旗杨心泰的领旗地区，守雉河集怎么会守到义门集去了。这可能是个疏忽。

15.《二老渊》

《二老渊》的原稿在民间文学发表以前，我就有幸先睹。当时我正在写捻军人物传，写到刘狗、刘尿时，关于他们的籍贯，我只能断定不是义门集。看了《二老渊》原稿，证明我的推断不错，并使我得出他们是山东滕县人，是在1846年(清道光26年)逃荒到义门集的。

传说：刘狗弟兄四个，都是“光腚猴”，穷得弟兄几个伙穿一条裤子。从小在河南①四桥口看桥，后来在涡河码头上当“马

① 指义门集的涡河南岸，义门集在北岸。

腿”^①。刘狗、刘尿哥俩很有劲，在码头上成车的柴禾，一人能扛一车。起手是到北边去抢大盐，后来人慢慢地多，就起事了。起事后，刘狗住张小庄，又筑了寨，改名为张寨；刘尿住邓楼；老三住十里庙^②；老四住许圩子。老三和老四还未铺搭开就死了。刘狗、刘尿的性情暴躁，人都怕他，他俩到义门集一进茶馆，原来象鸭子窝一样的茶馆，一下子就变得鸦雀无声。刘狗、刘尿后来被清兵逮住，绑在义门集桥桩上，先挖去眼睛，后抽肠死的。

《二老渊》基本上是根据高元勋的口述整理，但也免不了有虚构和夸张的地方。高元勋住义门集河南邓小街，1958年我去访问他时是87岁。高元勋的父亲高心田12岁（1853）参加捻军，在刘狗跟前牵马买菜。高元勋所知道的刘狗事迹，都是听他父亲说的，比较可靠。所以说这篇《二老渊》不仅是篇好的捻军传说故事，而且还极有史料价值。

16.《神海蜷》

张岳先是张老家人，与乐行同族，善吹“唢呐”^③，在张老家便有关于他的神话般的传说。据说张岳先的“唢呐”能指挥马队作战，能使敌人的马队闻声逃散。在与敌人的马队作战时，就凭他的“唢呐”便能取胜。但在一次与僧格林沁的骑兵作战中，他被清兵逮住，带他去见僧格林沁，他没有隐瞒自己身份，并说善吹“唢呐”。僧格林沁就要试试他的技能，命令摆开马队，要他当场“表演”。只听张岳先的“唢呐”一响，僧格林沁的马队就“炸”开了。僧格林沁没有杀他，又弄了些酒菜给他吃，还给他些银子，把他放回来了。

① 即搬运工人

② 距义门集10里。

③ “唢呐”可能就是“喷呐”，老人将“唢”读白为“喷”。

可是这篇《神海蜎》与原来的传说相去甚远。但也可能它是根据传说，发挥想象能力创作出来的。我所听到的关于张岳先的善吹“唢呐”的传说，也就是这篇《神海蜎》的口述者之一张本志讲述的。所以，我怀疑《神海蜎》不是完全根据口述整理的。

17.《牛丙砸盐店》

1899年，涡阳爆发了牛世修①、刘疙瘩领导的农民起义。起因是由于清政府的食盐垄断政策，“官运派消，店夥恃财凌人，时以运盐短少，勒令车户加倍赔偿。车头牛师秀积不能平”②，遂于1899年1月17日（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牛世修、刘疙瘩等打毁曹市集官盐店，竖起义旗。接着牌坊集、众兴店、鄆家集、楚店集、临湖铺、彪狸铺等地皆有起义响应。但这次起义仅坚持17天（1899年1月7日—23日）就被清政府镇压下去。这篇《牛丙砸盐店》就叙述了牛世修、刘疙瘩初起义时打毁曹市集官盐店的情况。纵然，这次的起义，也是打的五色旗，刘疙瘩也自称“大汉盟主”，但人们不称它为“擒军”，而称之为“刘疙瘩起义”。

应该指出，《牛丙砸盐店》中有一处错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六日，清政府要在蒙城将牛丙斩首……监斩的安徽巡抚邓华熙把牛丙提出监狱……突然平地冒起一道虹光，顿时狂风大起，飞砂走石，天昏地暗，对面看不见人。人们都被刮得闭眼抱头朝外跑，巡抚和刽子手被摔死在地上。”且不问牛丙在蒙城斩首，安徽巡抚会不会跑到蒙城监斩？就“巡抚被摔死”一事，我觉得甚为离奇。虚构和夸张在文艺作品是被允许的，但也要有个限度，总不能夸张到连事实都不顾的程度。为了证明安徽巡抚邓华熙不是在蒙城“被摔死”的，可以看看他的简历：邓华熙，广

① 牛世修，又作牛世秀、牛师秀。《曹市牛氏支谱》及《剿办涡阳事件节略》均作牛汝秀。

② 民国《涡阳县志》。

东顺德人。1896年8月17日，由江苏布政使升任安徽巡抚。1899年11月13日，与山西巡抚王之春对调。1900年3月14日，又由晋抚调为贵州巡抚，直至1902年1月1日病免。

三、注“注解”

注解，一般是为帮助读者理解文意，这就要求注解，务必力求正确，却不可以强不知以为知或想当然地去注解。但捻军传说故事中的注解，有一些是勿须注解的，如“郎中”、“当家的”、“印子钱”等。可也有些是注解得不确切或注解错了的，我把它重注于下。

1. 盐巡

原注（见《火烧袁楼》注②）：清朝管理盐务的官吏。

重注：盐巡是民间对辑查私盐的巡勇（或称巡丁）的简称，它不是“管理盐务的官吏。”

2. 鏊子

原注（见《双座山》注⑤）：是皖北烙饼的器皿。

重注：鏊子为北方烙“煎饼”之平锅。把鏊子解作器皿，是不恰当的，按“皿”系指盘盂之类的盛器。

3. 正阳关

原注（见《正阳关突围》注④）：在安徽淮南，是捻军当年在淮南作战的要地。

重注：正阳关又名凤关（凤阳常关所在地），位淮河南岸，今安徽寿县境内。

4. 咋安眼

原注（见《正阳关突围》注①）：淮北土语，即咋安排。

重注：“咋安眼”一语，淮南亦有，但因淮南语言中无“咋”字，便说成“怎安眼”，按“咋安眼”应为“怎么得了”、“不能就算了”之意。就《正阳关突围》的原文来看，亦非“安排”之意。

5. 海蜗牛

原注（见《打高公》注③）：又名海丝号，是清朝的一种乐器，可以传达驻军、攻击等命令。

重注：捻军传说故事中所说的什么海蜗牛、海蛎、海丝号，就是海螺，捻军用作“军号”。海螺不是乐器。在清朝的乐器中亦无之。

6. 一锅

原注（见《张宗禹大闹高隍庙》注⑥）：是指“牌九”四方子，三十二张推完为一锅。

重注：推牌九所说的“一锅”，系指钱数而言，比如说100元一锅，庄家的输钱数目即以100元为限，即使“一条子”牌九输掉1000元，庄家亦只拿出100元“赔款”。赢钱诸家按“点子”的大小（不是多少）为序，取得“赔款”。若是因点子小，虽赢而得不到“赔款”的，叫做“喝水”。

7. 归德府

原注（见《红胡子绿眼睛》注③）：今河南商丘市。

重注：归德府是现在的河南商丘县，而非商丘市。两下相距约十里，非为一地。

8. 官盐店

原注（见《二老渊》注⑥）：清朝设有盐防、巡盐、盐店控制百姓吃盐，从中剥削。

重注：清朝的食盐垄断，采用引票，凡商人向政府认销的“引盐”，即为官盐。所谓官盐店，不完全是指政府经营的盐店。

9. 代刀的师傅

原注（见《老锤手与苏天福》注①）：回族中管理屠宰牛羊的人员。

重注：即指阿訇。按将阿訇说成是“回族中管理屠宰牛羊的人员”，是极为不当的。

10. 巴图鲁

原注（见《西瓜炮》注②）：即清将称兵，谓小子们。

重注：“巴图鲁”为满语，意即勇士。清朝将“巴图鲁”作为勇号，赐给有武功者。

四、对搜集整理擒军传说故事的意见

发表了擒军传说故事，若是按擒军的旗色来分一下类的话，就可看出属于黄、蓝、白3旗者居多，而属于红、黑、花3旗者仅《侯趟主大败挡牌队》、《二老渊》、《胡椒大王》等数篇而已。但这只要到涡阳吴桥寺北侯老郢及其附近、义门集北的下张桥和河南永城的苏家楼，就不难搜集到红旗趟主侯士伟、八卦旗旗头杨兴泰和黑旗首领苏天福的传说。再就黄、蓝、白3旗来看，其搜集的面也不够宽，仅是集中于张乐行、任柱、龚得3人。张乐行、龚得是初期擒军的重要首领，任柱是后期擒军的主要领袖，有关他们的事迹的传说，流传下来的自必会多些。但黄旗除张乐行外，还有几个著名首领如张敏行、张振江、张宗禹的传说也很多，特别是后期擒军的主要领袖张宗禹的传说更多，如张宗禹之参加擒军、擒军失败后关于张宗禹的下落等传说，若能搜集整理出来，均可列为擒军传说故事的佳品。蓝旗除后期主要领袖任柱以外，关于韩鼻子（韩老万）、山猫（刘金鼎）、饿狼（刘永敬）、小白龙（刘天台）等初期著名首领的传说，也可进行搜集，只要到涡阳的顺河集一带就可搜集到。白旗除龚得以

外，另两个著名首领江台凌、孙葵心的传说也不少，这要到涡阳江集江老家和孙集一带，才能搜集到关于他俩事迹的传说。

搜集擒军的传说，根据我们从擒军调查中得来的经验，如要调查某一擒军人物的事迹，只有到他所居住的村庄及其附近的村庄，得到的传说才比较确切、可靠。比如调查张乐行就需要到张老家；访问任柱的事迹，就要到蒙城的坛城附近。在访问老人时，特别重要的事情，是要做详细、忠实的记录，千万不能只记个故事的梗概，留待整理的时候加工。擒军的传说，“异文”很多，几乎同一内容的传说，很难听到相同的说法，即是同一个人说两遍也不会完全一样。这是民间口头创作的特点。这也就要求我们对待异文要予重视，应该也必须把听到的异文都记下来，到整理的时候，再决定取舍。

整理要慎重从事，要对原始记录予以特别尊重，切忌刀砍斧削、大肆删节的改头换面做法，免得把原来的传说故事弄得面目全非。这种现象，在发表的擒军传说故事中倒不是罕见的。但也不是说对老人口述的记录，就一点也不能改动了。既然是整理，就意味着不仅要对口述的记录进行除芜存精、去粗留细的工作，而且还必须对情节和语言，做一番适当的安排（不是虚构）和必要的修饰。这是变口头传说的素材为供人阅读的成品所必经的加工过程。

擒军传说的内容，多为擒军人物的活动事迹的片断，如关于张乐行的传说就有《闹粮》、《老乐拒捕》、《火烧袁楼》、《双座山》，等等。这些片断，既可以独立成篇，也能将几个片断（属于一个人的）缀合成一篇。人民文学编辑部就曾将《闹粮》、《老乐拒捕》和《双座山》等三篇，辑为一篇，题名《张老乐》。

篇幅的大小，应该取决于擒军的传说本身，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这应是最简单的标准。但是，擒军传说故事并未能完全做

到这一点。本来三五百或千把字就可写完的，却总要加水使它膨胀，拖长到千字或两千字以上，结果，变短小精干为冗长松懈，实为可惜。我很希望捻军传说故事能象太平天国传说故事那样，篇幅不求其大，而求以精。

正因为捻军的传说内容，多为捻军的活动事迹，这就要涉及史实。所以，这就要求整理捻军传说故事者，具备一些历史知识和熟悉捻军的历史，必要时还需要查阅些资料。根据我们的调查经验，老人对年代、地名、人名是不大记得清楚的。老人对人名多记姓和绰号，如周大人（周天爵）、陆大人（陆希湜）、杨驴熊（杨锡山）、大老渊（刘玉渊）、胡椒大王（王万全）、山猫（刘金鼎）、饿狼（刘永敬）、小白龙（刘天台）。从老人嘴里说出的地名，更是音差字错，往往需从声音的近似去推定，如将湖北的松子关说成生死关，江苏的赣榆说成盖县或赣县^①。诸如此类的问题，就要靠我们对捻军历史的熟悉或者是靠资料帮忙。若是碰到一些历史上的不懂问题，宁可手劳，查查资料，切勿强不知以为知地揣测行事，免得闹出将“巴图鲁”解释成“清将称兵，谓小子们”的笑话。

也可能正因为我对捻军传说故事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便对之特别喜爱，总希望它能完美无缺，就对它挑剔起来。但我对民间文学又是外行，总不免要说了些外行话，或有错误的地方，尚希捻军传说故事的整理者和读者不吝指正。

附记：此文写于30年前，刊载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的《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五辑（1963年），是从内容上揭示捻军传说故事整理中的弄虚作假问题。近又见陆志成《略论捻军故事整理中的语言》^②一文，是从语言方面指出捻军传说故事整理中的胡编乱造，“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类文字，听腔就不像”，即在语言

① 据老人说龚得死在湖北生死关，任柱死在山东盖县或赣县。

② 陆志成：《漆园斋论稿》，安徽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260—262页。

方面失去了民间文学的本色”。并将其归纳为六种“表现”：偷梁换柱，乱删乱砍；空喊口号，空头说教；空洞无物，牵强附会；名为搜集整理，实则大抄史料；改白话为文言（说作曰、信为函）；混淆史实，不辨真伪。

陆文最后写道：“擒军起义故事的采集和整理，在人文历史科学等方面具有深远的意义，一个严肃的认真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对自己的工作性质和内容应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起码要严格划清整理、改旧编新再创作的界限，不可把它们混同起来。至于东拼西凑，改头换面，名为整理、实则抄袭的行径，就是文风和人格的优劣高下的问题了。盗名窃誉事小，搅乱民间文学事业事大，应引为重视。

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既要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又要忠实于原作的艺术形式。但为实现这两点，最关键的还是要忠实于原讲唱人的语言’（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语言的重要性也就在于此。”

捻军歌谣真伪辨

历史传说故事、歌谣虽然属于民间文学形式，但如果所述是历史上的真实事件、人物事迹，又当被看作是口碑资料即口述史料。作为文化的精神产品，亦同物质产品一样，一旦走俏畅销，就不免会出现假冒的赝品。我对流布的捻军故事、歌谣，都有这种感觉。如鲠在喉，以吐为快。先是写了篇《捻军传说故事考实》的小文，从史料的角度肯定其价值，同时也指出不足之处。现再属文辨析捻军歌谣的真伪。

一

民间文学形式的传说故事与历史的关系，犹如戏剧中的历史剧与历史的关系一样，是个有争论但意见又难以统一的老问题。文学之与历史不同，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过，无论何种文艺形式，既然是同历史挂起钩，就不应违背重要历史事实。尽管文艺可以虚构些情节，但却不能夸大渲染到失真的地步。基于这种观点，我写了《捻军传说故事考实》一文，指出其中有不少胡编假造和夸大失实之处。就在刊载拙文的《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第五辑上（民间文学研究会编，1963年），又见到《民间文学》编辑部吴超的《阜阳地区捻军传说歌谣的搜集和整理》一文。他

于1962年11月访问安徽淮北，先后参加“阜阳专区民间文学工作座谈会”，涡阳、蒙城、亳县3县的“捻军故事歌谣搜集整理工作座谈会”。文中提到传说和历史的关系到说：

据史学界一些同志的反映，他们一方面肯定了已出版的捻军传说故事、歌谣集子的成绩，无论是供作读物，供作历史研究参考，都有很大好处。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出版物中的缺点：一、假造；二、错误；三、夸张太大。说史学界同志下去时，听到的都是八九十来句话，而整理的人一发展就成几千字的了，故事一半真一半假，一些人物、年代、历史事件的性质都搞错了，甚至把一些不是捻军的东西当成捻军的东西整理。如把光绪年间、宣统年间农民暴动的事，当成捻军故事搜集整理；把地主团练苗沛霖和清军作战的故事，当成捻军故事，把地主团练编的歌，当成捻军歌谣；把捻军的叛徒当成英雄等。由于历史知识的缺乏，有时在人名、地名、时间、称谓的注解上搞错了。如把清廷赐给有武功者的封号“巴图鲁”（满洲语），意即勇士，解释“清将称兵，谓小子们”；把民间对缉查私盐的巡勇（或称巡丁）的简称盐巡，解释为清朝管理盐务的官吏的名称等。有的故事又好像是根据史学界下去调查的史料编写的。

对于来自史学界同志的这些批评，不少搜集整理者反映是：一来认为民间故事是文学作品，本身就有虚构，有夸张，不是历史文献，故事中反映的东西并非有可考的才能存在；二是认为自己是本地人，同故事讲述者同喝一个涡河的水，熟悉本地风俗、语言，经常和故事讲述者打交道，互不拘束，听的比搞史学调查的多，又是按“忠实记录”的要求记录故事，能记下的也比搞史学调查的多，并不都是八九十来句话，碰到会讲的几天几夜也讲不完。但是，大家都感到在搜集工作中，如何正确处理传说和历史的关系到，的确是一个

问题。

此处所说的“来自史学界同志的这些批评”，应是将拙文《捻军传说故事考实》亦包括在内；“搞史学调查的”，无疑是指我们在1958年的那次捻军调查。对此，我还必须说明几点：

一、捻军故事、歌谣搜集整理者认为自己是本地人，熟悉本地风俗语言，听的比搞史学的多。说这话的人可能不知道我们那次捻军调查的5个人都是生长在淮河两岸，有的就是当地人，对涡、蒙、亳一带的风俗语言并不陌生。至于说到“忠实记录”这一点，自诩是能做到，但捻军故事的搜集整理者却未必能做到。不然的话，为何“事后当报刊编辑、历史研究者去信（向他们）索取原始资料时，已找不着了”呢？实际上没有原始记录，以“找不着”为托词。

二、根据我们的调查经验，调查到的多为捻军初起的事迹，且是以人系事，并有很强的地域性。一个捻军首领的事迹，流传的范围，大都仅限于其所居及附近村庄。就连张乐行这样著名的捻军人物，离开张老家周围，纵然他的名字还都为人所知，但对他的事迹却语焉不详，其他人就概可想见了。在访问的故老中间，确有能述说捻军遗事传闻几天几夜的人，但为数不多。不过，其讲述的一个事件，亦只是百十来句而已。这样熟知捻军掌故的老人，我在调查中只碰到一个，就是涡阳县吴桥寺附近吴（武）土楼的侯怀德，时年84岁，熟知捻军各旗主要首领的事迹。他的父亲侯霞昌是红旗捻军小旗头，捻军失败后还做过圩长。侯怀德本人是个会织布（俗称机匠）的手工业者。他之熟知捻军事迹，一方面得之家传，一方面是由于职业的接触面广。我曾三顾其茅屋，每次去都见他在当门而放的织布机上劳作，我就倚门而坐，听他讲述，中间偶而夹进一段歌谣；间或我也提示，以核对记录。他的记忆力令人吃惊，如谈捻军被困正阳关103天，张乐行牺牲（他说成“塌驾”）后，张宗禹在五月十三日回来过

一趟，就到处面去再没回来。这都与史料记载的时间大致不差。

二

捻军歌谣之刊布，始于1957年，先捻军传说故事见诸报刊。最早是在安徽省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辑的《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6号上，刊载了杨立现搜集的捻军民歌39首。接着1958年历史研究室捻军调查组搜集整理的捻军民歌41首，发表在《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6期。之后，报刊上便陆续出现捻军歌谣。1961年，先后有安徽人民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两本《捻军歌谣》集。据1962年阜阳专区民间文学工作座谈会上的统计，捻军歌谣有600多首。实际上它是夸大了好几倍的数字，因为这中间有很多是重复发表的。就以安徽和上海出版的两本《捻军歌谣》集而言，前者201首，后者212首，重复之处甚多，且又多是在报刊上发表过的。

综观已经刊布的捻军歌谣，可知有人以整理为名，行作伪之实，弄虚作假，用粗制滥造的赝品“鱼目混珠”，较之捻军传说故事有过之而无不及。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1962年3月23日《安徽日报》上发表的《新发现的捻军歌谣十二首》了。署名是合肥师范学院历史系捻军史调查组。应当说，内行人是不难辨别其真假的，一看就知是伪托之作。因为这12首所谓“新发现的捻军歌谣，毫无民间歌谣的语言朴实之特点。可是，偏偏遇到好事者的认真，却要去戳穿这一骗局。1963年元月15日，《安徽日报》又发表了《新发现的捻军歌谣十二首真象》一文。作者吴腾凤同志是在看到《新发现的捻军歌谣十二首》后，“产生了极大的怀疑”，即于当年（1962）七、八月间去蒙、亳进行了调查，证实了“这十二首歌谣确系伪造的”。其真象是：

蒙城县柳剧团编导组的白岩同志，于1959年往山东诸城搜集

捻军传说故事和捻军歌谣。在诸城县遇一剧场刘姓老工人，口述出断续不全的9句歌谣……传闻这是诸城刘塘的曾孙女刘惠娟被鲁王任化邦掳后作的。白岩回安徽蒙城之后，便把这9句歌谣交给原蒙城县志编写室的李东山先生（现已调至蒙城县文化馆），并叫他在原来的基础上代刘惠娟写几首，以留作整理捻军传说故事之用。于是李东山就杜撰了12首（也把前9句用进去了）。1961年12月，合肥师院历史系捻军调查组来到蒙城搜集捻军史料时，他们便把这12首“新作”交给调查组的同志，伪称这是在安徽涡阳县义门集一位老先生所藏的一批竹片上录下来的，是才女刘惠娟给捻军作的行军歌。调查组便信以为真，视如珍宝，并牵强附会地分析考证一番，写“新发现”一文。

轻信招致被人愚弄，已是可悲。可更不应该的是，合肥师院历史系捻军调查组还争“发明权”，“自称是在义门集发现的”。受人骗又去欺人，误上加错。从这一作伪的典型事例，举一反三，就可知捻军歌谣的伪作赝品，不知凡几。我在《捻军传说故事考实》一文中，曾对搜集整理的工作做过评价，以涡阳为上，蒙城次之，亳县最差。即以之观捻军歌谣亦如之。这固然是个文风的问题，但又不仅是文风问题，更重要的还是个人品的问题。所谓文学即人学，俗云“文如其人”，观其文可知其人，臧不谬也。

三

捻军歌谣也同捻军传说故事一样，多是以人系事，且有其地域性。这就是说在某色旗捻军的地区或势力范围内，流传的多为这一旗色捻军首领的传说和歌谣。若是从史料的角度，以审慎的态度去搜集整理，就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这方面要以1958年前

在《安徽史学通讯》发表的捻军歌谣为佳。这是因为搜集整理者是从史料着眼，态度比较严谨。捻军歌谣多是以人记事，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这几个方面：

1. 阐明捻子起义的时间和原因。如以“咸丰二年半”为起首的歌谣，就有好几首；或是“咸丰坐殿闰八月，大雨下够两个月，黄河两岸开口子，人死大半显不着”。都是记实，说明捻军大规模普遍起义是在1853年，咸丰三年农历闰八月，是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这个近因促成的。

2. 捻军各色旗或首领连串而成的歌谣，亦复不少。如：

大花旗小花旗，七里八卦双边子旗，顶头又遇黑膀子旗。
大花旗首领是雷彦，小花旗是李廷彦，八卦旗是杨兴泰，黑膀子旗或称老鹄膀子旗，即白边黑旗，首领是刘玉渊、刘学渊兄弟。他们的领旗地区或势力范围，都在亳东至义门集一带。

大老渊、二老渊，苏老天、邓老左，五沟集上李开哥。
这是把黑旗捻军几个首领串连起来的歌谣。大老渊即刘玉渊，二老渊即刘学渊；苏老天是苏天福，河南永城苏平楼人；邓老左是邓左仁；五沟集在今濉溪县境（原属宿州），李开哥名大喜（溪），但也有说他是蓝旗。

山猫、饿狼、小白龙，胡椒大王随后行；遣兵调将老锤手，打仗还是张乐行。

第一句是蓝旗捻军首领刘金鼎、刘永敬、刘天台的绰号；胡椒大王是黑旗（一说蓝旗）王万全（《涡阳县志》作王万一，误）的绰号；“老锤手”这一绰号，捻军中有两人，一是永城冯金标（震），捻军初期“十八铺”之一，另一个是尹如惠。此处应是指前者。

3. 跟着某人结果如何，稍为著名的捻军首领几乎都有这类歌谣。如：

跟着张老乐，吃的刺烙馍；

跟着龚瞎子，不愁吃着鸡鸭子；
跟着孙老葵，不愁吃的水牛皮；
跟着江老台，饿得直打趑；
跟着苏天福，饿得直啼哭；
跟着刘天祥，不愁吃着果子糖。

这样内容的歌谣还不算少，有的甚至对同一人而言，意思却完全不同。

4. 表述捻军各旗的特长或战斗力。如：

黑旗的马蓝旗的枪，白旗全仗人硬棒。

蓝旗打白旗裹，里旗后面放着火；
黄旗助着威，红旗啃窝窝。

5. 捻军站岗和防备清兵与团练的小唱或歌谣。

那块来？这块来，手拿钢钎样着来，
远的洋枪打近的使枪戳，不远不近挠钩抓。

睡觉莫睡着，防备官兵过了河；
睡觉莫脱袜，防备苗老扒。

“苗老扒”指的是苗沛霖团练。

6. 一次战役或事件带来的胜利的喜悦、失败的感伤，给人的印象深刻，难以忘怀，形成很多歌谣流传下来。如：

高公庙两头亭，中间坐着杨驴熊，
绅士两厢劝不走，单等瞎子来摸营。

这是捻军初起时，白旗首领龚得带领人去偷袭驻守高公庙的清军。“杨驴熊”是当地给杨锡山起的混号。

孙老葵性子急，一心想上柳沟集，
上先吃的飞箩面，末后啃的水牛皮。

1857年张乐行率捻军占领霍邱三河尖，在今阜南县的方家集、柳

沟集一带，遭受清军胜保部的堵击围攻，粮草困难。这首歌谣述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另据《黄彭年日记》说，捻军蓝、白之间曾为争食，还在方家集发生过火拼。

跟着江老台， 包谷揣满怀，
才说烧着吃， 鲍妖撵上来。

1858年，白旗捻军江台凌部在豫、鄂边活动，为清军鲍超部所败，损失惨重，有很多传说和歌谣记述捻军的这次败绩。除此还有：

哈巴狗子洋眼炮，打得老台钻山套。

听说过武（胜）关，两眼泪不干，
抛下好坐马，扛点青竹竿。

驴踢的龟爬的，娘娘被他杀得怕怕的；
牛不走车不转，娘娘急得一身汗。

传说“娘娘”是指白莲教，“他”指的是龚得，总之是捻军。这首歌谣是说捻军同白莲教发生过战斗，透露了他们之间有嫌隙，关系并不融洽，极有史料价值。

7. 颂扬捻军战斗力及与群众关系的歌谣，为数不多。如：

张老乐会说作， 四面八方送烙馍；
张老乐人马多， 杀得清兵安不了窝。

四

民间故事和歌谣，是众人的口头创作，又流传于众人之口，就会出现很多“异文”。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正是民间文学的特点。

民谣的特点，就是顺口溜，不加雕饰，语言朴实无华，夹杂俗话俚语，甚至粗语脏话，通俗流畅好懂，有韵上口易记。

捻军歌谣的最鲜明的特点是记实，上面已大致将它归纳为七

种类型。从所举的例子也可看出，每首不过四句，少者两句，字数无定，长短不拘，顺口溜成，浅显易懂，有韵上口好记。象这一类的似可肯定其为当时的捻军歌谣，充其量不过百首而已，还包括一些“异文”在内。至于说《十二月小调》、大数词《杀僧王》之类长篇歌谣，虽为后来之作，或是民间艺人的创作，但因其去捻军失败的时间不远，内容亦属记实，也可作史料看，又可弥补捻军本身资料之匮乏。可是，后来发表在《民间文学》和结集出版的两本《捻军歌谣》，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无论是内容，还是文字语言，都不象是捻军歌谣。从上面所举的伪造“新发现捻军歌谣十二首”的例子，使人觉得绝不仅此一例。怀疑还有不少的捻军歌谣，是经过加工篡改，而非原貌，或者纯系伪作。

下面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捻军歌谣》集（简称皖沪版），谈点看法。在这两本《捻军歌谣》集的“前言”或“编者的话”里，都开宗明义地说明编辑出版的目的，并给予很高评价。

皖版“前言”：捻军歌谣象捻军传说故事一样，相当真实、深刻的（地）记载和反映了捻军抗清斗争的基本面貌……同时也是研究捻军历史的很有价值的资料，这也就是编辑出版的主要目的。

沪版“编者的话”：劳动人民所口头创作的有关捻军的歌谣和传说故事，则是许多反映捻军起义运动的文学中最真实最生动最珍贵的一部分，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伟大运动的本质和面貌。

皖版《捻军歌谣》注明提供人和搜集者，但多无流传地点，沪版虽注明流传地区，但很笼统地说是一个县的范围（渦、蒙、亳）。根据我们调查所得的经验，捻军传说或歌谣，都是以人系事，即事迹是围绕着人物流传于民间的，且有地域性。就以捻军著名领袖张乐行而言，他的事迹也只是流传于张老家附近的方圆一二十里，走出黄旗势力范围或地区，就难得其详了。其他人

也就概可想见。有的人甚至只有到他居住的村庄，才能了解到一点他的事迹。所以，若说有关捻军的一个传说或一首歌谣，流传于一个县范围，这是一种假托的骗人话。

根据捻军歌谣的记实记事的特点，从内容和形式可辨别其真伪，大致说来：

1.将民谣当作捻军歌谣，或以粗制滥造的伪作“鱼目混珠”。试举几例：

针穿黑豆长街卖， 河里杂草上秤称；
人吃人犬吃犬， 老鼠饿得直啃钉。

这首民谣恐只前两句有据，且不能肯定是述咸丰初年岁荒饥馑情景；后两句有今人手笔的嫌疑。

地上老财心似锥， 天下乌鸦一般黑；
地上老财心似锥， 哪山老虎不吃人。

这显然是今人之作，将“天下乌鸦一片黑”、“哪山老虎不吃人”的俗语，加上一句“地上老财心似锥”串缀编造而成。但伪作者似乎忘记了当地过去称地主为“日子主”，“老财”似是后来的说法。象这一类的粗制滥造之作，还有一首《邓家土地没有沿》，也较为典型。它是根据一个传说胡编的。我们在张老家调查时，不只一次地听到过邓姓大地主挂过“千顷牌”，从亳州向东几天不走别人家地的说法，但一深究却原来是明末的事，且是夸大了的。还要指出的是，应当尊重历史，更不该犯常识性的错误，或出现历史超前现象。在《邓家土地没有沿》的所谓捻军歌谣中，有“广货洋货卖的全”一句。试问，即使是在道咸间，地处穷乡僻壤的雒河集，那时店铺里能有洋货吗？另外，更不能将与捻军沾不上边的事，编作捻军歌谣，如“江大人舜上天，打不过咱们往河里钻”。这个“江大人”应是指江忠源，是在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初克庐州（合肥），在水西门投黑他坝而死。捻合到肥附近活动，要到1858年，是两不搭界的事。

2. 凡歌谣有擒子或擒军的称谓，就可肯定是伪作或改作的赝品。有一首题为《王家大姐才十八》的歌谣，结尾是“咱擒子还嫁给擒子汉”或“那个擒子不把她夸”。一看就知是篡改传统民谣而成。还有些歌谣，与其说是歌颂擒军，倒不如说是在歌颂红军。试举册例：

盼擒军迎擒军， 擒军来到解仇恨；

擒军来到刚住下， 为民除害杀冤家。

听说擒子到， 穷人哈哈笑；

听说擒子来， 穷人喜心怀。

诸如此类内容的所谓擒军歌谣，还很不少。更有甚者，还有“血海深仇记心头，一心盼望擒军来”的语句，看了使人身上打冷颤，真不知怎么能写出来的。

3. 文绉绉腔调，似通非通，言之无物，甚而是一派胡言乱语，一看也就知为伪作：

卖淫的女人坐了朝， 恶心毒计召沃王，

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王八才受你招降。

这是一首胡编滥造的典型，态度又极其不严肃，以之冒充擒军歌谣，是对擒军的亵渎。

梁上燕子唧唧啾， 秋去春来换单衣，

寒去暑来你知晓， 擒子何时到湖西。

这类模仿文人寄情诗之作，内容却经不起推敲。还有首《沃王何时能还阳》：

看作义门好心伤。 想起沃王泪汪汪；

看看地在人不在， 太阳从此失了光。

这是首四段七言重叠句的“诗”，毫无民间歌谣的风格。下面还有三段，只是最后一句不同。结尾是“清清的涡河变浑汤，遍地草木变枯荒，沃王何时能还阳？”

另外还有首《捻子好象星星草》，共四段十六句，每段第三句为“捻子好象星星草”的重叠句。作者可能是受白居易的文言律诗《离离原上草》的寓意之影响。有部以后期捻军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作者凌力就是以“星星草”为书名。这首假冒为捻军歌谣的作者对星星草所作的注释，是近似小麦的植物，“是一种喂牲口的很好饲料”。但第二段却是：“星星草赛牛毛，它与长工两相好；捻子好像星星草，穷人离它要饿倒。”不能不说是作者的疏忽之处，有侮辱穷人之嫌。

3.画蛇添足的狗尾续貂之作，所谓“貂不足，狗尾续”是也。试举两例：

跟着张老乐， 有吃又有喝，
跟着李老峰， 人人有活命。
要想死里来逃生， 参加捻军是正经。

前两段是把今之涡阳张乐行和阜南李老峰的两首歌谣凑合一起，他们都是捻军首领，倒无可。第三段明显是现在加上去的，显得不伦不类，而且破坏原意。

“十二月小调”已是后人之作，或为民间艺人创作，现又被人篡改，旧瓶装新酒，塞进私货，鱼目混珠，改题为《唱捻军》。先是发表在《民间文学》1959年9月号，还能保持点原貌。但收进《捻军歌谣》集（皖版），选编者却又作改动，即以四、九月为例：

四月里来麦子黄， 老乐定计斩饿狼，
饿狼本是忠良将， 将星落在西北方。

改为：

四月里来麦子黄， 老乐领兵攻正阳，
龚得订（定）下绝妙计， 杀得续宾人马亡。

这可能是由于篡改者主观认为，捻军内讧的六安事件，蓝旗刘永敬叔侄之被张、龚诱杀，有损农民起义军的形象，以致置民间文

学“慎重整理”的原则于不顾，妄自改来改去，弄得面目全非。令人扼腕痛惜。而且由于篡改者不熟悉历史，却把1858年太平军的庐州三河大捷，误作捻军占领霍邱三河尖。鲁迅在1924年写过一篇《望勿纠正》的文章，批评当时一些人标点重印古籍时，随便改动文字的现象，且将对的改成错的。这对捻军歌谣的整理，也还有其现实意义。

五

各种文艺形式都有它的表现手法和创作技巧，可以发挥作者或表演者的主观能动作用和才能。相对而言，民间文学工作者就似乎显得有点被动。民间文学形式的传说故事、歌谣，是流传众人之口，这就要求民间文学工作者遵循“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捻军传说故事和歌谣，还不同于传统的民间故事和歌谣，它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基础的，搜集整理时更要“忠实”、“慎重”，绝不能心猿意马，随意而为之。恕我直言，捻军传说故事的搜集，如能记一个梗概，就算不错了，大多是听后记在脑子里，保存在记忆里，根本谈不上“忠实记录”。所以，当报刊编辑、历史研究者去信向他们索取原始资料时，便以“找不着”为应。捻军歌谣的搜集，记录可能要好些，但整理的弄虚作假，情况相当严重。衡量民间文学工作的好坏，评价民间传说故事和歌谣作品的优劣，标准是看“忠实”、“慎重”的程度。民间的口头文学，流传、创作于众人之口，必然会有各种“异文”。捻军传说故事和歌谣为尤甚，更应采取“慎重”态度，不要随意改动或舍弃。

捻军歌谣的“异文”较多者，首推跟着某人如何怎样？均为两句一首，不下20首。就同一人而言，有内容不同的数首。但这是对某次征战的遭遇感受不同的写照。现举出有关张乐行、龚

得、江台凌三人的歌谣“异文”各一二种。

跟着张老乐，有得吃来有得喝（吃的剩干馍）。

跟着龚瞎子，吃的鸡鸭子（跑胀了脚丫子或跑崩蹄甲子）。

跟着江老台，烧饼包子揣满怀（包谷玉米揣满怀）。

其次是表述捻军各旗势力和特长的歌谣。如：“黑旗的马蓝旗的枪，白旗全仗人硬棒。”就另有两种“异义”：

黑旗的马白旗的枪， 蓝旗全仗人硬棒。

黄旗马蓝旗枪， 白旗全仗人硬棒。

很显然，这是因流传地区不同而内容不同的。不过，这首歌谣的前一句是衬托，后一句是反映真正势力。捻军五旗是以蓝、白旗为强，人多势众。红旗人少势弱，所以就没有提及。但却有一首“大红旗穿山跳涧，大黄旗扁也不见”的歌谣，流露红旗对黄旗在某次征战中的不满情绪。

民间传说、歌谣的搜集整理，先要有“忠实记录”的基础，才能谈到“慎重整理”。这是至关重要的。对捻军歌谣的整理，以愚之见，首先是要辨正语言文字。因为它是流传在民间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众人之口，语音不准，咬字不确，尤其是对地名、人名、官衔，以讹传讹，势所难免。如将湖北罗田松子关讹成生死关，江苏赣榆讹作盖县。这就要予辨正，或一仍其旧，保持原貌，但都要加注。

其次，口述者对一首捻军歌谣记述的不完全，在没有听到另外人的口述可以补全时，最好是以“×”号表示空之。即使是以己意补之，一定要加注说明，以免真假不分。

再次，对捻军歌谣“异文”的处理，可取其一种，其余加注说明。这是一种办法。另一种方法，是将内容不同的各种“异文”都整理出来，各成一首。总之是不要随便舍弃或拼改，因为内容不同的“异文”，倒正有可能反映不同的事实。这都是从史

料的角度着眼的。

《捻军歌谣》(皖版)的“前言”中说它“是研究捻军历史的很有价值的资料,也就是编辑出版的主要目的”。但是,编辑整理者似乎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史料是不能伪造的。就以这两本《捻军歌谣》集而言,其中掺杂着大量今人之伪作,鱼目混珠,不免给人以“假作真来真亦假”之印象,使人疑心,或对其资料价值打个大折扣。莫若干脆给这些今人所作的捻军歌谣赝品,冠以新编,以与真品区别。就象以新编历史剧区别历史剧一样,似为恰当。

六

捻军歌谣同捻军传说故事一样,对人名、地名、官职和事物的注释,也有很多不准确或错误之处,随举数例,以窥一斑。

1. 胜保是清朝的副都统兼河北镇总兵,曾帮助袁甲三到安徽打捻军。

按:胜保,满洲镶白旗人。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曾任光禄寺卿、礼部侍郎。1853年为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尾追太平天国北伐军入冀中,加钦差大臣衔。1857年,赴淮北攻捻,以副都统帮办河南军务。职衔均比袁甲三为高。都统、副都统为八旗各旗的长官。

袁甲三,道光进士。1853年以兵科给事中为帮办团练大臣,驻临淮关。1855年被皖抚福济参奏回京。翌年再起用,随豫抚英桂攻捻。1859年又被胜保参奏,回京供职。旋复南下攻捻。1861年,攻陷捻军占领的临淮、凤阳,授钦差大臣,任漕运总督。

2. 国瑞即陈国瑞,僧格林沁部将。

错在想当然。这实际是两个人,国瑞是满洲人,历官侍郎、将军,隶属僧格林沁部。陈国瑞是湖北应山人,先入太平军,降

清后湘军黄开榜收其为义子，改姓黄。先后隶属左宗棠、吴棠、僧格林沁部。官至总兵，归复陈姓。

3. 张德府即侯老寨。

按：侯老寨，《涡阳县志》作侯老营；当地称作大侯。在曹市集（涡阳设县前属宿州）东3里。张慎德（头号雷）、张慎聪（二号雷）兄弟起义后，在大侯修筑圩寨，改名为张德府。传说他们还有个兄弟，绰号三闪（忘其名）。当地流传有“大雷二雷都不怕，就怕三闪说句话”的民谣。这个地区属蓝旗势力范围，但《涡阳县志》和传说，却都说他们是黄旗，这可能是与张姓有关系。不过，《捻军歌谣》集有首：“张德府真威武，旌旗招展遮日头，老乐里面坐朝廷，四面八方聚英雄。”却把张慎德兄弟误作张乐行，推敲内容，琢磨文字，似是伪作。

4. 对“大花旗小花旗，七星八卦双边子旗，顶头又碰见个黑膀子旗”的注释，对错参半。

大花旗是李廷彦，小花旗指雷彦，黑膀子旗即黑旗，这都是对的。但说“七星八卦旗指城父、义门一带白莲教参加捻军，如大老渊、韩老万”，却不免牵强德附会。据我们调查所知，七星八卦旗是下张桥的杨兴泰，距义门集不远。义门集的刘玉渊（大老渊）、刘学渊（二老渊），无论文字还是口碑资料，都说他们是黑旗。韩老万是蓝旗，顺河集大韩庄人。1863年清军僧格沁部进攻下张桥时，韩老万就在杨兴泰的寨内，为炮所伤，抬回家死的，葬在青阳沟边。

5. 圩长：清朝的地方官。

按：圩长不过是一村之长，是靠其在家族中的声望地位而确立的。因圩寨多是聚族而居。当然是要得到县级地方官的认可或委任。这是指官圩而言。但它不是清朝的地方官。在捻军起义时期，为数不少的圩长，首鼠两端，看风使舵，用当地故老的话说，“是官的私的都来”。

6. 河北指淮河北，是对“河北出了小阎王”而作的注释。

按：“小阎王”即张宗禹的家，是在涡河北的张大庄，距涡阳县城（雉河集）北20多里。此处的河北，应是涡河北。

7. 孝帽会也是地主的反动武装，这是对“老牛会、孝帽会”的注释。

按：这实际上是一码事，而且并没有解释清楚。所谓老牛会，原来是河南永城牛庚办的地方团练，成为捻军地区群众对团练的代称。老牛会的人都以白布包头，所以又称其为孝帽子会。

8. 《捻子好象星星草》的作者所加的注释：“星星草是近似小麦的一种植物，秆子细，撮连撮，遍地皆生，是一种喂牲口的很好饲料。”

观此似为皖东地区叫做“燕麦”的野生植物。而所谓星星草，恐就是皖东的“香蒲子”（俗名），形似菲菜苔，杆子三楞很硬，顶端三叉象星。随地皆生，菲菜地多见，不易拔净，只要留一点根，又会生长出来。为此，我曾不止一次地请教淮北的人，以证实我的看法不错。

附录一

《中国人论捻军起义》导言

〔美〕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翁 飞 译

译者按：裴宜理博士是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年青学者，现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并兼任华盛顿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的助理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有：《华北的造反者和革命者，1845—1945》（“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1980年出版）。1979—1980年，她作为中—美国国家学术交流项目的成员来华，曾到过合肥及皖北一些地方，进行学术考察，并和我省研究捻军的史学工作者交换意见。回国后，遂将其编译的《中国人论捻军起义》（“Chinese Perspectives on the Nien Rebellions”）出版（1981年于美国纽约出版）。

选集内容分两大部分：一、中国学者关于捻军的学术争论文章；二、捻军传说故事。

这篇文章是裴宜理为选集写的导言（译者节译了有关史学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到她对中国有关捻军研究情况的介绍和评价。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术空气活跃，史学领域已经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学术成就。同“文化革命”前的史学工作一样，注意力仍然集中在农民起义这个问题上。可是现在，随着全国性的强调生产力而不是把阶级斗争作为历史的主要动力，出现了降低农民起义积极作用的倾向。历史学家们已被赋予重新评价形形色色农民起义性质的使命——强调这些运动中的许多“落

后”方面^①，和当前舆论相一致地指出中国仍保留着很大程度的“封建性”。

目前，在中国的学术讨论中，流行着一种比较开放的风气，有关农民起义这个问题的论著中，经常反映出一种激烈的论战精神，这在太平天国问题上最为明显。1980年1月，我有幸参加了在南京举行的一次太平天国学术讨论会^②。焦点集中于太平天国的土地纲领和政权性质。在会上，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太平天国土地政策的激烈争论，它是代表地主阶级的封建利益呢？还是农民的“革命”利益。意见远远没有统一。讨论显示了一种严肃细致的努力，以对那些使全世界农民起义的研究者伤脑筋的问题得出认识。关于农民暴动“进步”性的论点，受到了挑战；现在，起义的领导、思想、组织形式都必须受到仔细审查，以得出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

如果这种新倾向在太平天国研究上已经有了一个实际影响，它对于比较典型的中国农民起义的研究具有同样重要的含意。以前是夸大了任何情况下民众反抗的革命作用，尤其是歪曲了这类运动的许多事实，这些运动不象太平天国，提不出任何政治纲领。也许这类事例中最值得注意是捻军起义，一场与太平天国同时席卷中国北部的大规模起义。和太平天国相比，捻军缺乏详细的土地政策、宗教信仰组织，或行政机构。这场运动在许多方面是地区性的，而不是改朝换代。然而，对于中国学者来讲，这些局限以前使得“捻”成为一个令人烦恼的论题。当前的倾向，为重新引起对这个所谓的“封建”叛乱典型的兴趣，开辟了途径。

任何对“捻”有兴趣的人，或者说大多数其它农民起义的研究者，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个障碍，就是起义者本身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文献可供参考。这里要指出太平天国及其大量丰富的内

① 《亚洲研究杂志》，第295—326页

② 《人民日报》1980年2月4日

部记载^①是例外而不是通例。绝大多数的农民起义的参加者缺少文化，极少有文字记载流传下来。那么人们怎样着手研究这些运动呢？我们通过什么手段去了解这些比较典型，然而不大容易理解的农民起义呢？目前，许多西方学者的反应是简单地否定其全部可能性。当然通过查阅政府和绅士的记载，可以弄清一场运动的粗糙的轮廓，但是谁要试图作出比较透彻的分析，则似乎显得轻率了。幸运的是，今天看来，研究中国的农民起义的确是大有前途的。由于韩书瑞（Susan Naguin）^②和其他人的工作，现在我们知道了太平天国以外的其它起义者的自述的效用和价值。可以确信，韩书瑞所研究的八卦教起义是非同寻常的，那次攻入紫禁城的事件，引起了皇帝的御审，从而得到了一份起义者供词的文件汇编。然而几乎没有其他起义者能够提供同样丰富的自供文件，这种类型的资料，对于许多其他暴动的研究，可能是有用的。

例如，关于捻军起义领袖张乐行的自述的发表^③，使它对于研究那场起义的学者，成为有用的重要资料。不幸的是，大量的捻军死在战场上，加上清政府在镇压起义后当场屠杀捻军首领，就没有多少自供保存下来。另一方面，关于早期“捻”，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保存有一些遗物^④。迄今为止，无论中国学者或西方学者都未仔细推敲过，资料揭示了运动形成时期捻军领袖和他们的活动的内在关系。这些文献，提供了有关早期捻军的宗派背景、组织和行动的细节。通读这些供词，使人们感觉到捻军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用简单的方言详细地记叙自己的经历、家庭和亲友。

① 一种新的太平文献汇编最近由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整理出版，即《太平天国文书汇编》，北京中华书局 1979 年。

② Susan Naguin:《Millenarian Rebellion in China The Eight Trigrams Uprising of 1813》（《韩书瑞“1813 年八卦教起义”》，美国，纽海文，都鲁大学出版社 1976 年。

③ 马汝珩、刘守治：“关于捻军领袖张乐行的自述和徽文”，《光明日报》1962 年 10 月 10 日。

④ 参见：“Grand Council Memorials, Peasant movement collection, bundle # 8”（“农民运动纪念集”第 8 册）。

自述对理解起义很有价值^①，但不能忽略自述只不过是官方记录的供词这样一个事实。经过政府官吏的删改，有些地方也许不可靠。某些自述很可能由于地方官员为了最大程度地向皇帝表功而添油加醋。由于这个原因，中国学者在他们研究农民起义时，采取了试图超越官方资料的策略。

他们所采取的一种方法是在起义地区进行现场调查。通过访问起义者的后代，力图挖掘出一种也许为官方记载所缺乏的下层农民的看法。但这种方法，只有在时间较近尚能被当地人记忆的情况下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初20年中，历史学者进行的主要现场调查有白朗起义（1911—1914）、义和团（1899—1900）、太平天国（1851—1864）、捻军（1851—1868），和其它一些起义活动。尤其是捻军，因缺乏可信的文字资料，调查资料便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意义。此外，由于捻军流传下特别丰富的民歌和民间故事，起义的现场调查被证明是特别有价值的。

有关捻军的地方调查，大体上分三批进行。一、阜阳地区文化局和涡阳、蒙城、亳县文化局或文联，收集和出版有关捻军的民间故事。他们的工作从50年代中期开始并继续到今天，二、1958年，安徽省社会科学研究所近代史研究室的捻军调查，收集不同于民间文学的史料。三、1959及1978年，山西大学的江地教授，两次到安徽北部进行调查研究。三批中每一个项目都发现了大量材料，尽管在研究中有些矛盾，这些材料有益于加深我们对捻军的了解。通过这些材料，我们现在知道了有关19世纪中叶淮北的社会状况、各位捻军首领的生活、起义的组织体制和其他有关情况的生动情节。

最近，作为美—中国国家学术交流项目的成员，我有机会见到了那些开创捻军现场研究的中国学者。1980年4—5月间，我被允许访问皖北，抱着进行现场调查以及和当地学者交换意见的目

① Susan Nagami: "True Confessions: Criminal Interrogations as Sources for Ch'ing History." (韩书瑞: "亲供: 作为清史资料的审讯记录")

的，我所到的地区超过了对一般外宾的限制^①。这次旅行使我在合肥会见了1958年调查项目的主要参加者张珊和马昌华，并和蒙城、涡阳等县民间文学项目的成员进行了商讨。然后我于7月到太原访问了江地教授。这次会晤，给我提供了向这些学者请教他们的调查方法和调查结果的机会，以试图解决在翻译本书选用的资料中所发现的有抵触的说法。

1980年4月29日上午，我在安徽大学历史系会见了张珊和其他一些人。经过“文化革命”的沉重打击，安徽大学历史系在去重新开始招生。该系大部分成员被下放农村10年之久，几乎还末年才恢复研究活动。但是，今年，系里计划集中力量于安徽地方史研究。例如张珊就打算写出1958年捻军调查的结果。

张珊说，捻军的现场调查，是安徽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刚建立时就设想的。张珊和他的5名同事不久就到捻军战场遗址进行调查。这些遗址是：涡阳，几乎有一打村庄是捻军首领张乐行、张宗禹、张振江、江台凌、刘狗、刘尿、杨兴泰和其他一些人的家乡；蒙城县，有任柱和龚得生活的村庄（译者按：龚得是涡阳县公吉寺人，作者误记为蒙城）；还有沿着河南和安徽交界的亳县和永城县。

调查用了两个月时间，开始在涡阳县城召开一些一般性的座谈会。会上，调查者提出问题并请参加会议的当地人回答，最有帮助的提供资料者是一位90岁的老人，他叙述了有关“捻”的大量惊人的情节，尽管他由于进入耄耋之年而时有失误，但这位老人在他神志清醒的时候，是一个丰富的资料来源。还有一位84岁的侯怀德老人也给了巨大帮助，他是捻军红旗主要首领的亲戚。捻军的总指挥张乐行和捻军首领刘狗的后代也提供了另外一些详

① 有关这次旅行，见1980年6月20日《安徽日报》。

细的资料。尽管有一些方言上的困难，调查者在他们提问的过程中得出对“捻”这一名词的含义的认识、捻和白莲教传统的关系，及其它一些问题的线索。

从一般的座谈中获得一个总看法以后，调查组分散到周围的农村中去发掘更深一层的资料，但这个调查组没有发现新的文献资料。他们发现了一些和起义有关的文物：蓝旗捻军韩老万用过的齐头镢，僧格林沁清军中的一枚西瓜炮弹，以及一只注明日期为“太平天国二年”的茶杯。小组事先没有准备形式统一的询问，每一个调查者各自探讨最引起他兴趣的问题，后来的调查报告也是在个人的基础上整理的，先由每个调查者写出他自己独到的调查结果。

到目前为止，他们的成果只有很小一部分写出来并发表。本书所选择的这些资料，最初发表在1959年的《安徽史学通讯》杂志上，然后于1960年以单行本出版，书名是《关于捻军的几个问题》（安徽人民出版社）。

29日下午，我访问了马昌华所在的安徽省博物馆，马是张在1958年现场调查的主要同事，现在是一位研究人员。这所博物馆，象安徽大学一样，在“文化革命”的几年期间遭到了破坏，当时大部分职员都被下放农村。可是，幸运的是，它的藏品几乎没有损失。博物馆藏有9万多件文物，以及同样数量的书画。对捻军起义的研究来说，最有用的文献资料似乎是安徽地方志及地方绅士的私人记录。马昌华打算使用这些资料和其它一些材料从事捻和太平军的关系这个题目的研究。

根据日程安排，4月30日上午重到安徽大学与张珊再次座谈，我建议马昌华参加。两人用了一个多小时追忆他们的调查，由于互相提示而渐渐变得十分坦然，并且承认他们调查工作的某些局限，甚至在调查之前就制定的计划，也不是非常周密的。调查组在名叫张老家的村庄进行了最详尽的调查，因为它是捻军总

指挥张乐行的家乡，而不是作为这个地区村庄的典型。有时调查遇到困难，被访问的人有顾虑，当谈话涉及到暴露世仇和诸如此类的家族秘密时尤其如此。农民的文盲程度，给调查者在用文字表述口语方面，带来某些困难。

尽管这些障碍，两人都深信他们的发现的重要性和基本准确性。他们曾十分辛苦地反复核对大量访问记录，并仔细地推敲判断互相矛盾的说法。他们对自己的结论感到自信。

在研究项目开始时，就确定了一个分工，张珊着重有关起义的社会背景，马昌华注意“捻”和白莲教的关系。为了探索这个所谓的关系，马昌华曾到过一個名叫义门集的集镇，这是白莲教在皖北活动的中心，他向当地居民询问这个问题，从而发现“捻”完全不受秘密团体的影响。在本书所选的马昌华的第一篇文章中（“捻军与白莲教的关系”——《捻军的产生及其初期的活动》第二节，原载《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6期），我们看到了对坚持捻——白莲教一致性的观点的一种系统的否定。马阐明了有关“捻”的解释的意义，以确证这场运动产生于宗族组织和地方贩私盐活动，而不是起源于秘密团体。

这种把“捻”看成是狭隘的地方环境反映的观点，在本书选录的张珊的文章（肖柳即张珊）。“捻军产生的社会背景”，原载《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6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支持。张的文章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恰好是皖北成为捻军起义的发源地？他的回答涉及四个论题：租税的影响，地理条件，贩私盐的盛行，以及这一地区自然灾害的频繁。张珊集中进行研究的实例张老家，几乎不能作为绝大多数淮北村庄的代表，但它也许是淮北地区的一种次要的村庄形式——地主庄园的重要典型。尽管淮北多数村庄很大程度上由自耕农而不是佃农组成，租佃关系在这个地区决不是没有意义的。张珊的研究，除揭示租佃关系的有用的细节外，还介绍了有关赋税对自耕农影响的有价值的资料。

他对于在贩私盐活动中“光棍”〔Kuan Kun〕作用的论述，给我们展示了淮北“地方豪强”的情况，这种“地方豪强”与乔安娜·麦丝切尔（Johanna Meskill）在近著中所生动描述的台湾“地方豪强”地位相同^①。麦丝切尔把台湾特有的暴力行为和边境居民不稳定的传统联系在一起，而在淮北我们则看到一种在很大程度上由周期性的自然灾害所引起的不稳定性。正如张珊解释的，洪水尤其成为皖北社会不安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也许还可以补充一点，我和当地居民的讨论增强了控制洪水问题的中心地位，当问他们在淮北社会主义革命取得的最大成就是什么，没有一个人会引证土地改革或农业集体化的例子，毫无例外，他们都指出水利是共产主义制度的主要贡献。张珊关于捻军起义背景的描述有助于我们理解这种情况。）

圆满结束了在合肥的访问，我出发去皖北，先到蚌埠访问治淮委员会总指挥部，然后去蒙城县和涡阳县。5月3日开始和阜阳地区文化局的李东山、朱玉朗（音），蒙城县文化局的 茆文斗、毋连甫和周怀轩，蒙城县文物管理所的殷克毅，举行了一系列的座谈，所有这些人都参加了搜集和编写有关捻军起义的口头文学。

在口头文学的编写过程中，至少有两个也许是互相矛盾的动机。一方面，民间故事的选择主要根据它们作为大众文学的价值；另一方面，又用历史文献的方法来处理它们，为能使人们对农民的历史有新的认识。在和张珊、马昌华的交谈中，以他们的观点，对使用民间文学来研究历史，表现了一种怀疑态度；而我在蒙城的主人则坚持捻军故事的史学价值，说他们和历史学家们进行捻军“现场调查”所采取的方法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大家在

^① Johanna Menzel Meskill:《A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1729—1895》（乔安娜·门泽尔·麦丝切尔：“一个中国拓边者家族，台湾雾峰林氏，1729—1895”），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79 年。

接受农民记忆力的恩赐方面是平等的。然而，他们也承认，在故事的铺叙过程中，可能有些凭想象的虚构。

此外，当时大部分农民都能够唱曲调简单的捻军民歌。不幸，这种艺术今天几乎湮没了。虽然过去30年中，民间文学已有较大的收获，但目前口头文学显得相当衰落了。因此，皖北地方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出这种重要的遗产，使我们受益非浅。

本书翻译的只不过是已出版的大量捻军民间故事中的少量样品，作者在编写这些故事时，十分注意保留强烈的方言风味，运用粗俗而幽默的语言和那种带乡土味的歇后语，而增添了无穷的趣味。尽管译者试图尽可能地保持原作的精神，可惜，在翻译的过程中原作的大量语调都丧失了。（译者注：以下介绍民间故事情节，与史学无关，故删去）

7月25日，我在山西大学江地教授的家中会见了。由于他现在参加其他研究课题，对捻军还没有计划作进一步研究。然而，他期望出版其未发表的有关捻军的文稿，和重印他研究捻军的两本旧作。江地教授无限怀念地谈起他的淮北之行，第一次调查距今将近25年，他认为是特别有成效的。当时，他注意到，农民还能传唱捻军民谣，并且当地居民都具有关于这次起义的异常丰富的知识。可是，在最近一次访问中，江地发现了完全不同的情况，捻军民谣事实上已经消灭了，农民中几乎没有人真正能够回忆起这场运动的其它传说。

象安徽省社会科学研究所和阜阳地区的调查小组一样，江地似乎完全相信现场调查的结果。可是，和那两个小组不同，江地在他的第一次现场调查之前就已出版了数量丰富的论著，也许因为这个原因，江的结论在某些重要方面和其他人的发现不合，最明显的就是关于“捻”和白莲教的关系问题。在本书选录的江的第一篇文章中（江地：“论捻党”，《初期捻军史论丛》第1—

13页，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出版），他说“捻”是白莲教的变种，并设想白莲教、捻、义和团都是“掖刀会”的支派。可是，江地事实上没有引用文献资料证明这个论断——一个受到淮北当地居民强烈否认并和大量文字记载互相矛盾的论断。看来江地确认的捻、白莲教和义和团的联系只是一种一般性的武术传统，而不是一种特别的白莲教派。无疑，捻和白莲教的信徒某些时候曾联合起来共同冒险，但从来也没有建立过两个组织的统一体，正象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这两个组织曾在比捻军和白莲教更为持久的基础上合作——看成是一个组织那样能够引起争论。尽管江地在我们的谈话中不愿意从他早期著作的任何立场上后退，事实上，他本人后来的工作——在淮北现场调查后完成的——已经把捻和白莲教的关系降格了。本书中他的第二篇文章（江地“论捻军的正名”，“论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关系”第二节，《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距第一篇4年后发表的，已从早先关于捻和白莲教的论断上退步，而代之以把捻军看作一个建立在家族纽带基础上的贫苦农民组织。在江地的第二篇文章中，他对“捻”的解释，证明了他受在淮北现场调查的影响，和马昌华一样，并和罗尔纲相对立，江在文章中坚持“捻”是起义者自己使用的名称。由于这个理由，他提出把这场运动作为“捻军”来论述，而不象罗尔纲，把这场运动作为太平天国的附属物。罗尔纲——也许是因为他未到淮北进行过现场调查或是因为他对太平天国起义过分地感兴趣——争辩说，捻军至少在它的后期应该称作“太平天国新军”。通过对比，那些到淮北进行过调查的学者一般相信捻军基本上具有地方性和独立性，因而并不满足于把这场运动归于太平天国的红色标题下。

在人民共和国的头15年中，研究农民起义的一种新的方法开始形成。由于起义者的“自供”和致力于发现更多有关起义的“农民观点”的现场调查，而补充了官方资料之不足。

当然，就开拓这个研究领域的中国学者而言，这种新的方法，并不意味着一致的解释。本选集列举了学者中间关于捻军起义的一些不同意见。有关起义的起源和名称，和秘密结社的关系以及分期等方面的争论。今天，由于中国的学术空气活跃，我们期待着中国历史学家能有更多的学术争论，尽管由于时间的消逝，进行富有成效的现场调查的可能性逐渐减少，但解释农民起义的框框的打破，给更为公允的评价这些运动开辟了道路。有关捻军的新论著，正好在最近几年已在中国出现，可以想象这种趋势正在发展^①。

① 这些新论著，有张珊于1979年5月向南京太平天国研究会提供的论文《捻军、侯世维、王万全事件说明了什么》，江地1979年出版的《赖文光传》。

附录二

抢军歌谣

这些抢军歌谣是我们调查抢军史迹时搜集的，当年就予刊布（《安徽史学通讯》1958年第6期）。歌谣的整理注释有我的劳动，故作附录于斯。调整改变原排的次序，以使内容相近者集中，但不作文字改动；删削注释中多余的空泛评论或重加注释。

这里的民歌多是当年抢军及其家乡群众的口头创作。只有唱词小调之类，似为后来民间艺人的作品，取材于当时的民间传闻，亦去抢军失败的时间不远，比较接近历史的真实。如“十四月小唱”说刘永敬“能打能闹”，是被龚得定计害死，刘天台是“叛死在六安州上”。这就有区别，亦可见叔侄是先后而不是同时被杀，使得“蓝旗一去不回头”。又说龚得“死后官上又封官”。凡此都可补文字记载之缺，有其史料价值。

咸丰坐帝二年半，江南①反了一大片；
毁些铡头破犁砚②，打些苗刀双齐线。

咸丰二年半，出了长毛③来捣蛋；
骑点子好大马，穿点子绫罗缎。

① 安徽省建置前与江苏合称江南省，淮北仍习称安徽为江南。

② 犁砚指犁铧。

③ 抢军受太平天国影响留长发，因此也被称为“长毛”或“二毛子”。

咸丰二年半，顶子满街串，
问你啥功名，大刀齐头镢①。

咸丰二年半，长毛来捣蛋；
竹竿开花猫唤蛋②，家家掀起大刀齐头镢；
穷了多少日子主③，发了多少穷光蛋。

咸丰二年半，大刀齐头镢；
穷了多少大财主，发了多少穷光蛋；
穷人的孩子骑骏马，楼主的孩子披袄片；
富豪人家卖儿女，装水烟的做大官。

同治二年半，×××××；
日子主还是日子主，穷光蛋还是穷光蛋。

前面走着莫瞎子，后面跟着张乐行；
左右山猫饿狼小白龙④，胡椒大王⑤随后行。

闪门进，闪门出，
山猫、饿狼、小白龙，
胡椒大王随后行。

① “齐头镢”是淮北地区割麦子的长柄刀，成为捻军的一种武器。

② “竹竿开花猫唤蛋，是指事物的反常。唤蛋(犯)即生蛋。

③ 蒙、亳一带称地主为日子主(读音为“准”)。

④ 这是蓝旗刘金鼎、刘永敬、刘天台三人的绰号。

⑤ 胡椒大王是王万全的绰号，涡阳龙山大王庄人。《涡阳县志》作王万一，误。

刘天福、刘天祥，
山猫、饿狼、小白龙，
后头又跟杨大鹏①。

大老渊、二老渊、苏老天，
王冠三、邓老作、五沟集李开哥②。

西北死了王冠三，
捻子塌了半个天。

四月里四月八，
江南反了王铁叉。

大雷、二雷都不怕，
就怕三闪说句话③。

东门口两只虎，
张堂、刘小五④。

跟着帐子⑤走，吃也有来穿也有。
××××××⑥，不纳银子不完粮。

① 杨大鹏是凤台县人。

② 这首民歌是用黑旗旗头的名字排列。邓老作即邓作仁，涡阳赵屯人，捻军“十八铺”之一；五沟集今属濉溪县（原宿州地），集上有一黑旗头叫李大溪（喜）不知是否即李开哥。

③ 大雷名张慎德，三闪张慎聪，涡阳曹市集人。二雷不知其名。

④ 张堂、刘小五是蓝旗鹿利科（连科）的部下，蒙城板桥集人。

⑤ “帐子”指大队捻军。

⑥ 有作“张老乐称沃王。”

跟着龚瞎子，吃的鸡鸭子；
跟着张老乐，吃的剩干馍。

跟着龚瞎子，跑崩蹄甲子①；
跟着张老乐，有得吃来有得喝。

跟着江老台，包谷揣满怀，
跟着韩老万，穿着绫罗缎。

跟着江老台，包谷揣满怀，
刚想烧了吃，鲍超追了来。

跟着江老台，包谷玉米揣满怀；
闲着无事打草鞋，后面妖兵追了来。

江老台站得高，看得远，
看看鲍妖可来撵。

哈巴狗子洋眼炮，
打得老台钻山套。②

江老台打得好，离了江兆③曳个帛；
江老台，离了江兆爬不起来。

① “蹄甲子”是指马的蹄甲，又作“跑胀了脚丫子”。

② 以上四首及下面的“夜晚打草鞋，白天穿山套”。都是记述江台陵部捻军在豫鄂边山区的活动(1860年)。鲍妖指鲍超。

③ 江兆是江台陵的部下，江集(今属利辛县)江西庄人。

张乐行鸿门监，
自称盟主胆包天。

张乐行、韩老万，
出门就是大刀齐头镢。

张老乐、韩老万，两家商量打团练，
团练的人马也不少，结果没咬张老乐扁。

抬着枪，背着药，
后头跟着张老乐；
张老乐人马多，
杀得清兵安不了窝①。

抬枪大炮头里走，
后头又跟老锤手②。

韩老万领皇兵，
张老乐在大帐中③。
×××××××，
莽瞎子摸营是好样的。

张老乐会说作④，
四面八方送烙馍。

① “安不了窝”又作“打哆嗦”。

② 擒军中绰号为“老锤手”者有两人，冯震和尹如惠。这里是指后者。

③ 又作，“韩老万带皇兵，张老乐坐帐前。”

④ “会说作”又作“人不错”。

苏老天、韩老万，
抬枪大炮打成片。

高公庙①两头亭②，当中坐着杨驴熊③，
绅士劝他他不走，单等瞎子④来摸管。

大红旗穿山跳涧，
大黄旗帛也不见。

夜晚打草鞋，
白天穿山套。

长毛一扭头，
官兵就发愁。

七月十五发号牒，
八月十五装大旗⑤。

① 高公庙在涡阳县西南 50 余里，西界太和县境。

② “亭”又作“平”，意为“差不多”。

③ 杨锡山，为驻高公庙的清军营官，当地群众给他起个绰号杨杂碎。“驴熊”是骂人的话。

④ “瞎子”指龚得。

⑤ 捻军出征“装旗”前先发通知，集合队伍。

顺河集雾腾腾，

饿狼赛朝廷，

全胜^①守阙龙，

东宫娘娘蔡小姐^②，

西宫娘娘戴秀英^③。

黑旗的马，白旗的枪，

蓝旗全仗人硬棒。

黑旗的马^④，蓝旗的枪，

白旗全仗人硬棒。

蓝、白旗缠牛皮，

打了败仗装装旗。

蓝旗打，白旗裹，

黑旗后面放着火，

黄旗助着威，

红旗啃窝窝^⑤。

① 全胜是刘永敬(饿狼)的儿子。

② 蔡小姐，名不详，蒙城北山蔡家人。

③ 戴秀英，蒙城小涧集北戴家花园人。全胜为她所生。她活到80多岁去世。当时(1958年)顺河集上的老年人都见过她。

④ 又作：“黄旗马蓝旗枪，白旗全仗人硬梆。”都是捻军各旗为显示自己的势力特长而言，因地而异。可就没有红旗，以知其势力不强。在首领侯士伟死后，红旗势力更弱。

⑤ “窝窝”系指“窝窝头”，意谓光吃不干，坐享其成。能“啃窝窝”。

大花旗、小花旗，
七星八卦双边子旗，
顶头又遵黑膀子旗①。

出了东门往东看，
镢腊白顶一大片，
要说是军功，
未与长毛战；
要说是科甲，
未演弓和箭②。

看得清，望得远，
手拿枪刀放马撵；
看着咧，望着咧，
手拿钢刀扬着咧③。

看见吗？看见喽，
望见吗？望见喽，
手拿钢刀扬着咧；
远了使枪打，
近了用刀杀，
不远不近挠钩抓④。

① 这首民歌多为杂色旗：大花旗雷彦，亳州雷寨人；小花旗李廷彦，亳州芦庙人；八卦旗杨兴泰，涡阳下张桥人。“黑膀子旗”或称老鸹（乌鸦）膀子旗，即黑旗白边，是涡阳义门集的刘玉渊、刘学渊兄弟。

② 这是首讽刺团练的民歌。

③ 这是捻军放哨、守卫时唱的短歌。当时（1958年）还有不少老年人会唱。据说捻军战士唱这支歌，是对唱或齐唱，用以提高警觉性。

④ 这首似是夜晚的防御守卫歌。

睡着要靠墙，防备苗沛①黑心狼；
 钢刀头下枕，遇着苗沛心要狠。
 睡觉莫睡着，防备官兵过了河；
 睡觉莫脱袜，防备苗扒子。

睡觉靠墙睡，防备官兵苗老沛；
 睡着睡醒点，老妈子②放里边。

兔子跑成路，黄蒿长成树，
 野鸡满天飞，一庄一个磨③。

情愿耙套地，
 不听侯老永④的戏；
 打火吃紫烟，
 越想越生气。

侯永清的戏，
 不听不生气
 麻秸枪红纸旗，
 锣鼓一声响，
 蹦出个拿鸡的⑤。

① “苗沛”是指苗老沛即苗沛霖的简称，或称其苗扒子、苗蛮子。

② 老妈(音马)子即妻子。

③ 这首民歌描述的是同治年间捻军失败后涡阳农村景象。

④ 侯老永即侯永清，亳州侯集(涡阳北)人。传说他是个“五狼光棍”，欺软凌弱，与其子侯龙标都死在张乐行手里。

⑤ “拿鸡的”即偷鸡的，或称“鸡扒子”。

张建勋、毋占鳌①，

二八佳人搭吊桥。

打开徐家楼，

先牵马后牵牛，

回头带你家大丫头②。

六月小调③

正月里正月正，老乐领人朝南征，

朝南征到淮南地④，四面八方乱纷纷⑤。

二月里龙抬头，龚瞎子领人打柳沟⑥；

打了胜仗回家转，打了败仗不回头。

三月里三月三，老乐屯兵正阳关⑦；

大小兵丁都害病，亏了神仙下仙丹，

又亏饿狼来搭救，搭救猛虎出了关。

① 张建勋、毋占鳌原都是任柱部部下。1860年，任柱与张宗禹等攻打苏北江浦，坛城交给张、毋防守。他俩便叛变投敌，里应外合，使坛城被蒙城团练攻陷。

② 这首民歌记述苗沛霖团练攻打徐家楼的烧杀淫掳。徐家楼在宿州曹市集（今属涡阳）北五里。

③ 这原是首十二月小唱，系涡阳县顺河集（原属宿州）王葺子所提供。他因病未能唱完，数日后即病故，虽有另一人唱出了“八月里水连天，老乐兵困正阳关，多亏饿狼来搭救，搭救盟主出了头。”但与王葺子所唱“三月”的内容差不多。

④ 淮南地又作江南地。

⑤ 乱纷纷又作乱哄哄。

⑥ 柳沟今属阜南县。

⑦ 正阳关属寿县，在淮河、颍水会合处。

四月里来麦丝黄，老乐定计杀饿狼^①；
饿狼本是忠良将，将星落在西北方。

五月里来天气燥，老乐领人打顾桥^②；
大家小户都种稻，大河湾里免心焦。

六月里来热马蹄，老乐领人去装旗；
瞧瞧老万^③好兄弟，×××××××。

十四月小调

正月里正月正，咸丰坐殿乱哄哄；
长毛贼子造大反，雒河集又反了张乐行。

二月里龙抬头，老乐领人上南游；
雒河集上打一仗，打了一仗种了仇。

三月里三月三，五色杂旗上三河尖^④；
大小长毛都害病，过路神仙下仙丹。

四月里四月八，老乐领人要回家；
刘北城子打一仗，整整队伍转回家。

五月里是端阳，能打能闹数饿狼，
打满天下无对手，天下英雄数他强。

① “饿狼”是刘永敬的绰号，宿州顺河集（今属涡阳县）人。1857年12月，刘永敬与其侄刘天台在六安为张乐行、龚得所杀。

② 顾桥在凤台县西北，以陈醋出名。

③ “老万”指韩老万，即韩万峰，顺河集西南大韩庄人。捻军蓝旗首领。

④ 三河尖在霍邱县，史、漕河之入淮处，西界河南固始境，昔日为皖豫边商业重镇。

六月里三伏天，韩老万兵困正阳关，
里无粮草外无救，一圈子炮划围得严。

七月里秋风凉，苏天福领人去打粮，
刘北城子打一仗，打了一仗抛了粮。

八月里是中秋，龚瞎子实坐六安州，
南北山下来进贡，蓝旗一去不回头。

九月里是重阳，龚瞎子定计害饿狼，
他把饿狼来害死，小白龙叛死在六安州上。

十月里天气短，龚瞎子死在松子关①，
云南王子②来吊孝，死后官上又封官。

十一月天气寒，出来强贼叫苗蛮，
铁打的寿州都破过，纸糊的蒙城作了难。

十二月整一年，五色杂旗上家还，
白天黑夜只管走，奔到家里好过年。

十三月一年多，李四一③定计害老乐，
他把老乐来拴住，献给僧王把头割。

① 松子关在湖北罗田县，与安徽霍山县交界处。

② “云南王子”指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

③ “李四一”是李家英，僧格林沁赐名勤邦。蒙城县西阳集（今属涡阳县）人。

十四月一年零，僧王领人向南平，
一天杀够十五里，上下黎民得太平。

大鼓词“杀僧王”

大清统一镇山河，咸丰坐殿民不乐；
咸丰坐殿十一载，改换同治来坐坐。
就起咸丰坐天下，不是反来就是乱，
枪刀滚滚动干戈：明罗山结反了苗蛮子，
江老台招兵聚将江家坡，龚瞎子聚众公吉寺，
涡阳县招兵聚将活阎罗^①，阎王亮好^②人和马
要把万岁的江山夺。万岁听说心害怕，？
问谁去平活阎罗？僧王说赐我多带人和马，
让我去平活阎罗。万岁问他怕哪个？
僧王说我怕阎王爷！带兵路过曹州府，
顶头就碰活阎罗。四月二十开的仗，
遍地多深小麦棵，打了三天并三夜，
僧王打败躲麦棵。阎王一边开言道，
高叫皮绠^③你听着，你为何不将僧王来逮住？
皮绠说让我麦棵去找找。麦棵里僧王正坐着，
皮绠将他来拿住，手举大刀将头割。
老百姓见僧王死的苦，年年烧香来敬着。

① 活阎罗指张宗禹。

② “亮好”即“明摆出来”之意。

③ 张皮绠，涡阳（雒河集）北十五里之张楼人。

后 记

这是将拙文有关捻军史者十余篇结集出版。我之研究捻军史，肇端于调查，故颜曰《捻军调查与研究》。

初闻捻军之名，是在50年代初就读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聆听罗尔纲先生讲授的太平天国史专门化课。然我的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却都选择的是陈恭禄先生指导的清代嘉庆间白莲教、天理教的两次起义。这也是我在捻军调查时注意捻军和白莲教之间关系的缘故。大学毕业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历史二所，研究隋唐史；后调安徽省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始从事近代史的研究。

1958年，省科研所扩建为中国科学院安徽分院，历史室改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遂即实施历史室初建时拟定的调查捻军的计划。组成一个5人的调查组，于当年8月奔赴淮北，进行捻军史迹的实地调查。

历时两月的调查，几乎走遍涡阳全县及蒙城、亳县、潍溪、永城（河南）等县的部分村集。获得了大量有关捻军的口述史料及民歌、实物。捻军蓝旗主要首领韩老万（峰）曾使用的“齐头镡”，我们带回合肥，转送给安徽省博物馆，列为一级文物，后又被中国历史博物馆征调去。

整理调查资料时，由我先将搜集的捻军歌谣，整理成41首，

加以注释，赶在当年《安徽史学通讯》最后一期上发表。当时还议定先利用调查资料撰文发表，然后再刊布调查资料。《安徽史学通讯》1959年第6期发表的拙文《捻军的产生及其初期活动》观点或看法大都得自调查。比如捻字的解释，原是淮北的方言，与铺(pū)、股、伙同义，都指的是群体；同时从调查得知，捻军的组织基础是宗族，而非宗教，与白莲教毫无历史的渊源，且二者之间的关系龃龉。

1959年，全国掀起了一股修志的热潮，我们又都承担了编写省志的中心任务，就使得“捻军调查报告”搁浅。结果是既未写出省志，又荒芜了研究的园圃。随之“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又接踵而至。先是参加工作队，到农村去教育农民；后是“斗批散”，拆庙赶和尚，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历史也真会开玩笑。岁月蹉跎，春秋八度。直至1976年全国开展古天文资料的普查（据说是受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出版的影响）需要懂点古文的人，我始得离开农村，参加由省科委组织的安徽省古天文地震资料小组。时值唐山地震，安徽另加地震历史资料。古天文资料普查的成果，曾获得全国第一届科学大会一等奖。然而成果的出版问世，却是在10年以后的《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1988年）、《中国天文史料汇编》第一卷（1989年）、《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1988年）。

两年的古天文地震资料普查结束，省人事局曾调我去省出版社任历史编辑。但因事先未征询我的意见，而被我拒绝。遂又到省博物馆去待上两年。

1980年4月，美国学者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博士访问合肥，在参观省博物馆的座谈会上，得知她已将拙文翻译。就在这年，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Chinese Studies

History》NO13,1980,P41—51),译载了拙文《论捻军和白莲教之间的关系》。一年后收到裴宜理编译的《中国人论捻军起义》一书(纽约阿芒克·夏普出版公司,1981年),收录我的《关于捻的解释》、《捻军与白莲教的关系》两文。其余为罗尔纲、江地、张珊3人的6篇论文。

1980年底,我调回复建的安徽省社会科学研究所,重操旧业。见到《江淮论坛》1980年第6期发表的李东山《论捻与白莲教的关系》一文,是针对着江地和我的文章的,遂写《再论捻与白莲教的关系》(载《江淮论坛》1981年第6期),以与之商榷。同时,又从尘封的旧书堆中,检出我1958年捻军调查的原始记录,幸有一张调查的时间历程表犹存,可以帮助我追忆20多年前调查时的情景。遂将其整理出来,以《捻军调查记》为题,发表在《安徽史学》1984年复刊第1期,以竟夙愿。《捻军调查记》杀青后,我再访涡阳。旧地重游,是为追寻过去,重温旧事,增点感性东西,核实道路里程。

1985年应邀参加新修《涡阳县志》评稿会,是我三访涡阳。谯承县志办公室聘用的张汉三老先生厚爱,以手抄的佚名《江河南发匪志记》相赠。他是从河南夏邑县志办公室保存的油印本转抄的。《江河南发匪志记》是1964年文物普查在夏邑县桑垌店发现的手稿本,系当时人记述捻军的活动,极有史料价值。其中有“龚得于咸丰五年秋自夏邑回亳,张乐行腊月后称盟主”之说,引起了我对捻军雒河集会盟于咸丰五年秋成说的怀疑,于是写了《捻军雒河集会盟时间考》,发表在《安徽史学》1987年第1期。

另再对几篇未刊之文稿,交代一下写作的崖略。

《论捻军与太平天国的关系》之成文,几经易稿。这是治捻军史者,都要触及的问题。我在捻军调查后亦曾拟定的研究题目。

1980年，裴宜理访问省博物馆，她曾问及我以后的研究题目，我以“捻军与太平天国的关系”相告。后来，在撰写《安徽近代史》中的《捻军起义》一章，就将其作为一节。去年，参加在南京举行的“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成立大会暨学术”，再将内容加以充实，改写成论文。

《捻军起义与淮北圩寨》也有个成文的过程。1985年在合肥举行“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100周年学术讨论会”，我曾写了篇《团练与圩寨》，着重于合肥团练及后来成为淮军创建之基础。再作进一步研究，认为淮北的圩寨是由于捻军起义使之兴起的；而并非如有些中外学者的看法，是圩寨兴起促成捻军起义。

《捻军人物姓名小考》，则是近年来在为《安徽近代史》撰写捻军起义，或为《省志·人物志》撰写捻军人物传，以及为《太平天国大词典》撰写捻军条目。时感资料记载中多把捻军人物的姓名弄错，或是一人多名，比较混乱。遂属文以辨正。

《捻军歌谣真伪辨》一文，草成有年，现加修定。是针对60年代初出版的两本《捻军歌谣》集，滥竽充斥其间，为辨其真伪而作。

回顾我的研究工作历程，对捻军历史的研究，则是调查奠定的基础。所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也。70年代的天文地震历史资料普查，在省博物馆参加过全国的善本书整理，使我得见一些现在难以看到的资料。80年代的春风和熙，风调雨顺，正是耕耘收获的季节。差堪告慰的，捻军调查搜集的口述史料，弥补了捻军本身资料的匮乏；我对捻军史上一些问题的看法，谬蒙国内外同行的注意，视为一家之言。

去年，王鹤鸣所长建议我将捻军史的文章整理出版。这里需要说明的，即对已发表之文，除《捻军调查记》，因近又发现我当年整理的旧稿，予以补充。其余均不作内容观点的修改，只稍

改动个别字句，或改正原排印之误。《戊戌涡阳刘朝栋等起义》虽是光绪间事，但是发生在涡阳，与捻军起义有相似之处，故亦收录。我们那次调查搜集的捻军歌谣，原是由我整理注释后发表的，现按内容归类排列，重加注释；翁飞翻译的裴宜理《中国人论捻军起义·导言》，亦与捻军调查有关。均作附录，收入本书。

本书承蒙领导的敦促，友朋的鼓励，出版社编辑的帮助，始得以问世。书中的照片，均为涡阳县文联牛家昆先生提供，是其50年代末搜集捻军故事时拍摄，较为珍贵。均当在此一并表示谢忱。并以此纪念捻军起义140周年。

马昌华

1991年8月于合肥

责任编辑：秦 闯

封面设计：钱念孙
